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7

中央文献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F

ISBN 7-5073-1163-6/K · 561

定价:280.00元(共6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文献出版社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ЕВ

МОСКВА,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史料—中国—1927~1931 ②共产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史料—中国—1927~1931 N. ①K260.6 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269 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18.5 印张 459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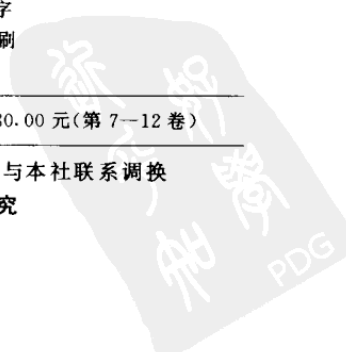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 元(第 7—12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413份，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1927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8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9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7、8、9、10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0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明其姓名全称。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1927年7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1933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2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1996年版。

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并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1937年4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至8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1937年8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

人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1927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宝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1927年至1937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20年代末，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1928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和

“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1928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现在没有发现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1928年3月以后继续活动的材料。从1928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20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中国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中山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30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谴责和迫害。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1937至1938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1937至1938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院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机关、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左”倾或“右”倾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 and 执

^① 见B.H. 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1970年版第170—176、180—188、209—218页。

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用各种“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在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倾向分子”和“敌对分子”所搞的“阴谋”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中等水平”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工作。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20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作出的修改。

随着30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火

案中赢得崇高声望的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并能于1934年6、7月间向斯大林提出必须重新审定已明显遭到失败的方针的问题^①——这一切促使斯大林同意（并非没有摇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新的策略。然而众所周知，以前的方针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否弃，而斯大林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七大的决议。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似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是暂时推迟到将来，即到反击日本的时候去实现，这有碍于清醒地总结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和以往的年代一样，在苏联的对外政策^②和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在中国执行的路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对这一构想持批评态度的“左倾”反对派的首领们被解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后，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事实和文献表明，这种看法未被证实特别适用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期。实际上，在国家关系方面转向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政策有其最初的动机，并由直到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冲突发展，即提出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所决定的。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20年代末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出的，正是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和苏联东西方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给苏联国际处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契切林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而使自己能够作出坦诚评价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在

^① 关于季米特洛夫在重新审定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方针及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见K. K. 什里尼亚：《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和战争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莫斯科1979年版第36—45页；A. M. 格里戈里耶夫、A. B. 列兹尼科夫：《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载《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274—293页。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5—1974年版第5—10卷。

共产国际内无谓地谈论同子虚乌有的反苏战争准备的危险作斗争只能损害和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①。他认为，从苏联利益角度看，“继1923至1926年实行的绝妙政策以后”自1927年在中国采取的行动方针是“极大的错误”^②。契切林在1929年10月写给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信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在我看来，共产国际目前的方针是极其有害的……在中国，我们正穷于应付1927年致命方针带来的后果……我们把1927年对华政策的方针搬到了西方，这是可怕的，它正在全力破坏同德国的关系”^③。

“共产国际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的主导地位在30年代初，在1929至1933年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保持下来并有所加强。这表现在提出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战争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上。在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民主党，通过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在东方，这表现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对中国形势的“左”的估计的升级上——“新的革命高潮”（1930年）、“革命危机”（1931年）、“革命形势”（1932年）和夸大苏维埃运动的规模 and 实际作用上（“苏维埃革命在相当多的地方取得胜利”、“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④）（1932年）。这一方针也决定了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国家关系的对抗性质，1929年至1932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① 1927年6月20日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见B. B. 索科洛夫：《鲜为人知的契切林》。摘自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解密档案，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2期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1929年10月18日契切林给李可夫的信。同上，第15页。

④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莫斯科1934年版第317、323页。（下称《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在论述苏联外交史的著作中，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不符合它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造成苏联国际处境恶化的左倾政策的原因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些作者这样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正是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充满了“世界革命迅速到来的期望”^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思想家和宣传员们的理论构想和评价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其中许多人，也还有共产国际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善良地陷入了迷途”，把希望当作了现实。但是在分析这种极左倾向的原因时，应当估计到，这种倾向早在 1927 年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进行反“右倾”斗争时早就发展起来了。正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浪潮中，在 20 年代末，许多共产党首先是一些大党（西方是德国共产党，东方是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新的领导。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中，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是一个极其主要的方针，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论证，并被认为是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宣传战争危险即将到来的思想和结合关于苏联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的论点在国内加剧“被围困的要塞”的形势，这些都被用来确立斯大林的专制，用来论证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

30 年代初对中国形势上述评价的暂时冻结以及对“苏维埃革命”的规模和作用的夸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加强联系着的。这些评价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批准的政策“正确性”，尽管文献表明，莫斯科有足够的材料可用来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力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工作

① H. B. 扎格拉金：《苏联外交成败史》，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88 页。

人员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对苏维埃力量的评价“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宣传夸大的极限”。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包括它们的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开始考虑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是1927至1931年间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直接参加下所通过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和中共领导机关的一系列决议中制定的。这些决议的大部分已收入为专家们所熟悉的文件集中^①。这一政策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由斯大林在192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以及布哈林在1927—1928年的著作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对于理解共产国际这几年里制定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其他领导人，如库西宁、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米夫、曼达良等的讲话，也还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中国研究所发表的文献^②。对形成苏维埃政策的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托洛茨基1927年及以后(根据“一个反对者的”原则)的立场^③。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它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方针的反应、中共

① 见П.Е. 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莫斯科1932年版和1960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1917—1949)》，见《1917—1927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76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工人运动(1917—1949)》，见《1917—1949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共产国际》，莫斯科1993年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卷《论中国》，汉堡1990年德文版。

领导人及其各派在制定和执行苏维埃运动方针时的作用，这一切在其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同共产国际和地方组织的来往信件中，在领导人的著作中和在中共的报刊上都有反映^①。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那些年的许多文件已在西方一些国家^②、在台湾^③、在日本^④和在香港^⑤公开发表。

共产国际文件中涉及到这个时期苏维埃运动的内容和目标的一般性论点通常在中共的文件中毫不修改地加以重述。同其他各党一样，从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就共产国际某些决议和指示作出一些专门的决议。与此同时，和以往一样，党的领导层及其地方组织内的各个派别不仅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对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状况提出自己的评价，在某些时期里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计划。总的说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流行的评价和指导方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左”倾向，有时要比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更甚。这是同中共新的领导人中尚未根除的“左”的观点和情绪一脉相承的，这些领导人是在从似乎有可能实现激进方针但失去了机会的角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浪潮中进入党的领导层的。20年代末

① 见《中共党史文件（1920—1949）》，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1927—1937年（五卷本）（下称：《中共党史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1991年版。

②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勃兰特等编，剑桥（马斯）1952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托尼·塞奇编，阿尔蒙特1996年版；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1961、1967年版；肖作梁：《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西雅图1969年版。

③ 《共匪祸国史料汇编》，台北1964年版；吴天威：《陈诚藏资料选目题解》，剑桥1972年版；杜诺万：《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共资料》，李厚伯1976年版。

④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东京1965年版第1卷；第3—7卷；竹内实：《毛泽东集》，东京1983年版第3—5卷。

⑤ 《中国共产党文件（1927—1930）》、《〈中央通报〉文件选编》，香港1979年重版。

在共产国际内强调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以及在评价中国形势时“左倾”的滋长为中共党内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加强提供了土壤。

中共党内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表现是1930年形成并试图实现的李立三的极左主张和行动计划，李立三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的时期里实际上领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所指望的是，通过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暴动和罢工，借助于红军力量的冲击，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革命的“爆发”，从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①共产国际阻止了这一方针的实施，因为这一方针引起了中共领导层中的尖锐危机并给它的力量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但是在评价中国形势方面的左倾情绪的增长为中共活动中的左倾复发提供了土壤。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正当开始转向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像在1928年初那样又不得不克服中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批准的方针的惯性作用。

在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方面，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第三卷收集的几个主要部分的文件反映了这一过程的轨迹。

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作出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转向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武装暴动，从而形成了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城乡暴动时期。这些暴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组织遭到破坏，同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失去了联系。残存的一些组织和某些共产主义团体以及他们领导

^① 关于李立三的纲领和共产国际在克服这一纲领中的作用，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和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载《共产国际与东方。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战略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328—345页。

的为数不多的军队被驱赶到了偏僻的乡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主要在农村进行发展并同残存的和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取得紧密联系的时期。在进行暴动的过程中，党取得了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土地政策、组织武装部队和在乡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初步经验，进行了总结农村斗争的可能性及其作用的最初尝试。1927年底，时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中国的特殊条件，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军阀战争、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软弱，“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开始时它可能波及几个县并成为“初期暴动”，与发达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不同，“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冲而决的形势”发展^①。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出现了“割据”这个术语，反映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通向“最初在一两个省内”夺取政权的道路^②。同时，建立小块苏维埃地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可能性是同当时国内似乎存在着革命形势联系着的，当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暴动会与城市的暴动结合起来。

关于党遭到惨重失败和巨大损失的消息促使莫斯科修改了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在中国的行动策略，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的决议中和以更全面的形式在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定了下来。暴动的结局被认定为工农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的衰退和惨重失败。与此相联系，建议党采取暂时退却在“争取群众”口号下恢复和积聚力量的政策^③。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载《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第10期第294—296页。

② 《布尔塞维克》杂志1928年第13期第410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22、25页。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中所阐述的主要纲领性理论观点总的说来反映了早在1927年确定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向“左”转，这首先表现为否认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统治阵营中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反帝爱国主义潜力，否认它们有解决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任务的能力。与此相联系，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的反帝革命、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①。

尽管统一国家也属于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评价形势时却指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分裂的开始”，作为中共斗争的主要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制度的任务。与斯大林的理论相适应，认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②。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文件中和宣传中试图把苏维埃运动同时看作是反帝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走狗和亲帝国主义势力）。这种尝试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没有带来明显的实际结果，因为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中国各阶层居民对这种运动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改变为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形式有所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

在20年代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中，对南京政权的评价的演变也是与上述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和潜力的评价相联系着的，从认定南京政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演变到认为它是地主资产阶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第16、18页。

级性质的政权^①。无论在这个时期还是稍后一个时期，共产国际都未能对南京政权的潜力作出恰当的评价。在评价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南京政权活动的性质和前景中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缘由：否认中国有按照“凯乙末尔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在 20 年代末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斯大林的讲话中所作出的有关结论的惯性作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们从世界经济危机中看到了有助于作出这种评价的补充论据。在中国和世界报刊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国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城市里广泛的失业现象和许多乡村地区闹饥荒的材料也对作出这种评价有影响。南京政府成立后相继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战争使人们得出“上层”深刻危机的结论。甚至在 30 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趋向调整和寻求实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尽管事实上承认南京政权是能够对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没有清醒地分析国民党在发展经济和统一中国方面的政策的内容和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只是“半承认”季米特洛夫在 1936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总之，蒋介石能够组织起四分之三的民族，但他不是争取统一中国、反对各派军阀、反对分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斗士”^②。这番话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长时期内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南京政府把孙逸仙的学说作为官方的理论，这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这一学说的各个方面以及一些国民党派别和左翼国民党人团体要维护和利用孙逸仙学说中最激进部分的企图采取否定的态度。

与“左”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排斥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①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机构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对南京政府评价的演变，见 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史学家论中国问题》，第 177—179 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86 年版第 265 页。

（“改组派”）以及谭平山和邓演达一类的“第三条道路”党进行任何交往的方针^①，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某些担心，唯恐这些势力会吞噬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共产党。此后，由于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解释为激化同“中间”势力的斗争，这一方针又成为共产党同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宗派主义自我隔绝的根源。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策略方针规定了对党在城乡的活动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城市来说建议采取退却和积聚力量的策略：恢复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恢复党在工会中的阵地，通过组织罢工以及口头和报刊的鼓动宣传工作将城市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②。

在农村，尽管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初尝试几乎各地都遭到挫折，而共产党人领导的小股部队经受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还是采取了“扩大苏区，巩固可能成为开展更大规模运动的根据地的地区”的方针。扩大游击队被认为是通向建立中国红军之路^③。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斯大林在接见代表时的讲话都谈到了这一前景。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建立中共武装力量的工作^④。

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指导党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人组织，争取在工会中发挥决定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1—32页。

^② 中共六大关于组织工作、关于共产青年运动、关于职工运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和决定，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节40—59、72—77、78—86、112—123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0页。

^④ 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39、92—99、107—110页。

性作用和最终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没有考虑到中共从事活动的现实条件。在这里，以及往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指示和中共的文件^①中都保留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原先固有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斗争水平、关于工人阶级由于受本国和外国资本最深重剥削而具有“特殊革命性”的过高估计。

随着南京政府工会政策及其工厂法^②效果的显露，对中共在城市里的地位开始产生影响的，是对残酷的警察监控措施与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宣传对于主要工人阶层和城市基层群众的影响的估计不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流行着这样一些观念，既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人贵族”的土壤，那就有利于将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些观念没有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即国民党的工厂法和工会法给大城市的熟练工人阶层所提供的最低限度工作保障，使他们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更不用说同失业工人分离开来了。

对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所积极响应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爱国主义要求和口号对于工人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不可避免地要对 30 年代初中共的活动产生影响。

从 1931 年底起，共产国际试图实施“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党组织应当独立领导爱国主义团体和爱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1929 年 8 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 248—251 页；第五次全国职工会代表大会决议（1929 年 11 月）—《中国职工运动文选》，北京 1958 年版第 2 卷第 309—312、339—340、343—344 页；又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 1957 年版第 238—358 页。

^② 关于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工会政策见：B. И. 霍里科夫：《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2）》，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80—94、112—142 页；又见 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68—86 页。

国主义行动,同时把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这些尝试导致了爱国主义团体的分裂,使共产党人处于孤立状态,并成为警察容易获取的猎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代表于1932年初在“上海保卫战”期间批准的策略,即上海各阶层居民和保卫上海的部队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发动以武装抗击日本军阀占领上海的图谋的策略使中共的组织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和党在城市积极性的衰退^①。这一情况以及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屡遭失败、工作人员屡遭逮捕,促使中共作出决定,于1933年初将中共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这实际上是默认固守城市的尝试失败。

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具有另一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在表述一系列重要理论原理,首先在确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农民……希望拥有土地”)上^②,表现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原先固有的想法,要把从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搬到中国来,深信在中国自发的土地革命也已成熟^③。同时,在考虑到中共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了中国农村形势的许多特征和特点、农村各阶层和各种组织包括传统性组织在内的行为和作用,以及中共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和途径。在代表大会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共以后在军事工作中所要碰到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答复^④。总

① 关于中共组织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立场及其后果,见T.H.阿卡特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79—188页。

② 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页。

③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1920—1925年)第13页。

④ 《中共六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和《中共六大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有关于农民组织、游击战和建立红军的专门章节,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34—39、92—98页。

的说来,在中共六大以及随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制定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的决议,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不断加以利用,转入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和各种类型的中国农村反抗运动以及分化瓦解军阀队伍的轨道。实施这一方针使中共有可能利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利用当时统治阵营内部各派力量的混战,以便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地区,在国民党各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管辖范围的间隙地带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①。

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关心中共这方面的活动分不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中共农村活动的经验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拟定了一些指示,明确指出和规定了在农民土地政策、军事建设和红军作战策略方面的方针。这项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技术专家、参谋工作和侦察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许多人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领导了中国红军的集团军、红军的司令部和苏区的军事院校。具有在俄国和中国内战年代工作经验的苏联军事专家为军事院校的中国学生编纂了有关军事组织、游击战争策略方面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中国红军院校里也曾广泛加以利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曾设想“在总的革命高涨形势下,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是可能的”。同时认为,“这些省的政权也将会在几个中心城市里夺得”^②。以后的事态发展——苏区的扩大和红军在农村的发展、党在城市的阵地明显薄弱——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自己的方针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

^① 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 1980 年版第 125—129 页。

^②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 24 页。

年7月)》中,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主要是同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联系着的^①,而将“建立有充分战斗力和政治上经得起考验的红军”^②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在1931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城市处于政府当局和外国列强严厉管制的情况下,“工农红军自然将成为积聚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的中心,成为整个革命运动高潮的极重要的杠杆……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主要形式”^③。由此可见,在1927年秋至1937年夏的时期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计划夺取政权和首先在一些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类似广州革命根据地那样)建立苏维埃到得出结论,在“牢牢控制并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加强红军”作为压倒其他一切工作的主要任务^④。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把中共全部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农村中来。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这个术语。

事态发展表明,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的设想和预测相反,“苏维埃阶段”在中共的活动中不是战略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向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转变使中共有可能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尤其是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了根据地,而主要是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成为反对南京的各个地方派别有实际兴趣与之结盟的一支力量。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

①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280页。

②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页。

③ 同上,第296页。

④ 同上,第296页。

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收入本系列文件集第三卷的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还阐述了制定和实施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大量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的文件及其同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决定中共于1927年下半年转向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口号内容的演变过程和莫斯科在准备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一些专门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一时期在通过一些重大决议和向中国发出指示以前进行讨论的内容,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2月)等等。

很大一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在实施六大后恢复中共组织的计划方面,在组织在苏联为中共培养干部方面,在分析党的领导层、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方面所做的工作。

破天荒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工作人员1929至1931年间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关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同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来往书信、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的记录。

第一次发表了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中国的米夫关于远东局活动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决议草案，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红军建设和农民土地政策问题的指示信，补充说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制定苏维埃运动方针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编者们发现的关于莫斯科给中共及其工会经费援助的文献资料。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些文件对于了解经费援助的规模，而主要是对于了解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系统为在城市里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领导机构的活动提供财政补助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概念。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会国际系统在中国的工作大大加强，第三卷收入了大量资料，揭示了工会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方针和工作成果。

总的说来，本卷的文献资料和以前出版的文献资料一样，包含许多新的材料，既可以大大充实，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纠正现有文献中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的评价。这里发表的文件为研究本文件集的中心议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内容，在每个部分的引言中都作了简短的说明。当然，在这些简短的引言中不可能详尽地探讨在文件中所涉及的议题和内容，这需要吸收其他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史专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者，都会对本卷发表的材料为对这一领域内迄今很少研究或者颇多争论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所提供的可能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在这些不仅为中国史和苏中关系史的专家而且为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中，作为例子，我们列举了莫斯科对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当时和以后将他们推举到党的领导地位上的作用问题。很自然，这里说的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第三卷和第四卷发表的文件，包括在共产国

际刊物上发表的已为人知的材料表明，从 20 年代末起，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都积极促使毛泽东进入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的行列，竭力维护和加强他的地位。早在 20 年代末，由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特别重视农村武装斗争的作用，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经常不断地特别提到“朱毛军队”（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的作用。从 1929 年底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已经讲“毛泽东的军队”，它的内部结构、政治工作的组织在 1930 年就被认为是其他部队的范例（第 221、260 号文件）。1930 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同意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决定，尔后又建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在项英和周恩来到达那里以前，毛泽东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远东局领导下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建议重新审查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选举结果，毛泽东被留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同意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使他进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在 1932 至 1933 年间给予毛泽东以重要支持，当时由于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苏区的很大一部分军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开展批判毛泽东的运动，解除他的军队领导职务，甚至以“赴苏治病”为由让他离开苏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与莫斯科协商后发出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关于让毛赴苏的建议也被拒绝了，认为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冒险，是危险的。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坚持，在 1934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任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闻天取代他担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是没有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同意的。很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收到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作出决定将毛泽东的报告以单行本形式用俄文和其他多种文字出版。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当中只有毛泽东的名字被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以中国苏区名义向代表大会所发的贺词中也同样如此。王明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鉴于上述情况，莫斯科对1935年秋所收到的关于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共主要领导集体的消息作出积极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①。

文件表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至少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起高度评价了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并支持推荐他担任政治局的一些最重要职务（负责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和特种工作）。早在1920年至1930年初，远东局认为他与李立三不同是最有才能和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第206号文件）。周恩来1930年4至8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亲自确认了对他的这种看法。在此期间，斯大林曾接见过他，莫洛托夫也几次接见过他，他受委托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30年底至1931年初，远东局实际上随时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周恩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和苏区的工作。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他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兼红军总政治委员。

^① 应当指出，对阐述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的这种意见，近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上也得到了承认。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杂志北京1997年第4期第21—23页。

现在发表的文件为以下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提供了补充论据，即莫斯科曾极力主张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提拔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各级领导层中去，总之，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建立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体制。

本卷中发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秦邦宪（博古）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许多学生绕过中共同共产国际的通常联络渠道同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领导人交往的书信表明，东方书记处领导特别器重这批人，把他们看作是“可靠的”和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指望得到他们提供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情报，而往后逐渐地把他们提拔到中共和共青团领导机构的各种岗位上。毫无疑问，陈绍禹由于跟米夫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往的联系受到了特殊的信任。1930年7至8月间李立三主义“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冲突，随后在党内对批评自己方针的人进行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决定加速选拔“莫斯科派”的进程，以便保证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持久忠诚。众所周知，结果在1931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陈绍禹、沈泽民和其他许多“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被选进中共中央，陈绍禹还被选进中央政治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青团中央局推荐选拔秦邦宪为中央局书记（见第409号文件）。

然而，陈绍禹的这一提升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莫斯科派”在党内领导中占居主导地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完全清楚他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在党内缺乏根基。把大部分“老的”政治局委员，如周恩来、项英、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仍留在党的领导成员内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和张国焘还担任各大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一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1931年底陈绍禹去莫斯科后，被任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代表团领导人的高级职务，还得到了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重要职务的任命。他本人开始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所熟悉，并被选进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取得了国际性的知名度，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被认为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正如文献所表明的，莫斯科没有把他看作是“党的领袖”，是党的总书记的候选人。

本卷和以前的几卷一样，不可能收入值得人们注意的所有材料。出于篇幅的考虑，编者不可能将东方书记处会议的许多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解决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时的争论和探索的速记记录以及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决议草案都一一收入。莫斯科一些档案馆的某些尚未为研究人员开放的材料也未能收入本卷。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在发表一些用糟糕的俄文书写的文件（如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陈绍禹给米夫的信）时，编者只对某些明显的语法错误作了修正，总的说来保留了文件的语言特点。文件中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当时在文件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人民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苏区、国民革命军。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和词典中常用的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共产主义小组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И.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M. Л.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 M. 莱特奈

尔，教授 И. 克吕格尔，教授 Р. 费尔伯和博士 Т. 特拉姆彼达赫。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Л. А. 罗戈娃、Е. Е. 基里洛娃和 Ю. Т. 图托契金，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А. И. 卡尔图诺娃帮助发掘文件，卡尔图诺娃还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发掘了一些文件。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В. И. 格卢宁、М. Л. 季塔连科、К. В. 舍维廖夫、М. 莱特奈尔、И. 克吕格尔、Р. 费尔帕和 Т. 特拉姆彼达赫撰写。书目索引由 К. В. 舍维廖夫编写，并有 И. 克吕格尔参加。人名索引由 В. В. 拉林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编写，并有 К. В. 舍维廖夫、В. Н. 谢契林娜和 М. Н. 斯莫林娜参加。在编写人名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工作人员 К. К. 米罗诺娃提供的材料。

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Н.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Е. К.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Н.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

本卷俄文版责任编辑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责任秘书 Н.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向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策的转变

(1927年7月—1928年8月)

1.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录)
(1927年7月16日) (15)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
记录(摘录)(1927年8月11日) (16)
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
记录(摘录)(1927年8月18日) (20)
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1号(特字第99号)
记录(摘录)(1927年8月25日) (23)
5.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8月26日) (26)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2号(特字第100号)
记录(摘录)(1927年9月1日) (31)
7. 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
(1927年9月5日) (33)
8.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
(1927年9月6日) (35)
9.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
(1927年9月14日) (36)
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
记录(摘录)(1927年9月15日) (70)

11. 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27年9月20日）……………（73）
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第103号）
记录（摘录）（1927年9月22日）……………（87）
13.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9月24日）……………（89）
14.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
上的讲话（摘录）（1927年9月27日）
……………（92）
15. 库诺夫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1927年9月27日）……………（94）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6号（特字第104号）
记录（摘录）（1927年9月27日）……………（97）
17. 弗赖耶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面
报告（1927年9月）……………（100）
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速记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日）……………（102）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47号记录
（摘录）（1927年10月1日）……………（117）
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文件（摘录）
（1927年10月6日）……………（118）
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特字第106号）
记录（摘录）（1927年10月6日）……………（120）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
（1927年10月11日）……………（121）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9号记录（摘录）
（1927年10月13日）……………（122）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51号

-
- 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14 日) (123)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速记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14 日) (124)
26. 希塔罗夫给沙茨金的信
(1927 年 10 月 14 日) (132)
27.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2 号 (特字第 110 号)
会议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27 日) (135)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 52 号决议
(摘录) (1927 年 10 月 28 日) (137)
29. 布哈林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 (摘录)
(1927 年 10 月 31 日) (138)
30. 牛曼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11 月 29 日) (140)
31. 波赫瓦林斯基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7 年 11 月 29 日) (141)
32.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 年 11 月) (142)
33. 普利切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7 年 12 月 3 日) (151)
34.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 年 12 月 5 日) (153)
3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不早于 1927 年 12 月 5 日) (159)
36. 特里利塞尔对牛曼发自广州电报内容的报告
(1927 年 12 月 9 日) (169)
37.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9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2 月 6—17 日) (172)
38.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9 号 (特字第 116 号)

- 记录（摘录）（1927年12月6—17日）……（173）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2日）……（174）
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3日）……（175）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号（特字第2号）
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3日）……（176）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27年12月23日）……（178）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
（1927年12月29日）……（179）
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3号）
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9日）……（181）
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号（特字第4号）
记录（摘录）（1928年1月5日）……（183）
46. 越飞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1928年1月6日）……（185）
47.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和琼森的信
（1928年1月10日）……（196）
48.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和琼森的信
（1928年1月10日）……（205）
49.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8年1月10日）……（209）
50.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28年1月17日）……（210）
51.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信
（1928年1月23日）……（214）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67号记录

- (摘录) (1928年1月28日) (218)
53.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
发言和结束语 (1928年1月31日) (219)
54. 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
(1928年1月) (258)
5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1月) (278)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记录(摘录)
(1928年2月2日) (299)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28年2月4日) (300)
58. 索洛维耶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6日) (301)
59.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6日) (302)
60.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
(1928年2月11日) (303)
61.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28年2月13日) (306)
62.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2月15日) (313)
63. 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
(1928年2月15日) (316)
64.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会议第3号
记录(1928年2月22日) (333)
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
(1928年2月23日) (337)
66.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17号记录(摘录)

- （1928年2月27日）……………（338）
67.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27日）……………（346）
68.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
（1928年2月27日）……………（348）
69.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
（1928年2月29日）……………（351）
7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2月）……………（360）
71.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28年2月）……………（364）
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1日）……………（374）
73.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3月2日）……………（375）
7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的信（1928年3月7日）……………（376）
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15日）……………（377）
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5号（特字第14号）
记录（摘录）（1928年3月15日）……………（379）
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
（1928年3月22日）……………（381）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特字第15号）
记录（摘录）（1928年3月22日）……………（382）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会议
第1号记录（1928年3月22日）……………（387）
80. 米夫给加拉罕的信

-
- (1928年3月23日) (389)
81. 诺林与向忠发和苏兆征关于中国宣传鼓动工作的
谈话记录(1928年3月28日) (391)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会议
第2号记录(1928年3月29日) (394)
83.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4月3日) (395)
84. 米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4月6日) (397)
85. 布哈林给米特凯维奇的电报
(1928年4月7日) (399)
86. 瓦尔加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初稿
(1928年4月7日) (400)
87.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8年4月10日) (409)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特字第20号)
记录(摘录)(1928年4月19日) (418)
89.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定(1928年4—5月)
..... (420)
9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5月1日) (422)
91.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联共(布)中央的信
(1928年5月3日) (426)
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
工作的训令(不晚于1928年5月4日) (429)
93.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
(1928年5月4日) (443)

9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5月7日) (445)
95.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
(1928年5月7日) (447)
96. 琼森和布劳德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书记处的信
(摘录)(1928年5月8日) (449)
97. 中国共产党代表给农民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5月16日) (453)
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特字第24号)
记录(摘录)(1928年5月17日) (456)
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6号记录(摘录)
(1928年5月24日) (457)
100. 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8年5月25日) (458)
101. 向忠发和苏兆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6月5日) (462)
102.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6月6日) (472)
103.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6月初) (473)
104.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
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 (477)
105.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
(早于1928年6月11日) (483)
1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委员会会议第102号记录
(摘录)(1928年6月12日) (487)
107.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6月12日) (490)

-
108. 米特凯维奇关于给中国工会拨款的证明
(1928年6月12日) (491)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9号(特字第28号)
记录(摘录)(1928年6月14日) (492)
 1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飞行表决
记录(摘录)(1928年6月14日) (494)
 111. 米夫给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
和加拉罕的信(1928年6月14日) (496)
 112. 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6月19日) (498)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0号(特字第29号)
记录(摘录)(1928年6月21日) (500)
 114.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 (501)
 1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1号(特字第30号)
记录(摘录)(1928年6月28日) (504)
 116.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6月) (505)
 117. 米特凯维奇的书面报告《中国苏维埃的经验》
(1928年7月10日) (508)
 118. 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928年7月19日) (511)
 119. 米夫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7月24日) (513)
 120.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会议
第2号记录(摘录)(1928年7月25日)
..... (514)
 12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 决议案（不晚于1928年7月25日）……………（517）
1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5号（特字第34号）
记录（摘录）（1928年7月26日）……………（521）
1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中共出席共产
国际第六次大会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28年7月31日）……………（522）
124.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8月10日）……………（525）
125.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核心
小组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1928年8月11日）
……………（526）
126.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8月14日）……………（528）
127.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不早于1928年8月15日）……………（533）
128. 苏兆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8年8月18日）……………（538）
129. 瓦西里耶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8年8月27日）……………（539）

第一部分

向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策的转变

(1927年7月—1928年8月)

收入本卷这一部分的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从1927年7月中旬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裂到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期的对华政策。

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这是南京政权形成的初期，这个时期经历了同北方军阀势力的尖锐斗争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政治周旋和军事冲突。1927年下半年，正当南京和武汉出现联合的可能时，爆发了一场国民党各大军政派系（南京派、武汉派和广西派）以及党内各个政治流派（“西山会议派”、汪精卫的拥护者等）为争夺南京政府领导机构中的席位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

一些派系有影响的人物得以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在这种形势下，以及由于南京的军队在同北方军阀作战中的节节失利，蒋介石于1927年8月辞去了南京政府军队总司令职务。1927年9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成立了作为国民党新的临时领导机构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一举措引起了国民党许多省党部，以及武汉和广东的将领们的反对。8、9月间，掌握着武汉派军队的唐生智将军对南京发动了军事攻势。直到11月才被阻止。武汉的制控权落到了广西派首领李济深手里。1927年11、12月间，广东的将领张发奎和黄琪翔为争夺广东而对广西的李济深和黄绍竑部队发动了战争，结果以汪精卫支持的广东派在这里掌握控制权而告终。关于国民党首领们和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些冲突的情报在很大程度上使莫斯科和中共得出了“上层危机”、南京不能建立稳定政权等等的结论，并由此指望发动革命来取得胜利。

联合起来对抗北方军阀并与之继续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首领作出妥协，以便建立卓有成效的政府和军事指挥部。1927年12月，蒋介石在同各派首领谈判后，重新担任了南京政府军队总司令职务，而在1928年1月成为南京政府首脑。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通过了进行

北伐的决定，4月初南京部队协同冯玉祥和宣布加入国民党的阎锡山的部队向北方发动新的攻势。1928年4月至5月，南京政府的部队占领了山东，6月阎锡山的部队进入北京，并宣布北伐胜利完成。到1928年年中，在南京的庇护下国内大部分省份实行联合（1928年12月连满洲政权也宣布承认南京政府），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形式上的，但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事态的这种转变大大出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所料，因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和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制定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时的出发点是，1925至1927年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国家统一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

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寻求使中国共产党摆脱由于1927年上半年的战略和策略失误而陷入困境的途径，急速改变口号和策略方针，重新评价中国的形势，探索新的行动纲领。1928年春夏，这种探索以制定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而告终。在这段时间里，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中，在他们的计划中，在评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能力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和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议开辟了中共力量在军队中、在农村和城市里的武装发动阶段到1928年1月总结这些武装发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广州暴动，即1927年12月11至13日的广州公社）失败的教训为止。第二个时期从1928年1月到7、8月，经过在1928年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中国委员会的激烈争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后来在2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对如何评价中国的形势和对中国的策略方针作出了重大修改，并阐述了苏维埃运动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确定了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六大批准的决议的总的內容。

表明这个时期莫斯科对华政策特点的基本倾向和方针以及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和中共六大决议的总的评价已在总的前言中进行了阐述。收入本卷这一部分的文件阐述了这些方针的形成过程，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在制定这些方针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史上的事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参加下召开的党的主要会议及其决定、中共组织的武装发动、制定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主要阶段）在一些专门的文献出版物^①、回忆录性质的著作^②和各种观点的研究著作^③中都有足够广泛的反映。

尽管现有的材料极其丰富，但本卷这一部分发表的文件将为

① 《广州公社（论文资料集）》，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9 年，1967 年；《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34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30 年第 1—6 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 1929 年第 1—6 册；《（中共）八七会议（1927）》，北京 1986 年；《南昌起义》，北京 1987 年；《海陆丰革命史料》，广州 1988 年第 2 卷；《广州起义资料》，北京 1985 年第 1 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 1982 年第 1—3 卷。

② 《回忆中央苏区》，南昌 1981 年；《广州起义资料》，北京 1985 年第 2 卷；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 1986 年第 1—2 册；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劳伦斯 1971 年、1972 年（第 1 卷 1921—1927 年，第 2 卷 1928—1938 年）。

③ T. H. 阿卡托娃：《国民党中国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 1983 年；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 1980 年；Л. П. 杰柳辛：《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21—1928）》，莫斯科 1972 年；B. И. 哈尔科夫：《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2）》，莫斯科 1977 年；M. Ф. 尤里耶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20—40 年代）》，莫斯科 1983 年；郭德宏主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史述评》，北京 1996 年；李新、陈铁健主编：《星火燎原（1927—1931）》，上海 1994 年；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北京 1989 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5 卷，北京 1996 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 1992 年；R. 桑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1928—1930）》，西雅图 1969 年；M. R. 里斯泰诺：《中国革命的艺术：动员不满的群众（1927—1928）》，图尔罕 1987 年。

阐明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的政策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这样或那样一些事变中和制定中共政策中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使人有可能明确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或有争议的一些重大事实和结论。

在令人特别感兴趣和感到新鲜的材料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一时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以及像斯大林和布哈林这样一些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联共（布）各种会议上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内发表的讲话的原始稿。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以政治局名义发出的电报（第2—4、10、12、16、20、27、38、65号文件）以及以斯大林名义发往中国的电报表明，1927年下半年向武装暴动政策的转变和随后向在暴动过程中建立苏维埃政策的转变是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方针有直接联系的。从这些文件以及迄今尚鲜为人知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南昌暴动的计划（第14号文件）和与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相联系的在广东革命根据地新的基础上“重建”的计划都是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这里发表的政治局文件，使人有可能在现在准确地指出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作为实际行动口号的时间，即1927年8月12日（第2、3、20号文件），这个口号决定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性质的估计，这也是从原先斯大林关于提出这一口号的时间和条件（革命高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方针出发的。

在莫斯科，人们期待着南昌暴动部队的胜利南下和华中、华南诸省农村地区的暴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阶段”和高潮的开始，这从本卷首次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受政治局委托于1927年9至10月间起草的《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决议（第18、19、24、25、28号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收到南昌暴动部队在汕头附近遭到失败和湖南、湖北暴动尝试未获成功的消息后，制定

决议的工作停了下来，关于“新阶段”到来的宣言也没有发表。但是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取消，尽管在内容上作了一些修改：现在不是把苏维埃解释为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而是解释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

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发表的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代表发往莫斯科的书信、报告和电报也引起了这一时期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这些文件反映了国际代表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统治阵营内即国民党内的状况和中共现状的评估以及他们对中共策略的意见和建议，还有许多材料含有目击者，即直接参加中共一系列大的发动，如南昌暴动（第9号文件）、广州暴动（第63号文件）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的见证和评价。第一次发表了莫斯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在那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牛曼之间的来往电报（第30、31、36、38号文件），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牛曼提出的1927年12月10至11日夜在广州举行暴动的计划，尽管遭到波赫瓦林斯基领事的反对。

总的说来，除涉及个人问题的少数文件（第46—54、61号文件）外，在评估政治经济形势、国民党内的状况时，占主导地位的界定词是“崩溃”、“瓦解”、“停滞”、“倒退”（第32、34、35、54、55、63、69、71号文件）。⁵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牛曼，以及在他们回苏联后履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责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在1927年最后几个月里（第35号文件），甚至在包括广州暴动在内的许多暴动尝试失败后，认为在中国仍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和“革命高潮”（第55、71号文件）。

这些指导方针助长了中共多数领导人的盲动主义观点和情绪。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又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情绪和相应的评估（他们多半拥有后者的通报）中找到了有利于对形势作出这种评估和提出中共行动策略方面的建议的论据。这种方针和这类评估，其根源是莫斯科批评中共前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

不善于利用似乎摆在眼前的有利机会来取得胜利、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反过来又对莫斯科通过的决议的性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卷这一部分的许多文件，例如首次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会议（1928年1月）的材料（第53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的声明和书信（第53、55、71号文件）表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代表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以前甚至以后都一直坚持原先的立场，认为中国的形势仍存在“革命高潮”。1928年4月以前一直在中国工作的米特凯维奇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的“特殊意见”以及政治局建议将这些问题提交中共六大的立场（第90号文件）。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文件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许多会议的材料，使人有可能找到苏维埃运动新的行动纲领，即农民土地政策和军事政策、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指导方针、党的建设问题的指导方针的形成轨迹。

在对中国形势的评估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关于国家政治经济分散、新的军阀混战不可避免的论点，罗米纳兹夸大了这种形势的长期性和“不间断性”乃至达到了极点，他断定，中国“革命形势”的长期性将以年来衡量，要“抓住”机会利用这一形势来在“最薄弱的地带”即中央和地方派系权力薄弱，既无力同中央争斗也不能彼此之间争斗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些结论稍后（在中共六大上）发展成为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论点。

关于农民起义和暴动的可能性问题曾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起义和暴动是局部性的，不会对国内总的形势产生影响（第32、34号文件）。但是谈及这一问题的多数人认为，农民发动可能成为地方游击队的根据地，在此基

础上经过组织和训练可能组成赤卫队和红军部队。这一结论写进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随后又在中共六大的一系列决议中加以发挥。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会议以前，就给中央军事部起草了一份专门的训令，规定了中共在农村建立武装力量的基本工作方针（第79、82、92号文件）。在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系列文件中，都考虑到了在农村尝试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农民分田地的经验。这里指出了（来自于莫斯科的）全部土地国有化思想的缺点，也指出了在小私有者和佃农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庶民重分土地”方案的困难（第117号文件）。这些结论在中共六大制定苏维埃的农民土地政策时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代表们的文件中特别注意到工人运动问题和工会状况问题。从这里发表的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探讨这些问题的多数作者来说，突出的一点是对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工人举行罢工和反政府行动的可能性和准备程度估计过高，而对新政权建立的工会的影响估计不足。也有一些清醒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它们的影响在不断增长（第96号文件），但这是极少的例外，在寄给莫斯科的通报中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这种影响只体现在当局对工人的恐怖政策上，政府工会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不可能抑制主要工人阶层所保持的战斗情绪和他们对新的经济和政治发动的向往（第61、69、71号文件）。这些估计也反映在1928年2、3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的一些材料中。只是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对中国形势的评估才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统一的进程正在进行，尽管这种进程很不稳固（第116号文件）。

本卷发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之一皮亚特尼茨基（他负责处理给共产国际各党的财政

援助问题）给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以及寄给中国的信件，第一次提供了充分说明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在1927—1928年间给中共、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工会经费援助的规模的可能性（第83、102、105、107—109、122、124号文件）。中国这些组织的代表们就此问题给莫斯科的信件（第90、116号文件）表明，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是如何解决的。

这一部分的文章还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明确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和在中国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机构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关于这些或那些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正式立场和实际影响和特别是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处代表的特殊作用的材料。

这一部分发表的文件揭示了国际联络处驻华代表活动机制的某些方面。例如，从中可以看出，从1928年4月到1929年3月，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开始工作之前，国际联络处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不仅是经费的掌管者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的组织者，而且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代表（第69、90、103号文件）。

这一部分的文件使人有可能更加明确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代表在广州暴动失败后时期所依据的具体策略方针的内容。

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和琼森认为，在城市里组织新的暴动的尝试是不行的，他们积极支持中共领导采取的广泛发动农民暴动和在乡村开展游击斗争的方针（第61、71、103号文件）。1928年2月3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从莫斯科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电报中谈到，不能允许举行“没有准备好的暴动”（第56、57号文件），这意味着“准备好的暴动”可以举行。

1928年3、4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和苏联军事部门的代表共同制定了在华南一个农村地区建立大的游击根据地的

计划。1928年4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给布哈林的信中建议向中共中央推荐建立这样一个根据地的计划，设想在那里集中中共主要党的干部和军事干部，并由苏联提供军事专家和物质技术资料的援助（第84号文件）。根据由布哈林签署发给米特凯维奇的电报内容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支持开展农民游击战的计划，但反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地区，认为建立几个分散的游击战根据地是适宜的（第85号文件）。策略方针的进一步修改是发生在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工作的筹备过程中（第123号文件）^①。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重要决议的制定是在布哈林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布哈林在大会开幕时作了指导方针性的报告并在其闭幕讲话中对争论作了总结。^②应当指出，这一情况后来在布哈林被解除共产国际的职务和被谴责为“右倾”后，还被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用来重新审查代表大会的一系列方针，例如关于对富农的态度问题和对中国形势总的评估问题。揭示在莫斯科这一时期立场的文件中，引人注目的是本卷这一部分首次发表的斯大林和中共部分领导人在代表大会前夕的谈话的简要记录（第104号文件）。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对农村地区农民运动和游击战前景以及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相互关系的见解。

在本卷总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中出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所固有的想把在联共（布）对俄国革命经验所作的解释的基础上形成的评价和结论搬到

^① 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第 71—108 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1 册，第 9—52 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闭幕词，见第 3 册第 93—132 页。

中国来的倾向。应当加以补充的是，这种倾向以及对农村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研究不够也表现在大大夸大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试图借助于也是根据俄国经验进行的分类（“富农”、“中农”、“贫农”等）来描述农民的主要阶层上，这种分类运用到中国多半不是以社会差别而是以财产差别来加以划定的。少地和无地农民被划入“农村无产者”、“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之列。实际上农村大批的穷人和流氓都被划归“农村无产者”。结果在中国农村，“不算城市”就存在巨大的“无产阶级潜力”。

此外，代表大会的文件也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工作人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理解是很深入的，这反映在提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一系列“难题”上和提出中国农民社会结构的特点上。

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与中国许多地区缺乏自己的地主经济和存在大批无地贫农、流氓和退役或现役士兵有关的问题。布哈林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给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人平均分配土地，结果就会在革命后每个农民平均得到的土地要比以前少。布哈林认为，“应当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因为不然的话，“从土地的角度看，农民从革命中得到的东西很少”，不能使他们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保卫者^①。布哈林承认，他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现成答案。布哈林说，革命胜利后应当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公益工作，如工业建设和道路建设等等，以便保证大批无地农民的工作^②。但是在革命胜利前，在开展土地斗争的过程中应该做些什么呢？依布哈林看来，新政权手中唯一的“王牌”就是能让农民生活得更好，尽管土地数量减少了，因为他将支付的捐税少得多^③。但看来，布哈林本人也感到这一论据极不充分。他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册，第127—128页。

② 同上，第128页。

③ 同上，第128页。

在结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时说，“在任何情况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你们注意，不要轻率地提出这些要求，以免将土地搞得越来越碎”^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对农村基本居民群众状况的评价还规定了一种划分（和对抗）的界线，即（根据地区、气候条件和军阀混战带来的后果的不同的）灵活界线，把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阶层跟其财产尚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区别开来。当农村大量居民群众直接面临生与死的问题时，把他们分为“饱食者和饥饿者”的这种做法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文件中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成了中共农民土地政策中“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根源之一，成了决定支持和响应旨在维护农村基层利益的党的方针的基础^②。

代表大会的一些决议制定了农民运动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道路。在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提出的行动策略考虑到了各个地区农民发动的特点，以及地方传统组织和武装部队的性质和作用^③。在这个文件中和在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的专门部分（“建立红军”）中，确定了建立中共武装力量的主要途径和来源（农民游击队、农村传统组织的队伍、土匪部队、军阀部队解散后组成的部队）。换句话说，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的工作人员已经完全意识到，建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在农村开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农村传统组织的掌握。还规定把红军正规部队同半正规部队和青年自卫队结合起来。建议在这一阶段将游击战策略作为红军的行动基础^④。关于军事

① 同上，第128页。

② 详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1—1937）》第87—99页；又见他的《在中共六大决议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形势评价的几个问题》，莫斯科1981年第20—37页。

③ 《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34—39页。

④ 同上，第92—98页。

工作的文件是由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中共方面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周恩来和项英，联共（布）方面有：布留赫尔、别尔津和马马耶夫。

总的说来，在六大的决议中提出和解决了中共农村组织所直接面临的许多问题，在与南京争权夺利的各派发生新一轮激烈军事冲突（1929年春至1931年秋）的情况下，中共得到和利用了极难得的加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机会。

在中共六大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批准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共产国际六大于1928年9月1日通过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提纲有关中国的段落简要地归纳了中共六大政治决议的基本要点，重复了这一决议对国内形势和中共任务的评价^①。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册，第152—153页。

1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录)

1927年7月16日于索契

致莫洛托夫

(1)关于中国的事来后再谈。你没有理解我的信^①的意思。信中说不能认为间隙是例外,但这还不意味着可以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期新的高潮是例外。一句话,来后再谈谈。看来,您那里决定将反对派的文件分送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您拿什么东西来跟这些文件相抗衡呢?难道只拿布哈林的最近一篇文章^②吗?这可是非常不够的!所以散发文件是不利的。

(2)您匆匆忙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③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算是什么——是向张伯伦的献媚还是其他诸如这类的东西?干吗如此匆忙呢?

致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年)》,莫斯科1995年第78页。

① 指斯大林1927年7月9日给莫洛托夫的信,(见《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年)》,第110—116页。

② 见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载《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年第2册,第855页。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9 号（特字第 97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8 月 11 日于莫斯科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 1927 年 7 月 21 日会议第 118 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3——（1）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同志^① 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 15000 支步枪、1000 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帐上）、30 挺机关枪和 4 门山炮，带 2000 发炮弹，总金额 110 万卢布。

（2）只有取得上级机关^② 特别允许后才能开始将货物运往海参崴。

（3）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

（4）将 41 名中共党员暂时留在库伦。

（5）关于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关于伯纳^③ 1927 年 8 月 9 日的电报问题^④，等布哈林同志回来后再议。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③ B. B. 罗米纳兹。

④ 文件没有找到。

(6) 不接受中国委员会关于让柳克斯^①同志留在汉口以便取得情报的建议。

(7) 不要阻拦唐生智的 17 名军官离开苏联。

(8) 提请中国委员会副主席^②注意，向政治局提交的问题在两个月以前已经解决了。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7 月 25 日

听取：3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答复 434 号专电^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④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1927 年 7 月 29 日

听取：3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7——立即给伯纳和乌拉尔斯基寄去 30 万美元。建议

① О. Ю. 普利切。

② И. С. 温施利赫特。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南昌暴动和随后向广东进军的计划。

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

抄送：伏罗希洛夫同志。

听取：39——关于中东铁路问题。

决定：39——认为可以根据政治局1926年11月20日和1927年3月11日决定^①单独解决经费问题。

抄送：加拉罕同志。

1927年8月5日

听取：4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47——（1）给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都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

（2）给加拉罕的指示：

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秘密工作人员带去30万美元。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1927年8月8日

听取：52——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52——给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

“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

^① 文件没有找到（见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19—23、81—82页）。

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把你们那里的工作做好，不要忘记〔军事〕部队和群众运动的联系。很高兴取得了成绩。感谢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乌拉尔斯基发表政治声明，我们认为是多余的。如果没有安全保证，我们建议乌拉尔斯基返回莫斯科。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74—7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0 号（特字第 98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8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米高扬同志）。

决定：2——（1）鉴于乌拉尔斯基同志^①已离开，取得所需经费和支配基金的权力授予伯纳同志^②

（2）远东银行上海分行的 30 万美元划在伯纳名下。

（3）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③ 1 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

（4）责成加拉罕和米高扬同志在 24 小时内商定派工作人员去汕头的问题，以便在那里设立商务代表处或我们的其他某种经济机构，并紧急通过政治局的相应决定。

抄送：加拉罕同志——全部；

温施利赫特同志——（1）、（2）、（3）；

沙因曼同志——（1）、（2）、（3）；

米高扬同志——（4）。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B. B. 罗米纳兹。

③ 陈友仁。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年8月13日

听取：3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

“伯纳、乌拉尔斯基。答复你们489号专电^①：

(1) 批准柯巴^②12日关于使国民党革命化的电报^③；(2) 你们的方针仍然有效；(3) 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4) 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5) 在目前阶段只限于在共产党报刊上宣传苏维埃，决不能迫使国民党左派支持这种宣传；(6) 关于建立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参加而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的上海式的省国民政府^④的建议是正确的；(7) 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8) 同意立即预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套做法；(9) 对形势总的估计是：在将领们之间斗殴、张[发奎]、南京和武汉相互削弱、工农日益不满、共产党善于领导和你们的军队对农民做出模范行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和成立工农革命民主政府大有希望。最高领导机关。”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H. B. 斯大林。

③ 见附件。

④ 指在1927年3月起义时建立上海市政府的计划。

[附录]

密电

致汉口苏联领事伯纳

您没有理解指示^①的意思。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农村一切政权归农会”的口号仍然有效。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不要让加伦^②卷入冯[玉祥]和唐[生智]的肮脏斗殴中，即使提提意见也不要。日内我们将逐项转告最高领导机关的答复，这里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请转告加伦，感谢他提供的善意的情报。柯巴。

晚间发出。

1927年8月12日。

托夫斯图哈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84、86—8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第2号文件。

② B. K. 布留赫尔。

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1 号（特字第 99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8 月 25 日于莫斯科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 1927 年 8 月 18 日会议第 120 号记录，决定：2（报告人：米高扬、加拉罕、温施利赫特、沙茨金同志）。

决定：2——1.（1）批准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同志作为派往广东工作的人选，在最终弄清南昌暴动部队进军的命运前安排好这项工作。

（2）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

2. 将今年正规学校的毕业生分为三组：

（1）没有受过政治训练和暴露出反革命观点的学生，要遣送回中国回原部队（23 人）。

（2）要为在加米涅夫学校^①毕业和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提供继续在“射击”^②学习的机会，并为他们成立一个专门组（7 人）。

（3）利用 5 名完全可靠的学生来从事我们在华的工作。

① 以工农红军总司令 C. C. 加米涅夫命名的高级联合军事学校（在基辅市）。

② “射击”是 1918 年成立的高级指挥训练班（在莫斯科州的索尔涅契诺哥尔斯克）。

3. 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 500 万发步枪子弹和 1000 发炮弹。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立即给军事主管部门拨款 549000 卢布用来补偿已耗费的物资。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庭审议军事主管部门支付这笔经费的程序问题。

4. (1) 批准奥赫京同志为驻蒙古全权代表。以中央名义给奥赫金同志发去关于他在那里活动的指示信。

(2) 责成中央书记处确定派往库伦的人选，以便举行定于 9 月 20 日召开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大会。

5. 批准派施塔尔曼和弗兰克同志去安德烈同志^① 那里。

6. 采纳沙茨金同志关于派阿布戈夫同志去中国协助别尔格^② 的建议。

7. 将米高扬同志关于汕头的报告备案待查。

抄送：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舍波尔达耶夫同志——1 (1)、4 (1)、(2)、5、6.；

柯西奥尔同志——4. (1)、(2)；

弗鲁姆金同志——3.；

文佐夫同志——3.；

米高扬同志——7.；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 (1)、6.；

戈尔布诺夫同志——4. (1)、第一部分；

叶努基泽同志——4. (1)、第一部分。

① Г. И. 谢苗诺夫。

② P. M. 希塔罗夫。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年8月22日

听取：2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1——派维伊曼同志^①去中国工作。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89—9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牛曼。

5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8月26日于上海

绝密

致青年们

亲爱的朋友们：

利用我在上海短暂逗留的机会，想给你们寄去一个关于青年团^①现状的扼要报告。嘱咐我少写一些和写得短些，我不得不服从。请注意这一点。

根据这里收到的苏联报纸判断，我们的青年团被夸奖得完美无缺^②。我丝毫不想否认，青年团的政治立场，更确切地说，是它的中央的政治立场最近几个月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但是应当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根本不能陶醉。同志们，多少了解青年团的人都会理解我要说的话。而局外人则应更贴近和更清醒地看一看现实。中央就党的政策问题通过的现

①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苏联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说，似乎中国共青团中央与中共领导相对抗，始终不渝地主张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反对陈独秀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见查里 [H. M. 纳索诺夫]：《今日中国青年团》，载《共青团真理报》1927年6月29日；JL. 沙茨金：《青年共产国际全会总结》，载《真理报》1927年7月1日。

在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历史”^①的决议，确实我没有费很大力气就执行了。但正是这种“未经斗争”就接受决议的情况使人产生一种忧郁的思考，好像处在我的位置上任何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某个强有力的党代表，好在这里没有）都会执行决议的。另外我还有一种“思考”，或更确切些说是一种相当坚定的信念，即：共青团中央若是处在党中央的位置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不会更少，而可能会更多。我有许多事实证明这一点，但我在这里只举一例（因篇幅不够）：当我们通过反政府宣言时（这是在7月19日），跟国民党上层决裂已成既成事实并且在这一点上好像已不可能有任何疑问，这时中央总书记布林斯基^②顽固地和长时间地坚持要把所谓“左派”如汪精卫的名字在宣言中全都勾掉，理由是据说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还可以最后推他们一把”。诚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失败了，而〔我〕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将汪精卫的名字保留了下来，但有些人的名字，他们不顾我竭力反对还是勾掉了。关于这位总书记，我应当说，他这个人很不稳定，政治上不大可靠。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取代他。曾经被列为总书记人选的贺昌是共青团内党的反动派的明显代表。实际上，除几次事件在政治上没有跟党进行过任何“斗争”。仅限于通过一些决议和在政治局内发表一些很胆怯的讲话。无论是布林斯基还是其他人都害怕进行真正的斗争，并竭力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中央的情况如此，那么你们自己可以想见，团的基层会做什么。在这里，

① 文件没有找到。1927年6月底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中国共青团任务的决议》中有引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1927年6月9日通过的决议中的一段话，其中含有对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对共产国际决议的隐蔽的反对立场的批评（全宗533，目录2，卷宗77，第184页）。在中国的文献中提到了1927年6月通过的《关于政策问题的意见》。在这个文件中谈到了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见《任弼时年谱》，北京1994年，第73页）。

② 任弼时。

可以说由于不仅无党派群众而且党团群众在政治上的幼稚，到处是一片混乱，头脑里稀里糊涂，这是犯各种各样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的良好土壤。极其不可思议的想法充满着我们下层同志们的头脑，主要是以往政策的残余。而目前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刚刚开始进行的清洗运动还只刚刚触及到党团的最高上层。因此我不能夸大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意义，我希望你们看到一幅很清晰的情景。如果有谁还对中国共青团抱有某种幻想，那么他早就应该丢掉这些幻想了。我们只是为在团内做认真的政治工作，即使团政治化开了个头。整个工作还在后头。这一点必须记住。我在这里，在中央经常讲这一点。

在组织方面，团的情况要比政治方面还严重得多。诚然，这里主要是客观情况的缘故。在中国整个领土上的迫害行动达到了如此残酷的程度，以致一参加共青团一旦被捕就百分之百等于死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共青团队伍里不可能留住大量的团员，特别是不可能留住革命最高潮时成千上万地归附我们，加入我们合法组织的大批群众。你们看，情况就是这样：

在上海，我们只剩下 890 名团员，整个江苏省只有 1670 名。上海有 70 个支部，其中多数是学生支部等。从社会关系方面看，无疑也是“闲杂人”占多数。在武汉，我离开时在 8000 名团员中只剩下 2000 多一点。在长沙，有 3000 名成员的组织中只剩下大约 100 名。在省里、在县里究竟在干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同多数县联系中断。在北方，组织也正在遭到破坏。在天津（有我们最强大的组织），那里 8 月份遭到逮捕，大大破坏了工作。在北京，继续留下来的组织几乎全是学生的组织，在目前受迫害情况下，表现得积极性不高。在张家口地区，在 6 月和 7 月因逮捕遭到完全破坏，失去了任何联系。在大连、哈尔滨、奉天，日本人特别加强了迫害行动，团的积极分子几乎全部被捕。在山西，阎锡山自宣布自己是国民党员时起也开始加强迫害我们的人，已经

逮捕了許多人。在直隸南部，出現了很有意思的“青年紅槍會”運動，但我們對他們沒有影響，因為我們在那裡幾乎沒有組織。南方幾乎沒有任何消息，但應該估計到那裡遭到巨大損失，因為那裡的迫害極端殘暴。你們看，組織狀況的情景就是這樣。可以認為，團組織削減了一半多，即大約 15000 個。還應當補充一點，中央同各省的聯繫非常薄弱，一個時期中央實際上只是三四個中心省份的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們已採取措施來改善這種狀況，正在成立中央南方局和北方局，還在上海設立聯絡站。中央在最近幾個月內還留在武漢（如果情況不發生急劇變化的話），因為黨中央是這樣決定的。確實在武漢，從迫害方面來說要比上海稍好一些。

至於團的工作，那麼在這裡近幾個月來的成績是微乎其微的，常常等於零，有時甚至表現為負數。其原因主要是最近幾個月來的客觀情況，事態發展異乎尋常推翻了一切計劃，沒有可能系統地進行團的改組工作。這裡還應補充的是團的積極分子很軟弱。儘管一而再地說，但不能抓住團工作中的最重要環節，可以說他們在政治上幼稚，同群眾聯繫也薄弱（90%還是學生）。

應當指出，其後果就是六大^①的所有決議幾乎都停留在紙面上，甚至沒有傳達到廣大團員群眾，因此也不可能在實踐中產生相應的作用。現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不得不按新的方式來貫徹實施，也就是說要重新安排團的工作，使之真正符合團的作用和任務。

這就是我不得不極其坦誠地向你們描繪的淒涼情景，不管由此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你們自己明白，我是多么高興向你們報告這些東西，當然你們也有理由對你們的代表生氣，因為他們也要對這裡的情況負責。但我認為我絲毫不能蒙騙你們，因此我向你們道出事物的本來面目。結論由你們自己去作吧！

^①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於 1927 年 5 月 10 至 17 日在武漢舉行。

明天我去南方，此事我已经电告你们^①。你们可能知道，那里最近几周内打算做什么事情，既肩负着我们系统的任务，主要也肩负着总的系统的任务。可能我在那里会逗留一段时间，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满足我电报里的请求，再派一名代表到这里来。我建议派柯里亚或米沙^②。希望能在我从南方回来时欢迎他们中的一人。向大家致诚挚的问候

你们的贝尔格^③

又及：为什么你们一次也不给我寄来薪水？光靠空气是难以生存的，只好东借西凑靠别人恩施。总之，钱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昨天和前天我们才收到一部分钱，这是四个多月来第一次。你们自己可以想象，没有钱会对团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尽可能地借着、拖着。各省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得到一个戈比，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大概是由于饥荒。请代我向国际联络部及其首长^④表示感谢。

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120，第 99—10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分别为：H. M. 纳索诺夫和 M. S. 阿布戈夫。

③ P. M. 希塔罗夫。

④ A. П. 阿布拉莫夫。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2 号（特字第 100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9 月 1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8 月 29 日

听取：2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7——将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送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听取：28——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

决定：28——相信阿尔布列赫特同志今后不会犯由包括阿尔布列赫特同志在内的上海四位同志所签署的信^①中所犯的那些错误。同意皮亚特尼茨基关于派阿尔布列赫特同志去中国工作的建议。

① 指 H. A. 福京、T. Γ. 曼达良、H. M. 纳索诺夫和 A. E. 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该信于 1927 年 3 月 17 日收到并被 Л. Д. 托洛茨基用来在 1927 年 5 月 2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联共（布）领导的对华政策（见全宗 495，目录 166，卷宗 68，第 82 页）。不知什么原因，在许多出版物上该信的作者之一 T. T. 曼达良的姓名被删去了，见 L.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安阿伯 1967 年，第 391—426 页。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92—9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

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

1927年9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国委员会

早在去年秋天，维经斯基同志就和陈独秀一起提出后者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①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情绪的问题^②。

后来，已是在今年春天，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③。

这两次，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也没有同意让维经斯基来莫斯科。

很可能，如果当时陈独秀来莫斯科的话，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国党较为正确的路线^④。

① 全会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第1册第480页。（中译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581页）。

③ 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

④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第2册第646页。文件标明的日期为1927年3月21日，其中提出了让陈独秀在五大后到莫斯科来的问题。（中译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153页）。

现在，米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报告时提出让布哈罗夫同志^①来莫斯科的建议，这是中国共产党这届中央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最近一个时期曾担任上海党组织的书记。

由于在莫斯科没有一名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所以请中共中央挑选这样一名代表是合适的，同时可以通过伯纳同志^②提出布哈罗夫同志作为人选。

所有这一切决不意味着我们让布哈罗夫同志永远脱离中国的工作。他在莫斯科最多呆一两个月，大约在1月份就可以返回中国。

请在例行会议上讨论此项建议。

赖 特^③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9，第 1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罗亦农。

② B. B. 罗米纳兹。

③ B. H. 索洛维约夫。

8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①的电报

1927年9月6日于莫斯科

上 海

阿布拉莫夫致诺罗夫。请在年底前拨给中共 17128 美元。在给伯纳的电报^②中有详细的结算单。第 964 号。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第 13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估计是 Ф. К. 费尔格德。

② B. B. 罗米纳兹。电报没有找到。

9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① 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②

1927年9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第四局分析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

罗加乔夫：会议开始。戈列夫同志发言，报告起义部队情况。

戈列夫：谈张发奎部队中最近的暴动，首先应该谈谈这支部队的构成情况。我之所以谈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报告不仅是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的，而且也是给这里的机关人员看的。我谈这一点是为了弄清，为什么暴动发生在这支部队而不是发生在别的部队，当时这支部队里的情况如何。因此我就从这一点谈起。

同蒋介石的关系破裂后，在政治军事〔顾问〕团^③内提出一个问题，认为唐生智是继蒋介石之后的主要力量，但他不是中国革命运动能与之很长时间同行、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人物。所以当时很不坚定也很不认真地采取了培养另一个更加革命和更加活跃的人物的方针，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取代唐生智。关于从中国军阀中挑选另一个代表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提出过，但认真地提

① 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

② 根据文件上标注，这是 В. Е. 戈列夫、М. М. 契赫伊泽、А. Н. 切尔尼科夫、Н. И. 瓦西里耶夫、Е. В. 捷斯连柯、И. Я. 泽涅克、Г. Ъ. 斯卡洛夫、К. Я. 沃尔金未经审阅的速记记录稿。

③ 指苏联顾问团。

出只是这一次。作为唐生智以后的另一个人选是张发奎。他的经历众所周知。年轻小伙子，28岁，出身于广东，指挥过一个师，一年多以后任前线总指挥，并且有实力，足以在武汉集团中占首要地位。这个张发奎就其境况来说，他离开广东，把广东留给李济深就失去了根基。他保留了一些过去跟随他的部队。同蒋介石决裂后，李济深不再提供经费和补给等形式的援助。张发奎想从南方得到补给已没有指望，于是不得不相应地改变政策。他面临着三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投靠蒋介石，但那里有李济深，有前军长陈可钰，有后来逃跑的11军军长^①。那里的大门是关着的，即使他被接纳了，他也不能占据像在武汉那样有力的地位。

第二条出路是向唐生智俯首称臣。但是早从第一次北伐时^②起，他就看到唐生智蔑视他，竭力想从广州的争斗中为自己的部队取得更多的好处，因此那里他也没有出路。他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单靠自己的人。一个没有根基和跟着中国将领们屁股后头转的年轻人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和培植忠于自己的人。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当前线指挥官的时候，只指挥一些团半年时间的人都成了他那里的指挥官。实际上他已不能再扩充了。于是他走了剩下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不以他的好恶为转移，这就是向左转的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将领现在都清楚，蒋介石是由俄国共产党人提拔起来的，张发奎也说过，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何况他了解得很清楚（中国的将领不是那种蠢货），共产党纪律严明，并拥有共产党员军官。如果命令他们去为某个将领打仗，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去打。因此第四军军长、后来成为前线总指挥的张发奎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把左派和共产党员编

① 陈铭枢。

② 指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阶段（1926年7—12月）。

入自己的部队。由于采取这个政策，结果在向河南进军^①结束时张发奎的部队里有8名团长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有30%的共产党员，营长也大致占这个比例，连长少一些，但在有些团里共产党员军官的数量相当可观。张发奎集团就这样充实了自己的部队，在扩充时就可以指望它们了。同志们知道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项真正革命的指示，即关于扩充革命军的指示^②，那里指出，张发奎的部队应成为扩充新的革命军的基础。其实，在客观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张发奎本人依旧是……^③张发奎部队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谈一谈政治状况。起义前是什么情况呢？右派坚持东进，根据他们的意见，只有同共产党人决裂这才能实现，因为不这样做，许多军就不会去，这次东进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部队带来了严重不利的因素，曾采取很谨慎的方针，使国民军的精锐部队^④停止前进不去反对蒋介石，而转向南方。对于新的革命派来说，尽管不得不谨慎行事，但事实毕竟表明，编入张发奎部队的第20军军长^⑤应开赴南方，但没有就这个问题通报给他，为的是不让国民党右派得知。不管怎样，由于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到6月20日查清，张发奎部共三个军、约四万士兵集中在九江—南昌一带，不是东进而是转向南方，准备占领广东。但这里有些事情不大清楚。首先，张发奎声称，没有汪精卫他不去。接着，张发奎

① 指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6月经过河南省向北进军。

② 可能是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30日的决定，在文献中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1927年6月1日的指示而闻名的（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2卷（1926—1927）第2册第763—764页。中译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98—300页）。

③ 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④ 指武汉政府控制的国民革命军部队。

⑤ 贺龙。

在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的时间时表现得极其慎重，而在南方他说，只有在集中所有部队之后才能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我们立即做得比自己的革命纲领还左，那么唐生智就会出卖我们。因此他提出了以下方案：我们将秘密地到达广东边境，4万军队和8万人口仿佛可以秘密行进。

“根据武汉对于共产党人所说的总的政治形势，我不反对让共产党员工作。我主张让共产党员工作”，并在所有人正式声称同共产党人决裂的最后时刻，他把共产党员都作为团长安排到了指挥岗位上，但附带一个条件，共产党员要正式声明他们退出共产党。他说，为了使他们能够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必须这样做。起先他要求所有团长、师长、师参谋长都离开。后来他同意团长可以留下，只是叶挺必须走。他说，“凡从别的部队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悄悄地跟我走。”他说，“我将悄悄地把他们带到广东，我们将在那里工作”。由此看来，他让人明白，他本人的立场很不坚定，但让他转移也不容易，他的不满是以共产党员的错误来衡量的。但不管怎样已经有话在先，他将同共产党员在一起，直到找到能够替代共产党员的自己人，直到有合适的团长和师长来替代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到广东后会找到自己的广州人，而把共产党员一脚踢开。因此在7月下半月，提出了采取更激进的办法来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在部队和整个军队方面，而且也在总的政治方面，在群众运动方面提出来了。这时候，机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中央委员会而存在（我不知道这在手续上是怎样完成的）。当时存在左的政治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①。所以在7月下半月就提出，我们不是那么软弱无能，应当根除政治书记处实行的并受到

^① 指1927年7月中旬作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而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共产国际谴责的政策^①。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相当高涨。湖南的暴动遭到枪杀^②，但依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农民的情绪是：他们能够继续战斗，广东农民的斗志也很高涨。是转入进攻的合适时机。在政治方面，在工农群众的发动方面（我不像斯卡洛夫同志那样内行），我只知道基本的情况，到9月中旬，那时湖南和广东要收割庄稼和缴税，可以指望农民们拒绝缴税，在这个基础上举行群众暴动。但是光把赌注下在工农暴动上是危险的，因为一些正规部队，一些正规的武装的富农会来镇压这个暴动。因此提出了在国民革命军部队里，在那些最适合发起暴动的部队里，即张发奎的部队里组织暴动或军事政变的任务。应当说，当时共产党人不仅仅在张发奎的部队里有影响。第6军里有一两个团，好像是两个团处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但整个第六军是刚刚组建起来的，还不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③中也有影响，但这所学校当时已经解散，一个团转入第6军的军校，一个团转归张发奎。在其他部队里，在第3军里，共产党员被赶走了，在其他部队里，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影响，至少影响很小，不能加以指望。原则上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指望从张发奎集团中选择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集团，即能够对张发奎的正规军施加某种影响的正规军团。即使大致审视一下他的部队也可以说，希望是完全存在的。若更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就可以看到，军事技术方面的形势则更加有利。这个时候张发奎和贺龙的前线部队正在集结。第11军不含第26师，即第11军的两个师已在那里，

① 这里作者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方针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策，即在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上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当前形势的著名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36—142页）中所谴责的政策混淆了。

② 指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政变后农民队伍向长沙进军。

③ 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第4军的一个师在德安，第20军在德安，第21师和第26师以及一些团在九江。在更详细地进行研究时，得到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在通向南昌的路上集结了第4军的第25师，其中两位团长是我们的人^①，另有一个团是我们的部队，其中一个团，即第75团是过去的第34独立团，这个团目前和将来都无疑是中国红军中最优秀的团。这个团绝对是共产党的团，不是从数量上说的，那里的共产党员占10—12%，但是这是些受过教育的共产党工作人员，是些成熟的共产党员。第25师师长本人是我方人员^②，他的第74团参谋长是共产党员^③，第四军的第12师和第21师是反动的，第24师已经在那里，是由叶挺指挥的，这个师无疑是我们的师，有两名团长是共产党员，另一名是个优秀的右派^④，总的说是个坚强的师。第24师是我们的师；第10师是加强师，很强大，是最强有力的师。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个团是我们的团，两个团不是我们的。第20军有些独立。关于这个军下面再来说两句。这样看来，在那里的部队中，特别是在三个师的广州部队中，至少有60%是赞成我们的。

第20军军长是贺龙。这是个曾在湘西活动的土匪，北伐开始时在王天培部队，是个很会打仗的人。他同唐生智部队有过某些冲突。在12月向杨森发动进攻时，他突然从杨的手里夺取了宜昌。唐生智部队沿长江进发时，贺龙所在的第10军本应从南方出发，但贺龙突然夺取了眼皮底下的宜昌城，缴了12000名敌人的枪，缴了唐生智一个营的枪。此后，贺龙本应被缴械，但他没有坐以待毙，他作为第15独立师的师长被派往河南。在那里给他派了顾

① 周士第和李强。

② 原文如此。第25师师长是朱晖日。

③ 王尔琢。

④ 分别为古勋铭、欧震和许继慎。

问^①。他不知道是否会缴他的枪。这时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蒋派自己的秘书到武汉来进行谈判，而贺龙守在长江上。他把这个代表团都抓起来枪毙了。贺龙很会打仗，结果把第20军交给了他。他没能跟张发奎联系上，虽然张发奎对他很好，但认为他的军队是二流军队。这时他正要开始准备出发。应当说，第20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是个很正经、很不错的人，他在贺龙师里很有影响，也影响了贺龙本人^②。贺龙跟他在一起。贺龙说，假如在这里不成，就到山里去，一有机会可以再出来。

应当说，这个贺龙是个精力充沛、英勇果敢的小伙子，不但他本人，他的部队也这样。他可以抛弃自己的部队，让它去做无谓的牺牲。不是任何一个中国将领都能让自己的部队去做无谓的牺牲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政治上把他加以改造，他是可以造就成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的。所以，贺龙的第20军，既然军长本人是共产党员，就开始充实共产党员了。贺龙开始招募成百上千名共产党员，他说，到7月20日，他那里约有2000名共产党员。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但至少这时他那里能有1000名共产党员，而一个军里有1000名共产党员，这是很大的数目了。例如，在他那里，炮兵都是共产党员军官。关于军事政变或者说武装暴动的问题原则上已经决定了。只是暴动的技术问题引起了争论。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在各个部队里大约有3000名共产党员自己离开部队并带走尽量多的士兵，不是带走部队，而是单个的人带着单个士兵，到某个集合点，在那里由这3000到5000人中组成新的部队，再到广东去。这个方案被否决了。第二种方案坚持了很长时间，是某位领导人坚持的，这不是进行政变，而是把部队带走。这就是说，比方一个营长带着一个营。共产党

^① M. Φ. 库曼宁。

^② 周逸群。

员营长带走这个营。再由这些单独的连、营、团组成新的部队。这个方案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据我理解，它也被推翻了。至少在有可能与之进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士当中，这个方案被推翻了。剩下的是第三种方案，即我们可以不组织“出埃及”^①，而是在驻扎在九江至南京一带的张发奎部队中组织政变，也就是说控制现有部队，撤换团长和师长，然后开赴南方。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不知道当时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方面的细节，因为对我们这些即使在张发奎部工作的军事顾问来说也是保守秘密的，是瞒着我们的，但我从我掌握的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从一开始在领导人中对此事的成功绝对没有信心，认为共产党力量很弱，没有斗志，没有战斗力，不管怎样会把这件事搞坏的，在中国，群众没有战斗力，不能进行斗争，不管怎样这是没有希望的事，在同我们的领袖们所进行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冒险的举措，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弥补自己以往的机会主义过错。他们这样做，对此谈论得很多，使人感觉到，对这件事的成功没有信心。这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对进行这件事的技术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首先整个这项工作被拖了下来。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拖了下来。拖得很厉害。起先决定朝一个方向进军，然后又决定朝另一个方向进军。关于这次暴动的细节有一系列方案。例如，张发奎是否参加暴动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样是否有利。大家谈到他要参加，必须让他率领部队去广东，而且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使他不会发表任何政治声明，在这方面给他自由。此外，还打算任命他为政府主席。总之对他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但他并非近代的军阀，而是现代的军阀。有位领袖^②提

① 语源于《圣经·出埃及记》所称：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的古称），意指逃出困境。——译者。

② 何人不知。

出这样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接受），在行进过程中停下来，在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中发动哗变。让他没有办法，只好参加暴动。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他策划的。策划这事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张发奎，也不知道中国的将领、中国的军阀是什么样。结果是，暴动举行了，而他成了反对暴动的狂热敌人，并没有参加起义。

其次，在谈论这次起义时，在策划这次暴动的过程中，始终忽视了一点：中国人不会举行暴动，需要俄国人来领导，需要俄国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领导。至于什么样的领导，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善于领导这次暴动，让别的同志来说吧。但如果说这次行动取得了什么结果，还不错（这是我个人的意见），那我不打算说，得出这种结果是否正确，因为俄国人并没有领导这次暴动。而依我看来，假如俄国人看手来领导，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开始就会来解决根本不必要解决的一些政治问题，因为要进行斗争，事实上就是这样。让同志们来谈整个经过吧！

现在我来谈谈实际举行这次暴动的情况。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①，28日凌晨发动暴动。给在张发奎部工作的军事人员发了指示。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一些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28日我去九江时，我们曾估计，我们下舰艇后不是直接去参加舞会，而是去监狱，因为28日凌晨若发动暴动，那么29日这天显然要进行逮捕，等等。而当我们来到时，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起义。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当时那里在进行反汪精卫的宣传，在德安正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写了一些很大胆很有力的文章，而这时，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军长则在牯岭开会。29日他们开始开会，30日他们把叶挺和贺龙召去开会，因为他们得到情报，说他们张贴传单反对武汉政府，总之之做得很不得体。但我本人则坚信，这时武汉领导人中任何人都

^① 可能是指第2号文件。

不知道，反动军队领导人中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暴动，因为30日、31日和1日他们没有对暴动人员采取任何果断的军事措施。他们认为，这是一小部分人，是可以劝说的。叶挺和贺龙被召去开会，而31日早晨张发奎来找我并说，事情不好，他们拒绝前往。派了第10师师长^①去劝说他们，然后再派第11军军长^②去劝说，如果他们劝说不成，那么前线总指挥^③则亲自去劝说。他们还考虑，这件事是可以靠劝说来解决的。但结果是：31日晚上，当时集结在南昌的叶挺和贺龙部包围并缴械了第3军和第4军的部队，并声明他们不服从武汉政府，决定向南方进发。停在九江和南昌之间半路上的第25师的部队，即第73和75团捣毁了铁路，占据了张发奎和第11军顾问的军用列车。顾问^④和第11军军长后被送回，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指示，俄国军事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⑤，所以有人对瓦西里耶维奇说“红军政治部送您回去。抬起手脚走吧！”31日在北边的部队和暴动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作战行动，但鉴于张发奎实际掌握着第12师，而只有第74团一个团在半路上，这个团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暴动部队就出发去南昌了。

现在说一说，这时暴动者手里掌握着哪些实力：叶挺亲自指挥的第24师——第70、71、71团大约有4500名士兵，18挺机枪和2门大炮；第25师的第73、75团大约有2000名士兵和14挺机枪。第10军的第28、29、30团三个团，大约有5000士兵，24挺机枪。贺龙部算出了不同的数字。我们知道大约有8000名士兵，20挺机枪，6门大炮。由此可见，在南昌地区集结了足够的兵力

① 蔡廷锴。

② 朱晖日。

③ 张发奎。

④ И. И. 瓦西里耶维奇。

⑤ 见第2号文件。

来进行独立的作战行动。这时有情报说，第10师的第28、29团似乎脱离出去了。不管怎样，已集结了至少12000—14000人，并有足够数量的子弹和足够数量的大炮，可以组成一支能够与敌人相对抗的象样的武装力量。这时，张发奎那里有四个师。在这四个师中，有三个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①。我想，他们现在都被免职了。张发奎无论如何不会立即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投入进去。朱培德的部队一部分在南边，一部分在北边。

这些队伍的领导机构是这样组成的。那里有由周恩来、彭湃和张国焘组成的革命三人小组^②。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三人小组，对起义部队的政治领导可以交给他们。他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俄国顾问吉贡^③，他最近曾在贺龙那里工作。对这个小组的指令是这样：尽快离开南昌，摆脱朱培德在北边的队伍，到达广东，与农民运动汇合，组成武装正规军的核心。当时，在广东东部有望发起农民运动^④。根据电报来看，事情果真如此。

现在来谈谈这支队伍的纯军事前景。关于政治前景可以说很多，但还是不大可靠的。至于军事前景我个人则坚信，如果对这支队伍进行相当大胆和精明的军事领导，它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不仅汕头地区，而且整个广东。当时都知道，李济深的许多部队不准备打仗，不愿意被打垮，而希望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中国古老的真理。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里充满着团结，在这些部队里，每个团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共同事业作战。在这一点上，这些部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我可以大胆地说，只要有1.2万到1.5万人，打败李济深的4万人是毫不困难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许

① 哪些人不详。

② 另一些资料说是：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

③ 可能是指 M. Ф. 库曼宁。

④ 指海陆丰的农民运动。

多例子，我们曾用较少的力量打败北方的军阀集团，我认为，如果他们勇敢作战，他们可以打到广州去。

就讲这些吧。

契赫伊泽：我来晚了一点，所以我不知道，戈列夫同志是否作了政治性质的评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城市里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如工人运动，然后是店员和小职员中的运动——这一切日甚一日地吓坏了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我们亲眼目睹在多半由地主和富商为军官的军队的逼迫下爆发的。我曾担任其军事顾问的何键将军在这方面起了领头作用。起先是逮捕，解散工会。湖南的运动被湮没在血泊之中。后来就转向共产党人。在这以前，从所有部队中赶走了政工人员，向其他共产党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或者不再当共产党员，或者离开军队。造成了与党完全脱离的局面。党转入了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应当说，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共产党从来没有公开打过自己的旗帜，始终是以国民党、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出面，没有暴露过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给共产党人的心理打上了沮丧的烙印，他们似乎不习惯于采取积极的独立行动。于是在党的领导面前（我曾参加各种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转向积极的行动，于是决定要使工农运动活跃起来。决定以比较有效的方式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就是利用有足够的共产党员军事人员这一情况，他们应当在南昌与九江之间地区发动南京攻势时集结在军队的右翼。决定进行共产党员的武装发动，夺取政权，然后在共产党员的强有力影响下组织武装力量，挥师南方，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广东北部；然后再发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并与湖南的运动汇合。事情大致就是这样。还决定为了组织暴动，如果当时可以将其称为暴动的话，从中共政治局和中央挑选一些同志来领导这次暴动。为了帮助和加强这项工作还从俄国人方面吸收三个人参加——两名军事人员，一名政

工人员^①。

关于我们可以指望的队伍的构成，关于现有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戈列夫同志在这里已经谈了很多。我不准备对此作什么补充。最初以为，这次起义需要在德安和德安地区举行。贺龙部队应在这里集结。曾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打算让共产党员和同情者集中在某个集合点。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应当这样做：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共产党在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些营、一些团和一些连向其他部队扩大影响并缴它们的枪，然后控制局面，向南进发，进军南昌和广东。贺龙在德安时，我和吉尔伯特同志到那里去遇见了周恩来。另外两个人没有见到。这是28日或27日。

关于俄国人参加这次暴动的问题至今还不很清楚，因为一直等待着莫斯科的批示。俄国人参加起义是很危险的和很负有责任的。在那里不单纯是俄国的志愿人员，而且是苏联的代表，因为两位军事顾问，一位是35军的顾问^②，与张发奎毫无关系，跟整个这件事也毫无关系，另一位是驻扎在汉口以西的第二军的顾问^③。在我们准备出发的第二天，来了一位同志，说从莫斯科接到了指示，俄国人不应参加这次行动^④。过了几天我带着报告到……去了。斯卡洛夫同志可以说一说，共产国际代表^⑤是怎样来的，这些代表和斯卡洛夫同志更了解这件事。当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对戈列夫同志关于贺龙的话需要作一点补充。他把他称为土匪。我们这里通常把土匪这个概念想象得很可怕：手持匕首，腰别手枪。贺龙不是土匪，他是游击队员。最初他以当游击队员起家（我直觉地说过这个想法，有些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后来他扩充了一些

① 可能指B. B. 罗米纳兹、B. K. 布留赫尔和参加1927年7月26日由中共领导人参与在汉口召开的会议的一位军事顾问。

②③ 何人不详。

④ 见第2号文件。

⑤ B. B. 罗米纳兹。

武装力量，再后来在我们的协助下他成了第20军的军长。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社会方面说，他无疑具有强烈的军阀倾向，然而他有与别人不同的某些特点，即：他与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任何联系，他出身于贫苦农民。这个时期，特别是后来，他向共产党员敞开了大门。在对共产党进行镇压的时期里，他虽然明白他那里有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①，在指挥人员中有共产党员政工人员，但他对他们没有采取不好的行动。所以说他的立场是友善的。在品德方面，他无疑具有一些对于一个革命领袖来说令人怀疑的嗜好：好女色，好赌博，好酗酒。这些缺点无疑会在今后与共产党的合作中起到消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军人，他在技术方面一窍不通。在军事方面，他从小就是个真正的打手，非常勇敢，属指挥官类型，意志坚强，英勇果敢，奋不顾身，与冯玉祥明显不同。我们总倾向于把每个中国将领看作是把自己的思想深藏在自己的肚子里的外交家、政治家。实际上对于贺龙来说则很难这样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优点。由于性情暴躁，他的情绪很容易表现在行动上。即使不是像他喜欢那样迅猛发作，他也会立即作出反应和非常激烈地作出反应。

所以应当认为，他同共产党的合作是十分真诚的。从思想方面来说，应当认为这件事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根据我们的情报，他是在起义前在南昌入党的^②。这样从形式上他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应当认为，按其社会出身来说，经过改造以后他是跟我们一起走得很远的将领之一，至少要比所有其他人、要比叶挺走得更远。这就是我要说的有关贺龙的话。

现在来谈谈这场运动的前景。关于这些暴动部队或者更确切

① 何人不知。

② 贺龙是在1927年9月初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些说脱离出来的部队能否到达广东,这一点几乎无可怀疑。在广东,农民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如果有有力的军事领导和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它在军事方面就能够更加扩展开来。部队的到来将大大加强这个农民运动。占领广州,然后占领湖南,并向长江一带进发——这是可以指望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事。还应补充一点,在南昌,这些部队离开时预先发表了一个国民党左派性质的声明,批评武汉政府的行为,但没有谈到蒋介石^①。似乎已选择孙逸仙夫人^②当左派政府主席,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行进。如果这个前景实现,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步骤,因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一直要打到这个运动充分展开时为止,那时实际上将提到从肉体上消灭广东和长江以南的所有富裕阶层的问题,这个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一定的时期里将有可能使国民党左派中相当数量的阶层保持中立,吸引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大学。这些阶层将抵抗和阻止来自李济深部队方面的斗争。正因为有为数众多的阶层受到相当认真的革命宣传,这是一件相当成功的事情。这个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要一直打到转向大规模开展农民运动时为止。这就是我能向戈列夫同志所讲的话作的一点补充。

斯卡洛夫: 同志们!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回忆我们是怎么出发的,又是怎么没有达到那里的,因为这可以在茶余饭后来谈。我想就戈列夫同志的报告提出几点意见。我认为戈列夫同志在试图评述这些部队的政治状况时,要比契赫伊泽同志离真实情况更远。戈列夫同志开始时试图将这次暴动的必要性同发展农民运动的必要性联系起来。接着他说,暴动是由那些不相信群众运动、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这次暴动会成功的领导人决定发动的,显然决定暴动的原因,或是希望举行暴动,或是为了恢复名誉。我认为,

^① 指1927年7月31日发表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的声明》。

^② 宋庆龄。

这种问题的提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戈列夫同志在这里把几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他把政治合理性问题——这是一回事，和另一个问题——把握程度，即这次暴动是否会成功，这次战役是否会胜利混淆起来了。这两个问题是不能混淆的。戈列夫同志把它们混淆了，因此得出了组织这次暴动所要达到的错误前景。这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说几句，不详细展开来谈。整个北伐是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进行的，是在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帕夫洛夫：“不是三个阶级，而是更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帕夫洛夫同志愿意把资产阶级不是分作三个，而是分作33个也行啊，在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商业资产阶级，还有工业资产阶级、大商业资产阶级，如果帕夫洛夫同志还想找出第四个阶级，那么这里有某些军阀（集团），他们是农村地主利益的代表，在国民革命中反映的不是自己的而是民族的利益。这就是南京政变^①的三种基本力量。蒋介石的背叛——这是大资产阶级和最自觉的一部分地主、最自觉的一部分封建主第一次脱离革命，他们清楚地懂得，农民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发展将挖掉他们的立足之地。武汉和南京的分裂意味着不仅是大资产阶级脱离国民革命，意味着不仅是某一部分资产阶级，而且是大批封建势力脱离革命。在最终分裂前转向武汉是暂时的，是在维护地主利益、豪绅利益、农村上层剥削者利益的军阀的立场日益动摇的情况下还要保持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资产阶级、地主向反对农民运动方面的这种摇摆、众所周知的和完全不可避免的过激行动，也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这体现在国民党政治情绪的右倾化上，体现在国民党内部派别的变化上，也体现在我们在国民党内的直接力量对比有利于国民党“左派”的日益右倾化上。大约从5月中

^① 指1927年4月蒋介石的反共政变。

或者从4月底起可以确定原国民革命军开始不代表它的整体利益，不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而开始成为反革命力量。大约到5月份应当说，在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内政策方面军队开始把自己的政治面貌确定为反革命的了。随军队之后，小资产阶级也开始动摇。结果我们看到武汉的情景是：军队和国民党政府转而镇压工农运动。我不打算详细地谈这一点。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不考虑这个政治形势，不考虑如何评价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农民运动的未来前景，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暴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把这次起义同工农运动联系起来，作出了如下的政治评价：反革命没有打败、没有压倒、没有彻底瓦解农民运动，那里不仅存在着农民运动取得成功的希望，而且相反，农民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要发展起来，尽管开展这种运动是极其困难的。对农民运动的这种评价，是把农民运动的前景看作是中国革命前途大有希望的前景，这种评价可以说构成了那里的共产国际代表们和莫斯科这里的共产国际机构阐述以下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即：如果说革命应当在武汉开展起来，如果说同南京关系破裂后革命是由三个阶级——贫苦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的，那么现在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和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可以率领小资产阶级^①。同志们，你们看，这就是革命阵营中发生的崭新变化，这就是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崭新变化，即农民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因为中国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客观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迫切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既然所有客观前提都没有被反映出来，而主观前提不仅没有排除，而且今后有可能被充分估计到，既然可能发生暴动的背景是戈列夫同志所描绘

^① 可能指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时局的决定》（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36—142页）。

的那种背景，即有人希望组织起义而群众运动妨碍这样做^①。问题不在这里。政治形势是这样：革命在向纵深发展。同时，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增长和它们反对群众性工农运动斗争的展开，曾经转到那里去的力量转向了反革命阵营，革命深化了。这种业已变化的政治形势说明有举行暴动的可能性，或更确切地说，有举行暴动的必要性，以便纠正共产党的方针。戈列夫同志说，应该通过这次暴动来纠正共产党的方针。如果暴动注定不会成功，那么纠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错误的策略。当时是可以纠正共产党的方针的，因为有取胜的希望。因此，我在结束发言时想指出一点：政治形势要比戈列夫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复杂得多。他证明了什么呢？在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中，随着反革命的增长和加强，革命在深化，而这种政治形势使有可能提出举行暴动的问题。这是我想指出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对这些将领的评价。我应当说，不仅要把贺龙看作是追逐功名的军阀，即靠剥削农村为生的中国这种特殊组织的军阀。他出身农民不妨碍把他列入军阀阶级，而不列入农民阶级。他是个军阀，是个狡猾的军阀。我认为叶挺也应归入这类军阀，而不归入共产党人。当然，如果把胜利的希望建筑在对这些人的政治信任上，那是可笑的。现在问题不在于这些人。问题在于广东正在形成和可能形成的政治局势。我重复说一遍，今后这种运动只有在广泛的农民运动的背景下进行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农民运动将取得胜利，那么当然，贺龙和叶挺的动摇就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可以提出取代他们的问题。但应当说，迄今为止这种运动还没有开展起来。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坚决地抛弃任何把赌注押在将领们身上的做法，这就是说，不应夸大他们的革命勇气，不应把赌注押在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上，而应当完全正确地 and 清醒地估计今后举行暴动的革命潜力。

^① 句子不完整，原文如此——译者。

关于这些部队的力量问题。最近，上海和香港的一些英文报纸，估计这些部队在广东东部地区的力量有 8000 到 10000 人。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很准确的，因为即使在我们所谈到的第 10 师的那些部队脱离后，这个地方大约还有 10000 到 12000 人，所以在向广东进发的途中损失是比较大的。还应估计到，这些广东部队的许多士兵在举行暴动情况下，在运动不够发展情况下自然将会脱离这些部队。另一方面，这些部队也可能会有一些扩充。扩充 5000 到 8000 人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江西的农民会参加为了广东农民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这根本不符合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氓农民可能会参加，但这不是今后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这些农民即使参加这支军队也丝毫不会比广东农村可能推举出来的流氓农民更好些。

所以我认为，在途中损失得到了补偿，这支队伍基本上可以认为有 10000 人。

关于广东这支队伍的近期前景问题。我以为，戈列夫同志的那种乐观情绪即认为这支队伍可以夺取广东，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面临的是李济深和张发奎的联盟。鉴于业已变化的政治形势，看来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李济深派和蒋介石派。我认为，最近在广东，李济深和李福林的部队、张发奎和钱大钧的部队协同作战是完全可能的。我以为，这支队伍迅速开往汕头地区并不意味着这支队伍强大，而意味着敌人不认为现在是发动攻势的有利时机。这支队伍去了大约 12000 人。当然，要占领广东，这么点人是相当危险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物质基础。所以说，我们的超级占领运动的前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里应当十分小心谨慎。

这支队伍的转移和为这支队伍建立根据地的前景也是这样。我认为，在采取周密思考的行动和实行深思熟虑的政策情况下，为发展这支队伍建立根据地是很有成功希望的。我再重复说一遍：这支队伍的成功有赖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没有农民的支持，不仅是

他们同情方面和粮食、食品等供应方面的支持，没有农民的积极支持，没有农民的暴动，这支队伍是注定要在物质上和军事政治上被消灭的。没有农民的暴动，这支队伍就会或者被完全打垮，或者一些部队上山并失去自己的力量。这是这项措施在政治上的毁灭。必须把它同农民运动的成功联系起来。只有在农民运动可能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这次暴动。

那么广东的农民运动在最近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夏天我们举行了一系列暴动，虽然都遭到了镇压，但没有被彻底镇压下去。广东农民没有被彻底缴械。我们不止一次地确信，农民已经在足够的程度上武装起来了，只要有相应的有利条件就可以使用这个武器。这一点谁也没有争议。秋天，这个时候广东正值第二次收割，更确切地说，已经收完，大约从这个月起租田的农民要付第二次地租，这种地租在广东东部是大量的。这是关于地租问题。不言而喻，这时农民对收租反应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有可能组织相当广泛的暴动。如果认为这次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会与这支队伍找到共同语言，那是可笑的，但是取胜的希望是有的，而且很大。在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情况下，在善于理解农民心理情况下，在善于把这个农民运动同我们打出去的军事拳头结合起来的情况下，这次运动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我认为，在作出我一开始所谈到的那种政治估计情况下，是可以着手并举行这次暴动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叶夫列莫夫：（发言经叶夫列莫夫同志本人审阅）

同志们，首先应当指出戈列夫同志可能遗漏的一点，要知道他同张发奎将军一起工作，想必了解李济深和张发奎一贯的友谊和书信往来。因此，这种关系不会有什么好的预兆。

现在戈列夫同志把贺龙将军的军队称为真正革命的军队。我们在这方面总是犯错误。我觉得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带着这样一

批人去广东是可笑的。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着手准备这次战役是为了去广东，而张发奎与李济深情深义笃，肯定会给李济深将军送去一份礼物。

现在来谈谈农民运动、农民暴动。当然，闭口不谈在中国存在着农民运动是不行的，但我们的人中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这是事实，而到这个省或那个省里去的将军往往会利用这个农民运动。我坚信，我们大家以后将会看到，李济深将军会利用广东省，正是在这个省里有着比其他任何省里都更强大的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还应指出一点，近来在四·一五政变^①后，李济深将军开始同工人交往。他经常去广州最大的工人协会，这就是机器工会。他在那里做报告，发表演说。这样一来，他同工会很友好，而在四·一五政变中他就利用了该工会，该工会在抓捕共产党员方面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

此外，这里还应当指出戈列夫同志说的一点。他说得对，他说他不了解中国的将领。这是真的。因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犯了许多错误。但显然，同志们，今后我们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因为刚出现一个将领，我们就开始美化他，说他是个合适的人，同我们的游击队员相提并论。请看，戈列夫同志您自己说的，贺龙当了20年的土匪，而你现在想把他变成共产党人，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们的游击队员。这是极大的错误。我认为，李济深首先会收买贺龙，然后又出卖他。如果他在山里已经呆了20年，再在山里呆几年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从您的话里可以看出，认为贺龙是我们的人并把他同我们的游击队员相提并论是极其重大的错误。

现在谈一谈现有的力量。它为数不多。我同意斯卡洛夫说的，我们大约有12000人。而12000和40000之间差别是很大的。这

^① 指1927年4月李济深在广州发动的反共政变。

样的队伍要打到广州去是不可能的。不会出现 20 世纪的奇迹。我们不相信。

现在,如果您说那里有一些部队并在为反对北方人而斗争,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李济深过去的部队(有人喊:可不是他的。)据我所知,这是他的。即使损失 50%,甚至 75%,但留下的基本骨干是李济深的。我不想来确证这一点,但我看事情就是这样。意见就是这些,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得出什么结论呢?报告会作出结论,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单独的报告中作出结论。

马马耶夫:我请求叶夫列莫夫同志作补充发言,告诉我们到 7 月中旬,即您离开广州时,有关李济深部队的状况和部署情况材料。

叶夫列莫夫:报告人正是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既然我在那里呆过,如果您说您要占领广东,那显然您应估计那里的力量,然后再作出结论。但您却暗示,贺龙将占领广东。

现在我来算一算力量:

在潮州及其西北地区有 35000 人。我离开时,正好是 7 月 26 日,我们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的李济深和钱大钧说,那里有 50000 人,但根据我们的计算是 35000 人。有以下部队:第 16 师,两个第 20 师,两个旅(第 3 旅和第 5 旅),是从广西调来的。此外,那里还有第 13 师的第 4 团,还有民团队伍,曾一度倒向我们一边,后来又转到那边去了。这支队伍大约有 6000 人。那里还有在广州新编的一个师,在广州建立的一个后备师,宪兵师;广西的第 4 旅和范石生的第 16 军正准备调来。广州本身有黄埔军校及其预备团——8000 人。广州还有一支舰队,按中国的算法可以算作大约 60 个战斗单位。广州还有一些重新整编的团,可以算作 4 个,有一个士官学校。在广州地区有第 15 师。这些都可以算作是广州的。广州附近的第 11 师全部都在高州地区。在东江地区有陈炯明旧部约 10000 人,现已转向李济深方面。我想,当时李济深正在广东

整编军队。此外，还应算上 8000 名警察。后来，他又从机器工会中成立了一支专门队伍，在政变期间抓捕共产党员。这支队伍现在在大约有 2000 人。这是现在在广东所掌握的全部情报。

切尔尼科夫：同志们，为了使情报完整起见，我要谈一谈第 6 军。它与暴动队伍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个军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军队。但这个军多少还是参与了。根据总的任务，这个军应向江西东部推进，从那里向赣州运动。这样，这个军的一个师相应地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8 月初，第 19 师集结在萍乡地区和株州车站。但这时通过中国共产党转达了一道假的命令，要它返回武汉地区。当各团已经在土路上纵队行进时接到了这道命令。于是不得不在萍乡车站停下来，再开赴武汉地区。这样一来就把它拖住了 5—6 天，危险也就消除了。第 17 师的一个团留在南昌，而有两个团已经出发到江西地区，以便沿着去赣州的公路推进。关于第 17 师可以说，直到最后时刻那里有 10 名共产党员：两个团长^①，两个营长和下级指挥官约 4 至 5 人。中央给这两名团长传达了指示，要他们加入暴动队伍^②。但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个师是最糟糕的，是最晚组建的和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然而，命令已经下达了，但从 8 月 1 日到 8 日谁也没有接到说明它在哪里的报告。当时让我尽快去南昌方面，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系。整个这次行动的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这就是我想说的。

瓦西列维奇：尽管斯卡洛夫在这里说，不值得再来回忆，但我想，回忆有时可以提供历史资料，从中可以得出某些理论结论。在我们领袖的头脑中存在着对群众运动的不信任，这是事实，至少这种不信任已经贯穿到整个工作中。上海事件证明了这种不信

① 何人不知。

② 文件没有找到。

任群众的机会主义方针。当上海的军事顾问^①建议举行暴动时，有还主张与武汉政府合作的足够的左派部队力量，这是在3月份，而呆在上海的领袖们，包括老的中国领袖们，明确地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挑衅，等等，而实际上第1师师长和第21师师长^②准备跟我们一起行动。这两个师起先占领了上海。当准备这次暴动时，准备工作多半都带有对暴动没有信心的情绪。顺便说一句，当戈列夫同志跟银行家^③谈话时，银行家既不对他说是，也不对他说不是。戈列夫同志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问他对这件事是如何考虑的，但银行家极力拖而不答。毕竟他是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的，因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恰恰证明，不是斯卡洛夫所说的提出了暴动的问题，而是应该抛弃暴动的想法，因为我们的领袖们已经抛弃了这个想法，但领袖们分析和评估了举行暴动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我记得，当加伦^④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但过了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来了，那里说，应当参加，把力量投入到暴动者方面^⑤，而暴动者方面也有共产国际的指示，说俄国人不要参加。摆在那里的第一项任务是立即从南昌出发去汕头地区，而且加伦说，他们要在汕头地区呆上两三个月，或许还会有一些武装部队会转到他们方面。

同志们，从暴动本身来看应当毫不含糊地说，一切都是很有组织的。实际上，俄人不参加是很好的。根据领导暴动的三人

① 大概是指 A. П. 赫梅廖夫

② 分别为薛岳和严重。

③ M. M. 鲍罗廷。

④ B. K. 布留赫尔。

⑤ 见第4号文件。贺龙第20军顾问 M. Ф. 库曼宁参加了从南昌到汕头的进军。

小组的工作来看，应当明确地说，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很出色。解除武装后，指挥人员发生了变动，他们竭力吓唬指挥人员并建议不可靠的指挥人员回到张发奎方面去，这个方针是对的。我认为，像叶夫列莫夫同志那样否定革命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里是共产党中央在进行领导。如果否定这支队伍的革命性，那么也就得否定共产党的革命性。我认为，如果这样想的同志看到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共产党是怎么组织的，那么深深印在他们脑海里的机会主义东西就会烟消云散了。我讲完了。

捷斯连柯：我讲一讲在戈列夫同志、斯卡洛夫同志等人发言中讲得不够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暴动者的武装力量问题。要确切地说叶挺和贺龙到底有多少力量，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报纸说他们大约有 20000 人。戈列夫同志说 10000 人。可以断定，跟随叶挺的有整个第 24 师和第 25 师的第 73 团。而你们应当更好地了解一下第 10 师。第 10 师是陈铭枢的主力。那时它不可能追随革命运动，因为陈铭枢的这个主力是反革命的。这是一点。至于叶挺的武装力量，那里有 24 师的 4500 人，73 团的 1500 人，还有这里没有谈到的直属党中央的一支队伍，交给了叶挺，大约 500 枝步枪，24 挺机枪，没有大炮。共产党员人数是 120 名。根据我通过叶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收集的情报，有 3 名团长，一名参谋长，一名师长^①，8 名营长，12 名连长，20 名排长和其他士兵级的人员。

现在我要谈谈对贺龙将军的评价。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因为我们在评价将领方面有过痛苦的教训。就拿叶挺来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小资产者，一直向往当个广东的地方长官，所以他乐意到那里去。他曾在保定军校学习，没有毕业，于 1924 年在俄国上了东方劳动者大学。他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娶了一位

^① 分别为：古勋铭、耿震、许继慎、黄景范（音）和叶挺。

富有的中国老婆，全家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很有意思的是，他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那时正是武汉反革命军队镇压了农民运动，每天有许多代表来到我们这里向叶挺求援或讨教，而叶挺则躲避他们，什么也不说，甚至不让他们进车厢。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就找个借口。他常常说，现在不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时候，因为这会破坏北伐。这是原话。现在就拿罗易在武汉时的情况来说吧。当时在我们当中正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叶挺应当扩充军队。罗易同志把叶挺请来，他们进行了交谈，提出了扩充军队的问题，可是他说原则上他不反对扩充，但必须通过军事委员会。他本人不抓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叶挺根本没有考虑搞什么发动。后来，我们在县城大冶呆了大约两个星期，那里也是这样：强大的农民组织立即与我们会合，请叶挺出来讲话，交换关于形势的情报，但他一个代表也不接见。当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想讲话时，他则外交式地避而不谈，一次也没有发表讲话，也不接见代表。

现在来谈一谈暴动的前景。我认为，斯卡洛夫同志说的更接近实际情况。首先，队伍较小，只有12000人。从弹药的供应来看，叶挺那里要比中^①那里更少……，因为在……时他烧掉了仓库，弹药都丢失了。大概从东部也不太可能弄到弹药，那里没有工厂，因此没有指望有什么前景。现在谈一谈叶挺所回避的群众运动问题。在江西东南部以及广东东部没有发生任何农民运动。在汕头以西不远的地方开始出现农民运动。我曾在那里呆过。在海丰地区有强大的农会，很有组织。对陈炯明进行东征^②时，那里曾有过许多农民团，因为那里有农会。当然，前景问题不能忘记，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对陈炯明将军进行的第一次东征（1925年2—3月）和第二次东征（10—11月）。

但不应估计过高，取得巨大胜利的希望很小。我知道，那里陈炯明的6000人队伍^①可能会介入。

我不知道那里的领导怎么样。说那里有坚强的领导，我不相信。瓦西列维奇同志，这不是有很多革命委员会的俄国。在最近一段时期里，那里不可能有革委会。首先，贺龙是个我行我素的人，贺龙和叶挺之间有些摩擦。还应当估计到，无论贺龙还是叶挺那里都有共产党员，但我不信，贺龙那里有2000名共产党员。甚至连1000名共产党员也不可能有，我认为，你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马马耶夫：为了消除关于第10师的迷雾，我提供一点情况。有人曾正式向我报告，说第10师枪杀了所有共产党员，并开到浙江去了。

泽涅克同志发言提供情况。

泽涅克：我想就广东的部队提供一点情况。依我看来，叶夫列莫夫同志说得不够确切。首先，在广东北部有钱大钧的队伍，最多约有20000人，而不是35000人。此外，广东的军事力量应分为三部分。首先是钱大钧部，这是蒋介石的部队。其次是直接归属于李济深的军队，再次是独立师，即第6军的第18师，它归顺于李济深只是由于李福林的军也归顺了他。因此，广东有三派截然敌对的后来又有些摇摆不定的部队，这些部队李济深未必能加以利用。这就是李济深部队的情况。

斯卡洛夫：同志们，我只想作些说明，澄清一些误解。瓦西列维奇同志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否认在中共中央领导中和在我们总的领导中存在机会主义。我在发言中没有说过这类的话，而是说，我们的领导提出起义问题时，政治上的估计是，认为这次起义是可能的，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领

^① 看来是指陈炯明的旧部。

导从人员上说已经不是以前的一些人，而是另外的一些人了。

至于鲍罗廷的机会主义，我什么时候也不能袒护他。关于对部队的评价，在这些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要比任何一支军阀部队中多许多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部队有希望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现在来谈一谈广东东部农民运动的地区。捷列先柯同志^①说得对，东部暴动的中心是海丰地区，但是当我们说汕头地区时，我们说的就是东江的整个地区。

沃尔金：瓦西列维奇同志说，南昌暴动时的领导是新的和坚强的领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另一种方针。如果我们现在总说，暴动的成功将取决于伴随暴动发生的农民运动，那就必须附带说明，应该改变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如果还是迄今为止的那种领导，那肯定又会出现利用广东农民的革命热情作投机的现象。必须说，这次暴动只有在发展成为农民运动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应当使这次农民运动的领导是另一种领导，而不是迄今为止的那种领导。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斯卡洛夫同志和戈列夫同志之间的争论。戈列夫同志硬说，有人不相信群众的积极行动。如果考虑到暴动要求对群众进行革命的领导，而领袖们知道，他们没有让群众准备去进行战斗的革命发动，那么这个争论可能就是显而易见的了。由此可见，首先应当让群众准备去进行革命的发动，然后才进行发动。而如果没有做准备，那很自然，领袖们不相信暴动会成功。

谢尔盖耶夫：我觉得，南昌最近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次失败是我们摆脱由于从广东到湖北的整个政策使我们陷入的困境的唯一出路。斯卡洛夫同志说，由于这次发动使我们的革命深化了，我认为，这无非是一次蛊惑人心的发动。我们在

① E. B. 捷斯连柯。

这里取得的唯一的一个收获是，保持了实力，使我们有可能摆脱这种困境。无疑，戈列夫说得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准备，我们的领袖们不相信所做事情的结果。这是一个情况。

关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我认为就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谈一谈，不是在这里，并且要好好谈一谈，究竟这次发动是什么引起的，它是怎么组织的。

至于我们在那里拥有的力量，我不同意戈列夫同志说的，我们在那里大约有 20000 人（戈列夫：我没有说大约 20000 人，我说大约 12000 到 14000 人）。那里的力量大概只应算 8000 到 10000 人。毫无疑问，带这么点力量到汕头去是注定要灭亡的。它们缺乏后备，此外，在行进途中就得知，有些部队未跟上，或是单个地或是整体地离开了队伍。经费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甚至谈不上革命和暴动，谈不上他们加入中心农民运动中去。不，同志们，中国的农民也像我国农民一样。你不给他指明那里有面包，他是不会跟着你走的。

（有人喊：但给他土地啊）

马马耶夫：那里四分之三的居民是佃农。现在泽涅克同志发言。

泽涅克：总的说来，许多同志对这次暴动的前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其中甚至包括斯卡洛夫同志，这对他来说尤其不能理解，因为他对整个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在广东省和湖南省当前的形势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气氛，只要推动一下，就会燃成熊熊烈火，但与此同时他又怀疑这支队伍在军事上不够强大。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军事上这支队伍是由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组成的，且有好的领导，而上面又有这样的领导，被任命的三人小组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应当担心的只是贺龙和叶挺私人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应当使这个革命运动越过这些将领与部队直接联合起来，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说，从军事的角度看，我

们有很好的部队，如果有很好的领导，那么在采取决定性行动时是有战斗力的。所以戈列夫同志说得对，他说在军事上这支队伍在广东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很有希望取得成功。斯卡洛夫同志描述的政治形势是正确的，气氛极其炽热，只要一推就会燃成熊熊烈火。综合这两个因素来说，很难对这件事持悲观的态度。当然，不能说什么有把握，因为那里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些队伍将会发展，将会扩充，这些农民队伍常常远不是革命的，在指挥上将会有很大的摩擦，就是在领导这些极其重要的、而迄今为止又很不够的农民队伍时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那里在途中有许多困难，但这支队伍毕竟有很大希望取得成功。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叶夫列莫夫同志的意见，他认为李济深可能会投入非常强大的实击兵团来对付这支队伍。现在我要谈一谈李济深参加武汉政府的事。李济深不得不参加武汉政府为的是征服钱大钧，因为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亲信，并处处找李济深的麻烦，因此，李济深参加武汉集团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并最终主宰广东。

格雷：同志们，我完全不同意泽涅克同志对问题的提法。本来我不想发言，但这里有人提出利用这些数字作投机的问题后，我不是作为军人，而只是作为前线与政治工作有联系的工作人员来发言。问题在于不能像许多同志这样拿每个单个将领的政策来进行投机。不能联系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同时混淆个别一些将领的政策。我们清楚地知道李济深和钱大钧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结成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存在的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镇压革命的时候成为朋友。

还有一个矛盾。有人说李济深和蒋介石有很大的矛盾。是的，同志们，这是由于蒋介石想在广州实行独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矛盾。应当认为，他们必然会联手来打击共产党人。所以指望得到广东的支持（我斗胆完全以整个

队伍的名义说这个话），当然是不行的。此外，还应当估计到，驻扎在汕头地区的第18师是处在李济深的庇护下的。我提供这个情况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18师和C将军^①的战役，这个师的师长明确地说，他现在从李济深将军那里得到物资后备和战术指导。因此，所有这些情况都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在李济深将军的领导下来反对革命运动的，尽管他们有自己内部的矛盾。这是应该估计到的。

戈列夫同志的结束语

同志们，看来我关于在我们俄国工作人员中间，在领袖们中间存在着对运动缺乏信心，对共产党力量缺乏信心的论点，现在得到了半数发言者的确认。明确指出了对这次暴动的力量、对群众运动的力量缺乏信心。这里谈到部队不是革命的部队。我完全同意，比方说不能把原40军的第24师说成是革命的部队。不。但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那里有10%的共产党员，或者说有8%的共产党员（这是最少的估计），因此有理由称作是革命的部队，就像任何有8%党员的部队一样。我坚信，共产党、群众是有战斗力的，是能够作战的，是能够驾驭的，能够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的。这个论点我认为就是在现在也被证实了。我和斯卡洛夫没有分歧。可能是我说错了话，问题被理解得不正确。暴动的背景，正像斯卡洛夫说的那样，描绘得完全正确。

我并没有说鲍……^②缺乏信心，但鲍……亲口说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热情，没有愿望。我曾在牯岭，在暴动时与许多军事人员谈过话，他们说：“反正搞不出什么名堂，用不着上那里去。”斯卡洛夫同志也还会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被任命策划暴动的人

① 原文如此。从1927年5月起第6军第18师师长是张轸。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M. M. 鲍罗廷。

说，搞不出什么名堂。这是什么，是缺乏信心吗？是缺乏信心。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有信心吗？对群众坚信不移吗？没有。但他是坦率的，我不能责备他，他对暴动消极怠工，但使人感到，他做这件事没有任何信心。他作了指示，把我们派去，但他不能在没有信心的人当中激发出信心来，因为他看不到前景，他如此盲目崇拜那些实行（我们的领导人也实行了的）老的机会主义政策的人们，以致不能摆脱他们，走上新的轨道。我说的就是这些。我完全同意斯卡洛夫同志说的，前景就是这样。前景最终表明，过去战斗，现在战斗，将来还要战斗（全场议论纷纷）。当然，很难同捷斯连柯同志进行争辩。我说三个团被缴了械，他说两个团。当然，我不能加以证明。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关于军事前景。至于李济深、张发奎、钱大钧、反革命英雄李福林的所有这些部队，不能有特别可靠的前景。当然，如果这些暴动部队实行我们军队过去实行的方针，那么他们有可能拿下广州，但随后可能发现，他们那里剩下6000名革命者，而有66名是反革命分子，然后又一切从头开始。这就是主要的军事危险。他们将是没有战斗力的。他们可以靠暴动的农民来扩充自己的力量。

有些暴动同志犯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们不仅过高地估计了军阀们的组织，而且还不完全了解军阀们的情况。中国大约有100万军队（有人喊：120万）。如果集结100万军队向1万人发动进攻，那是糟糕的事。我断定，李济深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结1.5万到2万人。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一次北伐时是5万到6万人。当时，吴佩孚和孙传芳有40万人。

所以我说，虽然中国有120万军队，但叶挺和贺龙在军事上是牢不可破的。假如所有反革命军队中都有俄国顾问，那么他们会暗示应该如何做，但没有政治目标、没有坚定的政治方针的军阀们是无法摧毁这支军队的。我个人坚信这一点。我对事物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现在谈一谈这里提出的一些意见。有人说李济深在困难的时候会利用广东的农民运动，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李济深会利用机器工会，他不会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法西斯工会，这不是群众，这不是革命的农民，也不是革命的工人。这是工人贵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西斯分子。所以我认为，广东的农民运动不管多么软弱无力，不管多么没有组织，但它只会跟起义部队一起走，而不会跟李济深走。李济深枪杀工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农民、与工人可能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很不牢固，不可能使他们跟着他走（有人喊：中国的条件）。当然，中国的条件是个大问题。

下面再谈一个小意见。叶夫列莫夫同志坚信，李济深会收买贺龙，不能把贺龙同我们的游击队员相提并论。叶夫列莫夫同志从未见过贺龙，也没有听到过跟贺龙一起工作的人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但不管怎样，贺龙当然是可以收买的，但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问题在于李济深为此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因为在自己部队里当第一号人物的贺龙不会到李济深那里去当第5号人物。

现在谈谈对贺龙和叶挺的评价。他们俩当然都不是像人们所希望那样坚定的革命者，我跟叶挺共事一年半时间，或许还要长些。我也了解他的缺点。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叶挺在湖南暴动^①时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方针呢？叶挺属于共产党中的右派，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连国民党都知道，若是叶挺在俄国领袖^②、中央、整个中国革命界几乎都出来声讨湖南那枪杀事件的时候站出来：“我要说话”，那我们会感到很奇怪的。这会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叶挺毫不动摇地根据中央的命令站出来反对张发奎，他本来和张发奎关系很好，是同学，在军队里一起呆了15

① 指许克祥于1927年5月21日在湖南省首府长沙发动的反共政变。

② 指苏联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年，但他还是毫不动摇地站出来反对他。我可以大胆地说，那里的共产党员军人在党的方面是很守纪律的。叶夫列莫夫同志，要么我们认为在中国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进行工作，要么认为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那时我们就应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说，应当解散中央，解散整个中国共产党。叶夫列莫夫同志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人，因此他说不能依靠他们。这就是我要说的主要的几点意见。

马马耶夫：宣布会议结束。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4，第 1—38 页。

打字稿，副本。

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

（摘录）

1927年9月15日于莫斯科

听取：3——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1927年9月8日会议第123号记录，决定：10和政治局1927年8月11日会议第119号记录，决定：3，第5点）。（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布哈林同志）

决定：3——（1）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①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要注意到这些军事人员应受过政治训练，应把自己不仅看作是军事顾问，而且看作是政治方面的顾问。

（2）1. 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②。
2. 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3. 将此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最后决定。

（3）关于在每个地方政府中保留我们的军事代表问题和驻南京的领事馆问题，推迟审议。

（4）任命库丘莫夫同志为中山大学教务部主任，把他从中国召回。

① H. C. 温施利赫特。

② 文件没有找到。

(5) 1. 在国家银行给驻莫斯科中国代办^①开立每月支付 3000 卢布的 6 个月贷款户头。

2. 凭北京外交部签署的保证书付款。

(6) 通知乌拉尔斯基^②同志，让他立即来海参崴待命。

(7) 关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统一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问题，推迟审议。

(8) 1. 将呆在库伦的 41 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 H 部队^③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2. 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 4000 美元作派遣费用。

(9) 将学院的 5 名学员——国民党右派遣送回中国。

(10) 由组织局立即拟定派往内蒙古工作的人选。

(11) 1. 叶甫根尼·陈^④、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

2. 不反对叶甫根尼·陈发表声明，建议他只针对国民党发表一个声明，此外还在报纸上发表谈话。

(12) 关于李济深的申请^⑤问题——推迟审议。

(13) 同意政治局今年 5 月 5 日关于秘密文件的决定^⑥，建议加拉罕和温施利赫特同志（按侦察局系统）监督我们的中国工作人员执行这一决定的情况。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全部。

① 郑延禧。

② B. K. 布留赫尔。

③ 显然是南昌部队。

④ 陈友仁。

⑤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1926—1927）第 2 卷第 2 册，第 593 页（中文版第 4 卷第 211 页）。

⑥ 见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23 页。

莫斯克文、克雷洛夫——（4）。

沙因曼——（5）。

科肖尔——（10）。

叶努基泽——（11）1。

布哈林——（2）。

瓦西里耶夫（共产国际执委会）——（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98—99、10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1

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书面报告

1927年9月20日于莫斯科

叶挺和贺龙的暴动与 广东革命运动的前景^①

叶挺和贺龙的暴动可能成为或者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悲剧性插曲，或者相反，成为以比武汉时期更发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过渡阶段。叶挺和贺龙暴动的命运以及与这次暴动必然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工农群众性发动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对这次运动的领导。这次运动的成败就在于中共的政治路线和这次暴动直接领导人的策略。

同时，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中国当前主要革命政策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方针，引起了人们对叶挺和贺龙起义部队目前在广东展开的行动的命运的某种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湖南和湖北暴动的命运）。

中共就叶挺和贺龙的起义问题通过的主要决议可归结如下

^① 文件上有作者的说明：“赖特同志 [B. И. 索洛维约夫]：这里所说的关于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想法只适用于暴动部队占领的地区，首先是广东。1927年9月20日，M. 沃林。”

（见8月17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当前任务》的提纲）^①：

（1）“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个基本策略方针有以下几个理由：

1. “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并是在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农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3.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接着说：

“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应当加入公开的组织，以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

接着又说：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

^① 这是指的不是1927年8月17日，而是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这一点可以从沃林在文件最后一页上作的关于他于8月20日参加《提纲》讨论的注释中得到证实。可能注明8月17日的《提纲》是该决议的草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27—342页），沃林报告中的引文见同上第335—339页。

“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可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

由此看来，中共对目前中国许多省内发生的暴动，特别是广东境内发生的暴动的态度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暴动应当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各个革命阶级政治联盟的一种形式，也是革命解放运动的历史旗帜，它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而且在工农群众中赢得了威信。

我们在这个旗帜下举行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在这个基础上恢复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并在这个国民党内保证自己的领导作用。

至于革命政权的形式，目前我们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在组织革命国民党的计划完全失败，而又处在革命高潮时，中共才着手建立苏维埃。

提纲中在稍前面一点谈到苏维埃问题时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

义发展的唯一方式。”稍稍前面还说：“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引文的矛盾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暴动的实际领导人来说，还完全没有弄清楚，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与同左派国民党的试验的成败相联系的呢，还是像上面引文中说的，建立苏维埃不取决于我们组织国民党的计划的命运，而是作为从工农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过渡时期的革命政权的一种形式（“工农民权独裁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在中共当前策略方针的基本表述（见“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一段）中，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与组织革命国民党的计划的失败相联系的（计划失败而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潮之中）。而如果计划失败正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没有准备好向革命的更高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处在革命高潮之中）的话，那怎么办呢？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提供答案。如果把在暴动群众革命政权形式问题上的这个很大的矛盾暂时放在一边不谈，党在组织群众暴动方面的主要策略方针可以归结如下：

共产党借助革命武装力量（“共产党的军队”），依靠革命群众，发动革命的自发运动，粉碎反革命并组织新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共产党在国民党旗帜下要做的事，吸收“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参加新政权，同时根据中共的计划，“左派国民党”参加政权是在共产党实际领导暴动取得政权以后（见“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权机关”一段）。

由此可见，左派国民党的起义和我们同这个国民党的联盟不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是在工农夺取政权以后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里，整个这一计划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设想“革命斗争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

方面来”。

在我们看来，整个这一政治方针的主要毛病是必须和可能保持国民党以前的作用（尽管是新的“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和我们同这个党以前的组织关系的偏见。

如果清醒地分析一下中共中央提纲中的所有上述表述，实际上很难证明我们关于重新组织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努力和计划是正确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谈重建左派国民党，或者更确切地说建立与老的“左派国民党”〈汪精卫及其一伙〉不同的新的革命国民党这个任务在现时条件下是否可以实现，这个左派国民党能否跟中共一起始终不渝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旧的一切封建残余，并认真地跟帝国主义作斗争等问题）。中共实行这一策略的主要理由，如果根据提纲来看，只能认为是国民党旗帜的声誉和我们跟反动的大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斗争。

根据近年来广东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1927年）广东革命的经验，我们觉得，中共在领导叶挺和贺龙暴动时的上述策略，除本身的矛盾和不明确外，是根本不现实的，因而也是不能实现的。

实际上，在关于“左派”、“革命”国民党的问题上，广东革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

1926年底，在广东（在广州），以甘乃光、陈孚木和王梦一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左派同盟”。这个左派同盟几乎包括了广州的所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有几十人），按其社会成分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多半是大学生）。这个同盟和群众没有组织联系。甘乃光（这个同盟的首脑）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现已被处决的陈延年、沃罗夫斯基^①和邓中夏）经

^① 黄平。

常谈论的是群众问题，甘乃光总是责备上述同志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特别是左派那里）夺走了群众，而上述同志在这个时期则竭力利用“左派同盟”来反对正在抬头的反动派，在同甘乃光的谈话和私下与自己人的谈话中，对如何向左派“提供”群众绞尽了脑汁。

但“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与革命群众联系，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深深敌视群众的。（要知道，最近这些年来对工农革命群众的实际领导，除一些改良主义的和黄色的工会外都为共产党所垄断，这不是偶然的）。左派国民党人（“左派同盟”）按其思想来说很接近戴季陶。“左派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他们政治纲领的主要之点就是阶级合作（为了全民族利益放弃狭隘的阶级利益），“不是阶级革命，而是全民族革命”，他们把以下的说法作为国民党实践活动的基础：广东的国民革命已经结束，现在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来进行广泛的建设和改革，以实现孙中山的纲领。

随着广东群众运动的发展和高涨，由于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内革命的深入，中共和“左派同盟”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工人阶级要求的提高“左派同盟”中的左派国民党人特别焦躁和不安，这使人考虑到，“左派同盟”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是代表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左派同盟”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和小心谨慎也说明了他们的阶级本质。左派国民党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商人阶级、小工业企业者阶级和部分土地所有者阶级有着联系，在同经济上强大的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代理人，同军阀、旧官僚、旧豪绅和各种封建余孽的对抗中有其革命性，他们在同这些势力的斗争中试图利用革命群众，但同时又对革命群众及其革命积极性怕得要死。实际上，左派国民党人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工农暴动的恐惧，对私有制的担心，对共产主义幽灵的害怕超过了他们虚假的革命性，这

正说明为什么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们同买办、同旧官僚、同豪绅和地主、同反动军阀在一起。早在四月事变^①以前，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群众革命积极性高涨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甘乃光在广西省作为李济深的非正式代表和左派国民党的领袖同广西的独裁者黄绍竑结成了联盟。甘乃光和黄绍竑这个屠杀广西工农的刽子手及李济深这个封建买办反动派的头号代表结盟标志着左派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蜕变，象征着在工农革命日益发展的危险面前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主的阶级联盟。“左派国民党人”的另一个领袖陈孚木，在四·一五政变^②前三个星期，曾同谭平山、杨匏安等人谈判结成统一战线放弃中共提出的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在4月15日革命遭到血腥镇压的那天，我们看到他在五人执政内阁^③之中，同李济深、邓彦华等屠杀广东工农的刽子手坐在一起。对我们成千上万优秀同志的生命负有责任的陈孚木，继续以“左派”国民党人的身份露面，可能是他本人笃信自己的“左倾”。曾有意同共产党人作对的陈孚木的这种“左倾”表现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同时他又提出了与“右倾危险”作斗争的口号，幻想以此来使反革命势力保持中立。但是天真的陈孚木不知道，他无非是反革命军阀手中的盲目工具，反革命军阀们根本不愿意半途而止，他们利用这个伪善的资产阶级说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在决定性关头把他像没用的破烂一样抛弃。

左派国民党的第三位领袖当时没有与自己的弟兄们搞好关系，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机会，不得不寻求与我们的联系，后来甚至加入了我们党。其他一些左派国民党人，如陈树人（四·

① 指1927年4月在上海、广州等地发动的反共政变。

② 指1927年4月李济深在广州发动的反共政变。

③ 指1927年4月15日成立的由五人组成（以李济深为首）的广东省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该省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

一五政变前任内政部长）是个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决定性关头只会为国民党同反革命努力作斗争的委员会提供自己的名望，把自己同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作斗争的全部“肮脏”工作托付给共产党的忘我斗士，自己愿意在这个时候作为一名清官在日本“等候时机”。广东一些左派国民党人不久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小资产阶级在其代表也成为白色恐怖牺牲品的时期，从其队伍中推举出什么能够同地主—军阀—买办的反动派进行真正斗争的真正革命者了吗？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共产党在广东革命最困难的这个时期是唯一不仅领导了工农革命群众，而且领导了城市贫民革命群众的政党。左派国民党“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仿效被反革命所震慑和吓倒的领袖们（陈树人等人），竭力把自己隔绝起来，把领导革命群众的战场让给共产党人。

因篇幅有限，我们姑且不来对广东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作历史的和经济的分析，我们可以简要地说一说，一些非常强有力的客观因素（例如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农村某些土地占有者阶层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使得前者不仅敌视革命的农民运动、而且也敌视革命的工人运动），麻痹了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只有城市贫民阶层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能够同工人阶级和农民一起为自身的革命解放而斗争。

根据上述广东省的经验，即已为经历尖锐阶级斗争的其他省（例如湖南和湖北）的经验所充分证明的经验，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中共在目前暴动蓬勃开展的地区内对“左派”、“革命”国民党的现时策略。对于富有经验的广东革命运动来说，关于左派国民党的“重建”，尤其是“指望”国民党的问题，听起来是完全缺乏活力和不现实的东西。左派国民党目前不仅不存在，而且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现时条件下和在向革命更高阶段过渡的情况下，不可能重建成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现在，叶挺和贺龙的

军队、革命工农暴动群众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开展土地革命，从肉体上消灭成千上万的豪绅、地主和军阀反革命匪帮，没收地主土地，解除民团的武装并把工农武装起来，立即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等等。我们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信心，相信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胆小怕事、在紧要关头经常摇摆不定、已经三次出卖了革命工农的阶级在这革命的新阶段上，在即将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刻会跟群众一起同反革命派作坚决的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呢？它可能在最初阶段胆小怕事，不会来反对工农，但是毫无疑问，“左派国民党”所代表的这个小资产阶级不会跟革命群众一起来同反革命派进行流血的和无情的斗争。然而，目前广东的问题只能是进行这种流血的和无情的斗争。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在广东开展暴动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国民党曾经确实是革命解放运动的旗帜，国民党当年或许甚至是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但是我们在最近革命历史阶段所经历的一切不能不在群众的情绪上引起深刻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于在整个这段反革命持续猖獗的时期付出了成百上千生命代价的大部分有觉悟的革命工农来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令人憎恨的了。城市里企业主对工人的清算，农村中豪绅和地主对农民的血腥清算，反动军阀的暴虐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都是为了国民党，为了国民党的荣誉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群众面前强调“左派”国民党的革命威望听起来简直是对这些群众的嘲笑，或者说只能意味着脱离这些革命群众。现在国民党的旗帜确实实地染满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和忠于革命事业的工农的鲜血。这面旗帜现在不仅不能鼓舞群众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尤其不能鼓舞他们的革命英勇精神，我们再重复一遍，它反而会引来革命群众的深深憎恨。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并不是被一小撮屠杀革命工农的刽子手弄得声名狼藉的国民党的旗帜。但这一点历史地看是不正确的。即使过去如此，但现在群众

不会区分这些细节。群众清楚地知道，一个反革命将领、一个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反对另一个反革命将领、另一个屠杀群众的刽子手，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都是为了国民党。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的许多省，特别是在广东省，群众开始对“挽救”国民党、对为迄今只替反革命作掩护的国民党的“清廉”而斗争的呼声漠不关心了。在广东，国民党几年来一直是执政党，那里国民党掩护了卖国求荣的官僚、反革命的豪绅、掠夺成性的军队和剥削者地主，国民党作为革命政党的光环早已黯然失色，这说明在农民的许许多多调查表上，在问到什么是国民党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答案：“国民党是富人的党”，“国民党是农民的敌人，因为参加国民党的是一些卑鄙的豪绅和农村的流氓”。

我们不想否认国民党可能以“左派”和“革命”的名称出现这种情况，但它首先不是由我们共产党来建立，其次这个“左派”国民党作为反革命的国民党，作为大资产阶级、买办、军阀、官僚和豪绅的国民党的对立面出现时，同时也将是共产党的对立面。

不管我们的这一信念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广东开展暴动的现时具体条件下，在该省经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教训后，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这场运动，提出“重建”左派国民党并参加这个左派国民党以夺取这个国民党内的领导作用——这不仅意味着遁入空想的王国并让幻想来使头脑发昏，而且意味着把整个这场运动推上错误的或许是灭亡的道路。实际上这意味着帮助这场运动的直接领导人重犯以前党的领导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说叶挺和贺龙本人在政治上是很不可靠的将领，这是尤为正确的。如果注意到叶挺和贺龙在客观上将出卖这场运动，那是很正确的。对于在叶挺和贺龙周围的实际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方面负有责任的中央代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等人）也同样可以这样说。这些同志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经历过与八月

党代会^①有关的党内政治和党内情绪的转变,他们正面临着重犯在党过去的政策中(党的上层人士等)犯过的许多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危险。很可能这场运动将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开展,不仅在同内部(不仅是广东内部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反革命的斗争中,而且在同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的冲突中遇到极大的困难,遇到极大的危险。叶挺和贺龙部队中共产党员占较高的比例(约20%士兵和约50%军官)本身并不是这支军队的正确政治方针的可靠保证。按其结构,按其组织机构和按其社会成分来说,叶挺和贺龙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流氓无产者),与一般的军队,实质上是军阀部队,即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没有什么差别。在所有这些方面,特别是在领导方针上,贺龙和叶挺的运动潜藏着极大的危险。至于广大群众支持叶挺和贺龙暴动的准备程度,那么掀起广东群众革命运动的这种高潮的客观前提无疑是存在的。此外,由于近一年半来,尽管群众不断反抗,白色恐怖仍持续不断地肆虐,所以在广东已经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燃料,斗争已经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革命群众对刽子手独裁者已经充满着如此强烈的憎恨和仇视,只要叶挺和贺龙部队取得初步的巨大胜利,基层群众的革命自发力量就必然会爆发出来。诚然,目前广东的群众运动还没有生气。工人运动还很分散;反动派在镇压、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优秀领袖的同时,还利用工人运动中的行会主义和狭隘团体习气的残余,来削弱工人的革命统一战线。农民运动更无生气,被禁锢在民团的镣铐中。反革命的民团队伍除了解除优秀农民队伍的武装(早在四·一五政变前,民团武装力量和农民队伍的对比关系是,大概一个装备很差的武装农民对十个装备精良的民团士兵)

^① 指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详见:《中国问题资料》第8辑,莫斯科1927年第3—38页,第9辑第3—10页;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7—306页;《八七会议》,北京1986年。

外，还手持步枪紧紧包围着农民运动的所有发源地，把一个村和另一个村，一个乡和另一个乡，一个县和另一个县分割开来。农民群众被分割得比工人阶级更散，无力同压迫者的血腥恐怖作斗争，他们等待着外来的援助。群众的处境没有出路，无以补救。叶挺和贺龙的军队首先应该卸掉民团扼杀农民的铁环，同农民一起解除这些队伍的武装，用他们的武器来武装起义的农民。叶挺和贺龙的军队要用这种行动来发动革命农民的自发力量，那时只要同反革命的真正斗争一打响，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了。这里也还存在着叶挺和贺龙暴动的主要危险，即来自领导方面的危险。叶挺和贺龙及其身边的中央委员们是否敢于发动农民的自发力量；最后，在发动这个自发力量以后，他们是否能够正确领导这个自发力量，将其纳入真正工农革命的轨道，更加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不使群众成为自己政治军事计谋的工具，而相反变成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工具？（应把话说在前头，叶挺和贺龙暴动的政治领导人应当现在就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一旦叶挺和贺龙的军队起到发动自发力量，解除民团武装和武装革命群众，以及消灭敌人一些大的武装部队等等作用，就应当瓦解这支军队。在这场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是无论如何必须做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将武装的工农群众归入叶挺和贺龙的军队，而应该成为组织新的中国真正工农红军的基础。否则，靠革命群众而得到加强的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会在广东进一步开展暴动时成为巨大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的不明确和不坚定可能是致命的。叶挺和贺龙的运动应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我们应当揭露右派和左派国民党人的背叛行为和反革命作用，并号召一切真诚地接受我们政纲（土地革命等）的人同军事独裁和买办封建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坚决的斗争。如果有这样的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团体，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肩并肩地为争取实现群众的革命要

求，争取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完全摆脱封建残余、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

简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就重建“左派国民党”和利用国民党旗帜举行叶挺和贺龙暴动问题所说的一切，我们应当说，后者在政治上是毫无道理的，前者按目前的提法（“我们重建……”）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由此可见，“组织”国民党的“计划”（见提纲：“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在与叶挺和贺龙运动相联系的现时具体政治形势下是中共中央又一个重大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在广东不是“组织”、“左派”、“革命的”国民党，而是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的真正的革命高潮，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而是在实行毫不犹豫的土地革命，从肉体上消灭成千上万的豪绅、官僚、地主、军阀刽子手、雇佣杀人犯等等，立即没收土地，立即武装工农，立即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并同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由此自然产生由暴动的革命群众所确立的政权形式的问题，或者具体地说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和革命政权形式的问题。首先，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清楚的是，不能以与“左派”国民党的试验成功与否来决定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形式的问题。对于那些哪怕稍微了解中国现时政治形势，特别是广东现时政治形势的人来说，应该不容置疑的是，“组织”“左派”国民党来举行暴动的计划或者是天真，或者是完全迷失方向，最后或者简直是机会主义。同样也不能认为，苏维埃在广东的建立只是作为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工具。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不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现在就应当作为能切实实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并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政权的唯一形式来加以接受。关于如何在广东实际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专门来谈。对于农村来说，苏维埃的问题最简单不过。这里农会是苏维埃的萌芽或特殊形式，因此“政权归农会”的口号在目前的革命阶段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城市苏维埃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在城市，苏维埃应当成为工

人、农民、士兵和城市贫民的政权机关。城市苏维埃的基础应当是工人协会和农民协会。例如在广东,联合了大约20万工人和职员、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所谓纠察队)并在罢工期间逮捕企业主、抵制企业和没收商品的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①可以被认为是城市苏维埃的萌芽和不发达的形式。在广州曾经存在过的由共产党领导并在当时起过政府咨议机关作用的所谓工农商学联合会^②也是民主政权的某种特殊的萌芽形式。

对于广东的实际工作者来说,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否把工农商学联合会或者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建立革命政权(苏维埃)的基础。不管怎样,在广州和其他城市都应这样或那样地建立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

在目前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这场运动遇到巨大困难和障碍的情况下,广东群众性革命暴动的胜利发展只能通过这种政权形式。如何具体执行这一指示应在各地加以解决。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上而下的正确领导。叶挺和贺龙的暴动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插曲,而且是悲剧性的插曲,还是相反,这次暴动将成为中国工农革命新的蓬勃高涨的过渡阶段,就取决于这一点。

这场运动的胜利或失败就在于中共的政治方针和这次暴动直接领导人的策略。

又及:上述意见当时(8月20日)在上海讨论中央提纲时已经说过。

沃 林

全宗514,目录1,卷宗264/2,第3—22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广东工人代表苏维埃是1924年5月在国民党的庇护下作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部分广州工会的代表机关而成立的,1927年4月15日政变后不复存在。

② 指1926年5月在广州成立的工农商学联合会。

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5 号（特字第 103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9 月 22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9 月 19 日

听取：15——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5——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答复第 335 号专电^①。我们与冯 [玉祥] 的关系早已结束。他的代表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往，在入境时或在途中我们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听取：2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1——对今年 9 月 13 日伯纳同志^②的电报（第 558 号专电）作以下答复：

“汉口。致伯纳。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B. B. 罗米纳兹。

示和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①可以得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我们不清楚您的建立各省政府的计划。请告知，这些政府将在什么旗帜下建立：是苏维埃还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②

抄送：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07—10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 1927 年 8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国际局势》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全会决议》莫斯科 1984 年第 4 卷（1926—1929），第 182—187 页。

^② 在第 21 项的边页上有“9·20 已送”字样。

13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9月24日于上海

致青年们

亲爱的朋友们：

上次我给你们寄去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因为那里说的是一些相当令人不快的消息^①。今天我可以让你们稍为高兴一些，有好消息告诉你们。昨天我从南方归来，明天大概还要回去：我们现在在那里做几件大事，还准备做更大的事。当然你们对此可能知道一点，而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就知道得更多了。据现有的材料说，汕头最近几天将被我军占领^②，前景是广阔的。我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我在当地亲眼目睹的这一切。整个广东燃遍了农民战争的火焰。由一些党员和共青团员完全自发领导的（因为总的说来那里的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是非常软弱的）农民，拿起可能弄到的武器，焚烧和刺杀地主、豪绅和当地政权机关，夺取土地，瓜分地主的财产；而在许多地方还夺取了整个县和县城，建立了自己的农民政权。你们拿起广东的地图，我可以告诉你们：整个西南部一高州、连州和钦州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李济深政权。那里只有几

① 见第5号文件。

② 1927年9月24日汕头被南昌起义部队占领。

个城市里还有一些不敢伸出脑袋来的小部队。那里的情况达到如此绝望的地步，以致李济深决定不再向那里派出任何部队去恢复“秩序”：他需要每一个士兵（而他那里士兵已经不多）来对付来自东面的可怕的力量。在西南边，你们可以看到有个巨大的海南岛。这个岛屿四分之三以上已被农民占领，只有在北部角落上还有一个团。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领导这个政府以及整个运动的是一位共青团员^①，据判断，这是一位很好的小伙子，也是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他在那里掌管一切时，他把党和共青团合并在一起，并在自己的报告^②中说，他们“总共”有1万人。当然，我说应当“分开”。但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分开”，还不清楚。广州东面的海丰和陆丰县完全掌握在农民手里。此外，农民们还几次切断了从广州来的铁路，而到25日可望农民沿西江进行总的发动，这就可以切断广西部队前来支援李济深的可能性。我们的青年都很积极地参加了整个这场斗争，领导了农民队伍，在散发我们的和党的材料方面做了巨大的和忘我的工作。当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全省范围内正在实行前所未有的凶残的恐怖。在广州，印刷所遭到破坏，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地都被抢毙了，大多数是十五六岁的共青团员。最近几周来，在广州成百上千的同志被处决，其中很多是青年。我们广州的组织大约有400人，但在最近一个时期以前不很积极。我估计，这里反映了中国共青团所有组织在突然遭到反革命的强大打击情况下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失去了同中央，有时甚至同省委的一切联系，这些组织由于追捕和不知所措而开始缩小和解体。但是只要与这些小伙子联系上，给他们以切实的指示，具体地帮助他们，他们就会热情满怀地着手工作，有时甚至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现在

① 区奇（音）。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在广州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来到这里并推动他们一下以后，组织就迅速开始活跃起来，现在已经在切实地帮助党准备干“大事”。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关于广东的这个好消息。关于其他省的情况，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由于我在上海短暂的逗留没有来得及同还在汉口的中央取得联系。不过你们自然也会同意，现在一切一切的中心在南方。当然，也还需要一位驻中央的代表，我已经向你们提出过请求^①，为什么你们没有派来？此外，你们不妨给我寄点钱来。现在 good bye^②！向大家问好。

贝尔格^③

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120，第 104—104a 页。手稿。

① 见第 5 号文件。

② 英语：再见！

③ P. M. 希塔罗夫。

14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摘录）

1927年9月27日于莫斯科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责备我们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不来驳斥托洛茨基同志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我只想谈谈南方革命运动整个这个事件：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等等。我想说，整个这个事件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倡导发动的，而且只是根据它的倡导。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知道一点儿情况的话。如果这个运动取得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涨成为事实，那末，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共产国际已经给我们中国同志发出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不对此大喊大叫，我们

不在报刊上宣扬这一点。也不应该这样做。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①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83a，第 28—29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① 这里发表的斯大林讲话的最初稿本与过去发表过的稿本（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27 年第 41 期第 19—20 页；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1927 年 9 月 27 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156—157 页）有所不同，那里南昌起义军向南挺进的计划被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还删去了共产国际关于对待革命的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态度的指示的一段话。

15

库诺夫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1927年9月27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致东方书记处赖特同志^①

敬爱的同志：

根据您的建议，谨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组织的简单情况。

该组织的工作人员由三人组成：洪承日（音）（书记）、吴苓生（洛佐夫斯基）（前书记，现在是宣传鼓动部部长）、吴绍棠（音）（组织部长）。

该组织现有正式党员150人。其中在哈尔滨的有63人，在中东铁路线上的有87人。支部共23个：在哈尔滨的11个，在铁路线上的12个。

共青团组织共有70人。

在前一段时期，中共哈尔滨组织没有可能与中央建立联系，它不得不自己设法摆脱风险。

与联共（布）组织的联系是通过特派员进行的。通过定期会议进行领导方面的帮助，会上研究组织性质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从联共（布）组织得到的经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该组织的需要。

^① В. И. 索洛维约夫。

该组织经常遭到警察的迫害。不久前，有 23 名党员被捕，其中有（主要机械工场区）一个最重要的支部的三名委员和一名书记。一部分被捕的人关在一般监狱里，一部分关在军事监狱里。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委员会向在哈尔滨被捕的人提供物质援助。关在其他城市——大连、奉天监狱里的同志情况更糟。最近在大连被捕的一批同志（53 人）根本得不到任何援助。中共中央派来一位同志^①组织东部各省特区边区委员会。但他没有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他被捕了。中共哈尔滨委员会本可以承担发起组织边区委员会的任务，但是为此一是需要经费，二是需要补充人员。

非常需要一名工作人员来加强大连的组织（北方人），随着抗日运动的开展，现在这项工作特别重要。

国民党组织有 200 人。在党部的 9 个席位中有 6 个属于共产党人。国民党员党部委员试图破坏党部，建议它表明对他们所拥护的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态度。我们提出反策略对他们作出反击，说我们的共同敌人（张作霖）把我们联合在一起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在这个行动纲领基础上继续共同同他作斗争。

地方工会的中央机关掌握在黄色领导人，即警察走卒和加入中国籍的俄国白卫分子的手里。在基层工会组织中，在中东铁路线上的许多站点上，工作都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此外，有 350 名中国工人被算作是俄国工会组织中的工会会员，但根据当地（警察的）条件，对他们的工作几乎没有进行。

今后无论如何必须给该组织提供书籍、通报性和指导性材料。

关于中共哈尔滨组织的工作，关于它的党内状况，关于工会中的工作，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农民中的工作，我将口头作出更详细的汇报。

① 何人不详。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工作特派员 库诺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317—31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6 号（特字第 104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9 月 29 日于莫斯科

听取：6—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洛佐夫斯基同志）。

决定：6—（1）认为与冯〔玉祥〕彻底决裂的政策无疑仍然有效，派我们的同志去兰州和开封只是为了搞情报，给予他们像在上海授予的类似领事称号。

（2）责成亚沃尔斯基^①同志根据政治局今年 9 月 15 日决定^②着手派 11 名军事人员去广东。

（3）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 10 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

（4）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

（5）向伯纳^③发电报作以下指示：

1. 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

① И. С. 温施利赫特。

② 见第 10 号文件。

③ В. В. 罗米纳兹。

2. 认为同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实行内部结盟的政策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的国民党登台的话，但是同这样的国民党实行外部结盟，有时根据目前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是可行的。

3. 警告中共防止过去的国民党员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最大限度的严格措施。

(6) 责成由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温施利赫特和加拉罕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这些决议、洛佐夫斯基和温施利赫特的草案^①和政治局交换的意见起草给伯纳同志的电报稿。电报中强调，目前广东最大的敌人是张发奎，斗争应主要集中反对他，同时与武汉派的拥护者们绝对不应签定任何协议。委员会由布哈林同志召集^②。

(7) 关于成立士兵委员会的问题推迟审议。

(8) 责成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起草关于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总决议，以俄国代表团名义提交共产国际。

(9) 责成米哈伊洛夫同志^③和中央出版部监视在报刊上不要突出叶挺和贺龙的名字，而要把南昌部队革命委员会和整个南方革命军提到首要地位。

(10) 到今年年底为中国情报局^④提供 350 英磅的津贴，由加拉罕同志个人负责该局的活动。

(11) 英国工党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⑤问题交给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作最终解决（见决定：6）。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在（5）和（6）项的页边上有标注：电报于 9 月 29 日发出（1927.9.29. 政治局决议）见第 20 号文件。

③ Л. М. 加拉罕。

④ 指在伦敦的中国情报局。

⑤ 见《英国工党在马戏场召开的第 27 届代表大会的报告》（布莱克堡 1927 年 10 月 3—7 日），伦敦 1927 年，第 335 页。

(12)关于孙逸仙大学在建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在中国传播方面的活动的报告于两周内提上政治局议事日程。

抄选：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布哈林同志——全部；

布马日内同志——（9）。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10—1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

弗赖耶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1927年9月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南昌部队挺进^① 政治准备方面的措施

1. 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并将其交给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公开积极地为实现这一口号而斗争。

(1) 在革命部队中作战的军官及其家属的土地，低于一定的限额不应予以没收。

(2) 革命军士兵的家属首先应分得一块被没收来的土地。

2. 将豪绅、高利贷者和地主全部逐出农村。农村和乡村的全部政权交给在农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农民自治机关。

3. 解除民团的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4. 撤销县里旧的官僚机构。建立在工人领导下的由军队、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县苏维埃。

5. 必须吸收农民，特别是农民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农会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

6. 吸收工人，特别是基层的工会积极分子参加组织农民的工

^① 指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挺进以便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见第9、11号文件）。

作和参加农民运动。

7. 在革命军队中建立士兵和本村农民之间的联系。例如，从某些地区召集一些农会代表，由他们成立主要是由本地区出生的人组成的较小军事单位的核心领导小组。

8. 加强通过农会召募农民参军的工作，并由农民成立辅助部队。

9. 对雇农和手工业者的困难和斗争应给以特别的关注。为此农会领导机构要下设特别的部门。

10. 帮助农民跟盗匪活动作斗争。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4，第 47—48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①

（摘录）

1927年10月1日于莫斯科

洛佐夫斯基：同志们！中国最近的事变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尽快给予回答。中国事变的特点是：各种集团更迭极其迅速，有合有分，试图集中反革命势力及其日益发展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是反革命联合战线明显瓦解，南京和武汉之间出现新的分裂，唐生智、张作霖等人之间试图妥协。此外，我们靠叶挺和贺龙领导的革命部队占领了相当大的地区。现在，由于军队向南方挺进，由于占领汕头和即将到达广州，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提出了哪些问题呢？现在自然而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这就是政权问题。现在，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以什么形式来组织政权，组织领导机构，另一方面，又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在业已占领的邻近地区、城市等等建立政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是，在所谓的左派国民党和右派联合以后，国民党内的所有真正的左派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他们现在思想上极其混乱，精神上极其沮丧、组织上极其涣散，以致在军队的这次挺进中不能起任何作用，而这

^① 会上发言的有C. A. 洛佐夫斯基、A. A. 沙茨金、B. A. 瓦西里耶夫、H. H. 布哈林。沙茨金的发言没有发表，因为他的建议的要点在布哈林的发言中已经涉及。

支军队的政治领导，新占领地区的改造，政治意义上的改造——所有这一切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在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之下。另一方面，正如大家知道的，也有一些试图从组织上建立类似真正左派国民党、革命的国民党等的想法。但大家知道，这些想法目前还没有付诸实施。在反革命占领的地区，没有出现任何革命的国民党，尽管个别一些人，国民党的较左的分子，向我们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提出了建议。但那里没有任何明确的、组织上定形的东西。另外，随着军队的逐步挺进，出现了和冒出来许多追求权力的左派分子。在这方面，在中国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物的，只要在占领新的城市后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他们就宣布自己是什么什么人。由于这一点，由于现在造成的特殊形势，就产生一个问题，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左派国民党。首先一个问题是：共产党是否去建立左派的革命国民党。这样的尝试是在进行。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尝试曾经在上海进行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曾发起召开了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员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前来参加会议的只有4名国民党左派和9名共产党员。结论是：共产党人想要亲手来建立左派的或者说革命的国民党，而那里共产党人实际上占多数，左派只会把我们搞乱和拖我们的后腿。这种跟左派一起实际尝试进行建立国民党的做法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共产党是否应该花力气和精力来建立革命的国民党呢？应当说，对于中国的工农运动来说，最完美的途径是不要去尝试建立新的革命的国民党。如果它自己出现了，那么我们就明确对它的态度。但是由我们来建立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发起来建立自己的左派国民党，然后作出一定的让步和退却，这在目前情况下是绝对不值得的。因此，这样的方针现在应该被否弃，而应该向我们的党建议：不要去制造左派国民党的幻想，而要去组织工农。而当左派国民党或者说革命的国民党一旦〔出现〕时，我们就应该明确我们对它的态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

国民党是否会出现呢？这一点不应有任何怀疑。它无疑是会出现的，它将随着革命军队向南挺进而形成。从电讯中获悉，一些左派国民党人已进入汕头，他们大多数已联合起来，而如果那里出现某种革命的国民党，那就产生一个问题：以什么形式来确立共产党和这个新成立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可以预先做些什么，现在应该预先做些什么——那就是同这种新的组织建立联系，而建立联系本身或同他们结成联盟只能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只能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而不能在某些含糊不清的承诺上。其次，联合本身必须具有外部的性质，不是在一个组织内的联合，而外部联合则取决于形势，取决于总的条件，取决于力量对比等。应当允许这些人进入管理机关，但要在保持共产党员占多数和对革命事变实行坚强领导的条件下。现在应当加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已经不是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而是关于政权本身的性质问题。大家知道，最近两个月来，共产党是打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进入农村的。应当说，这个口号对于农村来说是最成功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农会在其实践活动中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就其构成来说，它不仅仅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且在农会中还有乡村的小手工业者、乡村的小知识分子、教师等，它包括我们所谓的劳动知识分子、劳动农民，而他们实际上曾为政权进行过斗争。他们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他们规定赋税，他们惩办和处决盗窃公款者和盗窃国家财产者等，他们任命自己的代表来领导省里的部分占领地方，等等，也就是说，这是在农会旗帜下的实际政权。这个口号当然还要保留，但是随着农会政权的巩固，随着它的权力的扩大，随着农村的这个政权占领越来越多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农会将开始变为具有特殊职能的苏维埃。同时，由于这些机构开始变为苏维埃，那里实际上必然会出现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农村农业无产阶级的联合问题。至于一些大城市、工业中心等，那么很明显，在现阶段除了以工人代表、手工业者代表

等组成的苏维埃的形式成立政权机构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口号，这里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建议，因为旧式国民党的招牌，分为左派和右派的那种国民党已经破产了，革命的国民党暂时还不存在，它还是空中楼阁，而实际政权只能掌握在暴动者，即工人、手工业者的手里，而且它的特点就在于，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这里的苏维埃制度与汕头、广州等地的苏维埃制度混淆起来，这一点也是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两者按其结构和内容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我们成立苏维埃首先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在大工厂中，那么在广州，在广东省则不是这样做。如果说广州有一些大企业，但绝大多数工人，15到20万人是手工业者，而苏维埃则应该吸收店主、小商人等也来参加。那里苏维埃的社会构成，它的结构将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客观情况是，近来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将会有一种倾向，拥护共产党的坚定领导，当然只能在我们的组织本身不断加强和扩大的情况下。与政权结构问题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在那里，在新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农民夺得土地，这是一回事，而当我们接近广州时，情况就不同了。在广州我们是否也可以成立不是实际上的苏维埃，而是形式上的苏维埃呢？过几天后，这就会意味进行武器干涉了。因此伪装的问题在那里是很重要的。他们不能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等名义公开出面。应当明白，现在在广东省和在中国正在做什么事情。汕头现在已经有外国军队登陆。他们似乎是在保护传教士和其他神职机关，但不管怎样，英国和日本的军队反正已经在那里登陆了。他们大部分在广州，而汕头在侧翼，因此伪装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员在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中实际掌握权力的情况下使政府不具有纯共产主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政权将如何命名，是人民代表国民政府还是另一种形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个政府里应当分几个席位给非共产党人士，以便使招牌是非共产主义的。由此就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和极其困

难的问题，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军队、接近广州的农民暴动部队等最近要采取的措施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国际政策问题，即对列强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还包括地方上的政权结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不仅是关于农民的问题，而且是广州政府所面临的整个经济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广州离海岸只有80到90俄里，它可能随时被香港分割，还有中小资产阶级和很强大的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从政治问题开始）都应当加以仔细的分析，以便使站在暴动浪尖上的新政府能够立即给予城市贫民和工人一点东西，并依靠工人群众来同城乡反革命资产阶级相抗衡。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下一步将面临这个政权，或者你们想称作的革命委员会与司令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这支新军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员，贺龙也于不久前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共产党员，那我们就是最大的傻瓜。他们首先是中国的将领。他们可能把整个共产党连同共产国际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他们会出卖我们（布哈林：出卖不等于装进口袋。）他们也会出卖共产国际，如果他们丧失信心，不能在那里最终站稳脚跟和最终夺取一个省的话。所以，对这些指挥人员建立坚强的监督问题，组织这种监督，避免发生意外事件问题，以及这种监督采取什么形式，通过什么样的机构的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这里应当从一开始就忠告我们的同志，不要在这个司令部里设任何特别机构。这类工作做在前头无疑是错误的。在将领手下成立特别的监督侦察部等等，他们就会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如果需要建立什么机构的话，那就应当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无论如何，共产国际也好，我们党也好，都绝对不应在这方面给司令部提供什么帮助，而要坚决做到使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和政治委员手里。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你们知道，在叶挺的军队里有一个由三人组

成的类似革命委员会^①的机构。领导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是谭平山，他是我们的老熟人，依我看来，他是典型的吉伦特党人^②。要他来领导夺取政权和实行坚定的政策，那是根本不行的。所以共产国际应该采取措施，如果那里成立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那么应当是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无论叶挺，无论贺龙，也无无论其他将领都不能加以规避并利用来为自己谋利。下一个问题是这些新的军队，即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与现在驻扎在广州的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州的督军李济深掌握并领导着几万军队。不过你们大概从最近的报道中得知，北伐的英雄张发奎到了广州。他带来了自己的军队，在他们之间，即在李济深和张发奎之间开始发生争斗。如果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传统和策略，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随着叶挺和贺龙军队的逼近，张发奎和李济深之间的争斗将会加强，并且有朝一日张发奎会宣布，他跟我们共产党人一起走。而这个“跟我们一起走”就是一根绞索。不久前从中国来的只同志^③谈到同他有过的一段经历。那是在北伐时期。他也表现出自己是个革命军队^④的反对者，同时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⑤：“我将跟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作战，你从那里派部队来。当部队快到时，我就从后方出击。”还有一个例子：张发奎的铁军回到汉口后说：我们一直在打仗又打仗，但至今未给我们一个省。这就是说，关于这些将领联合的问题，即关于各种将领加入的问题，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他们开始时可能就这么参加进来了，而当革命军队一无所有时，他们就把它一脚踢开，杀掉所有上层领导，杀掉所有共产党的头头，又开始重操

① 见第46页注①

② 吉伦特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反革命勾结的政党。——译者注。

③ 何人不知。

④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反革命军队。

⑤ 看来是给李济深的电报。

旧业。这就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同志：要警惕，要当心这种加入。要注意，主要的敌人是张发奎，他是武汉驻广州的代表。汪精卫这样想：由于武汉的形势不要紧，所以张发奎占领广东，左派国民党就可以到那里去，并把广东变成进一步执行自己政策的堡垒。应该说现在主要的敌人是张发奎，不应当对他作出任何妥协，不应当同他进行任何对话。这是一场歼灭战。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党对过去的国民党员加入我们党的态度问题。看上去这是一个小问题，而实际上在中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已经分崩离析的左派国民党人现在像鲫鱼一样纷纷涌入共产党。由于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大学里毕业，这些左派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可能会给我们党带来极大危害。因此要提醒我们党，要当心这些钻进我们党里来的左派，不要让他们进来，否则以后他们会给我们背后一击的。由于军队向广州挺进、共产党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实际军事力量的问题。应当明白一点，军事力量现在还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军事力量掌握在叶挺、贺龙手里，掌握在司令部手里，而掌握军事力量问题，即建立共产党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应该重新恢复工人队伍、农民队伍，竭力做到在接近和进入广州以前，有一支实际的军事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另外，在快到广州时应该立即武装工人群众，成立工人纠察队，把工人纠察队变成将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和实际依靠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自己免受可能过几个月后会来反对我们的司令部的背后一击。要了解这个司令部上层的思想，还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我认为，中国党和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过于轻信和不够坚定的政策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志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面临的任务的扼要叙述。还有一点，这尤其是共产国际的直接职责，这就是现在就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一场声援这些军队、声援广州的运动。因为现在

从中国，特别是从国民党那里通过上海传来的消息说，他们正准备使各帝国主义了解，这是一些强盗军队，应当把这些强盗军队统统消灭。例如，在……港口^①，英国调去了一些军队，借口是一伙强盗袭击了他们的军舰。在这种借口下不仅可能调军队在汕头登陆，而且会在这种借口下派大批军事力量到广州，在这种借口下还可能完全扼杀即将建立的政权。所以，立即组织一场国际运动来声援这支军队，揭露从那里传来的虚假情报，是完全必要的。从一些大国，即从英国、美国、法国派去我们的人，从汕头、广州那里发出消息，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不然的话还可能出来进行抗议，而如果暴动已被扼杀，那么这种抗议也就无济于事了。最后，共产国际应通过什么形式对目前发生的事变作出反映呢？我觉得，现在应该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通过一个文件作出结论。当然，在文件上不能把我在这里说的一切都完全公开说出来。文件上可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可以指出中国革命面临的新问题，可以指出一部分问题作为指示，这些问题要求严格保密，要通过内部的方式通报下去，不公开发表，但要通报到那里。正因为如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有好处的，责成它起草以共产国际名义发表的正式文件，来公布和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审议一系列问题，并用内部指示方式，用秘密方式发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指示。我指的是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一些指示。

瓦西里耶夫：我认为，洛佐夫斯基同志拟定的和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只想为他提出的建议补充一两个关于党的工作、党的组织问题的具体建议，并专门谈一谈关于所谓农民军或农民部队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现在应该十分正确地提出关于在起义军占领的地区将要建立的革命政权机关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应当抛开像谭平山那样的动摇不定分子的问题，那么更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机关方面提出这个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无疑会在进一步胜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里应当事先预见到，正是在胜利进行的地区有削弱党的工作的危险性。当党的力量和归附于党的无党派革命积极分子直接参加革命国家建设工作，摧毁旧的国家机关和建设新的国家机关的时候，这将直接触及到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的工作、加强党委会等等的利益。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时形势下，存在着这些苏维埃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正确的政治方针的巨大危险，这比我们当年1917年在俄国存在过的危险更大。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当年具有无比强大的党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坚实得多的前提条件，何况还出现过苏维埃脱离党的领导的现象，出现过省里起来反对党的决议和党的领导从而大大削弱党的工作的某些现象。而随后，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所犯的某个错误，由于在对各个阶段和个别团体的关系上发生某些困难而在苏维埃生活中出现危急关头的时候，党竟不能坚决而迅速地出来给予帮助，以坚强的领导纠正错误，并在必要时以武力反击某种反革命发动。在中国，这是极其重要和极其危险的。因此，问题是要千方百计地开展破坏旧的国家机关和建设新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党无论如何不应忽视加强自己的队伍，加强自己的领导的任务。这一点在共产国际所发出的指示中务必加以强调。这不是在不同程度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各种群众组织——工农组织，在建设新的国家机关和破坏旧的国家机关的同时，要进行最坚强有力的、最不屈不挠的和最奋不顾身的工作来加强群众性工农组织，即工会和农会，因为只有依靠这些群众性组织，以后才能更有组织地、更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地进行扩大和巩固暴动成果的革命工作。现在来谈一谈农民部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分为两部分。我认为，正如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表明的。革命的农民应该从两个

方面加以利用。首先必须也应当用来加强革命的正规军。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从优秀的革命农民中，从优秀的农民游击队中大力补充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到还有很大一部分革命农民将直接对抗招募正规军和要他们离开老家的做法。同时，这些农民在自己那个地方，在本乡本土，在自己的老家将是一支对付反动派各种阴谋，支援一切革命发动的出色武装力量。这里有一个与地区总的军事计划和总的军事指挥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农民队伍和依靠本村居民并在一定地区活动的地方农民军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非常实际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有我们农民游击队，特别是西伯利亚红色游击队的经验，也有白色农民游击队，特别是安东诺夫匪帮^①的教训。就拿安东诺夫匪帮来说，我们知道，装备精良又有出色指挥人员的正规军需要花多大的力气来击溃仅仅包括唐波夫省三个县的暴动。这说明安东诺夫匪帮根据地方农民军及其后备队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多么出色。（布哈林：那时你们整整一个星期没能让我从唐波夫省脱身。）不是我们，而是安东诺夫。我们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运动的这个经验可能给我们的中国同志带来很大好处。应当说，大约一年半前，我们给中国同志作过一些指示，但据我所知，这些指示没有付诸实施^②。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叶挺和贺龙军队中的士兵委员会口号问题。当然，从这里很难完全公正和完全明确地来判断这个问题，但根据我所了解的叶挺和贺龙军队中的情况，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冒险的。应该考虑到，这支军队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或者说甚至完全不掌握

^① 指 1920 至 1921 年在安东诺夫领导下在唐波夫省和伏龙涅什省部分地区的反苏农民暴动。

^② 看来是指 1925 年 7 月 21 日 Б. А.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1920—1925）第 1 卷，第 577—581 页，中译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第 638—642 页）。

在我们手里，它是在个人玩弄计谋、倾轧等等过程中归附到革命军队中来的。但是，在目前暴动发展过程中组建起来的这两支军队是以与武汉政府左派国民党旧军队不同的方式组建的。它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领导成员是共产党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那也是由那些跟共产党一起走的人组成的，他们或多或少在最近一段时期里经受了考验。所以我认为，洛佐夫斯基同志建议的方针在这里是比较正确的，即首先建立党支部，在这些支部和政治委员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工作。依我看，这是在这些军队中进行工作的比较正确的方式，它可以更快地克服各种内部困难，使这些军队具有更大的战斗力。

布哈林：总的说来，我完全同意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建议，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一个决议。至于沙茨金的发言，我想提几点意见，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①。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一个难题，特别是由于可能占领广州，因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社会政治上，这在整个事件中是个危险点。说战略上是因为广州是个据点，不仅可以从海上进行封锁，也可以进行轰炸。毫无疑问，随着广州的被占领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一切势力，包括中国政府范围内的势力，都会起来反对广州政府。这里我们就会遇到两个问题：对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政策问题（租界问题）和政权的伪装问题，即它的命名问题。我想来谈一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比政府命名问题意义小。

怎么办呢？是否禁止群众去占领外国人的租界，是否尽一切努力或者完全禁止，或者阻止工人、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人民去占领租界呢？这是个问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我们不应

^① Л. А. 沙茨金在发言中建议，新政权要声明保留外国租界，并认为对新政权机关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稍作掩饰”是合适的，他援引了远东共和国的经验。

该禁止群众去占领租界，因为目前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斗争阶段，这种禁止会妨碍群众的革命高涨。现在，在以前的政府和整个国民党势力威信扫地以后出现了这样的形势，为了开展总的运动我们必须有更广泛的基础。从对帝国主义者的态度的角度来说，这自然是很危险的。

然而我们认为，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对于这类事情不应去进行任何禁止，如果群众想要占领租界，我们就应该支持这些群众。由此看来，这是在总的策略中的一个明确的和相当重要的转变。

至于伪装问题，我主张采取审慎的提法，我认为沙茨金同志提出的论据在目前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这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事情的实际方面，其次是命名问题。至于事情的实际方面，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成立苏维埃政权，而广州的苏维埃将是最高权力机关。

我忘了指出一点：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广州是个弱小的据点，因为我们在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

关于政府命名问题。沙茨金同志援引了远东共和国的例子，并说论据不正确是因为我们在苏联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因此这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论据恰恰证明沙茨金同志不对。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苏维埃，因此我们伪装起来就要复杂得多，但尽管我们伪装起来要更复杂，但这种手法却是成功的。另一个例子是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举行暴动的决定^①“甚至”是同现在的反对派同志^②一起制定的。爱沙尼亚是很脆弱的，可能遭到帝国主义政府从海上的封锁和直接进攻。由此看来，在战略上也像现在的

① 指1918年在爱沙尼亚的暴动并在那里建立实际上的苏维埃政权，该政权在德国军队进攻时很快被推翻。

② 指Л. Д. 托洛茨基和Г. Е. 季诺维也夫。

广州一样是危险的。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称它为革命人民政府。

还有一个论据对洛佐夫斯基同志建议的方针有利，这就是强调国民因素。应该选择什么名称呢？或许可以叫工农国民政府，或者类似名称，或者是革命人民政府，稍晚些时候可以这样命名，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强调国民因素。在同武汉、南京、整个资产阶级等进行斗争后，自然谁也不会怀疑这个政权的阶级性质。广州存在着苏维埃和这些苏维埃行使着职能，只要广州掌握在我们手里，人们就不会怀疑，我们在这里建立的是某种别的东西，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国民因素，这不是作为阶级因素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这个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一定的伪装就在于此，但正是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从实际和现实的情况角度来看，在我们的计划中可以为夺取租界而进行斗争，也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苏维埃政权。然而，我认为，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时期里进行伪装的尝试。（沙茨金：那您怎么掩盖苏维埃政权存在这一事实呢？）谁能在爱沙尼亚掩盖我们在那里存在苏维埃政权呢？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整个宣传工作等来解释这一点，诚然我不否认，不是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在远东共和国也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时机，我们利用了它，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经验是完全肯定的。

我再说一遍：广州的苏维埃政权以及为租界而进行的斗争，从实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要比政权命名的问题重要得多。

至于士兵委员会，我不想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这取决于共产党人拥有的实际权力，也取决于这件事所处的状况。从×同志^①那里我们接到了几份电报，他说，军队内部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我们是否尝试通过党支部、团委员会、革命

^① 可能是指 A. И. 哈西斯。

法庭、军队中的特别委员会的系统或者以士兵委员会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组织力量，能不畏失败的危险来夺取军队，那么我们可以不要士兵委员会就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从组织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设士兵委员会还是合适的。不过这个问题取决于实际情况。

（沙茨金：您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国委员会？）是的，但不是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是向我们的代表团。我们应当提出这个问题，但不作任何明确的指示，这样做是危险的。

其次，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在这里讨论得最少，也最难解决，这就是广州及其周围的经济政策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各种庞大的和奇怪的金融性质的要求，毫无疑问，在广州夺取政权时，我们立即会遇到一连串的困难。大资产阶级会反对我们，中产阶级——我同意沙茨金的意见——也会反对我们，使用雇佣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很可能也会反对我们。这意味着在税收制度等方面会出现怠工现象。如果采取没收之类的措施，在中国现时经济衰竭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不能从农民那里征收高额捐税以利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不得不减少捐税，以表明我们不是从前的政府。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到，象稻米这种天然产品的生产将会减少，生产过程也会遭到某些破坏，而在土地革命进程中，在分配土地时，农村生产过程的破坏情况，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得多，因为在农民中间斗争将会加强，因为在中国活劳动的特殊比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从经济形势的角度来分析的各种负面影响将难以克服。要为此事从莫斯科拨去必要数额的经费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提供援助，但我们不能为整个革命拨款，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

对此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大企业、贸易和银行的问题。这里必须考虑到，我们会比汪精卫等人处于更不利的情况下，因为

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反对我们的怠工现象将更加强大。与此有关的还有流动资本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将大企业，不仅是外国的大企业，而且是本国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大资产阶级将会跑掉，作为惩罚我们将不得不把大企业实行国有化，但为了使大企业运转起来，我们需要流动资本。从哪儿去取得呢？所有这些经济政策问题，我们还没有像现实生活要求我们的那样去充分考虑，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笼统地提出来的。

现在就决议的结构说几句。我觉得，在决议草案中我们应该强调策略方针的某种继承性，也就是说必须把对革命现阶段的阐述与革命以往阶段的阐述适应起来。我觉得，还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以前的阶段上，例如在北伐等时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地区现在成了运动的组织中心，而以前的组织活动，部分是由于我们选择了以前的策略才有可能进行的，现在已开始带来自己的成果。我们现在从过去创造的资本上得到了政治利息。

其次我认为，所有具有两重性的问题，即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如何解决的问题以及保密问题，却应该从这个决议中删除。在这个中间阶段，我们曾通过秘密途径发去各种指示，公众什么也不知道，至于向党通报，以及向广大公众通报，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些事，但谁也不知道。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所犯错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因此，决议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在于更多地向公众通报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活动情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6，第 6—15、20—28 页。

俄文打字稿（C. A. 洛佐夫斯基和 B. A. 瓦西里耶夫的发言），德文打字稿（H. H. 布哈林的发言），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会议第 47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1 日于莫斯科

听取：4——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4——为了根据讨论时提出的建议^①起草一份文件^②，成立由布哈林、库西宁、罗易、洛佐夫斯基（负责人）、片山潜、沙茨金和赖特^③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期限三天。

如果委员会一致通过这个文件，就可以公布。否则必须提交政治书记处批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库西宁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6，第 2—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8 号文件。

② 见第 16、18、25 号文件。

③ B. H. 索洛维约夫。

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8 号文件

（摘录）

1927 年 10 月 6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9 月 29 日

听取：16——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6——发去以下电报：

“上海。致伯纳^①和中共中央。答复你们第 093 号电报^②。最高领导机构^③。”

9 月 20 日我们已给你们发去关于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并赋予你们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④。为何没有告知收到该指示？作为该指示的补充，建议：第一，广东的形势要求尽快着手在所有大大小小工业化城市里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因此要采取措施来建立苏维埃；第二，同意保留‘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但要考虑到，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必须将农会改变成苏维埃，因此要采取措施准备向农

① B. B. 罗米纳兹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④ 见第 12 号文件。

村苏维埃过渡；第三，在目前形势下和在我们现时的方针下，我们认为试图由共产党人来建立左派、革命的国民党，这是不能允许的，但如果这样的国民党出乎意料地自动出现，我们认为与这样的国民党结成内部联盟也是不能允许的，建议只结成外部联盟，丝毫不能束缚中共的领导权；第四，警惕过去的国民党员可能纷纷涌入共产党，建议在吸收他们入党时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第五，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在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第六，在广州立即恢复工人纠察队，把尽量多的可靠工人和省港罢工者武装起来。对这些工人纠察队应该加强军事训练，使他们成为苏维埃的支柱；第七，不要在司令部下面设任何特别委员会、革命法庭或特别处，而要在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和党组织下面设特别处。应当免除一贯摇摆不定和在目前危险的谭平山的职务，给他一个名誉职位。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内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要由绝对可靠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组成；第八，把更多的工农暴动者吸收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里来，在所有部队里成立坚强的党支部，在每个党组织下面设立军事委员；第九，要跟武汉和整个汪精卫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他们指望张发奎把广东省变成自己的据点。张发奎现在是主要敌人。反对武汉和南京的斗争，一分钟也不能停止。在国民党部队投诚你们时，要把将领和指挥人员逮捕起来，接收士兵要经过一定的挑选。”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54，第 2、7—9、1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8 号（特字第 106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6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0 月 6 日

听取：28——关于孙逸仙大学问题（见组织局 1927 年 10 月 3 日会议第 148 号记录，决定：9）。

决定：28——（3）向中国的大学提出逐步共产主义化的任务，但不排除接受非共产党员和非共青团员的工人和农民入学的可能性，限额约占学生总数的 20%。

抄送：克里尼茨基、米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1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①的电报

1927年10月11日于莫斯科

电报

密电

上 · 海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第1040号电。

核对无误：

科兹洛娃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35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估计是Ф. К. 费尔格德。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9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听取：9——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9——（1）批准塔斯社的以下声明草案：

“外交人民委员部授权塔斯社声明：报纸报道以及凯洛格先生的声明，称闫锡山或冯玉祥发起的反对安国军^①的运动是苏联支持的，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谣言。”

（2）在《消息报》上发表相应文章，嘲笑诽谤者，并称：苏联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支持在华北交战的任何一方^②。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55，第 1，3，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安国军是于 1926 年 11 月在天津召开的反动军阀会议上成立的，目的是联合力量同南方的革命军作斗争。张作霖被选为安国军总司令。1928 年春该军被国民党军队击溃，1928 年 6 月 4 日张作霖死后正式停止活动。

^② 《消息报》1927 年 10 月 15 日。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第 51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14 日于莫斯科

听取：2——罗易同志与《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①。

决定：2——推迟审议。

听取：3——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决定：3——责成罗易和沙茨金同志在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决议，决议草案在由洛佐夫斯基、瓦尔加、片山潜、舒宾、彼得罗夫^②（副主席——赖特^③）组成的委员会仔细研究后提交政治书记处批准。期限：星期三，1927 年 10 月 19 日。

委员会会议由罗易和沙茨金同志负责召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库西宁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0，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意见分歧的性质不详。

②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③ В. И. 索洛维约夫。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①

（摘录）

1927年10月14日于莫斯科

布哈林：我的主要意见是，决议在其最重要几点上已经过时，事变已经赶在它的前面^②。洛佐夫斯基同志起草决议时，革命部队正在汕头，那时军事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形势是军队基本上被击溃。我们现在只剩下两支部队：一支有2000人，另一支有1000人，没有更多的了。另一方面，最近在湖南和湖北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暴动。在这两个省农民暴动在迅猛发展。与此相联系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形势，不是阶级关系方面的，而是军事因素和农民以及部分工人阶级直接暴动因素之间关系方面的。这从中国革命总的发展角度来说有点新的东西。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军事因素曾起过很大作用，而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形势，在军事因素作用较小的情况下存在着规模相当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就提出了按完全不同的途径来组织革命力

① 会上发言的有C. A. 洛佐夫斯基（发言没有记录）、A. A. 沙茨金、H. И. 布哈林、M. H. 罗易、E. 瓦尔加和O. B. 库西宁。沙茨金的发言没有发表，因为它的基本论点在布哈林的发言中已有反映。

② 指的是由C. A. 洛佐夫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于1927年10月4至10日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决议草案（见全宗495，目录3，卷宗40，第59—74页）。

量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洛佐夫斯基同志的阐述应从这方面来加以修改。

与此相联系的是还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决议中有一段关于新的革命中心的话，今天已经有点过时了。洛佐夫斯基同志写的一段关于新的革命中心的话，指的是汕头，而一旦占领时也指广州。然而，今天这样提出问题已经过时了。决议中提出军事占领广州的问题，要么为时已晚，要么当时尚早。在解决革命中心时必须提出湖南和湖北的问题，那里农民已经组织起来，首先是作为暴动的直接中心。这是同我们的部队在汕头遭到失败有关系的，也是同湖南和湖北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开展有关系的。

第二点意见多少也是同这一点有关，涉及到提出政权的问题，即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我认为，在决议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应该是主要问题。这里确实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些。我想在这里稍广泛地提出我们政策的继承性问题。

首先必须用具体日期阐明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情况，说明为什么，通过什么形式，然后说明为什么这个口号从宣传口号变为现实政策口号，目前苏维埃的问题又怎么样。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们提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口号）是主要问题。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论证。因此，要更多地说一说政策的继承性。然后要更多地说一说形势的变化，着重说明最近的事态，重新强调苏维埃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国民党或者说某个左派政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洛佐夫斯基同志已经说了，但是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没有理由绝对相信我们将会第二个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什么说没有理由呢？因为国民党在农民中已威信扫地。说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国，这决不等于说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会建立自己的政党。为什么呢？组织骨干在哪儿呢？不是在国民党内，就是在共产党人中间。我完全不否认，有可能培养一些新的骨干，能

够根据农民的特殊利益把他们组织起来。但为此需要时间，而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所有农民积极分子会转到共产党人方面来，而首先是那些支持共产党人提出土地革命方针的人。

我们俄国以前有过社会革命党。洛佐夫斯基同志想必还记得列宁和马尔托夫的争论，当时列宁提出一个论点，认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是绝对必须只通过成立农民党来与农民结成联盟。他说，我们作为一个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一起做了许多事情，但没有与任何农民党结成联盟^①。中国和俄国有什么差别呢？大家知道，中国是更为落后的国家。但从另一方面说，俄国有农民党的传统。此外，俄国那时的形势是，比方说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手里。俄国有着农民协会属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多年传统，而这样的局面一直保持到二月革命以后。只有在十月革命前夕，甚至更晚一些，我们才得以在农民中取得影响。而中国没有类似的传统，没有这样的干部，相反，在所有农民委员会中过去和现在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因此，这个论点必须非常审慎地加以表述。如果我们即使不是像在第一个草案中那样断然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在洛佐夫斯基的这个草案中，共产党人也会对这个论点作出这样的理解：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支持或者甚至去建立这样的政党，而我们的任务却是争取时间，竭尽全力利用缺乏能够把农民组织在自己周围的干部的情况，利用这段时间，以农民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有谁说过农民一定要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呢？不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能把农民的精力放在建立农会的苏维埃等等上面呢？而我们在那里有自己的党团，起着领导作用。因此，这个建议应当这样来表述，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显

^① 见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55—359页。

露出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方针。我们不应在这里给任何这种念头留下余地，我们应该这样来表述，即使出现某种类似的东西，虽然不大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在这样的时候也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几乎是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前景的，但假定说，如果在中国有可能出现真正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来领导农民走真正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并且不是像国民党那样做，而是成立革命政府并在其中占居多数，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景几乎不存在，但是回想一下，列宁在第一次革命时期是如何提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呢？他没有排除我们作为少数派参加这个政府的可能^①。在中国，头等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于，这是一个真正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竭尽全力来消灭封建统治的各种残余等等。可能在提纲中完全不应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反对这样的表述：只有当我们占绝对多数的时候，我们才能参加革命政府。这样说没有说服力，而我强调，这是与武汉时期情况不同的某种另外的东西。

与第一点有关的第二点，涉及到出现第二个政党的可能性。我认为，关于大批人退出国民党的论点是正确的。这是事实。尽管我本人在不久前还主张打国民党的旗帜，但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排除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前景，现在果真如此。

有人给我们写信，说国民党组织没有什么力量了。我们的代表^②也给我们写道，参加国民党的各种群众性组织现在都跟着共产党走，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因此我认为，关于大批人脱离国民党的论点是正确的。即使国民党内还留有一批人，但我们还是应该提出大批人脱离国民党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可以促使国民党

^①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决议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02—204页。

^② 看来指 B. B. 罗米纳兹。

进一步瓦解。如果我们的策略是不允许建立任何第二个政党的话，那么这就是共产党的任务。

我认为，在这里与社会民主党进行类比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当删掉这一点^①。为什么这不是一件小事呢？我们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时采取的各种立场也都删掉了。如果你们与社会民主党进行类比，那么我们就勾掉了与落后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差别，等等。当然，用约定的形式进行类比是允许的，但现在这种类比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应当删掉它。我不反对沙茨金同志建议的各种更为明确的表述。或许有些问题还必须更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例如，在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应当把使用雇工和没有使用雇工的阶层区别开来。至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里只需要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而不用说各种不同的形式。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应该更谨慎些，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将怎样发生。可能它以苏维埃的形式实现，就像我国曾经发生的那样，当时列宁提出了俄国革命通过和平道路的论点。那时在我国是工农专政，是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而列宁没有排除这种转变通过和平道路的可能性^②。也可能出现另外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这里只能笼统地说，而不谈各种形式的具体内容。我的意见就是这些。

罗易：谈谈决议的缺点。决议的主要缺点是，它是根据汕头的形势起草的，充满很大的乐观主义，不是所有问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而只提出了一些口号。因此，决议看上去像是一连串的

① 在决议草案中改变对国民党的口号的必要性是以引用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的变化来加以论证的。

② 见列宁：《在全俄第一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的讲话》（1927年6月3日—24日（6月16日—7月7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43—244、272—273页。）

口号，而不是给一个政党的对事态发展的指示。决议具有这样的性质，似乎共产国际第一次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它没有继承性。决议中既没有提出新的方针，也没有显出对旧方针的发展。在这方面，对共产党批评得不够，不仅仅是不够，而是一大错误。决议中只字不提在失败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错误政策和机会主义倾向。大家知道，党没有纠正这些错误，而我认为，不指出党的领导的错误，就不能正确地给党确定新的方针。我认为，决议的主要部分应该是批评党的领导和客观分析它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我看来，决议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国民党的问题；（2）小资产阶级的作用；（3）土地革命；（4）政权问题；（5）军队问题。

决议中很多地方谈到国民党是反革命的政党等等。但是，只是很机械地谈国民党，尽管我们同这个国民党进行过合作。因此，我们应该说明国民党反革命发展的过程。但这一点决议中却没有。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是个很重要的社会阶层，这个问题用三言两语是不能解决的。在这方面应该讨论与可能成立新的或第二国民党有关的所有问题。小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存在，如果它是农民党的话。然而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组织农民，甚至当农民运动在国民党旗帜下开展起来时，共产党人也控制着他们，实际进行工作的是共产党人。布哈林同志提到的新组织的干部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党是不可能的。小资产者只能被看作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工人和农民只有在革命的阶级搏斗中才能与这个社会阶层结成联盟。

关于政权问题。我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进行伪装。广州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政权问题和苏维埃问题，我们应该绝对明确地提出来，也就是说一切权力归工农。

关于没收土地问题说几句。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这是一个中心

问题。我们党甚至有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能提出如此激进的口号，因为所有将领都是土地占有者，如果提出这个口号，军队就会反对我们。当时找到一个妥协，办法是提出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不是小土地占有者土地的口号。这样的妥协办法曾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阶段。现在总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再存在，在这样一个时期保留这个旧的妥协办法将是错误的。现在必须提出无条件没收土地的口号。

最后一个问题是军队问题。军事因素在革命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革命仍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但是任何革命军队都不支持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以前巧妙地利用个别一些将领的策略完全不必要了。然而，这种传统还在党的领导层中保留着，鉴于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有一些犯过这种错误的老领袖，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

谈谈工作方法问题。我的建议没有用书面形式提出，因为这里成立了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工作的是洛佐夫斯基同志，但是他从来不召开会议，委员会也从来不进行工作。因此，我建议成立新的委员会，把所有意见以书面形式交给这个委员会来制定决议的最后稿。

瓦尔加：我觉得决议中还有一个重大缺点，即只字不提中国发生的所有一切争斗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干预下进行的，所有军事派别都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后者站在这些所谓的中国军阀背后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其次，同志们，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任务把国民党看作是已经走完自己革命道路的政党，那么我们应该在决议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它证明自己无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我对这样一点不满意：决议中把中国问题看作是和解释成某种孤立的东西，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军事和财政的干预下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这个决议要在较长一段

时期，在几个月时间成为对我们中国党的指示，那么在决议中对这个因素必须给予应有的考虑。

库西宁：我对决议的结构有许多疑虑。决议的主要目的是让[共产]国际内那些还不了解我们方针的共产党人了解我们的方针。现在这个决议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决议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加以补充。或许应当扼要地描述一下过去的阶段，指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曾面临哪些主要任务，为什么下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那样提出的等等。对中国党的具体指示则是另一回事。我担心，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说到，决议可能会很长，虽然中国党会去研究它，但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就不会去看它。委员会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决议分作给中国党具体建议的部分和供发表的部分。在供发表的决议中必须阐明总的方针，首先是苏维埃问题，而具体建议则必须在单独决议中加以阐述。我建议确定一位同志来承担决议的修改工作，然后再由一些同导来审定。实际上这样做最好。

布哈林：我们应当委托一位同志来对决议的文本进行补充。但如果不通过委员会就把决议立即交给政治书记处将是很复杂的事，因为有各种建议和进一步的说明应该加以考虑。因此我建议把这件事委托一位同志来做，但他首先应该向委员会作出报告。问题本身不是很复杂，是可以表述得很好的。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0，第 13—2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26

希塔罗夫给沙茨金的信

1927年10月14日于上海

亲爱的拉扎尔：

我本想趁此机会给您寄去关于团^①的情况的详细报告，但遗憾的是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们还在汉口至上海的路上，因此我这里除了在上一封信中已经向您报告过的关于南方的情况^②外，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所以只能说点总的情况。一周前我从南方回来，是作为“报忧者和报丧者”^③回来的，在汕头附近我们被打垮了，垮得那么惨，以至于我们曾抱很大希望的军队已经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零散的部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多：敌人要比预料的强大和聪明；军队又饥又累；军队领导在军事上相当无能；最后我们不善于也未能充分地发动农民，使他们能在军队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墙。最近的情况可归咎于两点：广东的党组织很软弱和军队政治首脑（以谭平山为首）实行的是以往那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方针，仍像过去那样不敢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胆口号，而仍竭力加以削减。例如，他们要求超过200亩的土地（约15俄亩，这是在中国的条件啊！）才没收。他们自己告诉我们，农民对他们说：你们干吗要为实行这样的纲领走这

①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见第13号文件。

③ 引文出处不详。

么远的路啊。然而，汕头的失败也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如果军事领导稍微有点本领的话，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和空间，即使暂时放弃汕头，也能保存军队，使它成为今后发展我们力量的起点。上层领导的政治错误本来是可以迅速和顺利地加以纠正的，广东的基础对于夺取政权，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在得到上面最后批准^①前就决定了的）是最有利的。但遗憾的是事情已经搞坏了，而现在只能如此，反动派无疑在加强，一切前景都拖延下来，面临着重新积聚力量的艰巨工作。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些经验，开始在进行改革。即将召开的党中央全会^②将作出最终的决议，但现在已经清楚的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党，建设中国从未有过的那样的党，为此有优秀的人材资源和非常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在许多省，首先在广东，准备武装暴动仍是当前任务，这项准备工作就是发展农民游击战。在我们的电报^③里我们已详细叙述了这些情况，希望你有机会看一看。

昨天阿尔弗雷德^④来了，我很高兴。的确，要是他早来四个月左右，就好多了，不过这样也很好。我现在就让他“熟悉情况”，然后他可能去汉口呆一段时间。至于我本人，我想呆到党代会^⑤前。您大概会同意我回去。由于广东的前景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渺茫，最近几个月有一位代表就可以应付了。在那里可以看得清楚。致礼！

① 见第2、3号文件。

② 原定的中央全会没有召开，后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见第159页^③。）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 M. 3. 阿布戈夫。

⑤ 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大会于1927年12月2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

贝尔格^①

全宗 533, 目录 4, 卷宗 120, 第 121—122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P. M. 希塔罗夫。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32 号(特字第 110 号)会议记录 (摘录)

1927 年 10 月 27 日于莫斯科

听取:4——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4——(1)接受前贺龙和叶挺军队中的 30 名中国共产党指挥官入我国军事院校;按高等院校培养外国人的拨款预算条款,增加给军事部门 45000 卢布的预算。

(2)将所有中共党员从库伦调回莫斯科继续学习。由中国委员会为此拨给必要的经费。

(3)关于在内蒙古工作的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

(4)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项指示,鉴于革命军在广东遭到失败和农民运动暂时低落,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并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同时告诫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在这个时期将党的力量分散,从而导致在新的革命高潮时有耗尽力量的危险。提出在大的中心城市创办党的报刊作为当前时期的一项特殊任务。

该指示由布哈林同志负责完成^①。

^① 见第 29 号文件。

（5）给伯纳同志^①发去以下电报：

“鉴于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建议不召开全会，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后同其他中央委员单独或分组达成一致。提出这项建议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必须爱惜每一位中共中央委员。至于外国人，建议只由一人参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20、12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B. B. 罗米纳兹。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会议第 52 号决议
(摘录)

1927 年 10 月 28 日于莫斯科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责成就这个问题成立的委员会^①在两天内完成工作,并在与布哈林同志商量后将决议的最后文本提交政治书记处各位成员审阅^②。

建议连同修改意见或补充意见用书面形式交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库西宁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42, 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9、24、25 号文件。

② 决议没有通过。

29

布哈林给各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的通报

（摘录）

1927年10月31日于莫斯科

绝密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谨就中国问题通报各国共产党中央，由于叶挺和贺龙军队的失败，我们党的工作进入了更为艰难的时期，各组织（工会和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恢复自己的联系和工作。同时在一些地方，农民革命运动正在进一步发展和深入（广东东部已被暴动农民占领；唐生智部队已被暴动农民从湖北南部赶出来；在湖南很大一部分地方，日益强大的农民暴动正在开展）。叶挺和贺龙军队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未能与这些农民暴动结合起来并依靠它们。与农民运动发展的同时，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斗争又重新高涨，尽管工会遭到空前的恐怖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将其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党应该避免在这个时期分散党的力量，防止在新的革命浪潮高涨时有可能耗尽力量的[……]。

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托 布哈林

^① 此处删去了关于欧洲共产党的策略和苏联形势的部分。在通报的英译稿上注明：“已通过绝密方式分送给一些重要的党。”其中包括1927年11月3日送给中共（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246，第38a—38b页）。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569, 第 158、160—162 页。

打字稿, 原件。

英译稿——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41, 第 39—44 页。

德译稿——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569, 第 164—168 页。

30

牛曼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摘录)

1927年11月29日于广州

特密

最高领导机构^①。我已抵达广州。城市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张发奎手里,他采取了明显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军事形势依旧。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②,其中在特别独立团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领导着大多数士兵和党员^③,在第二团^④里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正在迅速发展,它的力量有2000人和1000名没有武装起来的士兵,已占领了海丰、梅陇(估译)、汕尾、吉隆(估译)等城市。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处决了300个豪绅。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已把叶挺召来了。张发奎和黄琪翔不止一次非正式地要求会见,由于他们搞恐怖,我们拒绝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莫利斯^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专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② 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团、教导团和警卫团。

③ 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

④ 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警卫团。

⑤ 原文如此。应为:莫利茨,即Г. 牛曼。

31

波赫瓦林斯基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7年11月29日于广州

特密

致米哈伊洛夫^①

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时的改革派^②，他们尽管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是个特殊的派别，他们的命运在反对对他们不断收缩的广西包围圈^③的斗争中也大成问题。拒绝同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请立即给莫利茨作出他所请求的指示^④。韦谢洛夫^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专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① A. M. 加拉罕。

② 指汪精卫一张发奎派，他们于1927年11月17日夺取了广州的政权。

③ 指以李济深为首的桂军向广州的推进。

④ Г. 牛曼，见第30号文件。

⑤ Б. А. 波赫瓦林斯基。

32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11月^①于上海

秘密

关于中共策略的意见

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危险外，在中共党内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盲动主义危险。机会主义的基础是党不太善于适应由于进行土地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斗争条件。而新的盲动主义倾向的基础则应认为是党不太适应现在在直接革命形势基础上展开的某些联合过程所造成的新的斗争条件。

1. 三次大失败（上海、武汉、汕头）没有结束直接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没有统一。土地革命依然摆在议事日程上。要在现时的基础上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

^① 佩佩尔在1927年11月30日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兹寄去关于中国目前形势和我党策略的一些意见。寄去的这个材料确是一些简单的意见，没有对问题进行充分的阐述，应把它同以前通过的中国问题提纲和决议联系起来看。

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指出的（联合征兆），是相对的，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不过其中多数意见包含着今后革命加速发展的萌芽。但这些联合征兆是存在的，即使明天或后天它们又消失了，那么其他类似的现象可能又会出现，它必然会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估计现时革命形势和我们或许要过几年才能指望的长远前景之间的联系。

如果你们认为合适，请将材料中谈到的问题提交相应的机构讨论。

乔恩”

平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停止。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正处在两个磨盘之间，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一个是在中国经济深处仍居主导地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不可能发展。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内市场，而且建立一般的资本主义市场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土地革命、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目前状况下依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在直接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在这种形势基本没有改变的基础上，可以看到某些联合的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过程是：

1. 北方的联合

张作霖统治的地区正出现某种联合。最近几次战争表明，张作霖的邻邦没有能力将他从北方省份中赶走。张作霖政权的基础是满洲的联合。同日本的妥协，美国提供给南满铁路的大笔贷款，满洲的大规模殖民地化，开设新的工厂、矿山等等——这就是北方联合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联合也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华北的联合不可能使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张作霖实行的联合阻碍着南方军队占领北方，但同时张作霖也没有力量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来占领中国南方。

2. 战争性质的变化

现在进行的各种战役具有与从广州到汉口的北伐和汕头的南方战役完全不同的社会性质。北伐从社会关系上说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起来反对北方的军阀和帝国主义。汕头的南方战役从社会关系上说是工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前面的两次北伐引起了工农运动的迅猛高涨。它们使新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并带来了国家政权和国家机

关的变化。现在的军事进攻（所谓的战争常常无非是军阀之间的倾轧）只是由同一个阶级的不同派别组织的进攻，不会带来根本的社会变动，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会吸引群众参加广泛的运动。

3. 中国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帝国主义方面

从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决裂时起，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不再同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战争。蒋介石的背叛不是资产阶级民族背叛的顶点，而是它的起点。一年前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资产阶级如此公开地向帝国主义者讨好的场面，如上海资产阶级社会团体为美国布里斯托尔将军举行欢迎宴会和蒋介石发表亲日讲话。英国也不可能重新正式占据汉口英租界而不遭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的公开结盟，不言而喻使得中国无法借助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从而成为进一步保持革命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目前乃至以后一个时期里反革命势力的联合。

4. 国民党的重新组合

国民党丧失了工农基础，完全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它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它还有可能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某些利益的代表而存在。国民党各种派系、集团、外省和地方派系之间的斗争继续存在，党本身常常只起到各派军阀政治附庸的作用，但是在国民党队伍里也可以看到某种联合的倾向。有两个重要事实应该指出，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代表会议^①和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结盟。

^① 看来是指国民党武汉组织、南京组织和上海组织的代表于1927年9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召开的会议。

5. 工农运动的失败

最近几个月来，无论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都没有表现出高涨的趋向。由于遭到失败出现了某种消极情绪。表明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因素应当认为是以下几点：

(1) 最近三个月来，上海的所有罢工都以失败告终，广大工人阶层因此充满消极情绪。

(2) 自从张发奎采取枪决的手段以来，广州的工人群众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性。

(3) 汉口的工人们完全没有利用南京和武汉之间的战争，而英国报纸甚至报道说，汉口工人们认为自己现在比过去更加受到压迫。

(4) 由于晋军的逼近而引起的张作霖统治的短暂危机被北京的学生和国民党所利用，但没有出现工人们的任何发动。

(5) 9月和10月各地的农民暴动是孤立的，不能向广度发展，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了。

(6) 工农运动的浪潮彼此隔绝，不能汇合起来，因此比较容易化为乌有。共产党不能对农民暴动者给予必要的领导，农民暴动不能通过占领比较重要的城市来保证自己有巩固的中心。

6. 汕头的失败

主要由政治性原因造成的南方战役的失败意味着（至少在目前和最近一个时期）丧失了最后一支革命军、最后一块革命地区和国家机关。

诚然，所有这些客观形势的变动没有使直接革命形势化为乌有，但是这等于反革命势力的某种加强和联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定削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延缓革命的速度。

3. 在制定我们现时的策略时，我们应该弄清楚北方的发展和

南方的发展之间的差别（自然我所说的北方和南方不是作为地理概念，而是作为政治概念）。北方地区，或者换句话说，张作霖统治的地区在许多方面走的是与南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差别是：

（1）北方在政治上没有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时期。

（2）满洲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

（3）北方的国家政权要比南方巩固和强大得多。

（4）满洲是中国由头等帝国主义列强（日本）直接培植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关的唯一地区。

（5）满洲的经济联合和政治联合给张作霖提供了用来压榨中国北方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军事手段。

（6）北方的工农运动没有经历像南方那样的高潮时期，因此不能像南方那样发展大规模的群众组织和积累如此丰富的经验。

4. 为了正确评估农民暴动，应该考虑到中国国家机关的特点。

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很小一点政治集中制的萌芽。一些省份彼此联系很少，而且在其内部“凝聚力”也很小。正如在中国的经济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样，中国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关的实质也只有在考虑到适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制度形式，即亚细亚专制制度的巨大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够理解。这个亚细亚专制制度是：在其表面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政变、叛乱、战争），但是在其基层，在农村则丝毫没有变化。亚细亚专制制度的本质是，其表面的变动并不改变其社会内容，而在农民内部无论社会状况还是政治状况都不发生变革。亚细亚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在农村非常缺乏行政机关。农村现存的压迫机关是地方性的机关，它与省里的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联系十分薄弱。如果有谁认为自己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集中制的、官僚军阀制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谁就是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整个国家

机关的上面^①，特别是它在地方上的薄弱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发动地方规模的农民暴动是比较容易的事。不满、剥削和压迫到处都很严重，农民几乎无可丧失，鉴于参加暴动的往往是人数较多的农民群众，对地方暴动可能作出的抵抗也比较小。中国如此频繁地发生暴动的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地方农民暴动是孤立的，不波及大城市，也没有在那里产生像在现代集中制国家那样深刻的影响和具有那样巨大的政治意义。孤立的农民暴动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不会对邻近地区产生任何政治影响。然而，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政府或者省的政权当局会集中较多的军队来同暴动者作斗争，把农民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要对中国的农民暴动作出政治评估，不能忽视这一特点。农民暴动是孤立进行的，不波及较大的城市，也不加入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或者无产阶级的暴动，但是它毕竟是对农民群众的极重要的革命锻炼，不过它不具有像在资本主义集中制国家那样巨大的政治意义。农民暴动孤立爆发本身不一定证明国家机关的组织涣散，因为这样的国家机关在地方上的代表不多，而且这种暴动常常不产生像在集中制国家所产生的那种瓦解作用。

5. 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危险依然存在。依旧可以看到低估土地革命、蔑视组织农民暴动的倾向。然而，近来在党内也存在着所谓的盲动主义危险，它是对党的以往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反动，部分原因是不理解国内存在的联合倾向。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需要赶紧举行革命暴动，而不考虑力量对比，说什么否则由于经济萧条、企业经常倒闭、无产阶级分散和分化，工人阶级的胜利就会来得太晚。正确的思想是，只有工农革命才是摆脱中国目前混乱状态的唯一出路。这种思想被错误地解释成：只有暴动，只有暴动这一招儿是群众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武器，而不管力量对比、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上层。

不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地方上的具体状况如何。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暴动不是群众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顶点、顶峰，而是应当取代其他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方式的奇效手段、万应灵药。这种盲动主义的观点十分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轻率的暴动，造成对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估计不足，甚至完全忽视这种准备，还会导致流血的惨败、群众的涣散和党的毁灭。

6. 这种盲动主义思潮在中央关于上海暴动的第八号通告^①中，在要求建立第二个“少年共产”党的青年先锋主义倾向中，在认为中国根本谈不上“不成熟的”暴动的观点中有所反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如今引起了以极左情绪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对。

(2) 在许多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实践活动。

(3) 党的社会成分。由于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的，而工农出身的人极少，因此与国民党的分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众的涌入必然会引起某种危机。与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内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脱离了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已成为所谓的“失业者”。他们在工农群众中还没有找到新的活动场所，他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如果不立即发生“某种东西”（他们把“某种东西”仅理解为暴动）的话，那么一切都完了。

(4) 在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在举行规模巨大的政治罢工、群众示威游行和集会时，党内的知识分子能够在这些工人群众中起巨大的作用。而现在，当工人没有走上街头，他们只呆在工厂里

^① 原文如此。在1927年8月25日中央通告第八号上没有确定举行上海暴动的内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7—362页；《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北京1985年第1卷，第201—204页）。

的时候，当只有经济纠纷的时候，这些学生们感到自己完全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们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工人的情绪，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动摇。

(5) 总的说来党与工人群众联系不够，工人的日常斗争常常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所谓在一旁进行。

(6) 在同党内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时，党曾有充分理由确定武装暴动的方针，而在目前的复杂形势下，尽管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组织暴动的问题仍应占据党的任务的中心地位，但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联合倾向使立即举行暴动成为不可能，——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党却不善于把组织武装暴动与发动群众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协调起来。

(7) 最近发生的一些大罢工总是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在许多工人中引起了不是消极情绪，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似乎任何斗争都没有用，似乎只有立即暴动才有用。

7. 应该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党的任务。党应该充分意识到形势的复杂性。一方面应该确认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在这种形势基础上发生的相对联合的倾向。武装暴动依旧摆在议事日程上，准备和组织暴动依旧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力量和党本身的组织和政治上的准备，领导这些不可能直接导致暴动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问题——所有这一切现在应该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提到党的任务的首要地位。进行党的建设，组织工会，成立工厂委员会，建立农会——这一切等于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暴动的任务。

8. 要立即开展争取工人阶级民主自由，即争取罢工、集会、出版自由等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形势非常有利于开展这场运动，因为就连汪精卫在同南京政府的派系斗争中也开始玩弄出版自由的思想。不言而喻，共产党应该成为这场运动的动力，而在党外，工会应该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开展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应当成为争取

党和工会合法化的斗争。

9. 党的日常生活应该以工人引人注目的斗争来加以充实。领导机关和党员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紧密。党内必须有很大的民主。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召募运动，以便吸收新的工农分子入党。

10. 认为既然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那么在农民的斗争日程上就只有武装暴动和夺取土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暴动的准备工作必须也可以与维护一系列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斗争联系起来，例如与反对征用的斗争，与争取由农民自由民主选举村行政管理当局等等的斗争联系起来。

11. 鉴于北方和南方在发展上的差别，在北方提出武装暴动作为行动口号的问题是错误的。北方的形势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在北方，我们的方针应是：

与张作霖政府作斗争；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揭露国民党；组织工农力量；开展群众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强调声援南方的一切革命斗争；提出武装暴动的口号作为宣传口号。然而，在北方提出农民暴动作为行动口号无疑是错误的，但不提出工人暴动口号也是错误的。没有工人运动来加以充实和领导，农民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乔恩斯^①

全宗 514，目录，卷宗 245，第 70—8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J. 佩佩尔。

33

普利切给加拉罕的电报

1927年12月3日于汉口

特密

致加拉罕

最近两三周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对武汉工人运动领导的软弱。如果说在9月和10月初还能指望革命运动会发展，共产党至少能保持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能迅速加深自己的影响，那么现在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就谈不上这种情况了。共产党在这里显得非常软弱，不能适应真正的、有条不紊的地下工作。它的影响很小。迫于反动派的压力所有革命工会都已解散，而共产党不善于把工人团结在它们的周围，从而保存这些工人组织。工人们的经济状况仍像以前那样非常困难，因此在工人当中除了对革命运动成功表示失望外，还产生了要进行无组织暴动的念头。一些工业企业的工人经常投入奋不顾身的单独行动：杀死企业的管理人员，捣毁机器，宣布单独罢工。

近两个月来，武昌和汉口发生了10起中国人罢工，但是工人一次也没有取得胜利，因为没有领导。两天前，武昌一家纺织厂的工人由于一个女工被非法解雇当天就举行暴动，殴打工厂管理人员，捣毁旁边国民党的所谓改组工会，并杀死这个工会的5名管理人员，因为这些管理人员同意解雇那个女工。气氛已白热化，但共产党现在无力领导这次行动，因为它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软弱无力。共产党的进一步软弱以及工人运动领导的软弱将会把革命的胜利发展推得越来越远。

普利切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专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34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12月5日于上海

关于中国形势的进一步意见

我想对我在第一封信^①中所提出的意见作几点新的补充：

1. 广州的形势。广州最近的事变，顺便说一下，这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并且所有同志确实也都预见到了，是最好的标志，说明认为直接革命形势仍然存在的分析是正确的。

南京政府已向广州的汪精卫（和）张发奎政府宣战。众所周知，张发奎在广州打垮了现在已构成南京政府核心的江西派^②。目前，汪精卫已与蒋介石结成联盟，本来担当推翻蒋介石重任的首先是江西派^③。蒋介石现在已经有相当大的实力。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内拥有决定性的多数，不仅南京政府的武装部队而且政府本身都隶属于蒋介石的亲信。这样，广州的战争很可能不仅具有地方性质，而且将提出上海和汉口的政权问题。

2. 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它可能具有两种形式。首先，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这场新的战争也像南京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一

① 见第32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各处都应为：广西派。

③ 指蒋介石迫于武汉派和广西派的压力于1927年8月13日辞职。

样只涉及“上层”，不打一枪，只表现为军阀的倾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也可能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因为它将提出不仅对广州，而且对上海和汉口的统治权力问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战争会带来导致深入和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直接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将只是各派军阀和政治集团的事，从革命形势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会引起任何直接的和迅速的变动。

3.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这场战争超出军阀倾轧的范围，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搏斗和流血的战争。有可能是汪精卫-蒋介石派的命运将决定于这场战争，因此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努力来动员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力量。蒋介石和汪精卫目前无疑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有影响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彻底决裂，无论如何不会冒险去实行可能会把大批工农群众动员起来的策略。汪精卫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公开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他不仅声称，与工农结成联盟是个错误，而且改变了原先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公开说：我们同外国列强进行斗争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过于坚决地提出了太共产主义化的口号。现在我们应该寻求新的、更温和、更友善的斗争形式^①。毫无疑问，蒋介石-汪精卫集团也像中国社会除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一样，不能领导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消灭军阀、争取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性斗争。但这不等于说，这个集团根本不能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阶层动员起来，各种迹象表明，它正着手开展各种运动来进行这种动员。

这个集团开始在上海和南京打着各种口号组织某种反对派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是：

^① 见汪精卫：《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差异》，载《中国问题资料》1928年第（10）期，第23—28页。

应该由党来执政，而不是军阀！

只能有三分之二的预算用于军事需要！

反对南京政府实行过高的税负！

反对非常委员会^①，拥护国民党中央！

争取上海的出版自由！

反对南京枪杀该集团的信徒！

争取选举上海市长，反对任命！

这个集团想把某些社会力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并以南京政府反对派的形式动员这些社会力量，它提出的口号大致就是这样。这个集团还试图吸引某些工人阶层跟着自己走。大家知道，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时，试图讨好工会，甚至讨好共产党。以下事实表明了为他的这种做法付出的代价：在这次政变中流的血是被张发奎处决的共产党人的血。这个集团试图在上海搞新的工会运动，不仅反对革命工会运动，而且反对官方的黄色工会运动^②，并企图扮演全国总工会角色。汪精卫同时还坚定不移地发表言论反对“愚昧粗鲁的”工人，这表明这个集团的这一新姿态是多么严重。

4. 新的战争，像现在正在进行的其他所有战争一样，毫无疑问会产生一些革命化的影响。战争意味着局势不稳、经济破坏、税负提高、强制征兵，等等。但如果战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它不能同时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那么它的革命化影响将只能是缓慢地扩展，它不能给工农暴动在较大范围内的胜利提供直接的机会。但如果战争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大

① 指1927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特别）委员会，它临时履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

② 指1927年11月17日蒋介石的信徒成立上海总工会来同上海军事当局控制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相对抗。

大地动员起来，如果由于战争而在统治阶层内出现深刻裂痕，如果由于战争而统治阶级在一些大城市里遭到削弱，那么就会出现组织胜利的集中的工农暴动的可能性。

5. 上述可能性也应该决定我们党的策略。如果战争不超出军阀倾轧的范围，我们党自然应该以最大的努力和顽强的精神把群众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抓住形势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但同时不应诉诸武装暴动。如果战争发展为真正的战争，如果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真正的裂痕，如果因为战争而在大城市里出现紧急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不仅把自己的力量，而且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那么我们党应该也必须转向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将自然而然成为暴动的中心，因为在那里，首先由于战争局势必然极端紧张，其次广东省现在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第三广州的工人很少遭受过失败，而在政治上（至少在不久以前）表现出许多具有积极性和战斗精神的迹象。

6. 但在这里有这样的危险，首先一部分工人，甚至我党的一部分党员有可能跟着汪精卫-蒋介石集团走，其次他们会完全忽视这个集团的政策，对它不加分析。这样或那样的危险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能的。必须立即着手向广大党员和无产阶级群众说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真实情况。必须开展真正热烈的组织活动。农民运动不应是孤立的，应该把它与工人的发动结合起来。应该立即组织政治运动以保卫工农的民主自由（罢工、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但是，最大的危险在于通过一些四平八稳的空洞决议，不把这些决议付诸实施，并把机会主义的无所事事和盲动主义的异想天开奇怪地混在一起。

7. 对关于延缓中国革命发展速度的“意见”再补充一点“意见”。我曾试图分析在直接革命形势下并在这一形势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延缓因素。但依我看来，如果不作详细的分析，至少也应该指出延缓中国革命发展速度的较为深刻的原因。

这些原因就是：

1. 地域规模。有这里数量转化为质量。帕尔乌斯早就有充分根据地指出，日本和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差别之一就是：日本是沿海国家，而中国是沿海加巨大陆地的国家。

2. 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它没有全国性的市场，没有统一的货币，等等。

3.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地方主义达到如此规模。不仅一些省，而且省的一些地区都过着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在不同的省还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别。

4. 中国是非集中制的国家。它没有集权的政府和集权的官僚，通过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来对国家所有地区平均地施加统一的压力。

5. 中国农村还在许多方面过着与世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不会接受也不会转达“全国性的事变”。

6. 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缺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像中国那样巨大的规模，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重要特征之一^①。遥远的距离加上交通线路和工具的缺乏使得时间因素在中国具有与其他高度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意义。

7. 中国的社会阶级还远没有定型化和形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概念上的社会阶级。无论资产阶级，也无论无产阶级都没有形成为现代欧洲意义上的阶级。与此相适应，政党以及社会舆论、报刊等只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萌芽，还处在分散的状态。

^① 作者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所阐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见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3年6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3—150页；第28卷第258、268页）。

由这种客观情况造成的困难在共产党身上也有反映。

乔恩斯^①

全宗 514，目录，卷宗 245，第 82—87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J. 佩佩尔。

3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不早于1927年12月5日^②于上海

先从全会^③说起。

第一，在伯纳^④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伯纳在场时提出的和很晚才译出来的修改意见，由于广义地解释了苏维埃政权（更确切地说是建立苏维埃的时间）、暴动胜利的条件、不断革命的实质等问题而引起了我们的异议。现在这一切都已比较恰当，虽然还有许多重大缺点。会议决定不再进一步加以明确，因为修改意见基本上没有曲解决议的意思，而在党的生活中现在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伯纳离开后，全会又进行了4天，这期间还召开了与各省代表的多次会议和两次职工委员会会议。总的说来，气氛是

① 档案中除该信原件外还有给H. H. 布哈林和J. 佩佩尔的副本。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提到的M. 3. 阿布戈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确定的（见全宗533，目录4，卷宗120，第123—138页）。

③ 指1927年11月7至14日（根据其他资料为11月9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常称为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的政治决议，《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见《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10）期，第3—2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45—519页）。

④ B. B. 罗米纳兹。

友好的，对问题没有采取任何形式主义的态度，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对实际工作谈得很认真。

第三，最重大的问题或许是北方的形势问题，报告人是蔡和森同志，彼得罗夫^①和山东的一名工作人员^②做了副报告。由于在更换党的领导机关方面采取的措施，北方刚刚经历一场纠纷，还没有完全消除。知识分子上层领导对委员会工人化抵触很大，对蔡进行了诽谤，在省与省之间，即在直隶局和北方局之间出现了裂痕。反对蔡的斗争手法是很拙劣的，甚至怀疑彼得罗夫集团破坏北京委员会。这是很成问题的，但还是把彼得罗夫召回了，决定本应在回来的途中接到，但他还没有回来。

从几个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关于暴动的一些电报明显夸大了实际情况。农民暴动除山东外实际上只有在北京的东北部才有。最大的一次发动是一群上万人的农民占领了城市（几乎没有我们的领导），释放了在押的农会主席^③。豪绅受到打击，但还不严重。一连串的军事行动都不够积极。工人运动受到严重压制。实际上大搜捕以后没有保留一个中央工会机关。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北方是否面临着与南方同样的任务（现在我找不到我们的提法），但或许我们对于北方的困难、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等强调得不够有力，因为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没有合法的工作。人们一再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像南方那样举行暴动和夺取政权，提出加强党的任务，实际建立地下工会，首先在铁路上和矿工中建立。工会遭到破坏后我们决定给他们派去一位新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是派一位工会干部。蔡一直生病，还没有走。

第四，广东的问题。由于李济深和张发奎的争斗，很明显又

① 彭述之。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造成有利于最大限度开展工作的局势。采取了夺取一切合法阵地，夺取工会，彻底改选代表大会等的方针。首次提出：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可能也应该作为暴动机关在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对广州的指望暂时兑现了：工会合法化了，即将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会议，黄色工会被驱逐了，有五个县被农民队伍占领，那里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处死了所有抓住的人（很多，但没有数字），烧毁了所有地契和租约，对商人派士兵去看守（这样做不好，应提出合作化，而不是派士兵看守）。昨天得到消息说，这五个县正在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正在建立苏维埃。遗憾的是，与莫利茨^①还没有联系上。我本人相信，需要从广州这个工人中心建立苏维埃开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胜利是否巩固，扩大根据地是否可能还很不明朗。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几乎未能分化军队，未能使士兵转到我们方面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前景如何呢？由于军阀们的争斗（广东派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有一支专门的讨伐军派往广州，广西派的力量更大些），政权的瘫痪状态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工农武装起来，并把军队稍加分化瓦解，那么我们就能够严肃地提出广州的问题，否则任何一派一旦腾出手来进行镇压，它的军事力量就会把一切打得粉碎。我要提醒一下，我转达的所有最新消息都是中国方面提供的，他们真的以为最近可能取得胜利。我尽一切努力从莫利茨那里取得消息。我想你们的消息更灵通，因为在这里与广州实际上没有电报联系。有意思的是安德烈^②提出了必须同张发奎进行谈判的问题。中国人不同意，提出撤销安德烈职务的问题。为了说明情况，应该补充一点，目前广州根本没有军队（只剩下500—1000人）。

① Г. 牛曼。

② Г. И. 谢苗诺夫。

第五，现在谈一谈最棘手的问题，即党内状况问题。全会开得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较为严重的分歧意见。你们知道，大家一致谴责了右倾错误。大家的情绪一直都很高昂，实事求是，工作热情很高（尤其是布哈罗夫^①）。江苏省的事变（农民运动），湖南、广东的事变更使情绪稳定下来。由于内部矛盾，北方出现了纠纷（我已谈到），上海省委内出现了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对布哈罗夫有些不满。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态表明，在全会期间已经出现了反对布哈罗夫的严重倾向，谴责他的机会主义。上海省委作出决定，要求他离开中央^②。原因是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共青团中央全会^③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情绪，昨天我们又面对一项出乎意料的决定（是在书记处的紧急会议上通过的），取消保留下来的两个局（伯纳和我们大家都反对），彻底改组整个湖北委员会，撤销克拉辛^④的职务，任命新的三人小组（从工人中选出）到那里去^⑤。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是在唐生智政权削弱时期湖北委员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共青团代表^⑥提出了撤销布哈罗夫组织局职务的问题，在下次会议上再作决定。伯纳不知道这件事，谁也没有跟他商量，他将面对既成事实，而如果不把这件事暂时对付过去，争取同布哈罗夫一起通过湖北的决议，并在湖北代表会议上进行，那就会在近期内出现大吵大闹的局面。我认为，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周恩来，他在这个问题上鼓动大家，瞿秋白充当缓冲器，而苏^⑦则反对所有机会主义者，李维汉的态度不明朗。撤销全会

① 罗亦农。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1927年11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

④ 陈乔年。

⑤ 文件没有找到。

⑥ 任弼时。

⑦ 可能是苏兆征。

决议和局的原因是担心在中央以外另立权威，而周说在全会上没有对这项决议进行表决，是伯纳独断专行通过的（这是撕毁不合心意的决议的通常手法）。所有这一切只是现在才彻底弄清楚。我在汉口逗留期间早就怀疑，布哈罗夫执行自己的方针是得到认可的，事情果真如此。克拉辛带着这种情绪被安置在委员会领导职位上，而积极分子仍没有回心转意，没有转变态度。其次，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在这个时期里他和老头子^①的联系很密切。目前他正出色地进行着自下而上地改选汉口整个党组织的工作，12月那里准备召开代表会议。我提出一个问题：对湖北委员会的谴责，对它的改组要由党组织来进行，而不是仅通过中央来作决定（应该说决定是根据关于湖北共青团状况的报告^②作出的）。今天再补充下面一个情况。已派出以苏奇正^③为首并由两名原汉口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湖北委员会和长江局的方针和机会主义错误，召开党代会并谴责两者的方针，作出解除整个领导层以及克拉辛职务的决定。从与瞿和周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非常害怕整个机构摆脱他们，因此乐于抓住各种口实来撤销全会关于任命布[哈罗夫]为组织局主席的决议，由周来代替他，只为他保留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央特派员的职务。我认为，这是事先就决定了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我本人深信，布哈罗夫在目前情况下不是右翼意见的代表，他的摇摆不定也同其他人一样严重，但他表现得更明确得多。一旦同他发生严重的决裂，就会出现严重的危险，形成党内整个不满情绪，但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成为左的或者右的（更可能是右的）情绪的组织者，还很难说。不管怎样，危险是很大的。因此我正采取一切措施淡化影

① 陈独秀。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音译，可能是苏兆征——译者。

响。现在已经做到：(1)通过选人筹委会让他参加党代会的领导；(2)禁止在党代会上讨论他在中央的工作问题；(3)在他回来后再在政治局解决以后的问题。

我跟蔡和周非常严肃地谈到，这不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方式，全会结束后刚过两周就撤销决议，他们是会失去一切威信的，他们表面上承认，实际上他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如果把上层领导的分裂问题放在一边，依我看来，他们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个人目的在利用当时的形势，那么应当说，党员群众一致反对布哈罗夫是给原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一个打击。八月代表会议^①的决议，由于党的机关的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在机会主义者手里，所以没有真正传达到群众中去，新的机会主义错误加强了这样一种认识：领导是不中用的(或许情绪不是始终都表现得很清楚的)。上海委员会和共青团全会都反映了这一点。此外，还应考虑到，现在被免去领导职务的那一批人也会抓住各种不满情绪的。

但更有甚者，机会主义的领导，党组织的软弱，不善于把非法条件下的群众工作纳入新的轨道，只把希望放在对暴动的技术准备上，失败后又垂头丧气——这不仅引起了对领导的不满，而且迫使一大批党员同志去从提出立即暴动、建立南方共产党等问题上寻求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先谈一谈情况，上海委员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出决议的。一方面是在农民暴动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暴动鼓舞了所有人，包括涅姆采夫^②也在内，另一方面是在失业现象不断增长，一切罢工都告失败的背景下。在基层工作的工会干部带来了这样的情绪：“除暴动外反正没有出路”，到过农村的人说：“可以举行暴

^① 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非常会议(见第88页注①)。

^② 王若飞。

动”。领导群众的才能非常缺乏，在罢工中犯了一系列错误：（1）根据总工会^①号召举行罢工，没有工人大会的决定。只是简单地不去上班；（2）在一家工厂里少数人通过威胁手段强迫所有人去罢工^②。（3）政治工作做得较差，同时很明显向工人作出了许诺；（4）工人的情绪是：“如果总工会号召罢工，我们就去”，“据说总工会想罢工，我们不反对，只是这段时间我们要到农村去”，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向总工会要大米（就像向政权机关要一样）。虽然上海委员会也说过，党已经完全恢复，但实际上党组织还是很软弱。还应该提醒一句，这种情绪在上海从来没有消失过，中央著名的六月来信^③曾得到支持，还有，这种情绪在汉口也存在。当然，实际上不仅由于客观原因，而且也由于不会有多少工人跟着走，在城市里不可能组织任何暴动。同时我可以断定，这封指示信根本不能解释为只是党内知识分子情绪的反映，而无疑也是工人阶级上层领导情绪的反映，这些人在过去非常革命，而现在不知所措，在经受着遭受严重失败后所特有的那种失望和摇摆不定。恐怖主义情绪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积极分子。电车工人罢工^④期间的过激行动（无疑那里存在着强迫和威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罢工，工人们不去参加会议，尽管罢工很齐心〔朝鲜人搞破坏〕）、罢工时捣毁机器的情绪——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情绪的

① 指上海总工会。

② 指哪次罢工不详。

③ 大概是指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委员会的信，号召组织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取消租界和没收帝国主义者在华财产的口号下，示威者闯入外国人居住区。该信遭到共产国际代表M. H. 罗易的反对，并于1927年6月28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销（见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191—193、203—205页）。

④ 指1927年11月28日至12月24日外国租界英美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详见：《上海电车工人罢工（1927年12月）》，载《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1—12期，第261—262页）。

表现，而这种情绪会乐意响应暴动的口号，但不能进行日常斗争，不能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工人上层领导的这种情绪在目前还笼罩着上海和汉口的群众的普遍消极情绪和压抑心情中找到了滋生的土壤，但依我看来，这在发生转变前夕就已经存在。我们党的威望很高，总工会也是如此；我们的号召可以使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几周的饥饿，就像罢工期间的纺纱工人那样^①，但是还不能唤起真正的积极性。现在，情绪的转变表现在许多企业罢工者的集会上，表现在开始顺利开展反对禁止罢工法^②的运动中，表现在比过去更为活跃地成立工厂委员会上。如果电车工人的罢工以胜利告终，那么它将给情绪的转变带来很多好处。在工人运动活跃的背景下，我们会比较容易地消除党内的情绪。为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首先是通过中央的决议严厉谴责了上海委员会的盲动主义^③，这种盲动主义有使运动在萌芽状态时就被破坏的危险，除了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外，它没有任何现实的根基。指出了群众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党组织软弱无力，很少从组织上去加强工会等问题，还制定了工会的近期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举行电车工人罢工，加快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步伐，进一步开展同政府工会人员的斗争，开始进行争取实行工会选举制的斗争（我们想在蒋介石和广西派即将展开搏斗时开始），加强（通过个别培养）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加强吸收工会会员的工作，开展反对禁止罢工法的斗争，加强农民

① 指1927年11月底爆发的持续28天之久的上海东部纺纱工人的罢工（详见：《上海工人运动（上海同志来信）》，载《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5期，第94—95页）。

② 1927年11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工会法草案，规定在军工企业和公共事业企业内部禁止罢工（见《中国的工人运动——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1）》（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2年，第36页）。

③ 文件没有找到。

协会等。基本方针是提出当前的工作内容，把这项工作与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找出使冒进的工人先锋队和我党部分党员回到群众中来的推动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想是可以做到的。现在，由于电车工人的罢工有望取得成功（对此我不相信），人们开始受到一些鼓舞。应当说，上海委员会对作出的决定不是特别高兴，但它没有公开反对，而通过对布〔哈罗夫〕的攻击表示不满，对机会主义唠唠叨叨等。只有在本月召开的扩大全会上，以及在各区的全体会议上，才能进行认真的对话。代表会议未必能在1月底以前召开。在共青团的全会上也表现出相应的情绪。我不想谈一切细节，你们将从阿尔弗雷德^①的信中得知。我只想说，“先锋主义”现在得到了很多养料，是同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战士之一。共青团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越过党承担运动的领导（例如在苏州，在运动期间党委本身请求共青团委员会来担任领导，在河南一个纺织厂里党员们表示反对罢工，而共青团很好地组织了罢工并胜利结束，在汉口，党的委员会拒绝在军事冲突期间进行任何工作，而共青团解救了监狱犯人，等等）。我认为，无论是上海的“盲动主义”还是共青团的“先锋主义”都是以绝对错误的形式反映了对上层领导机会主义的抗议。在中共中央给组织^②的信中，除了应有的谴责和解释外，我们特别注意到通过党内途径来克服机会主义这一点，必须通过党内发表意见的方式来反对机会主义，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由共青团委员会来处理问题。党必须认真地来解决共青团的实际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里，一部分积极分子应该被吸收来担任工会和党的负责工作。我们打算把共青团组织的最忠诚卫士^③派到《布尔什维

① M. 3. 阿布戈夫。

② 指共青团中央。

③ 何人不知。

克》杂志^①编辑部去。眼下情绪还相当激烈，咬牙切齿反对任何领导的情绪，宣布领导是机会主义，希望摆脱一切束缚走上独立道路的情绪很强烈。

同这些情绪作斗争并不比同盲动主义作斗争轻松。这是明显的。应该无情地揭露他们立场的错误，谴责他们的这种倾向。但我认为，在最近正是这些人将帮助党走上正确的轨道，肃清机会主义。党内现在还没有看到光辉的健康的核心（不是中心）。

它将来还会出现的，现在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所有这些“盲动主义者”、“先锋主义者”转变成真正的党员，结束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始进行扎扎实实的建立党和掌握群众的工作。如果决定现在不能（在揭露他们错误的情况下）依靠这些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来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了。中央没有下面的支持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项工作的。

第六，我本应非常详细地谈一谈我同佩佩尔的意见分歧，但遗憾的是由于邮件要发出，只能就此搁笔。

亚历山大罗维奇^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5，第 199—204 页。

亲笔签字

①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7年10月24日至1932年7月1日在上海出版。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36

特里利塞尔对牛曼发自广州 电报内容的报告^①

1927年12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12月9日我们收到从广州发来的以下密码电报：

“张发奎的方针是彻头彻尾自卫的方针：到处是“打倒共产党人！”的口号，禁止挂红旗，进行大逮捕。不释放政治犯，不武装工农，不实行各种民主自由等，我们就拒绝进行任何谈判^②。”铁军^③的情况是：正在西江集结反对广西派，广州只有两个团，两个团里我们的影响都很大。星期日^④，有200名共产党员和独立团^⑤的左派官兵（团长也是共产党员^⑥），在张太雷作报告后表示主张暴动。这个团的多数人显然是跟我们的。我们有100名工人加入了第二团^⑦，此外，有一个营掌握在我们手里^⑧。由于货币危机，经济状况极端紧张。工人们的情绪十分高昂：罢工者自发地

① 报告的副本由M. A. 特里利塞尔送给И. В. 斯大林、Н. П. 布哈林、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加拉罕、И. А. 皮亚特尼茨基、Я. К. 别尔津。

② 指同张发奎的谈判（见第30、31号文件）。

③ 指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主力。

④ 1927年12月4日。

⑤ 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

⑥ 原文如此。朱勉芳不是中共党员。保卫团团长江秉枢是中共秘密党员。

⑦ 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警备团。

⑧ 指黄埔军校特别营。

烧毁了几十家资产阶级的住宅，邮政人员和海员正准备罢工，公共汽车正举行意大利式的罢工^①。参加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的主要是部队，只有600名民众，其中一半是我们的人，他们打着红旗。民主人士没有参加，在实行枪杀和逮捕以后，他们对政府不是淡漠而是仇恨。由工人和原纠察队员组成的赤卫军有2000多人，组织得相当严密（到汕头前第一次准备工作的结果^②）。武器数量：200枚炸弹，300支毛瑟枪，一些步枪和500把刺刀。广州本地唯一有组织的敌人是警察。起义计划：黎明时首先由独立团和赤卫军占领警察总局^③，然后占领其他战略据点和机关，同时举行总罢工，选举代表苏维埃，用缴获来的军用品进行武装，颁布法令，等等，农民从郊外冲进市内。占领广州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要守住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想，利用军阀之间的斗争，工人[发动]的规模，解除士兵的武装和农民暴动，是能够对付的。海丰的暴动规模很大：有10万多农民参加，4个县已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以彭湃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完全执行我们的命令。彻底没收了土地，销毁了地契，处决了几百个地主。同省委^④每天都有信使联络。关于征收50%捐税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的谣言。结论是：省委一致同意举行暴动，我们打算在下周初发动。口号是“粮食归工人，土地归农民兵士！”，“打倒军阀战争！”，“没收资产阶级住宅给工人！”，“全力支持罢工者和失业者！”，“没收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等。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

① 意为消极的罢工——译者。

② 显然是指1927年8月底至10月中进行的广州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叶挺和贺龙部队在汕头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10月12日给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取消广州起义计划并必须对叶挺和贺龙部队实行紧急援助。

③ 指公安总局。

④ 指广东省委员会。

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工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会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这里的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①。牛曼”

同一天，在打好上述电报前，我们又收到以下密码电报：

“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②”发动。牛曼”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专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31 号文件。

② 1927 年 12 月 12 日。由于敌人知道了起义计划，所以决定提前一天发动。

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39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2 月 6—17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2 月 16 日

听取：1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1——（1）同意给南京政府的答复照会草案并作一些修改，然后由契切林同志签署发出^①。

（2）不反对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采取措施保护我国在华公民和机关的建议。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63，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 1965 年第 10 卷第 555—556 页。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39 号（特字第 116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2 月 6—17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 年 12 月 10 日

听取：5——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5——发去以下电报：

“致广州莫利茨^①。”副本送上海奥里加^②。

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③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3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Г. 牛曼。

② О. А. 米特凯维奇。

③ 见第 30、36 号文件。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会议第1号记录

（摘录）

1927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

听取：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1——责成由契切林、布哈林、米高扬和托姆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在今晚前就中国事变制定整个活动的纲领，既包括对外关系和与华南的贸易联系方面，也包括各个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的号召书草案）以及苏联国内方面。委员会拟定的草案提交政治局通过征询政治局全体委员意见的方式批准。

委员会由契切林同志召集。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3，卷宗664，第1、5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会议第2号记录

（摘录）

1927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听取：11——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1——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发表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来往信件^①的建议。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3，卷宗665，第1，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电报》，载《真理报》1927年12月24日。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号（特字第2号）记录 （摘录）

1927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7年12月22日

听取：12—关于中国问题（见政治局1927年12月22日会议第1号记录，决定：1^①）。

决定：12—采取以下措施：

（1）将拥护国民党军阀的中国反革命分子（学生和其他人）逮捕和监禁起来，直到华南领土上的所有苏联公民被释放为止，此后将他们驱逐出境。

（2）关闭和撤走所有经济机构，包括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苏联商船队的机构。

（3）研究茶叶贸易问题，以便有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采购茶叶。

（4）在逮捕中国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发表相应的声明，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起草该声明^②。

（5）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刊部门和塔斯社发布关于华南反

① 见第39号文件。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0卷，第559—560页。

革命派野蛮暴行的详细和真实的消息，并鼓动外国报刊出来揭露这些暴行。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缅任斯基同志——（1）、（4）；

米高扬同志——（2）、（3）；

柳比莫夫同志——（2）（3）；

鲁祖塔克同志——（2）；

多列茨基同志——（5）。

1927年12月23日

听取：14——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4——建议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学生抗议华南的野蛮暴行。

抄送：乌格拉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 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27年12月23日^①于莫斯科

指示信

草案^②

致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反对中国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和杀害苏联驻广东代表的暴行^③。必须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在英国、日本和美国领事馆前游行。口号是保卫中国革命和苏联。事件极其严重，必须唤起民众，使所有附属机构（同盟^④、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都行动起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685，第 2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标明的：“电报已于 1927 年 12 月 23 日寄给各国共产党”。

② 在电报草案下有 Н. И. 布哈林的批示：“已通过”。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

③ 指 1927 年 12 月 14 日杀害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 А. И. 哈西斯、В. А. 乌科洛夫、Ф. И. 波波夫、П. П. 马卡罗夫和 К. И. 伊万诺夫以及 1927 年 12 月 11 至 13 日大规模屠杀广州起义参加者的暴行。

④ 指 1927 年 2 月 10 至 14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帝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殖民地各国人民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同盟。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号记录

（摘录）

1927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

听取：22——关于孙逸仙大学问题（见政治局1927年11月24日会议第137号记录，决定：10和组织局1927年11月18日会议第155号记录，决定：7）。

决定：22——（1）在肯定该大学出版工作方面现有成绩的同时，认为有必要根据该大学制定的计划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特别要建议讨论一下能否用中文出版列宁全集的问题。

（2）为了加速在该大学建立中文印刷厂，责成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保证尽快地从中国取得必要设备，并委托莫斯科卸载委员会物色适当的场所。

（3）建议国家出版局用俄文出版该大学最有价值的翻译著作。

（4）为了开展该大学中国学的工作，认为有必要：1. 通过中央鼓动宣传部吸收相应的学术机构来充实该大学图书馆有关东方的书籍；2. 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的印数增至300份，同时改进其内容^①；3. 组织出版中国年鉴；4. 加速在该大学成立中国问题研究所。

（5）认为在该大学继续保留国民党支部是合适的，撤销中央

^① 指1927至1928年间孙逸仙大学出版的《中国问题资料》通报。

书记处 1927 年 1 月 29 日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并建议大学管委会解散国民党促进支部。

赞同大学管委会进行清洗右派国民党员的工作。

建议米夫同志从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遣返右派国民党员办法的指示。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66，第 1、4、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3号（特字第3号）记录

（摘录）

1927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

听取：4——关于日本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4——责成契切林同志在会见后藤时发表大致如下的声明：

（1）我们同意，中国问题确实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应通过相互理解来加以解决，同时很明显，正如后藤男爵在备忘录^①中正谈到的那样，中国国家^②不应受到损害。

（2）我们认为，苏联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要维护这种威望可能需要采取某些特殊措施。至于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在我们看来，共产主义宣传不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它在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到处存在。

我们不理解某些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和不安。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必然的伴侣，只要允许民族运动在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存在。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观点来看，我们对中国事务的态度是，我们保持绝对的中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我们驻华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某个时候对共产主义宣传采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中国方面。

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中，不管是被揭露或被怀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人是一秒钟也不可能留在机关里的。就让后藤去说吧，究竟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日本人对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产生过分夸大的，有时简直是可笑的担心呢！

抄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4—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4号（特字第4号）记录

（摘录）

1928年1月5日于莫斯科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12月22日会议第2号记录，决定：12：（2）（3））（报告人：基辛、米高扬、契切林、施莱费尔同志）。

决定：7——（1）改变政治局1927年12月22日的决定，允许贸易人民委员部保留苏联消费合作中央联社和苏联商船队在中国的茶叶采购机构。

（2）同意派我们的代表去北京商谈关于在先释放在北京被捕的所有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的条件下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①。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① 为了抗议1927年4月6日对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的袭击，苏联政府于4月9日通知北京政府召回A. C. 切尔内赫代办及全体使馆人员，只留下履行领事职能的人员（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0卷第149—152页）。但是北京驻苏联临时代办郑延禧仍留在莫斯科，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中占领北京后，关于释放1927年4月6日被关押的15名苏联使馆人员的谈判一直拖延到1928年9月8日夜。9月29日他们从中国大沽港取道日本回海参崴（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6年第11卷，第739—740页。）

米高扬同志——（1）；

基辛同志——（1）。

听取：27——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7——给外交人民委员部除已汇去的12万美元外再拨去28万美元，以支付《纪念列宁号》轮船的罚款^①。

抄送：加拉罕、布留汉诺夫、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6—8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纪念列宁号》轮船是1927年2月28日被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在南京扣押的。船内3名苏联外交信使、M. M. 鲍罗廷的妻子和47名船员被逮捕。外交信使和Ф. С. 鲍罗廷娜在北京的法院受审，于1927年7月12日才被释放。1927年12月13日船员被山东军的军事法庭判处罚款（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0卷，第74、79—81、101、111—114、182、310—311、339—340、629、642—643页；第11卷第13页；又见鲍罗廷娜：《在中国总督的刑讯室里（我的回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

46

越飞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1928年1月6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赖特同志^①

送上两份文件：(1)1927年12月4日起草并于1927年12月5日送给米哈伊洛夫同志^②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草稿^③；(2)1927年12月13日对广东形势的评估。^④

我恳请您看一看这两个文件并转交给彼得罗夫同志^⑤，亦请告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政治上，开玩笑是奇妙的东西，政治笑话是必然的现象；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最好避免各种谣传。

在我的报告^③中，结尾处有一段话：“放弃局部的和单独的发动，准备在大的地区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工农暴动”，这是非常明确的。这里相当清楚地表述了对即将发生的事变的评估。

不言而喻，现在没有人会来重复1905年时普列汉诺夫的耶利米哭诉：“本来是不应该拿起武器的”^⑥。或许1927年12月广州的

① B. И. 索洛维约夫。

② A. M. 加拉罕。

③ 见附录1。

④ 见附录2。

⑤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⑥ 耶利米哭诉，语出圣经故事，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对耶路撒冷被攻陷时的哭诉、抱怨。这里指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12月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城市武装起义被沙皇军队残酷镇压时发出的哭诉和抱怨。

失败会导致自己的二月和十月^①。我们只是想，对于中国来说达到这不需要12年，或许只需要12个月。

别尔津的估计^②与我完全一致，我向领导作了报告。您瞧，在事变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很不安，甚至有些悲观（我们以我国侨民的报告为根据）。我们本以为，起义者有足够力量来对付李福林匪帮以及黄埔。但是考虑到总的形势和反革命势力的明显优势，我们得出结论：“工农政权有被广东反革命势力和香港武装力量摧毁的危险。”这是在12月12日夜里写的。

我们绝不奢望扮演永远不犯错误的先知的角色。在自己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工作，是很难充当预言家的。但也有一切都了如指掌的时候。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真理报》发表社论^③后，我在代表大会^④上对马列茨基说，要写得小心谨慎些。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说，在最近2—3天内可能出现致命的结局。诚然，我们曾以为，灾难与其说来自李福林匪帮，不如说来自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师团。这是我们唯一的错误。

您还会记得我在代表大会上同您的谈话。

主要结论是什么呢？

(1) 我们既不打算给安东，也不打算给奥奴弗里过命名日。我们有一定的看法，我们维护这一看法。然而暴动开始后，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本来是不应该拿起武器的。

(2) 事变表明，我们的情报不灵。现在情报来源几乎已枯竭。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情报。

谢苗·越飞

① 指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② 见附录2。

③ 见《真理报》1927年12月13日。

④ 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见第133页注⑤）。

[附录 1]

目前中国的形势可以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作如下评述：

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背叛国民革命事业，但作为一个阶级未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政权已转到**封建资本主义集团**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封建-资本主义集团（张作霖、正在复兴的吴佩孚）联合和另一些封建-资本主义集团（国民党南京派）解体的过程。

农民继续在进行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有些地方采取了严厉惩治反革命分子的办法。然而农民未能取得巨大胜利。应该指出，农民运动也稍稍波及到了华北。总的说来，中国的农村正在孜孜不倦地进行革命斗争，虽然有些地方出现消极势头（湖北）。

小资产阶级，根据许多材料来看，它开始动摇，对国民党首领们的政策感到失望。左的情绪，与共产党结盟的口号又重新在这些人士中流行。

工人阶级正经受着残酷的物质困苦。它的经济状况难以忍受地艰难。在南方，广东工人的战斗情绪最高昂。在其他地方，工人的盲动主义情绪在抬头（武汉）。可以说，工人运动软弱的原因之一是政治领导软弱。然而，工人阶级几乎到处都在坚决地同现有的黄色工会组织作斗争。

从以上所述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资产阶级未能统一中国。

中国南方军阀集团总的情况可以归结如下：

随着蒋介石 8 月底退出政治活动舞台^①后，南京和武汉之间

① 见第 153 页注③。

开始就两派的联合加紧谈判。表面上两派的联合没有什么障碍。蒋介石退出舞台，从而也挖掉了武汉派手中的主要论据。“联合”谈判的结果是在9月中召开了国民党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政府和军事委员会^①。然而，这种联合的腐败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封建军阀性质的派别联合，并带着他们在地盘划分和税收来源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选入“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的有43人(!)，也就是说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将领和政治活动家。选入军事委员会的有63人。选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的有14人：唐生智、冯玉祥、闫锡山、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程潜、朱培德、李宗仁、谭延闿、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和杨树庄，也就是14位都巍巍这样或那样独立的各派头子。这样一个大杂烩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显然是无法共处的。国民政府前财政部长宋子文于9月底去日本时声称：“南京的这次会议企图把国民党内互相矛盾和至今没有和解的人都联合在一起。”

与进行这种联合尝试的同时，唐生智将军则执行着自己的方针。9月初以前，他把两个军调到安徽省：35军调到首府安徽省^②的一个区，36军调到芜湖，直接威胁南京。唐生智的走卒贺昌将军（第35军军长）不顾任何联合，看来依仗着驻扎在安徽省的一些“野”军以及原安徽省督办陈调元，成立了自己的省政府，并自任省长。

长江流域一带的政治形势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到10月初，无论是武汉南京集团合在一起说，还是武汉集团和南京集团分开来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7年9月15至16日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会议是由武汉、南京和上海三派为联合而召开的，会上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在9月16至19日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

^② 原文如此。安徽省首府应为：安庆市。

说，在军事方面都蕴藏着表面上联合所带来的爆炸性因素。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包括安徽省），即在这块不大的地盘上，到9月初时集结了以下一些军：第1、第5、第6、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7、第19、第26、第27、第30、第23、第37、第40、第44、第45，共18个军。每个军平均按两个师算，每个师平均按7500—8000人算，就有27万人的可观数字。这个数字应该还要大，因为许多军都有3个师，还有许多整编师，我们没有掌握这方面的确切材料。集结在这个地区的部队人数，可以毫不夸大地确定为35万人。南京现有的财力为每月500—550亿元，而每月最低军费开支则需6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不引起一些将领之间的矛盾。

满足程潜、谭延闿和胡宗铎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事，以便缓解南京集团内部日益加剧的冲突。

广西派与何应钦争夺上海的斗争也要求以撤出军队的办法来缓和南京和上海周围的局势。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7军和第19军被何应钦挤出了南京。

由于上述原因，10月21日南京集团已向唐生智宣战，并向武汉进攻，于11月16日占领了武汉。

我们在唐生智那里也可以看到军事力量的发展超出财力的类似情景，这引起了一些将领之间的矛盾。1926年7月时，唐生智只有3个师，总人数1.4万人，在一年之内竟扩充到5个军，总人数约12.5万人。在如此迅速发展自己力量的情况下，唐生智未能在新编的各军当中巩固自己的影响。结果在他的将领中出现了离心倾向，为了满足这些将领的欲望，他在安徽省挺而走险，企图用两个军或者征服南京，或者至少从这方面来保证自己安全。

由于南京派，或更确切些说，广西派同唐生智之间发生冲突，结果出现了各派军阀按其向往的地区划分地盘的现象。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

1. 朱培德在江西省固定下来；
2. 程潜曾覬覦湖北，但遭到失败；
3. 谭延闿看来覬覦湖南；
4. 胡宗铎在湖北固定下来；
5. 白崇禧——在南京；
6. 陈调元——在安徽省；
7. 蒋介石与何应钦——在浙江省；
8. 陈铭枢——在福建省；
9. 黄绍竑——在广西省。

至于广东，由于缺乏足够全面的情报，我们还不能对李福林、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和范石生之间的矛盾发展进程作出详细的分析。但是这些相互之间不可调和的派系的存在，说明他们之间正在为夺取广东的权力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这些派系的力量对比大致如下：

- 李福林——8000人；
- 李济深——30000人；
- 张发奎——12000—15000人；
- 黄绍竑——8000—10000人；
- 范石生——6000—8000人

总计：68000—70000人。

据最新材料说，南京决定同张发奎作斗争，张在广东的影响正在扩大，并解除了李济深一些部队的武装。据有些材料说，张发奎正在同共产党进行谈判。

简单地评述一下北方的形势，作为对各派军阀集团在中国统治情景的补充。

安国军^①。尽管存在内部矛盾，但暂时协调一致了。来自阎锡山方面的危险已经消除。

冯玉祥。他的地位仍不稳固。来自东面褚玉璞将军的压力，北面可能遭到的打击和河南省内与“土”军阀的斗争——所有这一切使他在陕西面临着威胁。

吴佩孚在美国人支持下在四川省集结力量。

唐继尧在为夺取云南省的权力而战。

由此可见，认为中国政权已转到封建军阀集团手里的看法明显从中国的实际形势中得到了证实。由此可以产生在一部分激进资产阶级中重新滋长左倾情绪和小资产阶级再次向左转的客观前提。

根据许多征兆可以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中国可能出现新的革命浪潮。不应忘记，在广东可能保留着叶挺的几个师。不过我们没有关于这些师的人数的确切统计材料。

最近，我们得到了关于在广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情报。然而，有些情报人士担心，发动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党没有足够的力量。

有鉴于此，看来必须：

1. 通过派专业人员加强从中国的情报来源。
2. 准备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派到中国去工作（军事工作，组建红军，农会工作等等）。
3. 放弃局部的和单独的发动，准备在一个大的地区内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工农暴动。

1927年12月4日 越 飞

^① 见第122页注^①。

〔附录 2〕

关于对广东形势的评估

广州各派军阀的情况如下：

1. 张发奎……15000—20000 人。
2. 黄绍竑……8000—10000 人。
3. 范石生……6000—8000 人。
4. 李济深……30000 人。
5. 李福林……8000 人。

总计 68000—75000 人。

我们的情报来源和赖特的电报断断续续提供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断定这些派系的相互关系情况如下：1927 年 11 月 16 日汪精卫和李济深从广州去上海参加国民党准备召开的会议。当天晚上，张发奎向黄绍竑发动军事攻势。应当认为，张发奎已掌握广州，而军事攻势已转向广州西部的西江地区。上述力量的配置情况不了解。可以预测，李济深的一部分军队跟着张发奎走，一部分跟着黄绍竑走。驻扎在广东北部韶关地区的范石生采取什么立场也不清楚。

张发奎在与黄绍竑的斗争中依仗着广西派旅长俞作柏将军。张发奎轻而易举地将黄绍竑挤出广州，看来是因为广西派内部发生了分化。

由此看来，起义前的形势可以认为是各派军阀之间为权力、为广州这块宝地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至于与广东毗邻省份的形势，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一个

月内，不可能从任何一个省里（湖南、江西、福建）调去任何武装力量。这从以下情况中可以看出：

1. 在湖南，广西派和湖南派正在进行反对唐生智残部的斗争，同时这两派之间也不团结。即使说从衡州（音）可以调一些力量去广东，那么他们在一个月前也到不了广州。

2. 江西——朱培德的几个军集结在：

第3军——在武宁—义宁—长昌^①。

第9军——在萍乡。

到广东需要一个半月时间。

3. 福建——陈铭枢。有消息说，他把自己的一个军从福州调到广东边界。他离广州有一个月路程。

对广州的主要军事威胁是：

1. 驻扎在韶关的范石生。

2. 从汕头地区（到广州21天行军路程）来的李济深的第11师和第13师。

3. 驻扎在广州对面海南岛上的李福林。他占领着整个三角洲。

4. 黄绍竑和张发奎可能和解，共同来对付广州。

5. 有56个战斗单位的舰队。黄张之间搏斗时舰队持中立态度。

6. 曾站在黄一边的（原黄埔军校）学员。

结论：对广州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邻近省份，而是来自广东省内的武装力量，可能从6、7万人中派出不超过3、4万人来对付广州，同时在最近一周内，反革命派可能会调至少1万人到广州来。

至于香港，常备驻军的构成是：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瑞昌。

1. 步兵——两个营。
2. 炮兵——一个山炮营。
 三个海防营。
 三个重炮营。

3. 辅助部队。

总共 3067 人，30 门炮，16 挺重机枪和 57 挺轻机枪。

英国海军力量在中国海域巡防的共 73 艘军舰，14000 名官兵。（根据截止今年 4 月中旬的统计材料）。

国民革命运动以往历史的经验说明，广州一有风吹草动，英国在半天内就会派军舰到广州，在不到 16 呎深的海岸登陆。

革命武装力量有：

1. 转向广州革命方面来的两个团，3000 人。

2. 工人赤卫队，2000 人，武器装备：200 枚炸弹，300 支毛瑟枪，其余是刺刀。

3. 海丰地区的第 1 和第 11 农民军，是由叶挺和贺龙的残部和农民军组成的，有 3000 到 4000 人。

4. 海南岛，根据巴拉托夫同志的统计材料，那里的共产党员掌握着 3000 人的力量。

不算海南岛总共 10000 人，其中士兵 6000 到 8000 人。

广州占领后，暴动部队可以利用的有：

(1) 一个大型兵工厂，月生产量（如果有原料，通常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钢、铜等）为：

子弹，口径 7 到 6.8 毫米——800000 发。

重机枪……………3 挺。

轻机枪……………1 挺。

火药……………230 磅。

(2) 一个小型兵工厂，月生产量为：

子弹……………300000 发。

(其中有 150000 发利用旧弹壳)

(3) 原造币厂, 月生产量为:

炸弹发射炮……………30—25 座。

农民的武器没有算在内。一般来说, 这些武器都是古老的中国式武器: 火枪、长矛、大刀。至于民团, 他们一般都武装了现代化武器。特别是西江三角洲的民团武器很充足。对民团和匪徒武器的利用将取决于广州苏维埃政权的策略。

结论: 工农政权有被广东反革命势力和香港武装力量摧毁的危险。只有工农英勇抵抗以及我们及时给以武器、经费和人力支援才能挽救局面。

必须立即从我们方面派教官给以支援。首先应利用我们的驻外人员 (3 人)

必须用上海现有的经费给以支援。

必须用武器给以支援。

必须立即动员全世界工农舆论, 以对抗帝国主义者可能发动的武装干涉。除了这方面的统筹工作外, 还必须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会国际和农民国际发表号召书, 号召支援广州的工农政权。

必须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明确的政治指示, 特别是在农民运动问题上, 提出在“土地国有化”口号下全面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

1927 年 12 月 13 日 别尔津

全宗 514, 目录 1, 卷 349, 第 3—12 页。

打字稿, 越飞的信和附录 1 为原件, 亲笔签字; 附录 2 为副本。

47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 和琼森的信

1928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们：

看了一系列文件和信件，想跟你们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尽量说得简明扼要。

1. 中国总的形势

我看了中央全会决议^①，看了亚历山大罗维奇^②、施泰因^③和佩佩尔^④的信。我同意说中共目前存在着两种危险：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而这两种危险是密切联系着的。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医治党的这两种倾向和认清这两种倾向中哪种更危险。在广州事变^⑤前，我曾认为右倾更危险，而现在在广州事变后，我动摇了，

①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见《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10)期第15—18页；《中国问题材料》，莫斯科1928年第18—23页。在中国发表的《职工运动决议案》文本不是在1927年11月，而是在1928年4月底通过的。参看：全宗534，目录4，卷宗216，第131、152—168页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504—519页)。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③ K. 3. 琼森。琼森的信没有找到。

④ 见第32、34、35号文件。

⑤ 指1927年12月11至13日的广州起义。

这是因为我不清楚广州发生的事变。这里是否已经爆发出你们称为先锋主义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尽管有其革命性，但可能会使中国的工人运动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再说一遍。我这里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加以判断，但是许多因素，把一些事实和你们信中谈到的一些情况、一些提纲和决议加以对照，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在广州表现出了过分不耐烦的情绪。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充分的材料来加以判明。因此，请你们把我的这些意见作为对你们提供材料的恳切请求，以便得出我对广州失败的最终意见。不管怎样，我的感觉是，在广州那里犯了一些错误，而我们在广州的同志没有考虑到列宁关于如何组织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组织起义的忠告^①。不管怎样，我还是等待着更详细的消息，以便在充分了解情况或者比较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发表意见。

尽管如此，同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无论是这种倾向，也无论是那种倾向都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导致工人运动的毁灭和党在最近几年内的灭亡。但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只有通过坚定不移地贯彻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才能进行。可以拿俄国1905至1906年革命后的情况作某些对比，诚然需要附带作些说明。取消派^②和召回派^③一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同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找到了真正的方针，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日常的实践斗争中把群众组

①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载《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242—247页，《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77—283页。）

② 取消派是190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个派别，它主张取消非法的革命活动和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取消派的首领们于1912年被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党。

③ 召回派是1908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个派别，它主张将社会民主党人从俄国杜马中召回和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

织起来，从而通过组织群众的办法使党免受这两种倾向的危害。当然，这里只能有条件地谈论 1905 至 1906 年的革命。中国的事变要比俄国的事变进展得快得多。在经历 1927 年的一系列失败后，不能设想还会像俄国 1905 年至 1917 年那样经历那么长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各个时期是不同的，因为形势不同。资产阶级不是那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是那个国家机器，国际形势不是那个国际形势，等等，因此涨潮和退潮都比较迅速，此起彼伏，毫无疑问，到 1928 年我们将会看到又一个工农发动的浪潮。1927 年的经验无疑将会吸取。不要忘记，党的路线又将受到我们敌人的武器的批判。如果说机会主义会损伤党的机关的大量环节并使党受到削弱是正确的，那么说先锋主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则更加正确。我要说，在目前情况下，先锋主义更加危险。要知道，应该考虑到党的风气。那里不仅政治局，而且书记处或者某个书记都可以随时改变中央的所有决议。除了武汉时期有过的宗法式家长制以外，还存在着某种对中央全会甚至更高上级机关的决议和观点的极端蔑视的态度，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危险就在于，先锋主义，即盲动主义会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裂缝。只要这种裂缝一形成，那么它就会自动地发展和扩大。

2. 关于工会

职工运动决议案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那里把争取局部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最终目的斗争结合起来了。对这种结合只能表示欢迎。但我应该说，不是决议的所有条款都是明确的。例如，第六条说“在工人群众的当前工作中主要任务之一依然是大力发展和深化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我觉得，这个公式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在这里罢工似乎成了目的本身。如果拿最近几个月罢工斗争的大事记来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经济斗争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它在一些地方爆发，它波及到工人的各个阶层，因此问题

不在于发出指示要大力“发展、深化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而在于稍微地对这种罢工斗争加以区别对待。这个公式使我想起了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公式。即任何罢工都是好事，然而，正如你们知道的，这个公式与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毫无共同之处。问题不在于不顾形势如何来大力发展罢工，而在于使罢工赋有计划性、组织性、使罢工更加顽强不屈，围绕罢工在群众中造成同情的气氛，并善于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实行退却，把总的要求与日常局部要求结合起来，等等，而现在不是去总结整个这一时期罢工失败的教训，不是去研究这次失败的原因，而只是说要大力发展罢工。这里不由得要问一声自己，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在这种说法中有没有对先锋主义的让步，有没有想使那些认为只有巷战和直接冲突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工作的人感到满意的企图。在这一条和其他各条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我感到，这里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罢工的性质和形势，而不要采取笼统的说法，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令人注目的还有第12条，这一条，一方面说反对占领企业，另一方面又提出工人监督的口号。但工人监督是走向占领企业的一个步骤。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矛盾，也没有脱节。所以像第12条所说的那样，把它们对立起来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不算这两条和有些不大明确的表述，决议是可以接受的。我再强调一下，它之所以可以接受，特别是因为它向工会提出了具体任务，提出了局部要求，指出了摆脱目前非法工会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处境的某些组织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施泰因信^①中提出的建议。非法工会不可能长期存在。应该找出一些办法来摆脱地下状态，这里像俱乐部等各种组织可能会有些帮助。我还想提请你们注意这样一点，即能不能尝试一下在你们城市里的一些

^① 信没有找到。

产业部门成立互助会，比方说纺织工人互助会或其他别的互助会。这种互助会应该有很简单的经济纲领。若是能使这种按行业的互助会一个一个合法化，那么它们就能成为在革命工会周围积聚力量的临时组织形式，而革命工会则必然会成为这些互助会的灵魂和核心。下一步是否可以尝试成立工人体育协会呢？这类协会和俱乐部在进行社会搏斗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很重要的辅助力量。请考虑一下这一点。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条出路。我们的工会越深入群众，就越容易为我们的工作找到某种掩护。请考虑一下并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3. 关于 [工会] 太平洋书记处

第9、10、11期太工杂志^①已收到。这几期杂志有点单薄，但好在机关刊物在出版。我本人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管怎样应该把它进行下去，不要放弃阵地。如果在你们的城市里有困难，那么暂时可继续使用迄今使用的那套做法。诚然，汉口路途遥远，现在又是无声无息的省会城市，但是如果能够在那里印刷，那就应该坚持到底。当然，你们看得更清楚些，这一点由你们在当地决定。特别重要的是要与毗邻组织保持联系。不要忘记，菲律宾的整个工人运动是通过太平洋书记处与我们发生联系的，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也不要忘记，整个澳大利亚的职工运动已经加入太平洋书记处。我的一位朋友^②会告诉你们，关于同澳大利亚职工运动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有哪些设想。无论如何，这方面的工作要一刻不停地进行下去。不要失去我们已经赢得的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先地位。特别重要的是要同一些新的国家如印度、印度支那等进行联系。这些国家应该列入你们的势力范围。关于这一点

^① 指《太平洋工人》杂志，1927年在汉口出版，1928年在上海出版。

^② 可能是3.布劳德。

我不再多说了，因为我同意施泰因信中提出的建议。我的朋友会向你们证明，由我们成立这个机构是会得到全力支持的^①。顺便想指出一点，关于成立拉丁美洲工会书记处的问题已妥善解决，地点在蒙得维的亚。它大约于今年5月1日起开始行使职能，而你们当然应与它取得联系。南美洲8个国家已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在美洲大陆也站住了脚跟，可以与泛美劳工联合会^②的所有阶级性工会相抗衡。你们大概会很感兴趣地得知，我与檀香山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总书记经常通信。这个研究所的总书记梅尔·戴维斯已抵达这里。我和他将进行会谈。劝你们在机构成立后与这个研究所建立学术联系。

4. 关于〔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四次代表大会^③将于3月15日召开。我们有关代表团的所有指示^④仍然有效。任何国家的代表大会都不应妨碍组织像样的代表团。这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你们应该加以注意。我们尽量设法把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工人代表团^⑤留在这里直到代表大会召开，但代表团应该补充人员。应当再派一些重要的人员，并要事先决定今后留一两个人在工会国际工作的问题。恳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并坚决克服一切障碍。中国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单独列为一项议程，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在这里将设立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代表机构。与

① 看来是指成立太平洋书记处通讯局。

② 泛美劳工联合会是美洲劳工联合会（美国）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工会组织的职工联合组织，成立于1918年，30年代初解散。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3月17日至4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代表团成员有向忠发和李震瀛。

此同时，施泰因的祖国^①也应有强有力的代表机构。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参加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②带来了很大好处。他们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所有这些问题我的朋友会跟你们商谈，因此我就写到这里。

5. 情报工作

你们正在成立的这个机构和你们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前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取得世界各国报刊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报道。我们在这里利用的是中国报刊，主要是英文报刊，以便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变，但你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够的。你们应该经常寄信给一些重要国家的报刊机构，报道当地的消息。应该说，世界工人运动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了解的很少。在苏联报刊上刊登关于中国形势的消息最多。当然，我们尽一切努力把最重要的消息从那里发到其他国家去，但是如果你们确定定期寄信给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那将会提高人们对中国发生的事变的兴趣。这里说的不是理论文章，不是党内问题，而是简短的报道，如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行径，他们之间的角逐，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镇压工人运动方面的统一战线，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法，对笼罩在中国的对工人实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的描述，帝国主义列强驻华代表们的贪赃枉法行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成百上千封信的内容，可以使广大群众对在遥远的为欧美工人不甚了解的中国有个正确的概念。

6. 再谈罢工

我想再回过头来谈谈罢工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密切注视着我

① 美国。K. 3. 琼森，拉脱维亚出生，用的是美国人H. 施泰因的真正护照。

② 指第一次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于1927年5月20日至26日在汉口举行。

们从报刊上所能了解到的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经济冲突。我们缺少的是对罢工是怎样进行的和在冲突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什么策略的真实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帝国主义报刊上报道的一些情况。我们感兴趣的是原始材料，我们感兴趣的是领导方法。能不能做以下工作：集中注意一些大的冲突中的有关人员，对事变作逐日记事：如会议是怎样召开的，有多少人参加，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是哪个机构领导罢工的，有多少人留在企业里工作，是否有工贼在一边，黄色工会采取什么行动，工人对工贼采取什么行动，罢工期间怎样同黄色工会的代表进行斗争，与罢工者如何联系，有没有散发传单，提出的要求是怎样讨论的，罢工者是否对行政当局采取暴力，暴力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否募集了经费，在什么地方募集和募集了多少，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罢工者是如何生活的，等等。我这里列举了许多问题，但只要参加过哪怕一次罢工的人都很清楚，在一个月冲突期间一个积极分子的日记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得到5、6份如此真实的事件经过的详细报道，即逐日地报道做了什么事和怎样做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份极珍贵的材料，根据这份材料就可以来研究罢工期间我们领导的缺点在哪里，哪些应该改正和应该如何改正。请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知道完成这类任务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在恐怖盛行的情况下，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我们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别人了解得多，但我们知道的毕竟还很少。我们常常是根本不理解某些斗争方式和某些党员的曲折思想。显然我们不具体了解环境，不了解中国普通工人的心理。这种研究可能是制定我们策略的非常宝贵的材料，这一点当然你们也未必会怀疑。

7. 关于某些细节

我的朋友会告诉你们关于我们定期通信的一些建议。现在我

不得不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一点：奥[莉加]的朋友^①告诉我，奥[莉加]在给他的信中说，同时也给我、布[哈林]和罗[米纳兹]寄了信。布[哈林]和罗[米纳兹]收到信了，而我没有收到。不知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给我写了信但没有寄出，或者是寄出了但没有寄到，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写。不管怎样，我没有收到奥[莉加]的信，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这里通常的做法是，我们的朋友应首先给我写信，而不是通过别人顺便告诉本应先告诉我们的消息。我恳请你们二位严格遵循这条规则，注意我们的优先权。希望我们不应再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书面的或者口头的议论。请你们也将我们的愿望告诉领导。我就写到这儿，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将见到你们并告诉你们他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二是因为我指望不久会见到奥[莉加]，并从她那里了解你们的生活情况。

致友好的敬礼！

你们的 A. 洛佐夫斯基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3，第 1—4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实际上是 O. M. 米特凯维奇的丈夫（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27，第 36 页；卷宗 291，第 76 页）。

48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和琼森的信

1928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仔细阅读了那次全会的政治决议^①。决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有许多缺点。首先请注意以下这类玩弄词藻的话：“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另一个地方说，资产阶级是“不成熟的历史上的流产”。如果说这仅仅是玩弄词藻，那还算不上大错，但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作用和意义的过低估计。当然，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但是这种表述可能给人一个印象：它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而这是对资产阶级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极端危险的估计不足。我有一个印象，正是在这些表述中隐藏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不足。还不能因为它现在四分五裂就得出结论，它不具有任何力量。否则就不能理解，是谁最终扼杀了工农运动。

提纲中有一个与中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概念，即祖巴托夫

^①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见第159页注^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5—467页）。

组织^①。这是中国工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领会的。祖巴托夫组织比起蒋介石在上海建立的那些警察工会来简直是儿童玩具。祖巴托夫组织连当代俄国工人也很少知道，而把这类概念写进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绝对没有任何意义。

我认为关于不断革命的一整段话是非常冒险的和混乱的。诚然，这里援引了马克思的话，试图给什么是不断革命下个定义。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多年来成为攻击目标的术语写进中共中央的提纲呢？当然，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在一般共产党员的意识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的理论。本来可以表述同样一些思想，但不必用这个只会把普通的中共党员搞糊涂的术语。

提纲中关于革命事变发展速度的问题也存在着极大混乱。在这方面可以找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说，不要过高估计革命高涨的速度，在另外的地方则说得截然相反。

关于现在革命潮流低落的原因的一段话是非常奇怪的。关于这个问题，提纲中说：“革命潮流低落的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如果这不是拙劣翻译的结果，那就是意思表达得不好，很难加以解释。如果是“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那么关于准备武装暴动的一切议论都只好见鬼去了。

其次，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呢？可以说资产阶级想以改良来代替革命，但这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改良主义的途径，或者改良主义的方式，或者使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术语。改良主义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指工人运动中的某个派别。

^① 祖巴托夫组织是20世纪初俄国沙皇政府镇压革命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目的是培植警察监督下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这一政策的创导者是C. B. 祖巴托夫，因以得名。

我不喜欢“军事投机主义”这一术语。干吗要臆造一个新的术语呢？决议对军事投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群众。至少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混乱的。这怎么算得上是投机主义呢？如果我们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举行暴动，那么这可以说是愚蠢行为，是盲动主义，说什么都行，但跟投机主义有何干系呢，而且还是军事投机主义，真是难以理解。

关于苏维埃问题的提法也是混乱的。决议中说，只有确实无疑的巨大高潮（这是对的）和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的时候，方才应该组织苏维埃。这句话是经不起批评的。暴动之胜利是没有保证的。请回想一下列宁在1917年时在起义问题上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是怎么说的吧^①。

我不再来分析这些论点，我想上述错误说法足以令人高兴不起来了。我一开始就说，总的方针是正确的，但这类表述可能损害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政治方针，并使之化为乌有。

我写信给你们谈这一点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请你们注意，在起草决议时毕竟要考虑到谁来翻译决议，而这个决议，除了上述混乱之处外，在结构和风格上还有别于其他决议，一个中国工人翻译未必能理解那里写的东西。应该叙述得更简单些，更通俗些，否则不能教育工人，把其中的优秀分子提高到自己党的领导水平上来。要把一切都写得简单些，少一些知识分子气，否则我们的决议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财产了。

你们或许认为我的评价过于严厉。这是可能的。但这里宁肯过些，也不要不够。在中国，决议首先是给中国人写的，因此越简单，越明了，对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就越好。

^① 指1917年10月17(30)日列宁：《给同志们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0—410页）。

给你们写这封信是作为对昨天写的那封信^①的补充。祝你们一切顺利。

紧握你们的手

你们的老爷子^②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3，第 5—6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47 号文件。

② C. A. 洛佐夫斯基。

49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28年1月10日于上海

绝密

发自上海的电报的副本

事态发展进程，从湖南广大士兵中发生骚乱，地方政权削弱和湖南军阀集团之间军事冲突加剧开始，现在提出了暴动问题。为巩固我们的力量，在主要敌人白崇禧的军队被削弱前，要进行强有力的游击斗争，竭力推迟进行决战。请指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3，第 1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发的电报不详。

50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28年1月17日^① 于上海

亲爱的亚历山大：^②

尽管一再遭到失败，罢工运动仍在发展。罢工还像过去一样保留着我在第一封信^③中指出的那些缺点（行动分散，甚至属于同一个公司的企业的罢工也不同时开始和结束），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罢工者异乎寻常地顽强。罢工有时持续一个月，或半个月，两个星期（见永井公司纺纱工人的罢工^④、英国烟草公司罢工^⑤和码·机公司罢工^⑥），而在多数情况下，经过很短一段时间间歇，罢工又重新恢复。工人的要求多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1）工会的权利，工人代表权；（2）工人俱乐部的费用和结社、集会等自由。恢复前总工会^⑦的地位，等等。经济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1）提高工资（有时达100%）；（2）取消体

① 收到的日期。

② C. A. 洛佐夫斯基。

③ 见第35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日本“永井棉纺公司”里纺纱女工的罢工。详见《东方和殖民地。工会国际公报》，莫斯科1928年第46—47期，第7页。

⑤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英美烟草公司工厂里的罢工。详见同上第41期，第8—9页；第46—47期第5页。

⑥ 原文如此。可能是指上海码头和机器制造公司里的罢工。详见同上第41期第10页。

⑦ 指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罚（政〔治〕或经〔济〕要求）；（3）一系列保健要求；（4）节日放假；（5）妇女怀孕期间休假。缩短工作日起的作用不大。整个实际情况您可以从我们报纸关于工人问题的综合报道的剪报中看到，现寄上一部分已经译出的，全是中文的，将定期寄往柏林。

现在谈谈内部情况。尽管一再遭到重大失败（综合报告五天后再寄去），但罢工有许多优点。首先，罢工使我们在企业里的力量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党组织人数从700人增加到2000人，几乎都是工人。在30个企业中成立了非法的工厂委员会。所有罢工显然都由总工会领导。经常是工人明确提出要求……^①，工厂主就……诚然，这有其重要的原因。过去没有习惯来加以掩盖，过去工人有权退出……。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工会联合委员会”^②提出了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建立“真正的”工会的口号，并尝试选举工厂委员会……工人们达成协议，成立的速度……要大大加快。

现在谈谈我们从罢工浪潮中得出的几点结论：我们已经写信说过，首先（1）准备更认真地发动纺纱工人；（2）在英美烟草公司就军队进驻一事去作文章；（3）大力发展其他企业中的罢工运动。这都是原来的打算。现在工会联合委员会（右派的）为了削弱共产党工人的影响不仅转向成立真正的工会，而且要根本改变对罢工的看法。在上述情况下他们还积极帮助罢工者，发给他们补贴（每天3角），条件是参加联合委员会。与此同时，充当劳资协调人的方针依然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他们一方面发给补贴，另一方面劝工人们让步，玩弄明显挑拨离间的把戏，这一点将很快会大白于天下。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有些吓坏了我们的小伙子，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作为客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上海工会联合委员会是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不久由上海军事当局成立的，目的是消除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影响，并使工会严格服从当局。

观的见证，给您寄去 2 份……《字林西报》^①……虚假的……没有一个……罢工基金中的所有钱，应当归总工会的……^②

我们现在必须……为了在上海、广州、武汉设立罢工基金。恳切请求您寄钱来。阿〔尔布列赫特〕将详细面告此事。真希望您能在收到这封信前找个机会给我们秘密寄来可观的一笔钱（约 20 万）。现在非常需要钱。您知道，从……方面来支援总工会将具有多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当然，如果总工会不善于组织募捐，我是一个戈比也不会给他们的，因为这将是政治丑闻。但很明显，他们只有表现出色，才能在工人中募集到捐款。

这是当前我们的第二件事。

现在谈谈第三件事，现在这里还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做这件事。这就是对一定的经济要求纲领（根据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和中国代表大会决议^③的精神）做宣传和鼓动工作。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不管怎样，我现在正在顺便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谈谈第四件事。我们这里正准备组织规模不大的工会干部训练班（约 15—20 人）。我想很快就开始，但由于……更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小伙子们非常热衷于在海参崴开办工会干部训练班的想法。我想，在春天到来前办班最好。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能得到您的赞同。现在……这……我想，尽管有许多重大缺点，这件事基本上是我们需要做的。请您毫不客气地给以批评。关于中国总工会的号召书^④问题，早在这封信以前就希望得到您的答复。

请不要生气，我写得很潦草，这是因为几天来我的住所发生了灾难。我这就把给格列尔的信和具体材料送到轮船上去。

① 《字林西报》是 1864 年到 1951 年在上海出版的日报。

②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大概指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1927 年 6 月 19 至 28 日在武汉举行。

④ 指哪个号召书不详。

亚历山大罗维奇^①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29，第 1—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O. A. 米特凯维奇。

51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的信

1928年1月23日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鉴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声明并提出建议：

1.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员不满和骚动的原因，不能到按照某些俄国同志的看法似乎在东大中国学员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和“取消主义情绪”中去寻找。

“无政府主义”、“取消主义”，这只是一些耸人听闻的词语，问题在于东大的中国同志早就对改进教学工作（关于中文教材、关于翻译人员、关于分组等）和党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几个月来，学员们提出的所有具体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作出相应的报告来加以解释，学员们都不明白。简单地说，这就导致中国同志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导致他们只能集体前往共产国际执委会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党的最高机关^①。这里无疑表现出学员们的幼稚和对组织路线的不理解，但这也是学校党支部和校长^②领导方面〔缺乏〕明确的、有力的日常党的教育工作

^① 指1927年12月16日东大约100名军政班学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地附近举行的示威游行，要求改进教学进程中的军事训练。

^② B. 3. 舒米亚茨基。

的结果。

在我看来，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东大领导人没有及时对学员们的一些情绪作出反映，不打算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措施来改进教学工作，不打算哪怕通过党小组中增加俄国同志的办法建立坚强的党的积极分子核心来改进党的工作。既然如此，显然责任首先应在不重视教学工作和党的工作的领导人和支部委员会身上。当然，对革命失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取消主义情绪是应该进行斗争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用这种谴责（“无政府主义”、“取消主义”）来掩盖东大中国部工作中的缺点。

2. 有人说，中共党内有“马哈耶夫主义^①”倾向，特别是在东大学员中，这是不对的。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全党现在正在进行斗争，反对一些大学生党员忽视和低估提拔工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的意义。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是目前加强党的主要斗争口号。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见《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②）正号召这样做。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正当必须提高工人党员的政治水平，提拔他们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的时候，不能抛弃“反对马哈耶夫主义”的口号，因为这可能会使“工人化”的口号黯然失色。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要知道东大的工人们有反对像安德烈耶夫^③和其他中国同志那样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情绪。但问题是，尽管安德烈耶夫和其他中国同志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官僚主义地进行工作，不善于对学员们的一些情绪作出反

① 马哈耶夫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流派，因该派首领B. K. 马哈耶夫而得名，马哈耶夫认为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寄生阶级，而只有失去阶级性的人才是革命的基础。

②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的决议（见第159页注③）。

③ 武胡景。

映。安德烈耶夫和其他中国同志无疑是有错误的，但责备批评这些错误的工人是“马哈耶夫主义”，这是不对的。

3. 有人说中山大学里的反对派把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志败坏了。这在我看来没有证据。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东大有力地地开展反对反对派的经常性思想斗争，如果我们充分地进行党的教育工作，那么谁还能动摇东大的中国同志呢？

相反，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曾提出开除一些反对派分子的问题，但投票结果差不多一半对一半。这件事难道不是说明，东大没有〔对〕反对派进行足够的思想斗争，在中国部没有进行足够的党的教育工作吗？

4. 现在，如何摆脱东大目前的状况呢？我建议：

(1) 改善整个学校的领导，因为只有有了正确的和明确的领导，学校才能正常地工作，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工作。

(2) 要特别明确地提出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注意党的教育工作，要组织坚强的积极分子核心，并同他们一起进行强有力的工作。

(3) 要彻底着手改组军政训练班，因为目前存在的这些班，是花了大量经费挑选出来的，在派往莫斯科时又冒了很大危险，学习时间几个月或者一年，好处很少。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班不能证明是有效的（见学生来信^①）。

为了证明这些班有效，为了使我们在武装暴动期间在这些学员的帮助下能够使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机枪、大炮、飞机、兵工器材^②等），而不仅仅是步枪射击，就必须把一部分文化程度比较高和有点军事经验的学员分派到军事学校去受各种军事技术训练，而把其余政治上较强的学员派到一般的政治培训班去。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

(4) 舒米亚茨基同志关于开除 14 名学员的提议应予以否决。因为促使他们去示威游行的不是某种意识,某种阴谋计划^①,而是一些客观条件。只是由于没有出路的情况,由于学校领导不切实际的安排学业和对他们缺乏关怀才促使他们采取这种无意识的“极端行为”。对于这种无意识的错误自然应该加以反对,但不是通过开除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把他们列为反革命分子,而应该通过教育、说服的办法,向他们说明像上街游行这类错误在联共(布)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是不能容许的。

5. 至于今后,我认为应该立即采取具体措施,具体准备在本学期结束时着手将中国学员合并到一个学校。从总的任务来看,我认为合并是完全合理和可行的。因此,应该从中选择一个方案:或者是取消中山大学,把它合并到东方大学来;或者是把东方大学的中国部合并到中山大学来。这样可以有以下好处:

- (1) 工作人员集中;
- (2) 中文教材集中;
- (3) 翻译力量集中;
- (4) 机构合理;
- (5) 改进工作。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个人认为最好把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到中山大学来,因为后者已经适应专门为中国同志做的工作,会更好地为中国的学员服务。相反,如果把中山大学合并到东方大学来从而扩大东方大学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经费、过多的力量,等等。而这对共产国际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向忠发

全宗 530, 目录 4, 卷宗 3, 第 2—5 页。

打字稿, 原件, 中文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按意思是: 预谋计划。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会议第 67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1 月 28 日于莫斯科

听取：4——全会^①筹备工作。(1) 中国委员会。

决定：(1) 改组中国委员会^②如下：布哈林、斯大林、罗米纳兹、米夫、彼得罗夫^③(负责人)、罗易、向〔忠发〕、片山潜、沙茨金、佩佩尔、牛曼以及德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代表各一名。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56，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于 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召开。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

③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53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和结束语^①

1928年1月31日于莫斯科

二月全会^②的准备材料

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③

布哈林：同志们：现在我只能就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革命最重要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会议是在И. А. 皮亚特尼茨基主持下于1928年1月17、24和31日召开的。根据会议的结论，打算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1月17日和24日听取了B. B. 罗米纳兹的报告（全宗514，目录1，卷宗336，第1—42页）、J. 佩佩尔的报告（全宗514，目录1，卷宗335，第1—33页）、Г. 牛曼的报告（全宗514，目录1，卷宗331，第1—13页）和Г. И. 谢苗诺夫的报告（全宗514，目录1，卷宗331，第14—24页）。1月24日开始讨论，发言的有С. А. 洛佐夫斯基、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片山潜、Л. А. 沙茨金、Е. 瓦尔加、P. M. 希塔罗夫、向忠发、У. 加拉赫尔、А. С. 马丁诺夫、Г. 牛曼（发言速记记录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331，第36—180页）。会议最后一天，Н. И. 布哈林发言，随后B. B. 罗米纳兹（根据主要报告人的权利）作了结束发言，Н. И. 布哈林（就会议结果）又作了结束发言。此外，在与会者中间，作为会议材料散发了由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问题提纲草案》和《提纲的补充》（全宗514，目录1，卷宗336，第104—133和第134—136页）以及С. А. 洛佐夫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与会者的两封信，作为他提出的《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纲的草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331，第120—129页和第249—256页），另外还有B. B. 罗米纳兹1月3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与会者的一封信，作为他对洛佐夫斯基信的答复（全宗514，目录1，卷宗336，第172—181页）。鉴于意见分歧，会议的结论性文件没有通过。会议的全部材料转交给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中国委员会。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见第218页注①）

③ 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文件原注）。

问题说几点意见。我不能发表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的官方的和最终的意见。但是，我曾同在座的我们政治局的各位委员谈过，如果说我现在谈的不是官方的观点，那么我毕竟可以说，我反映了我们党中央的一些政治情绪和意见。

我们这里曾进行过很大的争论。依我看来，争论的腔调不是始终都令人满意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挑衅性的，不符合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的严肃性。至于问题的实质内容，它不仅对评价现时的形势，而且特别是对制定我们未来的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这里听取了亲自到过中国的牛曼、罗米纳兹、佩佩尔和安德雷^①等一些同志的报告，然后听取了其他同志的发言、争论，还看了一些文件、提纲草案以及中国党通过的提纲、决议等等。我不在这里批评这些文件，首先我要审议和分析这些报告和讨论时的发言。我先提出一些总的问题。然后对它们进行具体和详细的分析。

首先我想谈谈**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尽管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仍认为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些新的文件中，首先是在同志们的发言中，多少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迄今为止，我们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评价中国形势的，即我们在那里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按其实质而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阶段。不应该把问题的这一提法与革命的动力问题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革命的具体内容，革命的客观性质。我们曾完全正确地指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是在违背资产阶级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再说一遍，我说的不是革命的动力（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而是革命的客观性质。

在罗米纳兹同志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工农革命，如果提出它的形式、内容和阶级动力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① Г. И. 谢苗诺夫。

这样一来，无论就其形式，就其内容，也无论就其阶级动力来说都不能称这场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着又说：“中国革命现在已经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从评价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我决不打算挑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任何人都明白，这是对中国革命阶段问题的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曾多次谈论过革命的不同阶段，大家都同意，中国革命在其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最终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在其进一步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过渡。我们曾这样理解问题：两个阶段的交织、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问题是最复杂、最主要的问题，它决定着不同的策略口令、口号，甚至我们的整个策略。

但是，如果像在这里所阐述的那样来阐述问题，那就证明以下论点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再存在，它已经转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了。这只是初步的意见，下面我还要详细来分析这个问题。

这里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革命是不断的革命，或者像这里有人一字不差地说的：“革命具有无间断的、不断的性质”。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论点放在一起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而如果我们这样来分析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两个论点放在一起加以批判。说革命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论断的意义何在呢？从理论上讲，或者是有人想以此来说明，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矛盾或经济任务已经解决，或者是想说，革命的政治任务已经过去。只有这两种可能。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与此同时革命的经济任务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呢？我认为不能。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参加管理国家，也就是说它是统治集

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样说也只是 *Cum grano salis*^①。那么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绝对没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政治问题是中国的统一、集权，建立集权制的国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否可以说这个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呢？这个任务本身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即只有在无产阶级政策的范围内才能解决呢？丝毫不是。它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解决的，就像土地国有化问题一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国的独立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当然没有。罗米纳兹同志自己在报告中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土地革命问题。我们同反对派曾就这个问题争论过上千次，并强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本身无论如何不是某种社会主义的东西。它只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特点的某种前提条件和出发点。但中国的土地革命本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里还应该提醒一点：我们布尔什维克常常把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在我们的所有观点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桂冠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资产阶级政权适应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则适应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它也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阶段，在革命初步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一个阶段，但它本身只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顶点。我们对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就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现状，我们是否有权说，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呢？无论如何不能。这是根本错误的。从革命转变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复存在，那么转变成什么，

① 拉丁文，意为：讽刺性的、挖苦性的。

转变成哪个“X”，哪个未知数呢？如果这个革命已不复存在，那么转变的问题也就化为乌有，也就不存在了。而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中国有什么呢？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式吗？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存在过渡阶段，那么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

在讨论期间，我写了个条子问罗米纳兹同志，依他看来，转变成什么呢？罗米纳兹同志亲笔给我写了以下的答复：“我认为，革命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并在“已经”两字后面打了两个惊叹号。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论断：一方面是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阶段，而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具有不断的性质。我想结论是相当清楚的。关于特殊阶段的转变，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和革命不断性质的论断可以说是“经典式的”表述。正因为这些经典式的表述是“经典式的”，因此它们也同样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它们运用到中国要比过去运用到俄国更不正确。为什么呢？我们曾跟反对派进行过一场大论战，因为他们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时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即中国的殖民地性质或半殖民地性质。我们曾说过一千次，不能把中国革命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不能把俄国革命或帝国主义国家的任何革命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提并论。人们在谈论革命性质时往往不涉及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的情况与马克思当年谈到1848年普鲁士的情况一样。如果“转变”这个词意味着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激进的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俄国革命也是不断的革命。但是如果人们想以此说明，革命的退潮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这是错误的。这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可以争论的。我认为，中国革命长期停顿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同志们想这样说，那并非不对，而是说得不够谨慎。

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也不应忽视的一点。有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断革命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复杂问题，硬要采

用这个术语，从我们方面说策略上不是特别适宜的。每一个政治环境都有自己的规律性和合理性，我们在表述我们的策略时也应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问题也涉及到比较普遍的**革命发展前景**问题。这个问题在罗米纳兹和牛曼同志的报告中谈到了。我认为在他们的报告中，对革命前景问题提得和解决得不是特别清楚。罗米纳兹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谈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妥协道路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地方则说这样的道路毕竟会认为是可能的。罗米纳兹同志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道路最可能呢，他回答说，最可能的道路就是不妥协的道路。这个答案本身是正确的。但它与报告中的许多论断即这样的道路根本不可能，是不相适应的。应该像列宁那样来提出问题，即由斗争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实际上是合适的。但是罗米纳兹不是这样。罗米纳兹那样提出问题是革命的宿命论，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可能，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胜利，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的巨大危险估计过低。而这些危险实际上是很大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危险的严重性并加以分析。关于总的方针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现在来谈谈第三类问题，即**阶级力量的分布状况**。中国各阶级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和现在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罗米纳兹同志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是错误的。罗米纳兹同志说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是不对的。这不仅同我的观点根本矛盾，而且同罗米纳兹同志在其报告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所表述的观点有更明显的矛盾。

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对不对呢？对。但罗米纳兹同志说资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而只有一些资产者，这是大大夸大的了。这一点我且不说。罗米纳兹同志自己承认，这是他的迷惑，这是夸大。资产阶级已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这是事实。但硬说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是同中

国的整个现实生活相矛盾的。要知道我们自己承认，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领袖，而如果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怎么能领导革命呢？显然，所谓形成阶级无非意味着这个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也就是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为“自为的”阶级。在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曾经是动力。它曾经是革命的领导者，是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当然也是与军阀斗争中的领导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政治上这表现为国民党的领导和国民党内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在这以后，硬说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可以说有点“别出心裁”了。尤其是经过几个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明显反革命的势力，怎么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呢？这可能吗？无论如何不可能。难道资产阶级从其本身的利益角度看还不具有阶级意识吗——要知道这是评价阶级的标准——，难道它还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吗？面对事实硬说它不具有阶级意识，这是不对的。它早就具有阶级意识了，现在也具有阶级意识。

牛曼：它有纲领吗？

布哈林：这是一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个技术问题。这是同中国的特殊情况联系着的。它没有统一的纲领，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说明，它今天可以这样随机应变，明天可以那样随机应变，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为从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看必须永远说一成不变的东西，那是荒谬的。不，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们是很会随机应变的。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的种种失败证明，他们是非常善于随机应变的，这一点无可反驳。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党比起资产阶级首领们来或许太不会随机应变了。例如，资产阶级领袖们今天给共产国际发去各种各样的电报^①，而明天则大肆攻击工人们，当然，牛曼可能会说，这不是始终一贯的纲领，但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明智的。总之，说资产阶级没有

^① 电报没有找到。

形成为阶级这个论点绝不是正确的。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正确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散性。资产阶级的分散性何以解释呢？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不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那里有外国资本的各种势力范围，各国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各个不同的阶层起着各种不同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尖锐斗争，等等。封建主也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看作是决定性的论据，那么我们也应该遵循“铁的逻辑”，断定封建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为一些封建主彼此之间在进行斗争。

但是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多多少少与封建主义结成了联盟，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成熟性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已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发动吓破了胆。

在罗米纳兹和牛曼的报告中，部分地也在中国党中央的十一月提纲^①中，表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军阀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不能把他们看作是一定的社会经济阶层。

在这类问题上的另一个意见涉及到错误地否定反动派的联合。有人提出一个论点：我们在中国有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说：既然如此，那么资产阶级或者反动派的联合就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对的。我在同罗米纳兹的私下交谈中说过这一点，并向他指出，马克思有一句话，说革命的政党使反革命的政党团结起来。罗米纳兹同志反驳说，马克思这样说适合于欧洲的情况，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么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撇开所有“普鲁士的”论据，所有“俄国的”论据不谈，撇开马克思、列宁等的引文不谈，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在制定策略时，首要的和最后的决定权应属于实际情况。而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在那里结成了联盟。难道这不是我们现

^① 见第159页注③。

在在谈论统治阶级时可以谈的最重要的一点吗？在我看来，是的。过去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封建主曾经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稍后，封建主越来越同帝国主义者密切联系，并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现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在同一个阵营里，罗米纳兹同志自己说，蒋介石等人对帝国主义者卑躬屈节。总之，过去是分开的，现在是合一的，而罗米纳兹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但怎么不能说这是反动势力的联合呢？过去统治阶级之间不仅存在着裂痕，而且存在着相当深刻的鸿沟，而现在则存在着它们的统一、它们的联合。

另一个论据：如果说反动派的这种联合是存在的，那怎么能谈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看来是可以谈的。如果拿俄国的各种例子来说，尽管我不特别喜欢举出俄国作为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例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展使立宪民主党倒向反革命阵营；这是在十二月起义^①以前和十月罢工^②以后的事。我要说这样一点：形势变得更紧张了，而资产阶级地主的联盟也比以前更加巩固了。这是事实，还要我援引一些列宁的引文吗？其实这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当我们一方面指出反动阵营在联合起来，而另一方面说明革命在进一步发展时，可以援引数千条说明实际情况的引文。为什么欧洲的发展进程不能在中国的事变中发生呢？我不理解这一点。资产阶级在工农的压力下和出于对工农的惧怕而转向反革命阵营，这对不对呢？这是对的。这一点已为大家所承认而被写进了各种提纲。总之，反动势力联合的过程是在革命发展的压力下产生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你们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一过程呢？难道要把就这个问题写的所有决议都勾销吗？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这样评价形势的：正是由于工农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才转向反革命阵营。这是我们的评价。如果罗米纳兹同志否认革命的党（这是

① 指1905年12月莫斯科工人的武装起义。

② 指1905年10月全俄政治罢工。

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象征性表现)使中国的反动集团团结起来,那么他用什么来解释这种情况呢?怎么能够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走到了一起,同时又否定反动势力,否定它的联合呢?我认为,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碰到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如果我们有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反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联合。实际上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出现了力量的两极化过程、政治上的分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始终是清楚的。举例来说。我们曾如何评价德国1923年的形势的呢?我们说:革命形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力量的两极化,是政治上的中间阶层的消失,社会影响一方面在这一极,另一方面在另一极尖锐化、增大。如果从这个角度和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中国的形势,那么情况是否是这样呢?完全是这样:革命越发展,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化则越大、越厉害、越直线式。因此,无论在这一极还是在那一极都出现联合趋势,因此革命和胜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在一方,一切都逐渐衰退,而在另一方则一直上升,如果在一方只有下降的曲线,而另一方则只有上升的曲线,那么革命的胜利就十分容易和无庸置疑了。

因此,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的策略是应该争取动摇分子,他们由于其阶级利益本应该站在我们一边,但现在还处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也还要争取可能跟我们一起走的中间阶层。但这也是社会力量两极化的表现,而这种两极化是以这两个极的联合为前提的。你们举不出历史上任何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发生的。

至于敌方这一极的内部瓦解,一般说来,只有当革命阶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时,反动这一极才会出现分化的过程。

至今,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至今,敌人拥有政权,至今,我们不能说不存在反动派。因为这会意味对我们失败的深度估计不足。

如果我们现在来谈谈我们的策略问题(这是另外一类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敌人的评价等方面存在着某些幻想。

依我看来,在罗米纳兹和牛曼同志的发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阐述得不那么成功。我们不应该从暴动组织准备的角度，而应该从我们总的政治方针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依我看来，这从他们方面来说是个很大的错误。诚然，我们在中共中央的十一月提纲中有一些很正确的表述，但从另一方面说那里也有这样一些论断，似乎一切都应从农村出发，而城市只是暴动的对象。^①既然农民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那么它就需要城市的领导。农民首先应夺取一些城市，以便进行革命斗争。这就是我对阶级力量分布状况所要说的意见。

现在来谈谈**战略和策略**。至于说到战略方面的问题，那么上述报告中所提出的战略不是很好的，首先是反动集团联合过程的问题提得不对。至于说到策略，那么在提纲^②中，几乎没有任何策略方面的论述。策略的论述应该不仅建立在阶级相互关系的质量方面，而且建立在数量方面。要确定具体的策略，光知道革命的阶段或者阶级关系是很不够的，而应该估计到，敌人方面有哪些力量，我们有哪些力量，哪些力量是中立的，等等。就拿列宁在十月起义^③前所作的光辉分析来说吧。列宁是不是说，我们处在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并以此来论述起义呢？不是。他估计到了一个城市里、一个苏维埃内我们有哪些力量，运动有多大规模，敌人强大到何等程度，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哪些力量是中立的。他几乎以数学上的精确程度进行了估计（尽可能进行数学上的精确估计）并以这种方法论证斗争的方式和形式^④。这样做对不对呢？毫无疑问是对的。

同志们：我并不想挑起任何争论，但我认为，如果不对革命的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5—458页。

② 显然是指罗米纳兹的《中国问题提纲草案》。

③ 指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

④ 见列宁：《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信》，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2—234页；又见列宁：《危机成熟了》，同上第267—278页。

这个数量方面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不能阐明正确的策略方针。有人说工人是革命的。感谢上帝,他们确实是革命的,这很好。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估计一下,哪些工人阶层是消极的,哪些阶层是中立的,跟着工会走的那些阶层有多少,现在进行的罢工具有什么性质,哪些工人阶层被彻底摧毁了,哪些阶层属于工人贵族,他们有多少人,等等,中共所体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群众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在阐述策略时是主要的问题,如果战略已经确定的话。在估计中国的形势时,在估计社会力量时,在阐述我们的策略方针时,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放在首要地位。当然,可以说在革命期间和在革命过程中,一切力量都在迅速变化。今天反对我们的人,明天可能拥护我们。这是绝对正确的。至于革命的速度,那是跟和平时期工人发展的速度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应该稍稍“估量”这种速度。这很困难,但我们毕竟应该考虑到革命发展的速度、广大群众中的变动、从内部争取这些群众及其主要阶层的可能性。

我说过,缺乏问题的这种提法是策略方面的问题。罗米纳兹同志同意这一点。在牛曼和罗米纳兹同志的报告中,比方说没有特别详细地阐述准备暴动的形式,各种不同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问题等也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只是提出了武装暴动的空洞口号,而暴动前的一切都一片漆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与缺乏正确评价具体的力量对比状况相联系的,可以说这是确定策略方针的前提条件。组织路线、群众中的鼓动工作等等重大问题,无论在提纲中还是在报告中都没有谈到,难道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吗?

罗米纳兹:您已经讲了两个小时,而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小时!

牛曼:我专门谈到了准备工作。

布哈林:你们总共四个小时,而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一些次要问题。例如像暴动与其他地区暴动的协调问题,难道当我们转入斗争时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吗?我这里有一封12月5日即广州暴动前5天写

的信,信中谈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①。广州青年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不知道计划举行的暴动。

佩佩尔:党中央也不知道。

布哈林:要知道,青年组织什么也不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局是否知道,我不清楚。至今没有一个文件谈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知道些什么,但我可以证明,青年组织的中央在暴动前5天什么也不知道。

罗米纳兹:我们早在11月10日就在党中央决定了这个问题。

布哈林:暴动可不是今天作出决定明天就可以进行的事。我提出了协调行动的问题,而这里却没有协调。即使现在提出这样的论据,在五分钟内你们无法进行协调,那么这也是错误的。

罗米纳兹:暴动是在一个月以前与广州的同志一起决定的。

布哈林:不管怎样,在青年组织的全会上关于暴动问题只字未提。这么重要的问题居然没有在那里提出来。

牛曼:这是青年的弱点。

沙茨金:可能在会上谈到了,只是在报告中没有提到。

布哈林:在报告中不谈这么重要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毫不夸大地、完全冷静和清醒地研究事变的经验教训,不仅是广州方面的,而且是整个形势方面的经验教训,那么牛曼和罗米纳兹同志,我们就应该谈谈各种各样的十分危险的事。就拿党中央十一月提纲来说。那里有两个有关工会工作的策略问题^②。首先是与黄色工会的斗争。其次是捣毁粮铺。在这场斗争中建议使用的是什么法宝啊?完全是个

^① 指1927年12月5日M.3.阿布戈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全宗533,目录4,卷宗120,第123—138页)。

^②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见第196页注^①)。

人恐怖！那里这样写着：“对黄色工会的官方代表实行恐怖”。要知道，在中国决不能宣传脱离群众运动的个人恐怖手段。脱离群众运动的个人恐怖，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手法，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这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特别危险的。就拿黄色工会这个问题来说吧。同志们总是绕来绕去兜圈子，然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就拿广州的机器工会这样的问题来说吧。沙茨金同志把这些机器工人称为工人贵族。好吧，就算他们在中国的条件下处在比较优越的地位。但是否可以把中国的“工人贵族”与英国或者美国的工人贵族相提并论呢？我说不能。我们是否面临着至少争取这些工人中的某些阶层的问题呢？当然是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是剥削殖民地的产物。而中国本身就是殖民地。不能把这一切都混为一谈。为什么这些机器工人反对我们，这不是很具体的吗？是否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这里多多少少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革命发展的前一阶段上，当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国民党实际上领导革命时，人们谈论的是国民的奉献，而没有提出工人的特殊要求呢？

佩佩尔：这些机器工人早在1920年就派代表参加了巴库的东方各民族革命代表大会^①。

布哈林：我们是否面临争取这些阶层的问题呢？当然是的。或者说，我们是否面临哪怕作为暴动的准备，起码要使这些阶层保持中立的问题呢？是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罗米纳兹和牛曼同志，请问你们是否谈到过和讨论过说服这些工人阶层的问题呢？或者虽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事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牛曼：在中央和在广州讨论了。

布哈林：关于黄色工会，在提纲中说了一点儿个人恐怖的话。或

^① 广州机器工会代表黄凌霄参加了(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许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波兰是怎么提出恐怖问题的。我们说：既然波兰社会党^①上层领导在波兰享有很大影响，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来反对它，这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危险的。

而在中国呢？我们党是最英勇的党，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然而，正如一位同志从那里来信说的，失败以后常常有一部分过去的党员变成了叛徒。这是不难理解的。在各个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笼罩着最卑鄙无耻的恐怖时，有些工人加入黄色组织以求得到喘息时机，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看上去不是那么英勇，但这是事实。与这种恐怖策略相联系的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我们在进行顽强的和出色的罢工。这是正确的，绝对没错的。许多罢工持续时间很长，进行得很勇敢。但是应当说一句，我们有时强迫工人去罢工，我们是手执手枪逼迫工人进行罢工的。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愚蠢行为吗？对此应该在我们的队伍中敲起警钟。最近从中国寄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策略，信中说，对工人的这种强迫策略在我们队伍中经常出现^②。这一切是与“先锋主义”，与恐怖问题等联系着的。难道这是小事吗？请你们从我国革命历史上举出一个我们手执手枪强迫工人罢工的例子来。有人可能会对我说：“您歪曲了真实情景。”我不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美妙情景。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是即使个别现象也促使我们敲起警钟，这是我们的义务。有位同志在最近来信中谈到，在农民运动中也有这类令人气愤的各种情况。^③

牛曼：中央和我们一起对此进行了斗争并通过了决议。

布哈林：同志们，我还要再给你们举出一些事实，是一位同志告诉我的，至今他还没有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④。这位同志说，

^① 波兰社会党对1926年由Ю. 皮尔苏茨基建立的政权采取反对立场。

^② 见第55号文件。

^③ 见第35号文件。

^④ O. A. 米特凯维奇。布哈林凭记忆援引了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见第35号文件）。

工人运动被扼杀了，我们没有中央工会组织等等。我不来谈这一点，或许这不是100%正确的。这位同志说我们在军队里的工作也是这样，至于工会的策略、群众中的工作，他则说：“一切都放在暴动的技术准备上”。由此看来，我们没有起义的政治准备，而只有技术准备。这位同志说，党的上层领导在暴动时只注意暴动的技术准备。接着这位同志指出：“与此相联系的是无论如何要立即举行暴动的问题，建立青年共产主义政党的问题，等等。”最近的一封来信就是这样说的。

沙茨金：但这不是中央^①的意见。

牛曼：中央对此进行过斗争。

布哈林：这位同志写道，6月份在汉口打算举行武装暴动。他逐字逐句地说：“但是我们不能在城市里举行暴动，这不仅是因为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因为没有任何工人群众阶层，哪怕是很小的阶层跟我们走。”接着这位同志描绘了现时的形势并写道：“恐怖主义情绪笼罩着越来越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阶层，当强制手段和恐怖手段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时，像电车工人罢工期间所发生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另一部分工人反对罢工，工人们不去参加会议，但罢工毕竟还相当齐心协力。在我们这里像‘机器破坏者’等的那种情绪占了上风”。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在十一月提纲中提出对黄色工会领袖采取恐怖手段和捣毁粮铺的要求，作为举行暴动的准备。最后，这位同志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结论：“要找到使已经脱离群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我党部分党员重新面向群众的杠杆”，也就是说，他指出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确实存在着裂缝，“这是很困难的但毕竟可以解决的任务”。我甚至准备作出这样的让步：就让这种情景有50%不符合实际情况吧。

牛曼和罗米纳兹：这是100%确实的。

^① 指中共中央。

布哈林：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在讨论和表述我们的策略时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罗米纳兹：是的，如果完全放弃暴动的话！

布哈林：同志们，我认为，如果这些事实是确实的，而你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么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在遭到失败以后和多多少少由于失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我们党和群众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缝。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哪些主要口号呢？“更接近群众”，“争取群众”，“说服群众”，“在这种宣传工作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以便组织胜利的起义”？这样做对不对呢？如果说这样做是对的，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罗米纳兹同志说，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所以他未能谈这个问题。

现在来谈谈**武装暴动问题**。我看了罗米纳兹同志的讲话稿，我认为，其中不是都正确的。为什么我要批评罗米纳兹同志的讲话，而不批评他的提纲呢？因为在他的提纲中有些东西是经过粉饰的。我完全同意中心的策略口号是武装暴动的口号。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的，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允许庸俗化的。我肯定地说，不存在统一的中国，从而也不存在统一的中国革命。因此认为整个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既正确也不正确。运用到某些省里是正确的，运用到别的一些省里则是不正确的。你们可能会说这是矛盾的，但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或许经过几个星期以后，在一些地方会刻不容缓地提出武装暴动和组织武装暴动的口号。这是不是说，在别的一些地方这个口号也是刻不容缓的呢？丝毫不是。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某种特殊性所在，这种特殊性因此也不是延续一年，而可能是几年。一个省里的革命形势可能影响到其他省，这是不言自明的。对革命的失败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心的政治口号是苏维埃政权口号，而策略口号是武装暴动口号。但另一方面不能说：要么是武装暴动，要么是工会工作和同盲动主义

的斗争。

罗米纳兹：这是在哪儿说的？

布哈林：这不是您说的，而是根本否定暴动的另外一些同志说的。有些同志说，不要暴动，而要进行细小的工作，但我们说：细小的工作是为了暴动的需要。

牛曼：完全正确！

布哈林：在这一点上，我批评的不是您。依我看来，现在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确实认真地提出暴动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出暴动的准备工作问题。列宁早就这么说过。可以非常激烈地谈论暴动，但是如果你不做准备，那等于你实际上反对暴动。

牛曼：佩佩尔！

布哈林：就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您在提纲中说，我们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

佩佩尔：这是按罗米纳兹同志的方案做暴动准备的。

布哈林：那里说，“对付工会中的国家官吏采取恐怖手段是正确的，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这场斗争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广州的例子）。

我们原则上不否定个人恐怖。我们甚至认为，个人恐怖行为对于运动来说是合理的和有利的，但是这应在暴动前夕和暴动期间，而不是在暴动的准备阶段。这一点应当加以区别。特别是出现这样的形势，即我们的同志还不善于说服群众时，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承认，那么提出个人恐怖的口号就会把整个工作转向错误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说：不要采取任何个人恐怖行为，即使是合理的也比不采取好。这是与争取黄色工会的策略、与瓦解黄色工会的策略相矛盾的。而如果这在中国已习以为常，那就要跟它作斗争。

在群众性的暴动期间，对黄色工会成员不采取各种说服手段是错误的。请扪心自问：难道这与强制罢工没有联系吗？当然是有的。对于一些胆大勇敢的同志来说，没有再比枪杀一个工会官吏更容易

的了……^①

罗米纳兹：在广州有 5000 人聚集在工会大楼周围。

佩佩尔：而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只有 5 个人？！

布哈林：不过举这个例子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在策略上应该把党和工人们引到另一个方面。这里可以抽象地说，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是合适的，但目前在中国这样做在策略上是否明智，我还有异议。那里这样做既没有合适的条件，没有合适的时机，也没有合适的环境。因此，准备工作的问题，工会工作的问题，把经济罢工变为政治罢工的问题，组织工会的问题，这都是重要的，甚至还应该考虑一下罢工的正确领导问题。例如，您是怎样表述工会的组织问题的呢？提纲中说：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参加工会的基层支部。就是说，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这里不是说，也可以吸收共产党员参加这些组织，而在工会提纲中说：也可以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工会。这样说来，现有的工厂委员会无非是我们的党支部了。而您自己说，这不太好，这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是工会组织而是党支部了。罗米纳兹同志，您应该懂得，只要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有 5、6 名共产党员，那么这个委员会就已经成为委员会支部了。这本来是清楚的。这样来“纠正”路线是根本错误的。瞧，现在整个情景就是这样：个人恐怖（这还可以从大规模恐怖方面来进行解释），共产党工厂委员会，不太有力地跟强制罢工斗争，等等。这是对共产党策略的一幅讽刺画。我可以断定，提纲是一些讽刺画家起草的。如果两个人说同样的东西，那么他们说的毕竟不一样。还可以这样变个说法：在不同的情况下说同样的东西，得出的结果却不是一样的。现在中国的形势怎么样呢？我深信，情况是这样：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面向群众。在别的时候看上去可能是合适的东西，那么现在如果它在争取群众方面是个阻碍因素，哪怕程度很小，也必须抛弃。如果你们以为，枪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杀一些工会工作人员，你们就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广州暴动因为烧毁了多少多少房子就壮丽辉煌，那就错了。

总之，要同所有否定暴动口号和哪怕稍微倾向于否定暴动口号的人进行有力的斗争；要同所有把细小工作问题与暴动问题对立起来的人进行有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要使全党面向群众，消除一切必然造成以强迫工人取代说服工人的做法。强制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我们对工人也可以采取强制的办法，但只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行专政的时期，如果工人队伍中出现各种分歧，有些工人阶层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话。如果在夺取政权以前对工人采取强制的办法，那就应该敲起警钟，使任何人再也不敢这样做。如果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评价形势的话，那么这是极重要的教训。在这种评价的范围内应当说：我们的所有组织都要面向群众。

关于广州和广州暴动的教训说几句。有些同志激烈反对佩佩尔，然而他说的东西中有许多是正确的。牛曼报告的主要论点是，似乎广州失败只是由于军事技术上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分析形势，是根本错误的。说我们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胜利的暴动，这是对的。

牛曼：开始时暴动是胜利的！

布哈林：牛曼同志在同我的谈论中承认，暴动是胜利的，因为它没有遇到抵抗。我对您说，城里没有敌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夺取了城市。敌人的主力部队不在城里，因此夺取城市在军事技术方面说是可能的。下一个问题来了：这是不是盲动呢？

不是的。总的说来，是否具备举行暴动的社会基础呢？是的。然而，是否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胜利的暴动呢？没有。讨论中人们举出有3000到10000人，但毫无疑问，真正的总罢工却没有。

牛曼：当然没有。

布哈林：怎么这样呢？我们举行武装暴动，而事先没有组织总罢工？这样做对不对呢？

罗米纳兹：难道永远需要一个模式？

布哈林：依我看来，我们这里的形势很接近 1923 年汉堡的形势^①：技术上有所准备，政治上准备不足，政治组织上准备不足，过分片面地从军事政治意义上去理解。这可以根据中国以往的运动史来解释。人们总是算计各个军、各种军队等等，而对政治因素估计不足，没有考虑把这两个因素相应地结合起来。情况就是这样。我讲这些机器工人不是偶然的。他们不是中立的。

牛曼：孙逸仙发动起义^①时，他们也反对他。

布哈林：孙逸仙不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我们没有使这些机器工人中立。我们没有把广州的运动与农民暴动协调起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牛曼：请您证明怎么没有社会基础。

布哈林：群众这个概念，正如列宁早就教导我们的那样，也是在改变的。例如，列宁曾教导我们，起义是一门艺术，在起义时要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在很大程度上敌人的优势兵力也是在纯军事方面的^②。广州是否有这种巨大的力量优势呢？

牛曼：是的，在广州，积极的、有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有这种优势。

布哈林：现在来谈谈组织准备不足的问题，时机选择的问题。我认为佩佩尔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认为，佩佩尔同志正确地提出了工人与处在改良主义者影响下的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他的功劳。他提出了关于某些组织问题和强制罢工问题的许多正确意见。这是他的功劳。可以说，这是“孟什维主义倾向”，从文献和虚假论据的角度看，可以证明这一切，但不是从现实的角

^① 指哪次起义不详。

^② 见列宁：《危机成熟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267—268 页；列宁：《旁观者的忠告》，同上，第 374—375 页。

度看。佩佩尔估计的错误在哪里呢？在于：第一，不能清楚地理解，根据他的意见农民运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他又是如何估计这个问题的数量方面的；第二，他试图向政府当局提出虚假的口令和最低纲领口号，这可以解释为废除苏维埃的口号。

牛曼：孟什维主义！

布哈林：在我们的队伍里，用孟什维主义这样的字眼来进行论证是愚蠢的。也可以谈牛曼在1923年所犯的孟什维主义错误，那时您不是在布兰德勒那里吗？或者谈洛佐夫斯基同志在十月起义时的错误。但是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谈这些有什么用呢？可以“逻辑地”延伸任何一个错误并得到“孟什维主义”的帽子，但那时就不能进行讨论了。您希望进行这样的讨论吗，我可不希望。

依我看来，上述两个错误是佩佩尔同志的主要错误，但是他也有功劳，那就是他非常清楚地分析了问题的其他方面，可以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不同意，但在这些问题上他是正确的。我认为，也不能这样提问题：牛曼是马克思主义，佩佩尔是普列汉诺夫主义，就像有些文件上说的那样。在啤酒铺里或者在学生们的小酒吧里可以这样来进行论证，但对于严肃认真的人来说，这有点儿可笑。

牛曼：我认为佩佩尔同志的观点是普列汉诺夫主义。

布哈林：佩佩尔回避武装暴动，这是不对的。佩佩尔从来没有下过类似的断言。谁要断定不该拿起武器，谁就会散布这样的思想，谁就会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想要讨论一下，武装暴动的时机选择得是否正确，这种想法不能称之为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应当说，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广州暴动应负的责任不比牛曼或任何别的同志小。但是，如果我不说出自己的疑虑，那我就是卑鄙小人，因为我本人也在这里起了作用，而遗憾的是这里的人是按小市民同志式的样板组合的。

难道不能这样来提出问题：在采取暴动方针时，稍微等一等或做一些以下工作不更合适吗？这些工作是：在改良主义工会拥护者

中间进行更广泛、更有力的工作，做总罢工的准备工作，在广州周围的农民当中进行更广泛、更有力的工作，至少报告给党中央，让青年组织的中央知道这件事，以便立即得到中国其他地方的支援，当然不是以武装暴动的形式，而是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其他手段。

军队中的准备工作（大家都知道军队中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根本没有做。

牛曼：当然做了。部队曾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布哈林：至于敌军中的工作，可以说根本没有做。你们在敌人军队中有多少支部啊？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反对拖延暴动时机则只有一个论据，那就是我们即使不举行暴动也会被打垮的。我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本人也有过动摇。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一种情况是，我们在武装暴动后，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两天后遭到了失败，而另一种情况是，没有经过斗争就被打垮了。然而我认为，尽管这个论据也很重要，但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本来就应该在上海举行暴动，正如当时季诺维也夫建议^①的那样，以指望西欧无产阶级来支援我们。这个论据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于广州，我应该作如下的说明：我在分析问题时尚依据我们现有的情报。我看了许多有关广州的情报资料。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未能加以判断，所以我认为，在未做一些准备工作之前，我们本应等一等再举行暴动。

最后我要说：在中国应该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武装暴动。中心口号是武装暴动，而政治口号是苏维埃政权。组织武装暴动的问题应该是特别重视的，但决不能把武装暴动的口号当儿戏，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工会工作，说服群众的

^① 指1927年4月13日Г. Е. 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1927年四月全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提纲》（见全宗17，目录2，卷宗284，第44—45、55页）。

工作，同一切取消主义倾向和所有想以别的口号来取代暴动的人作斗争。一方面要同恐怖主义和盲动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同机会主义和普列汉诺夫主义作斗争。按真正准备暴动的方针来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运动。开始时，我们可能只是一些孤立的暴动，然而随后可能会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暴动。暴动的准备工作，为暴动进行的细小工作，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向我们党提出这个建议。

布哈林：(结束语)^①：

我不能详细地回答所有问题。我力求粗略地分析一下罗米纳兹、加拉赫尔和牛曼同志对问题的各种提法。

第一个初步意见：为什么我不援引文件，而首先援引讲话？难道这样做不是某种不忠实或不对的吗？依我看来，我们不应掩饰问题，而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应该以最明确的方式揭示每一种思想。为了弄清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们应该倾听反对者的全部声音。

比方说，牛曼和罗米纳兹同志也从佩佩尔同志的讲话中援引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地方，而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攻击对象的地方和词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罗米纳兹同志不对这种方法提出异议？

罗米纳兹硬说：中国党犯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的余毒还留在党的知识分子上层领导身上。这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集中表现为一种倾向，即把暴动口号化为乌有，掩盖、撇开这个口号。罗米纳兹认为，我没有以应有的激烈程度来谈论这一危险。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我没有用很多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这是对的，而说我不够明确和激烈的谈论这个问题，那并非如此。我必须同表现出反对暴动方针倾向的每一个集团和每一个人进行斗

① 结束语未经审阅（文件原注）。

争。我认为，应该区别讲话的场合：我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讲话有所不同，而在委员会里讲话又有所不同。我认为讲话的前提条件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论点的地方，在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的地方，我就不必用激动人心的语调了。当然，我可以这样说，广州是个伟大的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等等，但我不认为，在像我们这样的会议上有必要这样做。

牛曼：这可是客观真理。

布哈林：这是对的，但我对此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至于说到表述的明确性，那我是足够明确的了。您还要我怎么样呢？暴动的方针是站得住脚的，暴动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时期发生的，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都将产生影响，等等——这一切都是很正确的，这一切都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非常列宁主义的，但我不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地来谈论这些公理。关于中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危险是经常谈论的，就此通过了各种决议，在我们批评的压力下，党已经纠正了自己的路线。我们的代表带着我们的口号，带着我们的指示曾经呆在那里，就是沙茨金同志（他是右倾问题上的“最大权威”）也在我们的代表大会^①上认为，共产国际及时地纠正了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错误。总之，这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没有必要再对此进行争论。我们在这方面有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不想对它加以评论，而只想以十分明确的方式来证实它。但是，困难不在于此。还有各种各样的倾向我们没有进行议论。重要的不是在每次会议上重复早已众所周知的东西，而是揭示和研究新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造成不再发生新的失误的局面。在我们起草的提纲中，我们将来分析这个问题，重

^① 指 J. A. 沙茨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报告（布哈林的报告）时的发言（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速记记录》第1卷，莫斯科1961年，第722—729页）。

复我们早已说过的一切，再一次来分析右的危险，谈论过去的方针，谈论这些危险的残余，等等。我不反对在提纲中着重强调这一切，但一次又一次如此频繁地来讨论这些东西，是不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意见，因此我认为，我不再来谈论这些东西是对的。

在中国大失败以后是否存在某种革命蜕化变质的危险呢？是的，我认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这不是一种新的危险呢？是的，我们是否已经讨论了呢？没有。我们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拿对工人采取强制方法的这些“小事”来说吧！我们什么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呢？从来没有。这件事是在我们讨论过程中第一次知道的。我乐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党内不是普遍规律，也不是广为流传的。这是可能的。虽然我不能担保说，这些事情在那里占多大比例。至于实际情况，我们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报。但是这些事情是否具有征兆性的呢？是的，是很有征兆性的。能否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遭受一系列失败后，革命运动开始出现蜕化变质和瓦解呢？决不能排除。在1905年后，在同普列汉诺夫进行斗争后，我们同召回派^①进行了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分裂。以后又同取消派^②进行了斗争。谁能提出这样的论点，说只有右的危险或者只有左的危险呢？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我们出现过左的危险，然后又出现右的危险，起先与召回派分裂，然后又同取消派作斗争。当然，我们在同召回派作斗争时也同形式主义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在评价形势时，我们应该从事物发展的具体进程出发，至于事物的这个具体进程，那么所有同志，包括罗米纳兹和牛曼都承认，在我所援引的那封中国来信中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是最具有征兆性的，而既然我们是第一次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事实又很有典型意义，我们就应该集中批评这些事实。在其他的一些错误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

① 见第197页注②。

② 见第197页注③。

集中火力了。所有老问题已经都弄清了，而新问题却不是那么清楚，新的危险植根于中国失败后形成的特殊形势中。从我们方面说不断重复以前的东西，而不着重强调这些新的问题，那是绝对错误的。

这是绝对错误的。罗米纳兹同志说，我没有谈到佩佩尔关于自治的口号，这个口号看来应该替代苏维埃的口号。我并不感兴趣，是谁提出这个口号的。我只抓住问题的实质，并说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应该同它作斗争。如果你们想要详细的论据，我可以提出来。它为什么是不对的呢？因为中国现在的斗争要比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斗争激烈得多。斗争具有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至于两个阵营——革命和反革命——彼此都竭力想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不能指望在中国会扩大合法工作的范围。如果说像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所表述的这类希望在俄国都没有实现，尽管我们那时合法工作范围有所扩大，我们有合法出版的《真理报》，有一些合法的机会，多多少少有合法的工会、俱乐部等，那么在中国，问题就尖锐得多，从这个角度看要糟糕得多。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我也这样说过。我要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我恰恰把那些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提到首要地位，我认为我是对的。

关于革命的性质问题说几点意见。罗米纳兹同志为了反驳我，援引了列宁的话，即列宁和加米涅夫的争论。但这个例子是不对的。1917年2月俄国整个局势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次革命的焦点在哪儿呢？在于两个政权并存。罗米纳兹同志在这里作了一些暗示，意思是布哈林把问题看得过于抽象了。列宁说，生活要比灰色的理论更丰富多采。列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这番话的呢？他说这番话是与这样一个论点联系着的：加米涅夫及其志同道合者不理解俄国局势的特殊性，这里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两个政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不外乎工农专政的第二个政权。因此，列宁在同加米涅夫的论战中，在分析了关于政权这个问题后说，加米

涅夫是错误的^①。在中国有没有两个政权呢，在中国有没有这种特殊的形势呢？是否可以把列宁的话用于中国的事变呢？是否可以把列宁对俄国二月革命后形成的局势的评价用于今天中国的形势呢？生活确实要比灰色的理论丰富多采得多——这句话我应该用来反对罗米纳兹同志。我也可以回敬他一句：罗米纳兹同志，提出这样的论据使我感到很失望。

其次，列宁同志还有另外一个意见。他肯定地说，我们在俄国农村，在建立乡村贫农委员会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说，土地革命不是件小事，它也是中国发展的轴心。正是这一点要比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更加导致了我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分裂。建立贫农委员会也可以说是向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迈进的一大步，它是对农村革命进行另一种评价的基础。这些论据和列宁的引文恰恰是反对罗米纳兹的，而不是反对我的。

罗米纳兹的另一个论据这样说：既然中国现在进行的革命是消灭封建主的政权并继续向前发展，不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前景，而其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么——罗米纳兹得出结论——革命的这个阶段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罗米纳兹同志极其生硬地从革命的实质、形式、动力和社会内容等方面来阐述这一论点，并一口咬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因素。这是白纸黑字写在速记记录上的。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马尔丁诺夫同志当年说的自然就对了，他说这个论点应当这样说：既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既然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前景，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不能把二月革命阶段和从2月到7月的阶段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样一来，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的全部差别就根本失去意义了。因为假如事情真是这样，既然我们在中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和

^① 列宁：《关于策略的信》，《列宁全集》第5版第31卷，第139—144页。

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的最初步骤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步骤，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了。

牛曼：没有人这样说。

布哈林：没有人这样说，但这个结论是从这种评价中逻辑地得出来的。在伟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它的最后环节，你们如何从这些阶段的角度来评价现时的形势呢？

但是对于这些因素不应这样来理解，像牛曼同志那样以“纯文化”的形式来进行分析。他说，这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从座位上喊道：难道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吗？

布哈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否会出现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倾向呢？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国家政权形式。我在一年半以前就说过这些问题，并作了以下表述：中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小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没收大企业，但光是这一点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①。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如果小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实行某种没收，那这种做法自然不是典型小资产阶级的，而是独特的。那时我说，在我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情形，但在中国这是可能发生的。这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事态的整个发展进程是这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征兆。我们在这里听说，沙茨金和罗米纳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就连沙茨金同志也觉得，这个论据没有切中要害。

沙茨金：我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罗米纳兹的意见。

布哈林：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了您的观点。转变的过程

^① 指布哈林在1926年11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0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第1卷，第90页）。

是存在的。我们只能这样来表述问题。我们不能像罗米纳兹同志那样,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他的第一种说法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业已结束的过程。他的话只能是这个意思,但这是绝对错误的。

罗米纳兹同志硬说,佩佩尔同志在关于苏维埃问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上修正了共产国际的立场。罗米纳兹同志的这个论据不是很成功的。他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就是这样说的,因此佩佩尔在这个问题上修正主义者。为了证明,您援引了提纲中的话,那里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①。

但是,罗米纳兹同志,您肯定知道,共产国际自己修改了对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的这种看法,修正了提纲中的这一错误^②。罗米纳兹同志从来未同意新的表述,现在也不同意。

罗米纳兹:佩佩尔曾反对过这个表述。

布哈林:这样说来您是站在您所根本不同意的观点上了。这是一个错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来谈谈中国两种可能的发展道路。只要提出一个论据就足够了。罗米纳兹同志说,8月份我们在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而现在我们只有一种可能了。不过,您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在中国有两种发展道路的问题。您问道,哪种道路最可能呢。您回答说,最可能的是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罗米纳兹在8月份所持的立场和现在的立场,没有原则性的差别。

谈谈阶级力量的配置问题。这里罗米纳兹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

^① 看来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5月30日)》(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30页)。

^② 见《在困难的转折点上——从国民党到苏维埃》,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27年第41期,第67页。

的问题：一个是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的问题。

场内有人喊：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布哈林：宇宙中的所有分子都是相互联系的，甚至天文学同香肠厂也是相互联系的。

我认为，这是个大错误。罗米纳兹同志在重复鲍罗廷对阶级所作的机会主义评价。鲍罗廷说，中国没有阶级，而只有阶级的轮廓^①。罗米纳兹也说阶级的轮廓。

我再重复一遍：这里有两个问题：说资产阶级相对说来比无产阶级软弱些，这对不对呢？对的，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基础是整个工业，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不是掌握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里。早在两年前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在中国，由于情况特殊，由于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特殊，民族资产阶级的破产——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是非常可能的，这对不对呢？这也是对的。我们能否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与时间和空间相适应地说，要比例如英国、德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甚至俄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小得多呢？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我们已经成千上万次地说过和确认过。在这一点上绝对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如果您把这个问题与资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问题混淆起来，那您就错了。正因为在中国，我们遇到了比在欧洲软弱得多的资产阶级，由于它没有更长远的前途，由于在中国情况特殊，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完成一些发展阶段的速度就快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证明的。您说，我的这个论据，即资产阶级曾经领导革命，随后就转到血腥的反革命

^① 可能是指 M. M. 鲍罗廷说过的一句话：与上海的资产阶级不同，它“已经是自为的阶级”，而“中国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 2 卷（1926—1927）第 2 册，第 705 页）

阵营中去，没有任何意义。接着您还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彻底消灭封建主义残余，而资产阶级放弃了这一切。怎么可以认为它是具有阶级觉悟的资产阶级呢？罗米纳兹的这个说法是最糟糕意义上的极端抽象的议论。不能离开政治形势，离开阶级斗争，离开其他各种东西。资产阶级放弃自身利益了吗？丝毫没有。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它和封建主走在一起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但这是它的唯一出路。它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呢？没有。如果一个阶级处在这样的境地，它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选择唯一可能自救的出路，那么难道这个阶级随机应变变得不好吗？依我看来，它随机应变得很好。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它是不是因此出卖了自己的利益呢？没有，恰恰相反。不能说资产阶级会选择它所没有的出路。这是抽象的议论。它随机应变得好不好，它是否像一个有觉悟的阶级那样活动，或者说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阶级观点出发应该怎样随机应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现有的最好的出路。所以，说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在所有革命中都看到（这一点您也承认），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是资产阶级进行，而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进行的，尽管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本身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所以，当你提出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时，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和政治。不能把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统治时间的长短问题与它的阶级利益问题混淆起来。

现在来谈谈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反动派的联合问题。这里罗米纳兹和牛曼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首先，我们说的是反动势力的联合问题，其次是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上是否可能出现反动派的联合呢？是的。但这是不是说，在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形势下，反动派的联合就不可能呢？我认为不是的。实际上我们在中国正好有这种典型的例子。同志们还把这个问题同第三个问题，即革命本身的规模问题混淆起来了。罗米纳兹同志的

论据，他的战略大致是这样：如果你说反动派联合，那就是否定革命的规模。因此，你们拿革命的规模作为出发点，在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时，就认为可以证明，在反动派阵营内没有联合。然而应该证明的恰恰是这一点。您说，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划清了界限，所以在无产阶级阵营中出现了很大的高涨形势，造成了发展的很大可能性，制定了更加正确的口号，即与农民结成联盟，等等。这是对的，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们说，如果资产阶级反动派还依附封建反动派，那么从数学上说，等于反动派加强了，但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对的。

有时从数学上说是不够的，但不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牛曼：随着革命规模的扩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否会增长呢？

布哈林：我们谈的是反动派、反革命集团的力量。您是否可以断定，由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也依附于封建主，反动集团就被削弱了呢？请公开写上这一点吧！

牛曼：这是一个并非孤立的问题。

布哈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但是是一个矛盾发展的问题。为什么革命只能这样发展，即发展规模总是只存在于一方呢？有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有另外的情况，即双方同时都加强。您能否否认这一点吗？

牛曼：绝对地说它们都增强了，而相对地说它们都受了损失。

布哈林：现在中国局势的特殊性就在于，一方面是没有发生使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的事变，另一方面是存在着反动阵营，而且这个反动阵营得到了增强。我们已多次指出确有这种情况。

罗米纳兹：但这个反动阵营是四分五裂的。

布哈林：为什么您提出“或者—或者”的问题？如果您对比一下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如果您分析一下反革命集团中的内部斗争和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中整个集团的力量力的话，那就没有这种两者择一的问题。这是实际情况。生活又一次显得比罗米纳兹和牛曼的

灰色理论更丰富多采。罗米纳兹同志强调说，反革命力量的团结使斗争尖锐化了。这是对的。但这是第四个问题，它又是不能与上述三个问题混为一谈的。难道我说过或者提出过，似乎工人阶级从自己方面说不会使斗争尖锐化吗？没有。方针还是要举行武装暴动。如果把这一点作为这样的论据，即不存在反革命势力的联合的基础，那是错误的。如果你们想把反动派联合问题表述得更确切，那就请便吧！如果有些同志把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状况问题与整个反革命集团的力量问题混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罗米纳兹：它们不可能是统一的。

布哈林：但统一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平行的行动，另一种是根据制定好的计划行动。可能反动集团没有制定好的用来反对工人的行动计划，但是在它那里思想上和体力上的平行力量是存在的。这使人们有根据说，旨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已经增长了。

罗米纳兹：但在这反革命集团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阵营，它们是四分五裂的。

布哈林：但是反动派的力量是由于建立了集团才增长的，而如果它们又是统一的，那么这些力量就更大了。

沙茨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阵营，这个阵营力量的加强能否将其内部的分裂状况化为乌有呢？

布哈林：若是在广州大门口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李济深和张发奎公开互相争斗起来，那么可能会是这种情况。

牛曼：有这种趋向。

布哈林：我是说事实，是说某种完全确实的东西，即旨在反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集团的力量增长了。

其次，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数量方面的问题。罗米纳兹同志就这一点说，列宁做得对，他在俄国运用了数字，但在中国没有可能进

行估算。我自己也说过，像在我国那样的统计工作，在中国是不可能进行的。总的说来，列宁也不是进行全面的估算。这些估算我们也只能是相对的，只能从相对地加以证明的角度出发，但罗米纳兹把问题强调到在中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估算的地步。他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数量方面。他可能会说，关于中国的数字资料都是不准确的，他没有材料，许多数字都是不正确的等等。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他说，根本不可能进行估算，那他是夸大了。

罗米纳兹：我是说，在中国，不可能像在欧洲那样进行估算。

布哈林：但是您在中国就连中国式的估算也没有进行啊！关于广州我不再说了。

罗米纳兹同志说，我的策略方针大体上是正确的，我是根据问题的各种不同提法制定整个体系，制定新的策略方针的。这里我可以说：“或者—或者”。或者我选择了另一种策略方针，那么我的总的方针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或者您遵循的是另一种战略估计，因此您反对我的方针。

罗米纳兹说，除了我对个别一些问题如个人恐怖行为，广州等等的立场以外，我的方针整个说来是正确的。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他忘记了自己关于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论点，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他错误地从一些策略问题的总的联系中抽出了恐怖行为问题和广州等等。

我们现在不仅遇到了广州暴动和其他类似情况，因此我认为，在一起最后制定的提纲中——这一点我在发言中已经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只谈广州问题。我们的任务要广泛得多。

牛曼同志提出一个论断，似乎广州暴动要比维也纳暴动^①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原则上说广州暴动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从

^① 可能是指1927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这期间工人和宪兵发生了武装冲突。

数量方面说，维也纳暴动具有更大的意义。维也纳——这是整个奥地利，而广州则只是广大中国的一个城市。

牛曼还写到恐怖问题，也对这种危害性估计不足。但是使人不能不担心，将把恐怖问题与强制问题，与我们不去说服群众的问题，与佩佩尔同志说的毫无准备的暴动问题完全脱离开来单独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不能从总的一系列问题中抽出来的。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再说一遍，根本反对恐怖行为比起倾向于承认个人恐怖行为并将这种说法付诸实施要好上一千倍。

“要更接近群众”的口号是准备暴动时最重要的口号。如果说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消除妨碍我们这样做的一切因素。加拉赫尔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布哈林说，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但随后举出一些论据，证明广州暴动还是盲动。如果你们说，只能是盲动，或者是顺利进行的暴动，那么加拉赫尔是对的。但是依我看来，还有第三种类型的暴动：不是盲动，而是这样一种暴动：有社会基础但不够广泛，时机选择得不对，群众不积极参加，因而遭到失败。

场内有人喊：为什么时机选择得不对？

布哈林：罗米纳兹同志说什么，布哈林是把问题看得过于机械了。我说的是总的形势，是农民，是士兵中的工作。难道这过于机械了吗？我从一位中国同志那里得到一些资料：如果资料不准确，同志们可以纠正它。我说，我们关于广州暴动的资料可能是不够的。我说过，我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

一位中国同志给了我这样一份表格：参加暴动的人数：投诚过来的士兵 2000，释放的犯人 800，武装的农民 1200，党员 1800，加上共青团员总数大约 7000 人。

牛曼：这是与参与政变的人有关。

布哈林：我问过同志们，广州有多少有组织的工人。他们回答我说：20 万人。牛曼同志在今天的会上说，参加暴动的是 1 万人。这样说来，20 万名有组织的工人中只有 3000 人参加了暴动。

牛曼：这只是参加武装暴动的人。后来有几万人参加。

布哈林：整个运动包括罢工，街头示威游行，街垒战，构筑街垒以及其他各种发动。没有举行总罢工，我们也就没有触动广州的20万工人。我说的又只是根据现有的情报。如果这些情报不确实，那我愿意改变我的立场。

牛曼：您是把赤卫队和工人群众混淆在一起了。

布哈林：参加暴动的不仅仅是赤卫队。牛曼同志把赤卫队看作是暴动部队的组成部分。我怀疑，是否很好地完成了发动群众的任务。

牛曼：下面情况可以作证明：到处都悬挂着红旗，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工人们为战士供应食品，等等。

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所犯的很大的孟什维主义错误是什么呢？是在两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有一次说，不能允许玩武装起义的游戏。这就是根本拒绝起义。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论点是说：不要起义，而要工会工作^①。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主义。而像罗米纳兹和牛曼同志这样断定，凡是说或许应该再等一下和选择另外一个时机的人，就是站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上，这也是错误的。

现在来谈谈对暴动的总的评价问题。牛曼同志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变，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运动的最高形式等等，这样说对不对呢？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在决议中是否应该这样说呢？当然，我们也应该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比方说在群众大会上也这样说呢？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假如我们在群众大会上也像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这样说，那么这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不过，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文件，在暴动后我们立即发表了宣

^① 见列宁：《俄国的当前形势与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第176—177页。

言^①，其中谈的都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我们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谈到如何进行有利于广州的宣传等。但是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是从错误中学习呢还是只讲广州的世界历史意义呢？为了保持平衡，我们首先应该谈我们的错误。至于我们没有出路的理由，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说了。这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还谈到与上海平行的问题。谁也没有证明，我们在广州能够等一段时间，稍晚一些时候再发动，会赢得更多的东西。

牛曼：应该对卫戍部队进行猛烈扫射。指挥部曾作出这样的决定。

布哈林：我不知道，卫戍部队是否真的遭到射击，这件事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应该如何从数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依我看来，我们应该忍耐一下，选择另外一个时机来举行暴动。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我们在俄国没有举行起义，尽管我们的赤卫队被缴了械。何以证明我们无论如何应该不顾一切地蛮干呢？1917年7月时我们没有举行起义，而进行了武装示威游行^②。我们遭到了失败，我们说，反革命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毕竟采取了起义的方针。我们一部分赤卫队被缴了械，一部分保留了武器，一部分武器藏起来了，等等。

牛曼：在广州，力量对比情况不同：在那里我们有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

布哈林：说到广州，我们应该在正在起草的决议和我们的整个宣传中经常强调暴动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围攻任何普列汉诺夫式的说法。但是我们应该对中国党说，在决议中还应提到，我们应该从所犯的错误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当然，不能说暴

^① 宣言发表在1927年12月15日《真理报》上。亦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45—146页。

^② 指1917年7月4日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武装示威游行。

动整个说来是个错误，但应该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得出某些结论。

要更多地注意暴动的准备问题，各种形式的准备问题，要更多地注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行为的配合，所有党组织和所有工人支部的相互通气等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决议中也可以说；这是暴动的教训之一，当然不是最主要的教训。如果你们说，主要的教训是：广州暴动证明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可能的，工人是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那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是我认为，任何争论只有在我们完全诚心诚意地分析各种错误和缺点，以便今后不再重犯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和适宜的。正面的东西——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应该加以强调。但是我们不能重复一般性的东西，不会引起意见分歧的东西。首先应该阐述有争议的和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的东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33，第 1—27 页。

打字稿，副本。

54

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

1928年1月^①于莫斯科

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 中国的经济形势

作为对中国经济形势评价的初步意见，应该指出，虽然我们掌握了外国文献和俄国文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材料，但我们还不能对中国的经济作出哪怕是建立在大致的统计资料基础上的全面阐述。有关我们感兴趣的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大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准确统计性的。然而，即使这些材料也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出较为正确的描述，特别是有可能对中国现时的形势作出正确的描述。

外国资本的作用

外国资本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因素。所有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下述材料可以证明这一情况。

冶金工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拥有中国最大开采铁矿的大冶铁矿（武昌东南15公里处，长江右岸）和汉阳炼铁厂，资本为5500—6000万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标明的。

墨西哥元，100%属于日本。占有这个公司的办法是提供借款。应该指出，支付这笔借款的利息不是现金，而是矿砂，它由 Imperial Iron Works^①（日本政府铸铁厂）经营。

第二大炼铁企业是沈阳附近的鞍山铁矿，也属于日本。

总的说来，冶金工业 90%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煤

在投入采煤工业部门的一亿墨西哥元中，50%属于外国资本。在年产 2270 万吨煤中，50%是开滦煤矿（英国）和抚顺煤矿（日本）开采的。

结论：采煤业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

运 输

七分之六的铁路是通过借款和租让利用外国资本建设的。

水路运输三分之二掌握在英国和日本手里。

银 行

掌握中国金融命脉的是香港—上海的财团——英国银行，它不仅是英国金融资本的主要代理人，不仅是在中国分配英国贷款的主要渠道，而且它把中国政府的主要集中收入掌握在自己手里，如盐业垄断（每年 9900 万墨西哥元）和海关关税（每年约 8000 万墨西哥元）。

中国货币流通中具有通货使命的银元市场的调节也掌握在这家银行手里。

① 英语：帝国铸铁厂。

轻 工 业

应该指出，在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所首先向往的纺织工业也有 50—55% 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绝对数字显示如下（《大阪每日新闻》1927 年 12 月 18 日）

国别	开采量 ^①	纱锭量	机床量	在业工人总数
中国	73	2098000	13757	138000
日本	42	1479000	13981	79000
英国	4	205000	2348	16000
总计：	119	3382000	30086	233000

在纺织工业总投资 28800 万墨西哥元中，外国资本为 15102 万墨西哥元，占 52.4%（林达开：《中国工业与金融》，1927 年 8 月中国政府经济情报局出版）。

然而应该注意到，实际投资额要大得多，因为日本人对企业的投资往往以中国招牌作掩护。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危机

在评价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时，应从外国资本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出发。帝国主义在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难以置信的诸多矛盾，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取得巨大经济进展的。

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②，与改选前的中共中央在八月非常党代会^③上所作出的机会主义评价相反，试图以浓墨重彩描绘中国的经济形势，把它说成是灾难性的，描绘成资产阶级几乎处于绝境的崩

① 原文如此。应为：工厂数量。

② 见第 159 页注③。

③ 见第 83 页注①。

溃状态。毫无疑问，十一月全会过分片面地描绘形势，没有考虑到中国发展所遇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中国在农业方面正面临着深刻和漫长的危机。情况下面再来谈。至于工业和商业，我们现有的材料说明有局部的危机，但还不是某种灾难。中国封建-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争斗丝毫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封建-资本主义集团解体的过程和这些集团之间的争斗妨碍着这种发展，只是有助于资本原始积累形式的发展。战争，掠夺，农民破产，各派军阀的资本积累——所有这一切都是原始积累的过程。然而，中共中央在十一月全会上通过决议，根据政权落到军阀集团手里和这些集团之间发生争斗这些事实，得出中国经济面临灾难的结论，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以下几个数字可证实这样的看法，我们只面临暂时的危机。在贸易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商品流转在不断增长和中国市场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1913年的1.8%提高到1925年的2.3%（国际联盟资料）。

从以下数字中可以看出绝对增长数：

对外贸易总的流转量

（百万银两）

1913年 973

1923年 1676

1926年 1988

如果说对外贸易的危机，那么1926年作为进出口贸易主要渠道长江遭到破坏的一年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一年的贸易额却增加了。我们记得，俄国1913年的贸易额是25亿卢布，而198800万银两等于28亿卢布，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贸易额比1913年俄国的贸易额还多3亿卢布。

至于中国1927年的对外贸易，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认为它降低了50%，这是没有证据的。下面我们援引中国1927年贸易的数字，

是引自 1928 年 3 月 1 月《×××》^①：

1927 年海关总收入为 6868.7 万银两，而去年为 7831.3 万银两，下降 13%。兑换成英国货币，相当于 967.7 和 1216.5 万英镑。

满洲海关收入总额：哈尔滨、安东和大连提高到 73.4 万银两，而华北海关：天津和秦皇岛为 92 万银两，华南海关：厦门为 7.3 万银两，汕头为 25.5 万银两。相反，以下海关：牛庄降到 9.7 万银两（该海关在大连的压力下长期萧条——别尔津注），潮州为 2.6 万银两，汉口为 226.3 万银两，上海为 702.5 万银两，广州为 153.8 万银两。

海关总监指出，根据保证海关征收的各项义务，支付都是完全足额的。支付的总数为 6061.1 万银两（上一年是 5318.3 万银两）。

《泰晤士报》^② 写道：“很有意思的是，收入减少几乎都是在进口关税上，而出口关税的收入几乎与上一年持平……^③ 出口保持在原来水平上是因为军事当权者竭力减轻国内产品运输的负担，以便通过对这些产品的征税来增加收入，而进口的减少更多地是由于本国商人缺乏信心，而不是由于对国外商品的抵制。”（《泰晤士报》1928 年 3 月 1 日）该报在指出上海对外贸易下降时写道：“它的海岸贸易增加了”。然而，不管 1927 年初贸易削减的原因如何，这一事实对中国来说不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决不能从中得出中国经济“崩溃”的结论。

关于纺织工业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 1927 年上半年纱锭数量从 350 万减少了 7 万。这种减少不具有典型意义，不能证明有什么灾难。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15 年来纺织工业是不断增长的。数字如下（外国工厂除外）：

① 此处原文空缺。可能是《泰晤士报》。

② 《泰晤士报》是从 1785 年开始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

③ 此处及以下各处删节号是原有的。

1910年·····23家工厂	1922年·····64家工厂
1918年·····34家工厂	1923年·····54家工厂
1919年·····29家工厂	1924年·····58家工厂
1920年·····37家工厂	1925年·····69家工厂
1921年·····51家工厂	1927年·····73家工厂

通常中国的纺织企业平均每个厂拥有工人2000人,人员定额比欧洲要高。

中国工业的发展呈跳跃式,从危机到高涨,又从高涨到危机。上面引用的数字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指出,“各省之间以及某些省内贸易渠道的破坏和商业联系的中断”是灾难性经济形势的征兆之一。毫无疑问,1927年爆发的内战,特别是1926年的北伐,有些地方破坏了贸易联系,对整个贸易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联系的破坏是短暂的,尽管它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影响,但决不能断定说中国经济生活崩溃了。应该记住,中国建立统一国内市场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为许多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对其他地区的依赖性还很薄弱。遗憾的是,按区域来研究中国,即研究中国区域化的问题还没有被我们的中国学提上日程和加以阐述。尽管如此,这种区域化研究的尝试是可以进行的。可以将中国分为以下几个地区:

(1) **亚热带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省。主要产品——大米,蚕丝直接向国外出口。水路交通有:西江、东江、北江、浈江。有山脉与北部诸省隔绝;与北部的联系只能通过海路。

(2) **西南地区**——云南和贵州省。与亚热带地区接近。与中国其他各省的联系薄弱,因为这些省与四川、湖南和湖北隔着难以通行的山脉。云南和贵州省与缅甸和东京^①联系密切。

^① 东京系越南—历史地名——译者。

(3) **中部地区**——包括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浙江以及河南和陕西(后者通过汉江)的部分地区。主要交通是长江。

(4) **北部地区**。主要交通是黄河和铁路。它包括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省以及河南、绥远、察哈尔、热河的部分地区。

(5) **南满地区**。主要交通是南满铁路和京沈铁路。

(6) **北满地区**——中东铁路。它是北满的经济枢纽。

(7) **新疆地区**。它只与苏联和印度有经济联系。其主要城市乌鲁木齐与北京隔着70天的驼路。

因此,对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稍加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地区经济联系的中断不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工人阶级状况

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局部危机的征兆之一。近10年来,特别是1927年,罢工运动的发展说明,工人阶级正在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以下是几个很有意思的统计材料:

中国1918年至1926年期间罢工斗争情况

年代	罢工次数	参加罢工人数
1918	25	6455
1919	66	91520
1920	46	46140
1921	49	108025
1922	91	139050
1923	47	35853
1924	56	61860
1925	183	403334
1926	535	589585

1927年上海的罢工运动

月份	罢工次数	参加罢工人数
1月	17	24349
2月	40	87932
3月	20	31180
4月	22	30299
5月	没有统计材料	没有统计材料
6月	6	11066
7月	3	13200
8月	7	6471
9月	16	17227
10月	26	26737
11月	没有统计材料	没有统计材料
12月	没有统计材料	没有统计材料

近10年来以及1927年内，上海罢工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因为尽管成立了黄色工会和对工人实行恐怖手段，上海的罢工运动不仅没有沉寂，而在1927年秋出现了罢工发展速度加强的征兆。从经济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工人们的罢工斗争迫使资产阶级转入组织生产的更高的技术阶段；在目前这个时期里，工人的斗争导致工厂主为了同工人作斗争暂时关闭自己的工厂。顺便说一下，因此到1927年年中纺织工业的纱锭数量（从300多万中）减少了7万。

谈到对中国职工运动的总的评价，应指出它的优点和缺点。中国职工运动的特点是，所有工会（少数例外）都具有阶级的、革命的观点。所有工会（又是少数例外）都参加了工会国际下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但是中国的职工运动有许多极其严重的缺点，这是由于它年轻并处在变化无常的艰苦的政治、军事环境中。主要的缺点是职工运动的上层化。各工会都有中央委员会，它们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但是它们没有基层组织，因此不是真正群众性的组织，没有扎下深深的根

基。正因为这样,它们严重地受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制约。

另一个缺点是组织上分散。例如。在广州一个地方就有 200 多个工会,在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工会大部分在企业里,很少是“商行性的”,也就是说很少遍及到一个“商行”或公司所属几个企业的工人。

在没有基层组织、没有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即使要领导罢工运动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去年夏天的上海罢工运动中。多数罢工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是因为客观形势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领导不力。除分散性以外,同乡会在工人运动中也起了明显的有害作用。可以举出近几个月来在唐山、天津、上海发生的许多实际例子,说明远远没有根除的省和地区的地方主义、同乡会多么严重地妨碍了工作(格列尔)^①

工人阶级状况的所有这些缺点:生活水平低下,组织上分散,缺乏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中共方面的领导不力——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目前导致“滋长了一种向往进行无组织暴动和盲动的情绪”(引自 1927 年 12 月 3 日)^②。

尽管大多数工会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黄色工会对职工运动有腐蚀作用。这些黄色工会人数不多:广州的机器工会会员不超过 5000 人,上海的工会“联合会”也是这样。但是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程度决定于军阀集团对它们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说,广州的机器工会是由李福林和张发奎武装起来的,是摧毁 1927 年 12 月 10 日广州暴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所谓的上海工会联合会也起了这种贩卖性的作用,它的组织者和头领就是白崇禧。中国共产党

① 作者这里援引了 J. H. 格列尔 1927 年 9 月 15 日的文章《中国的工人运动》(见《论中国(政治经济文集)》,A. 洛佐夫斯基主编并作序,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第 103—104 页)。

② 此处和以下各处引文出自何处不详。

迄今犯了一个大错误，她蔑视黄色工会，没有越过工会官僚去争取这些工会的群众。工人群众对黄色工会的评价可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 11 月份，一群工人冲进工会的办事处，用砖头砸死了工会的主席。

农业危机

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对这一危机表述如下：“农民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全会认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是不可能的了……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①

在分析危机以前，我们再援引一些表明中国农业问题和农业状况的总的统计材料（沃林同志整理的中国工农业部的材料）：

土地分配状况（1917年）

农户等级	土地规模	农户数量 (百万)	百分比	全部土地 (百万亩)	百分比
小土地经营户	1—20 亩	24.4	49.5	244.3	15.9
小农户	20—40 亩	11.7	23.7	350.5	22.8
中等农户	40—75 亩	7.7	15.6	386.8	25.4
大农户	75 亩以上	5.5	11.2	551.0	35.9

49.3 100% 1532.6 100%

^① 见《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 1928 年第 1（10）期第 4 页；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447 页。

从上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75%的农户是较低等级的农户。其余25%是大农户和中等农户。从土地面积的分配来看，应该指出这样一个情况：全部较低等级的农户（75%）所占土地与只占全部农户1/9的较高等级农户所占的土地大致相等。如果拿农户等级的两端（小土地经营户和大农户）加以比较，那么可以看到，占全部农户一半（49.5%）的小土地经营户只占全部土地面积的1/6弱，而占1/9的大农户占了全部土地面积的2/6强。为了更加清晰地评价中小农民的状况，应该指出，根据美国对个别一些地区的调查材料，“贫困线”（最低富裕程度）确定为五口之家的农户是150墨西哥元。低于这条贫困线就吃不饱和饿死。美国的调查者确定一亩的平均收入为每年5个墨西哥元。由此看来，最小农户的收入是5到100墨西哥元，小农户的收入是10到800墨西哥元，中农户的收入为200到375墨西哥元，等等。如果回想一下，支付地租是收成的50—70%，中国农民又生活在经常性的税捐、掠夺、高利贷资本的重压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农户不得不交出自己收入的70—90%，生活在贫困线或者贫困线以下的水平上。

租赁关系是了解中国农业问题的又一个问题。根据中国1917年的官方材料，自耕农占50%，佃农占28%，半佃农占22%。这样看来，佃农和半佃农占着总农户的50%，而自耕农也是50%。这里我们不来分析租赁的方式，毫无疑问它表明，农村的封建一农奴制关系占着统治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关系很快渗透到中国的农村。对外贸易的统计材料证明了这一过程。在1924到1926的三年中，进口农业机械器的支出款额是：

农业机械器的进口（百万银两）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279.9	161.2	511.5

外国资本从中国运走的农业原料的出口量在出口商品总数的

70—80%之间徘徊。绝对数字（中国海关的统计材料）为：

总出口量（百万银两）

1913 年	403.3
1924 年	771.0
1925 年	776.0
1926 年	864.0

其中农产品的份额为：

	1913 年 (百万银两)	百分比	1924 年 (百万银两)	百分比
大田作物	91.2	22	206.2	26
畜产品	55.2	13	96.0	12
蚕丝	104.8	26	147.0	19
茶叶	32.9	8.4	21.1	2
食用品	17.6	4.4	26.3	3
油料	12.6	3	48.5	6
棉花	16.5	4	42.2	5
总计：	331.8	81%	588.1	75%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农产品的出口过程是迅速发展的。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确切说明资本主义关系渗入农村过程的材料。只有芜湖地区 102 个村的调查数字，使我们有可能得出结论：农业经济的商品量大约相当于 54%，也就是说，农户收入的 54% 表现为货币形式，而其余 46% 则是农产品的实物消费。这些数字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不可能具有典型意义，但是它说明农业经济的根本摧毁。

中国经济方面的材料没有给我们提供农业无产阶级的数字；不

同地区的单独材料说明农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在增加：1927年4月^①的《中国经济通报》^②提供了湖南和江西一些地区的农民构成情况：

湖南：

	农业工人	佃农	半佃农	自耕农
宝庆	20%	35%	25%	20%
长沙	25%	45%	13%	17%
来安 ^③	15%	40%	31%	14%

江西：

万乡 ^④	5%	20%	30%	45%
吉安	5%	15%	70%	10%
潘源 ^③	5%	35%	50%	10%

这些统计材料说明，中国农村出现了很大的阶级分化，并清楚表明了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趋势。

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封建—农奴制关系在缓慢地、痛苦地被摧毁。

这一危机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开始的；它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并不时地表现在像太平天国起义、回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④以及1924年至1927年农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动乱中。从1911年起这一危机表现得特别尖锐，这是中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农村中旧制度迅速瓦解的开始。

① 原文如此，应为：3月，见《中国经济通报》1927年3月12日第10卷第136号第312页。

② 《中国经济通报》是1921年至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周刊。

③ 原文如此，译音。可能为耒阳、万年、鄱阳。

④ 太平天国起义是1850—1864年爆发的几乎遍及长江以南整个中国南部的群众性人民运动。起义者建立了太平天国，因此称为“太平军”。回民起义发生在云南省(1855—1873)、陕西省、广西省、青海省、新疆省(1862—1878)。义和团运动是在秘密团体“义和团”的领导下爆发的自发性的人民运动，在外国报刊上称为“义和拳运动”(该秘密组织教民一种特别的拳术)。

因此，这里说的危机是不断的危机，但决不是某种灾难。这种危机不可能在封建—资本主义中国的范围内得到解决。

农民运动

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中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结论：农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军阀、豪绅、高利贷者、商人等等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后的鲜血。成千上万的农民离乡背井，加入到盗匪、士兵和城市流浪汉的行列，构成一支庞大的后备军。毫不奇怪，流血的农民运动时而在中国这一角落，时而又在另一个角落不断地爆发。我们可以指出中国农民运动进行的三种途径：“红枪会”、农民协会和迁移。“红枪会”不是阶级性的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有时是富农，有时是小地主，其任务不是解决农业问题，而是整顿和建立“好的”政权。

许多其他半神秘性质的农民团体也具有这种形式，它们的宗旨是反对军阀进行的令人不堪忍受的压迫：如“光蛋会”、“哥老会”、“黄黑白三枪会”、“大刀会”等等。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不发达的农民运动的形式。

在华中和华南诸省普遍存在的农民协会是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性组织。有些同志说湖南省农民协会的构成中有14%是手工业者，可以认为这是很独特的。

农民协会在其斗争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广东阶段，它的特点是只要求减租和协会的合法存在。共产党领导了这些协会，竭力避免提出据说可能会使国共关系紧张的口号。

(2) 北伐时期，它的特点是农民协会的扩大和增加。湖南农民协会的数目从北伐初期的20万个增加到1926年12月的250万个。农民们经历了组织和为实现局部口号而进行局部斗争的阶段。

(3) 1927年1月至6月的阶段。

农民们从要求减租和打倒土豪劣绅转向要求没收土地和在农村夺取政权。

(4) 1927年秋的阶段。农民协会在湖北、湖南、江西组织了一些暴动。在广东，农民协会在海陆丰地区夺取了一些县，在那里一直到目前，保持着自己的政权。然而，尽管出现这些星星之火，但农民运动在华中还不具有广泛的规模，没有汇合成群众性的农民暴动。农民运动进入了从组织上加强自己力量的阶段，在中国各地不断燃起星星之火。

在华中和华南诸省普遍存在的农民协会是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性组织，有些地方也是手工业者的组织。

这里还应该指出农民寻求摆脱困境的另一种途径，这就是迁移。这个现象在我们的报刊上没有提到过，但它在华北地区起着很大的作用。1927年秋，所有外国报刊都众口一词地指出，在南满和北满还从未见过像今年这种农民迁移的浪潮。如果说过去20年来，从华北各省迁移到满洲的移民人数每年相当于20万是正常的话，那么在1927年秋以前，这个数目提高到了100万。移民多半是从山东省来的。到满洲来的移民无论对于中国的地方还是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满洲一直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在收割季节。日本人和中国人以及中东铁路都鼓励农民的这种流动。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和京沈铁路给成年人减免1/4票价，而儿童和老人则免费乘坐。沈阳省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移民局，其任务就是调节移民潮。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春提出的口号把农民运动弄得残缺不全，对农民运动领导不力（农民运动中常常没有党的领导），随后又使它组织涣散，到去年夏天有些地方被反动浪潮所摧毁，尽管如此，目前的农民运动虽然基础比较薄弱，但还一直存在着并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小规模自发农民暴动，杀害地主，夺取土地和政权的现象至今仍在各地时有发生。这些农民暴动似乎已成为中国农民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习俗。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华南和华中的农民

运动逐渐转向华北张作霖和张宗昌统治的省内。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但还是可以大胆地说，最近冯玉祥使张宗昌蒙受军事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张宗昌实行恐怖手段和使农民遭到破产而引起了山东省的农民运动。

叶挺革命军残部在广东省的存在大大地推动了华南农民运动的发展。

诚然在有些省内，特别是在湖南和湖北，由于去年的破坏，农民运动现在非常零散，有些地方甚至处于沉寂状态。请看我们的消息来源是如何评价那里的形势的：“盗匪活动十分猖獗，不久前湖南全省大规模暴动浪潮所引起的农民运动高潮已被消极和沉寂所取代。”

然而，尽管在个别一些地区农民运动被摧毁，全国运动的规模总的说来大大缩小，但是在中国农村的公开的内战没有停止，农村的风潮是巨大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是确凿的事实。**

十一月全会认为，中国的局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但附带说明一下，“中央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况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①

附带说明实质上是正确的。中国革命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工农运动的胜利也像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农民、工人阶级以及千千万万的城市贫民不可能放弃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争取生存不致饿死的斗争。

至于说到当前的形势，那么最近5至7个月内将是积聚和有组织地加强革命力量的时期。

^① 见《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10）期第7页；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3页。

从对中国整个局势的分析中，无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运动将会发展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应竭尽全力来加强自己的队伍。它应把自己的全部有生力量投入到工农运动中去，把这个运动纳入相应的轨道，并准备进行不久将来的决战。中央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中央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从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清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在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务是：向每个省委或者至少向每个主要省委和向中央各派一名同志去，以帮助中共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

阶级力量对比

我们在上面对中国经济、内部政治形势和国际形势所作的详细分析，使我们有理由对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提出如下的看法：

理解中国形势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国的政权没有落到资产阶级手里，也没有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中国的政权掌握在封建-资本主义集团的手里。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听命于这些集团。然而这里应该强调指出，封建-资本主义集团内部不仅隐藏着它们相互之间为夺取领地和肆意掠夺的权力而斗争的矛盾，而且隐藏着基本上由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农奴主之间和资产阶级性质倾向之间的矛盾。

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四月代表会议^①正确地指出了这后一种矛盾，以“封建资本家”的术语替代了“封建军阀”的术语。这个术语反映了中国整个复杂的内部政治形势和国际形势。

与跟随在反动将领和帝国主义后面的封建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以下三种力量：(1)工人阶级；(2)农民；(3)小资产阶级。

如果说中国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已经在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资

^① 代表会议于1927年4月4日至5日召开。

本主义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实现，那么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还没有很明确地提出。

如果说在俄国的条件下，列宁说城市贫民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比较，既不代表独立的利益，也不构成独立的力量因素，这是对的，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应该从吸收新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应该怎样来理解小资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城市贫民呢？十一月全会提出了正确的定义：“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①从数量上说，小资产阶级有各种不同的来源。工匠手工业者的人数大约有1000万。小商人可以认为是第二个人数如此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拥有资本1到2、5到10元的小商贩充斥着中国的街头巷尾，大约也有1000万人。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有必要与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它把这种联盟变成了尾巴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害怕它离开而放弃了对它的领导，忘记了只有坚定不移地去解决所提出的任务才能使共产党对始终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实行领导。

总之，在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民、城市贫民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反对封建-资本主义集团和听命于它的资产阶级以及支持它的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

结 论

(1) 中国正经历由1926至1927年革命运动和封建-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斗争所引起的经济衰退时期。但是这一危机具有暂时性质，不可能阻止工业、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关系渗入中国农村的迅猛发展速度。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0页。

(2)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是软弱的。工人阶级艰苦的经济状况，它的难以置信的低下生活水平和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促使它去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上加强工人阶级的队伍。具体做法如下：

1. 组织广泛的无党派群众参加革命的阶级性的工会；
2. 在工厂和企业内，以不合法和半合法的工厂委员会名义建立和加强工会的基层支部；
3. 实行工会会员每月除名制度；
4. 在工会组织内建立坚强的共产党支部；
5. 绝对避免出现由党替代工会从而影响工会发展的现象。党应该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系统，同时党支部应该成为工会群众的核心。

(3)农民的问题也同工人阶级的问题一样。目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只是真正农民运动的开端，它正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开展起来并必将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削减口号以及农民和农民协会的要求。

党应该特别注意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问题。为此，除了在农村建立党支部以外，还必须加强现有的革命农民协会并吸收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还必须尽可能掌握现有的非阶级性的农民协会，使它加入中国农民的共同的阶级战线。

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劳动者夺取政权，农民协会必将变为农民代表苏维埃。

(4)中国共产党还很软弱。“共产党显得非常软弱(在上海)，不能适应重要的始终不渝的地下工作。它的影响还很小。”1927年12月3日同一个消息来源写道：“基层热火朝天，而共产党现在无力领导这一运动，因为它不仅在组织上软弱，而且在思想上也软弱。如共产党今后仍软弱，同时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也软弱，那就会把革命的顺利发展推得越来越远。”

共产党目前面临的任务是：

(1) 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队伍，从工人中建立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和党的机构，同时清除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2) 在工厂、商务企业、学校里建立支部。

(3) 消除党和共青团之间的脱节现象，由党领导共青团。

(4) 接收新党员（最近一个时期，党员人数减少了5到10万人）。

(5) 在全党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党的机关的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关于共产党在各个工作领域中的任务已在192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第11478号报告^①中作了详细说明。该报告中所述的内容从我们方面来说没有任何异议。

（别尔津）

全宗514，目录1，卷宗268，第158—176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报告发表在《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8年第1（10）期，第3—22页。

5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1月^① 于上海

奥莉加^② 发自上海的信

莫里茨^③ 离开后不久,关于广州问题的决议^④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没有作任何重大补充,尽管我们在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意见。

决议通过的突出特点是:无论整个政治局还是政治局的某个委员(李立三除外)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表现出:(1)在广州暴动的政治意义问题上有丝毫动摇;(2)试图(尽管在这方面带有某种“审问”的成分)谴责广州暴动是盲动,说它是不合时宜的;(3)正如我在以前的信中所说的,中央从一开始就预见到失败是必然的,但不愿谴责暴动,而宁愿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⑤(这正如这里通常所说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情绪)。从广州暴动的政治结论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1)认为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向新的高级阶段的最后过渡;(2)一再确认形势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3)在适宜的条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标明的。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③ Г. 牛曼。

④ 指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8年1月3日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44页;又见M. [翟秋白:]《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真理报》1928年2月5、7、9日。

⑤ 文件没有找到。

件下和有基本准备（实际上我们始终不渝地强调要有最基本的准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的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将提上工农革命的议事日程。根据这些情况，现在我来谈谈使我们感到不安和为了今后的工作需要正确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在中国为争取苏维埃政权而斗争问题上的困难

(1) 它的一些队伍不是同时参加革命的。

(2) 各省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形势不是同时成熟。

(3) 帝国主义者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进行干预的危险性大大加强。

第一个问题：

1. 整个工人阶级和它的上层之间存在某种脱节。尽管盲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资产阶级情绪造成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来的，但决不能忽视，在工人阶级中间也有相当一部人倾向于立即举行“暴动”，更确切地说倾向于搞各种直接行动，恐怖主义，左的空谈等等，这些人不会进行日常工作，也看不到日常工作的革命意义。这部分人的情绪激励了许多党员，使他们有理由说，上海现在有40%的工人准备立即举行暴动。正是这部分工人的情绪影响了湖北委员会，它现在又提出在汉口举行暴动的可能性问题。这部分工人，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倾向于不仅对工人阶级的敌人，而且对全体工人群众采取恐怖手段，就像在上海最近几次罢工中那样。应该说，这些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一些失业工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员中的优秀分子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失业队伍中来。广东机器工会仍然是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的例子，尽管我们在那里开始取得一点成绩。

2.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合拍是与下述情况有关系的，首先走上革命斗争舞台并在一系列战斗中没有得到农民及时支持的工人运动，目前正经受着并将会越来越多地经受反革命的各种打击。形

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它们在最近十个月来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工人积极分子。广州暴动失败后，反动派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整个中国疯狂肆虐。在广州，白色恐怖的牺牲者（战斗中阵亡和被处死的）已超过4000人（有人认为是6000人）。所有工会，包括汪精卫的工会，广东联合会（主要联合了一些手工业者），所有职员工会都被查封了。只留下一个机器工会；在汉口每天被处决的有30到50人；在上海，一切集会、罢工实际上都被禁止；工厂里不断发生逮捕和解雇等事件；长沙也是这样，以省委书记^①为首的全体领导人被处决了。蒋介石的新[工会]法草案^②实质上规定解散所有工人组织，即使是国民党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今后只能作为经济机关而成立。显然，所有这些情况不能不反映在工人阶级的情绪上（特别是在上海，那里发出如下呼声：）“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做什么，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要吃饭，我们不得不参加国民党的工会”。实际上在上海，无论是工会联合委员会（白崇禧的工会），还是工人联合会（蒋介石的工会）^③都没有多少工人群众，但很快就开始建立起以往那种“兄弟会”，这些“兄弟会”联合了50至100人的规模不大的工人团体，目的是保护这些团体的利益不受资本家和失业者的侵犯。这些团体往往使其他工人失去活力，为自己创造比较优越的地位，哪怕保护自己不受解雇。城市里的恐怖气氛如此阴森可怕，以致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积极因素见下面）。与此同时，除海陆丰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存

① 王一飞。

② 见《中国工人运动——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1）（文献资料集）》第34—38页。

③ 上海工会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4月下半月。工人联合会（正确名称为上海总工会，成立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工会改组委员会，取消了上海工会联合委员会和上海总工会）。

在外，广东的农民运动正走向高潮；尽管犯了许多错误，但我们有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东北部广汉铁路一带，占领了四个县，运动正向湖南和江西方面扩大；在汕头和潮州附近地区，除县城外我们掌握着一些地区；在广东南部，占领了遂溪^①和海康，海南岛仍在我们手中。在西江有两个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诚然，在有些地区，农民运动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例如海南岛，那里在一个月以前还欢迎汉口的人民政府，并谈论减租 25% 的事。

在湖南，农民暴动正在茶陵、宁乡、醴陵以及湖南南部进行。

在江西，苏维埃政权已在永新、临川、莲花、万安建立。

在湖北，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据当地工作人员报告，发展速度要比湖南更快。

在河南，据资产阶级报纸报道，每个农户有一人是盗匪。

山东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满洲，“大刀会”成员目前达 2.4 万人，对当局构成很大威胁。

很明显，这种运动的政治觉悟还远不是一致的，但这种运动的总的特征是，即使在最初阶段也与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变成游击斗争并逐渐具有为争取建立某种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而斗争的性质。海陆丰以及湖南运动的例子说明起来斗争的农民的革命觉悟在迅速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民运动内部正在分化，当农村中的贫民越来越革命化，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走上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农民阶层则有点害怕革命。在苏区自发进行的分田运动使小私有者感到害怕，我们从湖北和海南得到一些消息，说我们的同志难以进行土地革命，他们把土地革命理解为没收和分配土地。在河南，据共青团员们报告，我们的土地纲领，由于引起小私有者农民的不满，因此在农民中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并使豪绅和地主得以再一次削弱我们在“红枪会”中的影响，从而

① 估译一译者。

使他们在那里的地位有所加强。

(4)^①军队在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是大大落后的。目前可以称作是某种转折时期，因为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早已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士兵们的状况，他们得不到军饷，处于半饥饿状态。目前，由于新军的迅速发展，军队里新兵太多，他们不是那么遵纪守法，与城乡劳动群众的联系要紧密得多，他们已不仅仅是失去阶级性的分子的联合体。因此，军队中纪律废弛，与此同时惩罚手段大大加强，逃兵现象不断增多，处决事件也有增无减。士兵们越来越多地走上不那么正规的反抗道路。以下是一些具体事例：在广东，广州暴动后，约1000名张发奎部下的士兵投诚到海陆丰农民一边；在湖南，原唐军^②的几个营杀死了营长，投诚到农民一边。据最近消息，在李济深的第7军和第14军^③，我们的人组织了士兵暴动。从江西也有这样的消息传来。不仅在唐生智的军队中，而且在白崇禧的军队中，瓦解得非常迅速。唐生智的亲属被农民和士兵杀死。红军的力量在发展。在广东，我们现在有：叶挺的第10团，1000人，600枝枪；教导团1200人，1200枝枪；张发奎部下的士兵（确切数目不详）；朱德——1200人，700枝枪。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有消息说广东的有些军队可能要瓦解（如范石生部）。但总的说来，这个过程极其缓慢。

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来说，军事力量的因素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尽管在广东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运动有所发展，但我们的成就还可能在相应的军事袭击中毁于一旦。现在，农民力量之所以有可能发展和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阀集团内部的倾轧，他们不

^① 原文如此。

^② 唐生智军队。

^③ 原文如此。

可能投入力量来对付农民，并在与农民的一系列冲突中不得不作出让步，虽然切齿痛恨，但不可能把海陆丰收复。

上述种种情况是革命队伍运动中的某些零星插曲，这可能造成一些幻想，认为（在农民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总暴动的问题，也可能（由于城市里又出现一些恐怖行动），产生一种消沉和绝望的情绪，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产生恐怖主义和失望情绪。在上海，在许多工作人员中出现动摇不定的情绪。党经常无力来切实克服这些困难，因此在党的队伍中也产生一些动摇，特别是左的倾向在增长。

第二个问题：

中国没有中央政权，军阀集团和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军事冲突不断增加，时而在一个省内出现新的军事力量，时而又被彻底肃清，都取决于军事计谋，因此造成这样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各省夺取政权的斗争可能远不是一模一样的。革命传统、革命运动的习俗、党组织和群众性工农组织的状况又加大了各省情况的差异。

在国民党派系处于困难境地的地方，在它们不得不更多地派军队开赴前线的地方，在形成像广州暴动前那种局势的地方，当一些大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量军事力量的时候，省政府就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警察、豪绅、民团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统治集团内部就会立即惊慌失措。这时，只要对整个活动的军事包围稍有削弱，就会立即出现运动的高潮。在白崇禧军队到来之前，长沙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在湖北许多地方，当白崇禧削弱了自己的军队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一旦新的“胜利者”的力量到来时，这个运动也就很快被扼杀。例如，现在湖南工作人员的革命热情有所削弱，而湖北又出现了暴动的幻想。关于在一省建立政权的问题，你们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①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坚持对这个问题作

^① 见第 278 页注④。

出肯定回答的观点。表述需要更加明确些。当然还应该估计到保持政权的可能性。应该明确强调,在一省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邻近几省内革命运动处于高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只有得到其他省的支持,一省的斗争才能开始。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和个别一些中央委员(现在在湖北的李维汉)一样犯了许多错误,过分地把这个或那个省推到首要地位,不善于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工作,来领导和开展正自发进行的农民运动。

现在很清楚,应该多么小心谨慎地对待一些省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而等待的政策,把赌注押在敌人在相互冲突中耗尽力量的做法,是无论如何不可取的。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开展运动的各种机会是必要的。把地方工作人员搞得非常糊涂的是,在目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要摆脱地下状态和利用各种合法和半合法机会的任何尝试都是与几乎不很小的冒险联系在一起的?采取更坚决行动直到暴动也是一样。因此,许多人宁愿通过过早地举行暴动的办法来向“工人们展示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继续重演广州的经验”等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共青团的一种观点,认为“仅仅希望进行胜利的暴动,那就是机会主义。”

第三个问题:

对你们来说无需任何证据,我只说一些可能你们还不知道的情况。现在,英国几家报纸不遗余力地散布谣言,说什么中国商界人士提出,将上海划为脱离军事集团并由公民自己管理的独立单位。在这个问题上帝国主义者插手是显而易见的。

同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的危险和在上海开展任何工作的困难引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与国民党旧时的理论相类似,认为开展革命主要在西部省份。意思是要寻求与苏联结盟,通过最可行的途径,绕过整个沿海地带和满洲,使革命力量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严重冲

突。(布哈罗夫^①)。政治局没有同意这一观点,而同意瞿[秋白]的意见,他提出必须尽最大努力在像上海和天津这些工人集中的大城市里开展工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因为这在目前形势下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些机械,脱离与外界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指望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顺便说一下,我们曾根据《红旗报》^②的文章指望国际上开展保卫中国革命的运动,但显然有点儿为时过早。在太平洋书记处会议^③后我们会有所指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给以很大的帮助。

二、革命浪潮是高涨还是低落?

我现在没有对国民党的内部状况进行分析,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因为第一,关于这个问题在公开的报刊上已经有许多材料,第二,我现在没有可能来进行认真地分析。我将尽我力之所及在下一封信中阐述这个问题。但我越来越确信,尽管国民党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地认真尝试在帝国主义者及其钱袋的支持下稳定自己的地位,但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地在崩溃。

我只想谈谈现在革命浪潮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给自己提出问题:现在的时期是不是像俄国1906年农民运动那样的时期?许多事实证明,农民运动的爆发没有减弱,而是继续在加强和深化,新的革命浪潮在高涨^④。我认为,以上所述事实足以说明,一批又一批农民正参加斗争,这种斗争正转入更高的阶段,而

① 罗亦农。

② 《红旗报》是德国共产党中央的周刊。从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1933年法西斯上台后停刊,但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该刊转到布拉格出版,而从1936年10月到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

③ 可能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第二次全会,1928年2月3日至6日在上海举行。详见《泛太平洋工人》杂志上海1928年第1卷第14期,第1—3页。

④ 此处原文有个别字遗漏,因此表述不清,这里根据下面的叙述进行了补充。

迎接这场农民斗争的将是士兵暴动的浪潮，对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发展。现在有一些材料证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已向这方面转变。最后，最主要的是，目前工人运动的明显滞后绝不是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遭到失败的征兆。尽管存在我为了说明工人情绪所援引的种种事实，但我们应该看到，罢工浪潮几乎没有停止。即使在广州，我们也有过两次小规模罢工，可以指望会有新的更大规模的罢工。上海郊区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压制，她们被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吓坏了，她们说她们希望过几个月安宁的生活，得到一口饭吃，最后她们说：“当然，要给我们武器的话，大家都会去斗争，赤手空拳能干什么呢。”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许多其他企业的情况后也表示了类似的情绪。在工人集会上讨论广州的教训时（参加会议的总共有100多人），工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党是否有力量在广州再举行一次暴动？党是否有力量在汉口和上海等地举行暴动？工人们（我主要说的是上海）现在既怕党，也怕[上海]总工会，因为光是看一看共产党的传单就常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几乎总要丢掉工作。但是，只要能够喘口气，就会立即提出再举行暴动的问题。的确，在上海的工人阶级中在这方面对共产党寄予很大希望，把共产党看作是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解放的党，但很少懂得只有靠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和组织性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汉口工人的情绪，就是上海工人的情绪我也只能在调查现在刚成立的一个组织后在以后的信中再作详细报告。最后说一点广州的情况。所有一切都证明，广州暴动后共产党的威望在提高，工人阶级中没有失望的情绪。应该考虑到，国民党以其全部政策把工人阶级（其他劳动阶层也一样）推到了共产党一边，当军事包围圈被突破时，工人运动会表现出很大的政治觉悟，这种觉悟目前在疯狂的白色恐怖条件下正在逐渐成熟。关于中国工人的勇敢精神我就不说了。

策略问题：

我们再三地分析形势后得出了最后结论，除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取得政权而斗争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从日程上撤销暴动问题的任何空谈都是经不起批判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当整个运动融为一体，当所有革命队伍都汇成一个行列的时候，当千千万万的人们都确实为革命而斗争的时候，就可以像号召举行暴动那样去号召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在全国范围内或者在几个省内）进行斗争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是根据这个主要问题来决定我们的整个具体策略。

第一，最大限度地开展农民运动，特别要注意领导运动，把政治上的明确性贯彻到再次被吸引到斗争中来的农民群众的自发运动中去（包括中国北方的运动）。

第二，绝不允许人为地安排暴动，而要深入开展工作，以使更多的农民群众觉醒，投入到政治生活和斗争中来（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你们可从下述情况中看出）。

第三，不要把许多地区正在进行的农民武装斗争仅仅局限于游击战，而要把它变成为争取建立像海陆丰那样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

第四，同时要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如果不进行反对整个国民党和整个政府，不推翻整个政权的斗争，任何一个地方农民苏维埃都不可能保持住，不可能生存。

第五，要发展和加强农民红军，建立自卫军，把农民队伍的斗争与取得政权的总任务结合起来。

第六，把现有的红军变成流动的共产主义宣传队，变成帮助农民消灭豪绅和民团的政权并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力量，变成帮助把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的农民武装起来和在那里建立战斗队，训练农民并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而不断向新的地区推进的军事力量（请看一看广东的材料^①，你们就会看到，尽管犯了一些错误，军队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

^① 材料没有发表（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03）。

第七,要在农民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说明只有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农民的胜利才能持久,农民应该采取措施立即援助为共同利益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工人阶级。要宣传为了取得共同的胜利必须千方百计的捍卫工人运动。在具体做法上,我们甚至考虑到是否可以借助于农民来建立罢工基金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在政治上的暂时失败使我们不是去抑制农民运动的发展速度,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个运动,建立新的运动策源地,以此来削弱政府的力量,使军事力量大批撤离城市。

第八,尽管工人阶级承受着白色恐怖的全部重负,但要在工人阶级中巩固地下工会并尝试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在目前条件下,利用合法机会可能会引起许多疑虑,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工厂委员会的问题上同意暂时撤销这个问题,以便在罢工时期以成立罢工委员会来代替争取建立合法工厂委员会的斗争,并在可能的时候召开临时的代表大会(关于态度的问题另告^①)。

第九,在对罢工的态度上,要非常小心谨慎和作最充分的准备(更详细情况另告)。

第十,在没有得到农民和军队广泛支持以前,不要过早在城市里发动,不要举行任何暴动。

第十一,要千方百计解释广州和海陆丰的教训并宣传苏维埃政权。

第十二,军队中的工作至今没有做好,没有找到有能力的工作人员来做这项工作,但在探索这项工作的道路上,各地在寻求自己的方式,并找到了农民与士兵联欢以及派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到军队中去的方式。

我只从日常工作遇到的所有问题中取出了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的并与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主要困难有关的问题,我不再重复你们从决议中已经知道的东西,也不谈还在制定的许多东西。

^① 原文如此。此处意思不清,可能是“政府对罢工的态度问题。”

三、党、党的现状和病症，党的构成

我没有寄去新的统计资料，但想指出以下一些情况。党的构成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流动性。例如，现在在上海，两个月前我们有1700人，现在只留下很少的人了，特别是在一些企业里，支部只由5、6个人组成。最近的一些罢工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我们的党员，我们大量的干部被解雇，现在分散在农村。[相对说]党内有很多干部是失业者，而且还在增加。大批工人共产党员干部在白色恐怖影响下脱离了党，不再在会议上出现，回避见面，等等。与此同时，我们在农村，党的组织正在大大发展。例如在广东，我们党现在大约有3万人，其中1.2万人在海南岛。在湖南和湖北，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大批农民加入党，每次有一百多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总共只留下100人（现在已经有200人），其中只有40人在企业里。有些地方，知识分子开始退党，甚至成立自己的新党（谭平山）。

四、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病症

目前全党的主要病症是企图人为地加速革命成熟的进程，转而采取革命的最后行动。主观上的急躁情绪（试图“强迫”举行暴动，只采取一些技术性措施来挑起“暴动”，而不进行必要的群众性工作来准备暴动）——这就是一些智囊们的通常做法。在广州暴动后已经有五个省的委员会（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向中央提出，现在仍提出立即在它们的省里组织暴动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很少与对形势的分析、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当地情绪的具体材料等等联系起来。关于暴动的必要条件的议论，最近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列宁提出的三条著名的举行起义的必要条件^①被当作人

^①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与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5—237页。

为地加速发动暴动的基础和理由。在这里,暴动发起者本身情绪的不稳定是惊人的。由最乐观的希望转到最悲观的消极情绪是常有的事。湖北省委三个月来已经三次打算在汉口举行暴动,曾规定了日期又自己把它撤销。同群众没有建立足够的组织联系,不善于估计群众的情绪,每次都不善于抓住必要的环节和把问题与主要任务结合起来,这种现象在每次作出决定并要具体实施时就暴露出来。在长沙,现在在领导同志当中出现了某种情绪低落的现象,而作为暴动取得胜利的保证的客观条件也不是那么令人乐观(应该考虑到白崇禧军队的到来以及几乎所有党员积极分子被捕和处决)。乐观情绪现在转到了湖北,那里由于白崇禧军队的调动,现在力量削弱了。以李维汉为首的湖北省委已经提出将夺取政权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湖南的问题。在上海,盲动主义的情绪还没有克服,还在谈论准备立即举行暴动的工人的百分比问题,而无论是声援广州的罢工的失败,也无论是加入我党人数的减少都不能说服这些同志。

先锋主义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先锋主义还没有克服,或克服得很差。共青团为自己在许多场合率先提出(在湖北、苏州^①、浙江等地)举行暴动问题而感到骄傲,而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充当这些决议的尾巴,而且实际上把整个领导权交给他们。

盲动主义和恐怖主义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也像在共青团中一样,都没有足够清楚地理解什么是暴动。它被孤立地当作目的本身。革命被看作是一些孤立的爆发,一些武装的发动,等等。盲动主义的根基是相当深的,是与恐怖主义情绪有密切联系的。关于个人恐怖活动的危害性,我就不再说了。许多党员完全错误地理解恐怖手段,不仅用来与公开的敌人进行斗争,而且用来强迫群众。在上海,有些罢工期间就是这

^① 原文如此。

样，在浙江，也是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不愿参加发动的消极农民。在湖北，根据党委的决定，组织了一周的红色恐怖活动，而许多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三人战斗队，结果许多人在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就被逮捕和处决（武昌附近的一个铁路委员会）。在广东，在汕头地区，一些党员由于对党的策略不满成立了叫作“三K”党的新党，提出的目标是，不仅对当局实行恐怖，而且对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也实行恐怖。这个集团很快蜕变为公然的反党集团，有消息说它已被党员们自己消灭了。从广州逃出来的一些人中有这样的情绪，说什么离开那里就要“给资产者留下一堆瓦砾”。在海陆丰，人们对恐怖问题也理解得有些过火。在一次党的会议上通过决定，每个党员都要杀死九个同村人（没有指出社会出身、是否反对革命等）。因此，有一名共产党员走进村子就上吊了。豪绅们知道这件事后，就大肆鼓动反对已经取得一些成就的党和苏维埃。在长沙，党组织由于迷恋于搞恐怖被人们称为“深夜党”。

机会主义余毒

机会主义余毒在很大程度上正在纠正，但有时只是表面上的，极右派很快改头换面变成了极左派，而从极左的倾向中常常可以看到右的实质。但总的说来应该承认，党相当迅速地在纠正机会主义，相当齐心协力地同它进行斗争。当然，像我党党员参加县政府（江苏省的一个县）这样的事例是可笑的旧的残余。总的说来，对机会主义的谴责是最严厉的，大家都非常害怕它，因为全党充满着严厉惩罚以前一切机会主义过失的情绪。这样的例子很多。布哈罗夫事件，我们寄去的直隶党代会的决定^①，还有广东省扩大全会的决定^②，等等。这种现象常常具有反常的形式，例如在广东，对此不得不加以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1928年1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组织的当前任务和工作方向》的决议（见《广州起义资料》第1卷，第214—219页）。

纠正，但基本上是一种想纠正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善良愿望。机会主义情绪的爆发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将来再遭受重大失败的话。例子就是谭平山的党^①，顺便说一下，在广州已开始逮捕他们。

反知识分子运动

我不再重复，我们必须使机关工人化，而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广东除外），但目前这种基本上健康的现象常常带有对个人进行惩罚和报复的性质，蜕变为马哈耶夫主义^②。遗憾的是，无论是反对机会主义者还是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常常是由机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来进行的。只有这一点能够说明直隶所作的决定：“清查所有地主子弟，并将他们开除出党”，只有这一点能够说明李立三想用领导机关的知识分子构成（莫里茨也包括在内）来解释广州暴动中的一切错误。“离心”倾向是对党内民主的一种曲解，以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建议“根据群众的要求来改变策略，根据每个支部的要求来撤销领导委员会（直隶省），等等。这同共青团的分立主义如出一辙。”

失业情绪

党员中的大量失业现象，一批又一批工人党员干部被抛向街头，党员知识分子脱离整个“社会”和找不到一块面包糊口，这一切造成了依赖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党被指责为“什么也没有提供”并要求给予保障。所有这些倾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和加强，是由于不善于贯彻中央的正确决定，不善于把正确的方针落实到党的基层，不善于对执行决议的情况进行检查，不太善于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至今还没有收到地方上对十一月全会决议^③讨论结果的信息，更不用说对广州决议^④的讨论结果了。对贯彻广州的号

① 见第58—60号文件。

② 见第215页注①。

③ 见第159页注③。

④ 见第278页注④。

召^①没有进行监督。所有这些情绪，所有这些错误，由于革命道路上面面临着巨大困难，特别是由于党不得不在战斗的时刻，在实际上正准备暴动的时刻进行改组，所以具有如此严重和危险的性质，以致常常迫使我们提出党内危机的问题。党在医治右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犯左的毛病。问题在于，客观形势的革命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党组织的软弱、不善于领导群众和建立群众性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是否在扩大。显然，这个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来说是主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疑虑，许多同志表示担心，剪刀差正在扩大。在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中应该坚决而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广东委员会的行动（尽管它在广州暴动后犯了许多错误，健康的基调）（与北方人决议中的所有错误相反）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将迅速治愈这些错误，并已经在治愈。

五、广州问题

广州全会是在1月1日，即中央作出关于广州的决议之前举行的；参加全会的〔中央〕代表只有李立三一人，然而全会（参加全会的共20人）在评价暴动的意义上是非常正确的。决议^②明确说：“这次广州暴动代表了中国全体工人阶级、农民和贫民推翻政权的愿望……”^③接着说：“这次暴动完全是在我们领导下进行的”，最后在关于暴动的意义一节中完全正确地说，苏维埃政权保持了三天，“增强了全中国工农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号召他们去进行夺取政权的积极暴动”等等。那些承受着对中国来说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全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8页。

② 指1928年1月初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任务和党组织的工作方向》的决议（见《广州起义资料》第1卷，第214—219页）。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

部重担的同志，敢于大胆地谈论新的暴动，说反动派“推动群众，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沿着暴动的道路前进。下一次暴动将比这一次更加有力。我党的影响将在群众中继续扩大”。此外，同志们制定了农村地区的具体工作计划，采取了切实开展和深化农村暴动的措施。然而与此同时，在对广州暴动的评价上，广东委员会全体会议犯了一系列不可原谅的错误。中央对此的答复如下：（1）没有指出失败的任何客观原因，没有分析敌人的力量，错误地把失败的一切重担推在组织错误上。（2）把失败原因的重心放在群众参加不力并宣布广州暴动是“军事投机”的修订版，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实质上是推翻了第一部分，责备广州暴动是为时过早的盲动。（3）把巨大的牺牲解释为我们策略上的失误，失误无疑是重大的，但完全掩盖了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进行惩罚的政治意义。（4）不能对领导人提出要求并指责，认为领导人没有执行法令，哪怕是没收财产的法令，因为当时还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一点现在应该向群众说明。（5）中央指出关于将广州暴动的优秀领导人开除出党和开除领导委员会的问题的决定是绝对错误的。（6）中央指出，在武装斗争期间无法举行群众集会，等等。广东省委在处分一条上的决定被完全撤销了，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下一次全会上将对广州失败的原因问题从政治上重新加以审议。（7）纠正对知识分子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错误。（8）解释军事因素在暴动期间的重要性。详细情况可看不久将寄去的决议^①。

许多新的事实证明，广州暴动确实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性。以下是新的情况：批评者们自己认为积极参加暴动的人数是1万到2万；我们见到的许多同志，党和共青团系统收到的许多来信都证明，工人们围在指挥部周围，要求发放武器，而群众，甚至机器工会的

^① 大概是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23—131页）。

群众是不顾领袖们的旨意到指挥部去的。竭力反对前领导的共青团员们讲了佛山县的农民尽管头一天夜里被大批杀害，他们是如何成千上万地拥向广州的，从花县和石围塘来的农民没有召唤就自己跑到城里来了。工人赤卫队无比勇敢，手无寸铁的工人都自动地奔向他们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已给你们寄去关于广州的材料，不久还将寄去更多材料，每一个细微的情节都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刻地揭示了广州暴动的无比伟大。那么何以解释广东决议的错误呢？首先是希望找到一个罪魁祸首，使某个人来为失败负责并承受工人人们的正当批评，其次是新的领导（李立三）希望在左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甚至在有机会主义的地方也同机会主义进行过火的斗争。当你向同志们讲述，他们通过的决议具有什么政治意义和不能跟他们一起到群众中去时，他们就吓坏了，立即同意纠正错误。李立三将会最起劲地为决议的各点而进行斗争（见他的信）^①，他在全会上主动发言，有消息说他在全会结束后拟定了决议的最后稿。

广州失败后的广东。关于广州和广东组织的构成，我已写过信。这些组织的状况，包括广州市组织的状况，是朝气蓬勃的。所有材料都证明，工人们中间没有绝望情绪，而有很多怨恨。所有工会被查封使一批又一批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拥有1万人的机器工会仍然是不可攻克的堡垒；对它现在应该特别加以注意。广东的农民运动正在发展，新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正在建立。我们正面临着扩大农民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需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并提出全省总暴动的任务。当然，我们现在不谈广州暴动的问题。

广州的影响。广州暴动的被镇压对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产生了最严重的影响。广州的失败没有给农民地区带来消极影响，相反，它现在已是一批又一批农民群众开始联合在其周围的旗帜。

^① 指李立三于1928年1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见《广州起义资料》第1卷，第286页）。

六、党代表大会

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务问题，解决目前党内的状况和克服党内一切错误倾向，迫切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目前，无论中央全会，还是党的代表会议，对于全党来说，都不是很有权威性。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状况，内部缺乏足够团结的情况，从右的方面和从左的方面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使党有必要通过新的选举来加强中央的威信。党的代表大会现在是所有党员都在考虑的问题，应该不晚于四月份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切实领导。现在正需要帮助党来弄清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中央一起给你们发去电报^①，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这可能要冒在紧要关头脱离党内积极分子的危险，因此代表大会应该这样来组织，使同志们花在代表大会上的时间尽量最少，包括旅途在内最多只能用半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参加代表大会的应该有一个100人左右的代表团，因为光是中央委员就有……人^②。在中国召开代表大会非常困难，首先是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其次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第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与代表大会有关的其他问题，A^③将向你们报告。

中共目前迫切需要什么：

- (1) 需要派一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驻的认真负责的代表；
- (2) 需要一些能够帮助领导游击队，特别是领导我们红军的军事工作人员；
- (3) 特别需要一批同志来安排宣传工作，首先是安排群众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具体人数没有指明。

③ 可能是 M. Я. 阿普列京。

性的党报。需要这些宣传工作人员来安排这里党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帮助做出版工作，教会进行群众性的宣传；（4）需要一笔可观的经费援助。这里的财政状况是极端灾难性的。我且不说连按预算的经费都得不到，这实在是一种犯罪，这一点必须立即安排好，但我要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方面的大量经费。最近一段时期损失如此严重，以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这里用在这方面的每一个戈比都是多么地重要和宝贵。此外，我认为，安顿好到这里来的工作人员需要相当大的一笔经费，这笔经费既要用于军事开支，也要用于派工作人员下乡，等等，等等，而在目前条件下在通常的预算范围内是不能实现的；（5）必须由一个人来对正式代表离开这里后所造成的混乱状况负起责任来。我们现在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同你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联系，当我们迫切需要用钱时，我们从这个联系渠道只能得到循规蹈规的忠告，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帮助，这种情况何以解释呢？

七、现在使党焦急不安和需要明确回答的一些问题。

（1）革命的性质。许多同志，特别是共青团乐意提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与这种提法相联系的有以下几种倾向：害怕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使一些同志，其中包括不少中央领导人有理由提出：小资产阶级已不是革命的同路人，与它进行斗争是我们的任务。

（2）许多工作人员提出，在农村我们应该反对统一战线，而且与豪绅和地主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变成为只依靠农村的贫民，甚至忽视小私有者的利益。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重分土地的问题在有些地方已经带来消极后果。

（3）试图只依靠“贫苦”工人，山[东]省委书记^①甚至建议成立由每月收入不足10元的工人组成的党。显然，我们这里实行的方针是，

^① 邓恩铭。

无产阶级应该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的任务不是把尽可能多的广大阶层推开,而是吸收他们参加革命,这样做不是通过放弃纲领的办法,而是通过坚持不懈地和耐心地解释一些问题、解释革命所面临的为争取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等等。但是应当说,许多实际问题对于我和我们所有人来说现在还是不够明确的(例如(7)和(5))。

(4)农民协会还是贫民组织。

(5)对于那些佃农很少和小私有者很多的地区的土地纲领。

(6)关于党在同国民党结盟时期的错误。现在在不少党的干部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过去同国民党合作的整个时期,过去的全部工作是一个错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也有这种情绪。因此,一些省的工作人员提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瞿[秋白]就这一点写道,我们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①,当然,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更具权威性。

(7)靠谁来发展党?我们采取的方针是,我们认为像广东那样大批地吸收入党的做法是错误的。经过挑选入党,主要吸收工人和贫农入党的方针,为的是使党不致陷于像海南出现的那种不成体统和稀里糊涂的状态。

最后谈一点个人问题。如果你们不认为我在这里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我想在这里呆到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认真做会议的准备工作了。否则就立即召我回去。

我恳请在中共党代会后离开这里。

亚历[山大罗维奇]^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343, 第 87—112 页。

打字稿, 经过校对的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号记录
(摘录)

1928年2月2日于莫斯科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布哈林同志)。

决定:(1)基本同意布哈林同志的电报草稿。(2)责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伏罗希洛夫同志最终审定电报草稿^①。

中央书记 科肖尔

全宗17,目录3,卷宗671,第1—2、5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第57号文件。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
中央的电报^①

1928年2月4日于莫斯科^②

绝密

暴动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绝对禁止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目前我们反对举行暴动。建议特别注意做群众工作,做暴动的政治准备工作,要组织力量,加强党的组织,做瓦解敌人的工作,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内建立广泛联系,有步骤地准备在城乡进行协调一致的发动。没有广泛的准备、组织和工农之间的联系,暴动注定要失败。第1号。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第 14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上有批注:原件送托夫斯图赫同志。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4月4日发出”确定的。

58

索洛维耶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6日于莫斯科

秘密·亲启

致布哈林同志

据丘贡诺夫同志^①报告,有一位中国同志^②接到自己的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同志^③的信,报告了以下情况:

1. 一批中共领导人由于对中共中央现领导的最近政策不满,公开号召成立新的似乎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

2. 这些领导人推举陈独秀和谭平山为该党首领。

3. 实际发起人和领导人是:

于树德——原中共北方委员会委员;

李求实——原共青团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6年)。

杨匏安——著名的广州工作人员,曾任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常任联络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赖特^③

全宗514,目录1,卷宗350,第13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周达文。

② 何人不详。

③ B. И. 索洛维约夫。

59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6日于莫斯科

秘密·亲启

致布哈林同志

昨天报告的关于中共分裂的消息^①，我们已通过彼得拉舍夫斯基^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同志进行了核对，向忠发同志根据孙逸仙大学一些学生得到的类似信息完全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他说，组织者们打算把新党称为“工农党”，首先在广州和上海地区开展活动，准备发表相应的声明，并与正在德国的邓演达进行谈判，吸收他加入该党。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赖特^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2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58 号文件。

② 胡兆镐。

③ B. H. 索洛维约夫。

60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

1928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

据我得到的消息，中共党内的分裂问题对于确定目前党内的政策具有极其重要和极其现实的意义。这些消息的实质可以归述如下：

1. 谭平山被开除出中共后，试图在自己周围纠集一部分省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广东省的工作人员，以便依靠他们进行反对现中共中央的斗争。

2. 广东省的一些工作人员，如杨匏安、冯菊坡（工会工作人员，前广州市委委员）、郭瘦真、阮啸仙（农民运动领导人，前广东省委委员），张善铭（原东方大学学生、现在与彭湃同志一起工作）等人，他们都受到谭平山的影响。

3. 谭平山的亲信有：原广州市委书记、被开除出党的莫苍白、于树德（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工作者）、李求实（原中国共青团书记）以及前湖北省委委员（钱介盘等）一批人。

4. 据邓演达说，现中共中央的部长周恩来同志和张国焘同志似乎也在向谭平山集团方面摇摆。

据我收到的廖焕星从德国的来信说，不久前（大约两个月以前），谭平山集团在香港发表了由谭平山、杨匏安、于树德、似乎还有周恩

来签名的声明,否定武装暴动的策略,号召建立工农党^①。

曾参与讨论广州暴动计划的叶挺同志在暴动开始前就临阵脱逃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无不受谭平山的影响。

这些消息使我得出以下结论:

(1)谭平山试图建立所谓的第三党(或工农党)^②。

(2)于树德和广州的一些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支持谭平山的图谋。

(3)陈独秀、周恩来和其他非广州的同志现在正摇摆于谭集团和中共中央之间。

(4)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反对现时的中共中央,从而也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

(5)这确实是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一取消主义倾向。

目前在柏林的廖同志与邓演达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邓演达的全部书信、电报、报刊都通过廖转达。因此我认为,谭平山是否想通过廖实现自己的对外联络和与邓演达的联络。特别使我感到愤慨的是,谭大概想通过与他接近的一些学生、一些广州人把部分学生(在莫斯科的学生)拉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广州同志罗易^③(中国劳动者大学的中国同志)早在一个半月前就把谭的意图告诉了我们。

鉴于以上这些消息,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目前召开的全会应该认真地提出中共党内的分裂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评价,确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192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共的谭平山,于1928年夏,与一批脱党分子和邓演达周围的国民党左派一起发表了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声明。以后该党不止一次地更名,试图发挥既不同于共产党也不同于国民党的独立的政治作用,因此也被称为“第三党”。1947年该党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与其非共产主义的小党占有合法地位。

③ 郭寿华。

定对谭集团的必要方针。作为近期的措施,我认为有必要:

(1)解除廖担任的工作并派另外的人。

(2)提醒中国劳动者大学的领导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支部对学生们与中国(特别是与谭平山)的联系加以注意。

(3)向中共中央征询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

向[忠发]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319, 第 46—47 页。

打字稿, 副本。

61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①

1928年2月13日于上海

绝密

敬爱的亚历山大^②：

布劳德带来的您的信^③，我已怀着很大兴趣读了。作为对您对罗米纳兹提纲的批评意见的补充，我想指出这个提纲的薄弱之处，这是主要的不足。

在罗米纳兹的提纲中，核心是暴动的技术准备，而政治和组织的准备被推到了次要地位。在技术准备方面，罗米纳兹的提纲是所有省的和基层的组织都能理解的，因为它只是从技术上重新按“作战方式”改组了党，而根本没有加强和扩大政治和组织工作；党没有吸收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也没有吸收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参加暴动的斗争，而相反，党包括红色工会在内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各城市群众的联系和影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善于提出和宣传中心的政治口号，以致我们在举行暴动时，越来越不像是一支正在发展壮大的群众力量，而相反，我们在举行广州暴动时（特别是在上海）只是作为一个团体的力量，甚至很少依靠工人群众。例如，上海的积极分子主张立即举行暴动，尽管党和我们的工会在工厂里就连五分钟的声援

① 信的副本，包括关于O. A. 米特凯维奇和A. E. 阿尔布列赫特的片断在内，已送交布哈林、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全宗534，目录4，卷宗216，第66—71页）。

② C. A. 洛佐夫斯基。

③ 见第47、48号文件。

广州暴动的罢工也不能举行。因此,通过提纲来进行反右倾斗争的罗米纳兹[无意间]帮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忙,而**主要是**,他的提纲使广州暴动过分地变成孤立的,甚至只是在广州本地的,准备得很不够的暴动。

依我看来,广州暴动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上是适宜的,因为它的**优点大于缺点**。但是缺点也是很大的,这是因为领导非常不力。如果许多同志在暴动失败后认为,广州的工人或革命力量会长期遭到摧残,那么根据现在的消息来看,斗志和力量正在积聚和发展;如果许多工人以前把广州暴动看作是没有必要的(“本来就不需要拿起武器”),那么现在甚至在广州的机器工人(机器工会)中也可以找到拥护暴动的人。

稳定的局面是否会出现呢?根据我们工会领导人苏[兆征]、沃罗夫斯基^①等人的情报,企业主(纺织业主、商船主、[Shipping interests]^②)出现了反对工人的某种联合,即不是经济上的联合,或者不同企业或公司的联合,而是反对工人的“统一战线”。但是,经济衰退并不像罗米纳兹所描绘的那样在大步迈进。特别是对纱厂不能这样说。不过我认为,谈论(例如佩佩尔^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稳定或联合是错误的。相反,蒋介石满足了一个集团(特别是自己的亲属)的意愿,但造成了两三个集团来反对自己,其中有李济深集团。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在增长,性质严重的武装冲击已不可避免。

现在主要的复杂问题是工农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说农民运动和暴动正在非常迅速和广泛地发展,而且很深入,那么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工人则受到摧残和镇压,城市里的暴动还相当遥远。因此,如果说现在提出在许多农村和县城立即举行暴动并扩大农民暴

① 黄平。

② 英语:船运同业。

③ 见第32号文件。

动范围的口号是[及时的],那么在城市里现在要百倍地强调和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口号和组织任务上,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基础,增加我们有组织的力量和同情我们的力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和简单的。显然,首先应该召开党代会来弄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党中央现在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省里的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无论如何应该立即派一名合适的代表,因为奥莉加^① 远远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

对共产党的工作和政治形势我就写这些简短的和[零散]的意见,因为我想粗略地谈一谈我们的工会工作和工会任务。

1. 首先,附上我起草的决议草案,它将给您提供总的情况和我们执行迫切任务的方针^②。

2. 您在信^③中已经指出关于罢工的含糊不清的表述。显然,这个决议带来了不少危害。罢工不仅是按工团主义的方式,而且是按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和进行的。上海纺织企业的罢工只是由上海总工会宣布的,既没有丝毫准备,也没有通知纺织工人本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Took Place^④)在上海电车工人方面。此外,在宣布罢工时,上层领导或总工会没有经过这些企业工人們的讨论或征得工人們的同意就制定了所有罢工要求。此外,所有罢工要求都包罗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立即增加50%的工资,20%从利润中扣出,生病期间支付双倍工资,等等。在宣传罢工时,给工人们许下很多(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而在罢工结束时,虽然进行得很顽强和很长时间,但除了失望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罢工的第三个错误是,罢工是靠恐怖(个人恐怖)手段进行的,而根本不是依靠群众的

① O. A. 米特凯维奇。

② 见《全国总工会的直接任务》,查里·施泰因的草案,上海1928年1月30日(全宗534,目录4,卷宗216,第1—13页)。

③ 见第48号文件。

④ 英语:发生。

力量,不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您在附上的决议中会看到对这种奇怪现象的谴责。

第二个根本错误是,我们的工会组织和党组织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党的工会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的工会,而工会机关缩小到或者说压缩到如此地步:整个中华全国总工会只是由苏[兆征](总工会主席)一人组成,主席团不再存在,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在决议中,作为第一条就是提出了工会机关的中央领导问题和建立群众性工会问题。

上面指出的这几点或几个问题,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特别是成立工厂委员会的问题,使我们党和工会积极分子感到非常[震惊],并引起了热烈争论,争论已进行一个多月了。如果说一开始我的草案遭到四面八方“扫射”的话,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意见:基本方针和所有任务制定得都是正确的,决议提出了与蒋介石或国民党政变后出现的形势,即我们工会所处的地下状态相适应的方针。

但是,我应该指出决议中需要仔细讨论的两点,因为许多同志怀疑这两点是否正确。首先,党中央作出决定,认为在中国成立或者宣传工厂委员会是不合适或者不合时宜的,因为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应由我们的地下工会来行使,或者说至少不能超出工厂代表大会一步。然而,尽管党中央反对工厂委员会(奥莉加在这个问题上再改变自己的立场:(1)同意,(2)反对,(3)同意和(4)反对),那么现在正在召开的由20名代表组成的工会代表会议则同意建立工厂委员会^①。不过我还是请你们非常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次,我们这里对蒋介石为对抗“工会联合会”而成立的“工人联合会”^②的评价和与它进

^① 见《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任务的决议》(1928年2月7日),《中国工人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第2卷第26—27页。

^② 见第155页注^②。

行的斗争存在着分歧意见。例如,尽管在中国工人中不存在产生和传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在**我们**工会处于非法状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盛行像“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用革命词藻掩盖起来的妥协性工会,因此它已在三个工厂的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那末我们能光通过外部的批评和攻击来摧毁它吗?或者我们应该参加它们的会议并竭力从内部夺取它和立即改组它,把以前的所有领导人或官员抛出舱外。很明显,我并不提出**参加**“工人联合会”机构的问题,我只提出在全体会议或工厂大会上夺取[领导权]的问题。您可以看到,我在决议中甚至说,在“工人联合会”得势的工厂里,我们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会小组。所以,恳请您也对这个问题作出指示。其次,中国同志很不愿意去为争取**我们**工会的合法地位(open existence^①)而斗争,因为他们预见到会发生无休止的恐怖,因此对于所有合法的或者半合法的形式(俱乐部等)都远远估计不足;他们也看不到,工厂委员会或多或少地能够合法存在或者帮助扩大基础。因此,总的说来,我们(格奥尔格^②、布[劳德]和我)主张扩大基础,主张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主张加强我们(红色)工会和**组织上**(不是政治上)的**独立性**,主张细心地准备罢工和成立工厂委员会。显然,我起草的决议远不能成为您的提纲的基础,而只是一点**素材**,因为它是过分地建立在上海所犯的错误基础之上的,虽然说**这样的**错误倾向到处都可见,因此,提出的任务基本上和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不言而喻,奥莉加没有正确的方针,她自己随波逐流,最后完全溶入党的机关和党的工作,以致实际上她不再是工会工作的领导人。因此,只要您发来电报,让她把工会工作交给我,她回莫斯科去^③,那么我就立即坚持,必须执行您的指示。遗憾的是,她无论如何不愿走,

① 英语:合法存在。

② 乔治·哈迪。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坚持认为她的政治领导的重要,也就是说似乎没有“她”,中共就会“完蛋”。

关于中国工会代表会议,苏[兆征]同志将向您汇报,此外我们还将寄去所有材料和通过的决议。目前[我们这里]只有一些初步的消息,说制定和通过的决议中的总方针是与我的方针一致的。还将选出由 11 名委员组成的总理事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从 11 名委员中选出由 5 人组成的书记处,将常驻在上海并领导工会工作;书记处除定期发出通告外,每月出版两期中央机关报。因此,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大大帮助中国工会的领导人恢复和扩大了工会工作;帮助他们摆脱了极其困难的处境,但我们还是怀着极大兴趣期待着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中国工会问题的决议。

另外,我们并不藐视对中国工会工作的领导,并随时准备将这项工作交给从中央派来的另一位俄国工会工作人员。然而,如果中国工会领导仍交给奥莉加的话,我们将提出抗议,因为她对工会问题了解甚少,也很肤浅……^①

阿尔布列赫特已去莫斯科,当然,他会反对建立我们[自己的]联络机构,等等。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我们隶属于(莫霍夫街的)国际联络局^②,那么我们早就应该关闭太平洋书记处了,因为阿尔布列赫特(也像奥莉加一样)坚持认为,我不能召开工会太平洋书记处会议^③,说我们会失败,会给参加我们会议的中国同志带来危害。此外,阿尔布列赫特拒绝帮助派代表参加我们的大会^④,同时,指出这次大会并不重要,因此我们求助于邻居^⑤,他们同意帮忙。最后,阿尔布列赫特已经三个月扣下川崎以及工会工作的经费没有给他寄钱了,现在我

① 此处删去了文件中关于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章节。

②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第二次全会(见第 285 页注③)。

④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⑤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的工作人员。

自己安排了联络并建立了机构,所以现在我们经常通信,召开会议,等等。同中国工会工作人员会晤的情况也是这样^①,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住所,进行会晤^②,等等。这样看来,没有必要隶属于(莫霍夫街的)国际联络局。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查理·施泰因^②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6,第 72—80 页

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

② K. 3. 琼森。

62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彼得罗夫同志^② 转布哈林同志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正在发展和蔓延的中共党内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会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后的发展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在评价我党领导成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③时说:“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

① 在向忠发的信上有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附言,内容如下:

致布哈林同志

秘密·亲启

副本送: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送上向忠发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于中共“分裂”问题的声明。

如您同意,必须征询我们在上海的同志对这一问题所了解的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彼得罗夫

1928年2月15日

② 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

③ 以下引文援引自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见《中国问题资料》1928年第1(10)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70页。

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①”。这是对中共状况完全正确的评价。它不但揭示了过去中共领导动摇的本质和根源,而且也向我们说明在中共内部由于实行将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党的领导机构和共产党的政策所发生的分裂和摩擦。已被清除出我党的人和那些现在还在从事某项党的领导工作的人,他们摇摆不定的社会基础是他们共同的。因此必然拉近党内那些动摇分子和还在从事负责工作的人的关系,他们必然同情谭平山之流、右倾取消派和半孟什维克派。

解除这样或那样一些同志(如陈独秀、张国焘等)的党内领导工作,不能不给他们造成某种共同的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委屈变成了对自己党——共产党的敌视,这又是小资产阶级性格所固有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高于党的利益。党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同这些人划清界限,为加强党的布尔什维主义领导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彭述之和蔡和森之间有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攻击中共中央,因为他们都仇视作为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罗亦农同志(布哈罗夫)对瞿秋白同志的态度也是这样。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是个不坚定的人,迄今为止思想上一直向右摇摆。陈乔年同志(克拉辛)最近未经中央同意对武汉所有党组织逐个进行了改组。

陈独秀同志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所以很难说他是否会同谭平山走到一起去。这样一些摇摆不定和不愿服从现时中央领导的人还可以指出很多。

显然,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省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当中党特别遇到了危机。近几个月来农民暴动的一系列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领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导不力，在于对党中央所采取的原则性方针理解的错误。最近出现的党和中国共青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证明了这一点。诚然，中国共青团中的“先锋主义”是由于党在过去出现的机会主义使它对党产生失望情绪而带来的后果，但毕竟充分反映了现时省里党的领导不力（例如关于释放汉口监狱犯人问题^①）和对中央方针的曲解。

党内分裂问题、谭平山党的问题，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进行斗争，既要从思想上加以揭露，又要从组织上加强我们的党。中共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克服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将取决于这场斗争的成败。

简言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 (1)调整党内关系问题；
- (2)加强中共中央问题；
- (3)加强省里党的领导问题；
- (4)对待谭平山党的策略问题。

鉴于我很快要去中国，所有这些问题使我非常希望与您谈一谈，以便第一，亲自向您汇报您或许还不了解的与中共过去的历史有关的一些情况，第二，听听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立等您的回音。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25—27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情况不详。

63

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

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安德烈同志^①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

我报告的题目是广州暴动。但首先我认为应该谈一谈中国总的形势,因为这次暴动是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主要经济是农业。农业的状况要比第四局报告^②中所叙述的糟得多。在中国有些省里,农业的状况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山东,大约有400万农民在挨饿。逃荒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例如,1927年逃到满洲去的灾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100万到150万。盗匪活动现在是中国习以为常的现象。光是广东一个省就有大约7万匪徒。军队人数大大增加,大约已达100万到150万人。这些军队都是靠农村出身的人来补充的。农户的分化和分散达到了极限。

工业的状况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而在有些城市,例如在汉口,则是灾难性的。工业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外市场生产。国内市场混乱不堪,这不能不对工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掠夺性的内战主要反映在贸易上。公开掠夺商品,捐税繁重,占据轮船和铁路等等使许多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滞。

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1927年7月英国驻北京商务使团的报告:“汉口市和长江其他港口的贸易都停止了”(第33页),“长江沿

^① Г. И. 谢苗诺夫。

^② 可能是指 Я. К. 别尔津的书面报告(见第54号文件)。

岸从事采购出口商品和分配进口商品的所有外国企业都关闭了”(第 11 页)，“在[19]27 年的下半年，上海海关的收入减少了 400 万银两，也就是说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20%”(第 25 页)。

英国消息来源提供的这些资料与中共中央最近召开的十一月全会的资料完全符合，这充分证明中央的决议^①是客观的。

华南地区(其中心是香港和广州)的贸易在继续不断地衰落。由于掠夺性战争连绵不断，盗匪活动日益猖獗，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特别是在最近广州暴动以后，华南的贸易大大缩减了。

所有这些材料充分证明中国的贸易状况极其严重，没有任何理由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善。

国内主要的水路和铁路运输线都只为一些军阀的内战服务。铁路建设停止了(满洲除外)，运输逐渐遭到破坏。

显然，在工业、贸易和农业的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财政状况不可能好。它是同国内总的经济形势相适应的。

某个“临时进行统治的”军阀所发行的纸币的贬值更加加重了形势的严重程度，有时甚至引起了金融灾难，今年夏天在汉口和广州暴动前不久在广州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最近关于香港七家中国银行和广州许多中国银行破产的电讯消息鲜明地描绘了这种形势。

对 1928 年中国经济形势进行总的分析，可以坚定不移地说，目前没有资本主义趋于稳定的任何迹象，相反，国内经济在继续瓦解和崩溃。

考虑到中国的这种经济状况，可以大致确定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它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全部中国实质上就是周期性的农民暴动史，经过多年的农民战争后造成了全部土地的重新分配。现在农户的极端严重状况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① 见第 159 页注^③。

的问题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

农民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了。各种秘密社团,如“红枪会”、“大刀会”等等大大发展,这是农民群众极度不满的征兆。

在湖南、广东和湖北省进行北伐后,开始出现自发的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约有几百万人(没有精确统计)。这些农会一出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它甚至比我们1905年时的俄国资产阶级还软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50%以上的工业、运输业和金融业属于外国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被日益发展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吓坏了,它感到自己力量薄弱,就转到反动派阵营里去了。它现在不是统一的整体。它分裂成与各军阀集团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派系。

在广州暴动期间,资产阶级感觉到了红色危险的直接威胁,作出了一些联合和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可伶的尝试。例如,广州的商会在暴动后决定成立自己的武装卫队,以免受工人阶级的侵犯,认为军阀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另外一个例子:在广州暴动期间,广州和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如何共同对付共产主义的危险。广州暴动被镇压后,这种“联合”行动停止了,目前,资产阶级分成了许多相互敌对的派系。有些派系寄希望于英国,另一些派系寄希望于日本,等等。有些派系资助这个军阀,另一些派系资助另一个军阀,等等。

资产阶级的这种瓦解过程是与国内经济的性质和整个经济的继续瓦解和崩溃相适应的。

由于我在开始时谈到的那种经济状况,工人阶级目前正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众所周知是相当好的。

由于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工人阶级开始在中国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

从以上比较简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八月代表会议^①上正确地提出，现在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为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而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现在来谈谈暴动的准备工作问题。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是从南昌进军时开始进行的。我只简单地来谈一谈这一点。暴动是在南昌，在张发奎军队中开始的。参加这次暴动的有叶挺和贺龙的两个师。他们向南挺进。预计这两个师在进军过程中将进行革命的群众性工作，将会唤起强大的农民运动。这次进军结果完全失败了。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实际上还没有掌握八月代表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政策。很说明问题的是，被派去领导暴动的中央委员张国焘同志原来是反对暴动的，公然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谭平山成了暴动的领导人和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因此很明显，这支军队采取了什么样的机会主义方针。毫不奇怪，当农民在军队行军途中的一个地区夺取了土地，而一位师长则派士兵到这个地区去平息农民（周恩来同志的话）。当这支军队进入汕头时，曾试图把武器发给工人，但没有谁来领取（张太雷同志的话）。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是同军事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完全相适应的。在第一次战役（在会昌附近）胜利后，他们决定转向另一条路，而不是去追逐敌军。部队前进得很慢，到处停停走走，等着敌人来包围他们。最后，他们决定进行决战，一开始他们具有很大优势，敌人已经仓皇退却。这时第二师来了，参加了战斗，这是决定结局的战斗，但我们的军队被打垮了。如果叶挺和贺龙的军队早一天发动攻势的话，这场战斗有可能赢得胜利。

一个很典型的事件说明了军队内部的团结状况。在这次失败后，贺龙军的一支约三千人的队伍退到了陆丰城。在这里与李济深的第13师相遇。力量对比几乎相等。贺龙的一些具有反动情绪的军官决

^① 见第83页注①。

定投降,命令士兵放下武器,任敌人来包围,并转到了李济深方面。

叶挺和贺龙的全部军队只剩下了大约一千人,由一批坚强的共产党员领导,突围到了海丰附近的农民暴动地区。在那里,这些残部被称为工农第二师,对开展这些县城的农民运动给予了很大帮助。

由于这些部队向南挺进,在广州开始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按照明确的指令,我们应该在叶挺和贺龙部队接近广州时就准备举行暴动。由于这支部队没有到广州附近,所以暴动没有举行。但是如果部队即使离100公里远,广州暴动也会举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成立了工人战斗队,人数达两千人,打下了军事组织的基础,建立了领导整个工作的军事中心。

后来,在叶挺和贺龙军队失败后,省委^①考虑到土地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广州工人群众革命情绪的日益高涨,没有把武装暴动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销,认为暴动的问题在不久将来,在李济深和张发奎集团之间即将爆发冲突时将切实可行。

此时,土地运动在广东省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了,波及到大约15个县和海南岛。在海南岛,大约六个月以前就开始举行暴动,波及到海南岛一半以上地区。约有1000到1500名武装农民,而共产党在这个岛上有1万名党员和共青团员(根据海南岛区委报告;地委的这些数字是令人怀疑的)。广东省有三个主要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1)海丰和陆丰;(2)海南岛;(3)北海市和廉州附近。

广州工人阶级的状况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广州有大批失业的香港罢工者,约四万人,这种状况就更恶化了。

在李济深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工人中的情绪明显是革命的,表现在罢工、群众集会和群众性示威游行上。可以列出的大罢工有:海员罢工、汽车司机和邮电业职工的罢工。此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中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是在大约有3万成员的地下红色工会的领

^① 指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导下进行的。我亲自参加的一次示威游行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示威游行是在10月14日进行的)。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大约有6000到7000人,多数是海员。这次示威游行的特点是,明显表现出了广州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示威者占领了海员工会大厦。当黄色海员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们走出大厦时,他们立即遭到了砖块的袭击。

广州工人的这种革命情绪对我们广州的党组织也有影响。广州的党组织是中国最优秀的组织之一。它通过工会组织与工人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领导着他们日常的经济斗争,维护着他们当前的切身利益。

省委曾两次作出在广州举行暴动的决定^①。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压力下,它又不得不放弃这些决定,因为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是,暴动事先注定要遭到失败。省委考虑到广东省的情况,正确地认为,存在许多有利的因素: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工人的革命发动,以李济深将军为一方和张发奎将军为另一方的两派军阀之间已开始争斗。根据省委的意见,当这场争斗达到顶点时,那么也就是夺取广州政权的最有利时机。如果能够在广东夺取政权,那就有可能建立红军,在波澜壮阔的农民暴动的背景下,或许能够夺取全中国。

11月16日,张发奎将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摇摆后夺取了广州的政权。军事组织很了解张发奎准备夺取政权的动向。早在9月份,军事委员会^②下面就成立了情报局,情报局出色地进行着工作。我们预先得到了张发奎准备夺取政权的所有命令和计划的副本。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张发奎夺取政权的那一天,省委认为是发动的合适时机。自然,我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在张发奎发起夺权的时候,尝试举行暴动当然是不行的,因为这时广州街头大约有15000士兵荷枪实弹。最后终于说服了省委。

^① 见《广州起义》,北京1988年第88—97页。

^②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张发奎几乎是没有流血就夺取了政权,只死了20到30人。群众根本没有参加这次纯军事政变。张发奎夺取广州后,开始向李济深部队发起进攻,但这些师未经战斗就撤到该省的内陆地区去了。因此,张发奎不得不几乎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调到前线,离广州越来越远。

12月10日前,张发奎几个师的驻防情况如下:(1)第12师和第26师的一部分向梧州方向推进,对第7军发起攻势;(2)第2师和第26师的一部分占领江门后,向第13师发起攻势;(3)第25师驻扎在石龙和惠州,以便从东面保卫广州,防止第11师和海丰的红色农民部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几乎所有部队都撤离了广州,只留下一些新编的部队,大约4000士兵和2500人左右的警察。其余的力量都开往前线,与李济深的部队作战。李济深将军采取了非常巧妙的策略。他没有同张发奎的军队进行决战,认为这样做对他不利。他需要赢得时间来积聚和改组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一直退却,引诱张发奎部队进攻。

这时,党在进行最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认为暴动的时机已经临近。

12月10日,张发奎司令部会议上作出决定,不再继续进攻,而转为对李济深军的防御。这一天,张发奎司令部得到情报,说我们的组织在准备暴动,并且我们从组织上已掌握了广州的整个一个团。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第2师和第26师的一部分立即调回广州,解除这个团的武装,彻底消灭工会和共产党的组织。这时革命委员会面临一个问题:不等张发奎部队到来就举行暴动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解决。

广州内部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红色力量方面有教导团,有1200人,并成立了赤卫队——由各工会会员组成,共2000人。赤卫队武器很少,总共只有29枚毛瑟枪和200枚炸弹。一些后备的步枪在商船上的海员手里,但在暴动开始时没有指望他们。革命委员会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力量进行突然袭击是可以夺取城市的。开始时暴动有两个方案。我一开始坚持的方案是这样:中午12时,组织工人示威游

行；示威游行时宣布总罢工；武装的教导团参加示威游行，并开始占领政府机关和各区。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很明显，如果不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那么他们就会借助于大炮和机枪立即将暴动镇压下去。于是只好采取夜间的方案。这个方案先是教导团举行夜间暴动。团长[朱勉芳]和部分高级军官是反动派，不过那里有大约300人组织得很好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团的、营的和连的委员会。事先就拟定了夺取团的计划，任命了新的指挥人员。计划在夺取这个团以后，就分成几个营，开始夺取城市，而赤卫队集中在市区的两三个据点里，准备夺取市中心。12月11日3时30分，暴动开始。根据军事组织的信号，全团在团里集合。张太雷同志代表广州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讲话。讲话后就通过一项决议，推翻张发奎的反动政府，让其彻底服从广州苏维埃。当团长试图为国民党辩护时，他和其他15名反动军官立即被就地枪决。这以后，全团分成几个营，根据革命委员会的计划，以战斗的队列行进。第一营的任务是将驻扎在我们团兵营附近的步兵团缴械。第二营是将驻扎在沙河兵营里的一个步兵营和炮兵团缴械。第三营是向公安局大楼行进。以出其不意的夜间攻击，出色地解除了步兵团和炮兵团的武装。缴获了大约30门大炮，解除了步兵部队的武装，缴获了大约1500枝步枪。由于有了司机的地下组织，有可能掌握全部汽车库。暴动开始前，装满大炮和步枪的汽车开到了兵营，并向市中心的公安局大楼行进。

警署大厦于3时30分受到赤卫队的攻击。但赤卫队未能占领大楼。正在围攻时刻，我们团的一个营来到了。就在15分钟内一起将公安局大楼占领。革命委员会的指挥部就立即设在这个大楼里。

大约到2时，整个城市已掌握在暴动者手里。只有在市中心，还有几个据点没有占领：李济深的宅邸，是名副其实的堡垒，以及第2、第12、第4军的军部。这四个据点未能立即占领，只好将其包围。但是整个城市，所有区的公安机关都已掌握在革命委员会手里。占领城市后，立即开始成立工人自卫队。全部武器，在沙河兵营里夺取的全

部大炮都集中到革命委员会的指挥部里。

第一天结束时,只剩下第四军军部和李济深宅邸没有被占领。其余所有据点都已攻下。在第4军军部里有200名用步枪和机枪武装起来的精锐士兵。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进攻被一一打退。当时决定焚烧旁边的房子,并把大炮运来。火烧时,旁边的中央银行大厦烧着了。到上午10时,第4军军部终于被占领。大约100名士兵,从军部撤出来,乘上了军舰运来的小船,就这样逃走了。这以后,银行也落到了我们手里。

次日2时,敌人开始反攻。反攻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海南岛。这个岛上有李福林的两个团,约3000士兵。在舰队的支持下,他们开始向银行发动正面进攻。第二个方向是从北面。那里有李福林将军的四个团,是李济深派到那里去对付唐生智将军的。就是这些部队沿广汉铁路南下,从北面进攻广州市。从北面进攻的还有民团的部队。反动势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从北面来的一支敌军,离革命委员会指挥部只有200步之遥,试图以突袭方式占领指挥部。这次进攻被打退了,而且还俘虏了150人。李福林向银行的第二次进攻是在军舰上的炮火掩护下进行的,但也被打退了。

应当指出,工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晚上6时前的一切进攻都被打退了。广州的形势非常严峻。城市三面起火。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机枪和步枪子弹声到处噼啪作响,但是工人团体和工人队伍不顾这一切依然表现得很出色。到第二天快结束时,所有进攻都被红色军队光荣地打退了。

第2天夜里,根据革命委员会得到的情报,显然红色的广州已处在张发奎和李福林部队的包围之中。广三铁路车站被26师的一支队伍占领。从海南岛来的李福林部队估计到正面攻击银行可能会失利,就渡河南下,在那里集中后准备从东面发起进攻。从北面来的部队占领了粤汉铁路的车站,准备从东北面发动进攻。驻扎在石龙的25师部队沿着广九铁路线运动,已逼近广州。广州周围已形成一白卫势

力的包围圈。革命委员会面临一个问题：是继续守卫好呢还是撤退好？当时确定，守卫红色广州怕是不行了，因此在夜里决定，凌晨4时撤退。一些工人队伍须编入我们的团，一起突围向海丰农民暴动中心挺进。这就是暴动的大致情景。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广州暴动没有成功呢？这里自然有许多客观因素：(1)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2)工人们不会使用武器(75%)和构筑街垒；在进攻时，工人们由于不会使用武器而向自己的士兵开火；(3)暴动时，所有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了。李济深暂时停止了对张发奎的军事行动。帝国主义者给白卫分子帮了很大的忙。李福林部队公然在英国国旗下渡江等；(4)我们的军事组织软弱无力。在敌军中的工作一直很糟糕。这是中共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缺点。军事工作经常被置于次要地位；(5)黄色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达5000人。

革命委员会决定暴动时，是了解所有这些客观因素的，所以这些因素不是失败的原因。革命委员会估计到了这些客观因素，正确地作出了发动的决定。造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主观因素，这些因素是以我们为转移的，而不是以总的形势为转移的。当然，如果没有客观因素，那么主观因素不会在失败中起如此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极其重要的主观因素有以下几点：

(1)暴动计划考虑得不周全。犯了两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暴动一开始就应该占领东山(广州郊区，广州资产阶级住在那里)并抓获反动派的首领即张发奎及其司令部。但没有这样做，使反动派的首领得以逃往海南岛，并带领自己的部队，组织对红色广州的进攻。

(2)把占领第四军军部大楼置于次要地位。这使敌人有可能进行防御，从而延误了整整一天时间。

(3)对四个据点的包围持续时间过长。这些据点是在第二天中午才占领的。本来应该留下小部分赤卫队驻守在这些据点周围，把所有

力量投入到对海南岛、军械厂等等的进攻上,不给敌人积聚力量的机会。拖延一天到一天半时间就使敌人有可能积聚力量并转入反攻。这是主要的错误之一。本来应该从第一天早晨起就开始向敌人发起进攻。30门大炮中只有5门大炮开了火,因为炮兵很少。但即使这样本来也是足够的了。这支炮兵队伍本来可以用出其不意的进攻占领海南岛并解除李福林部队的武装。丧失主动性并由进攻转向防御是暴动失败的原因。

(4)不善于利用俘虏和工人队伍。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头一天晚上完全正确地决定必须把俘虏编入工人队伍,编入我们的团,以便组成**5000到6000人的突击队**,而不是1000到1500人的突击队。由于叶挺的罪恶的疏忽,这项决定没有执行。

(5)在粤汉铁路车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弹药武器库,那里大约有5000枝步枪。尽管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但没有去占领这个武器库。

本来是很有可能占领的。

(6)任命叶挺为总司令是个很大的错误。我曾反对这项任命,但我要对这项任命负全部责任。我的责任甚至比革命委员会其他委员更大。因为我意识到这项任命的危险性,但未能说服革命委员会。很难有比提叶挺当总司令更不恰当的事了。这位“中国将领”没有任何资格当将领。他不理解革命运动。实行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方针,不相信暴动会以胜利告终。从进攻转向防御是这次暴动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防御对于任何暴动来说都是灭亡。从进攻转向防御的责任主要由叶挺来承担。

这些主观因素对于暴动来说都是致命的。我认为,这是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现在来简短地谈一谈广州暴动的意义。这里有两点:第一,暴动具有巨大的鼓动意义。我们还没有足够估计它的意义。最主要的是,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们实际上掌握政权三天。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第一个法令就是关于将土地重新分

给农民的法令。这一事实将会在农民运动的发展上起极其巨大的作用。第二是这次暴动的组织意义。很难预料，中国革命将会不流血地一举取得胜利。我们在俄国也是从一系列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工人阶级在广州遭到的失败将为组织暴动提供必要的锻炼和经验。在广州这是第一次举行暴动。广州的工人完全不会构筑街垒。我曾视察了这些街垒，简直可笑之极。这种经验不是一下子就取得的，这种经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取得。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在广州暴动后一个星期接到的省委的信^①。整个信是以健康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写的。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广州党组织得到了革命的锻炼，它已经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组织。省委在信的结尾写道，如果说这一次红色广州遭到了失败，那么下一次广州的工人将会很好地组织暴动，并将它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现在谈几点具体的结论：

(1) 必须在中国建立坚强的政治领导，为此需要派三名在党、工会和军事工作方面很有威望的同志。这样做尤为必要，因为现在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十分困难。

(2) 必须立即选拔一批具有地下工作经验和懂得外语的游击军事人员(约15人)。现在特别缺少领导广泛游击运动的人员。

(3) 必须在莫斯科举办游击军事训练班，由150名中国人参加，给他们提供领导游击运动的专业知识。

(4) 必须派两三名军事人员来领导中共的军事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后意识到，在直接革命形势下，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军事组织。

问 题

日古尔同志：撤退是怎样进行的？用什么方式组织从广州撤退

^① 信没有找到。

的,又是怎样顺利完成的?

阿本同志^①:对李福林军队做没有做工作?在暴动发生时,在我方和敌方进攻和撤退时伤亡情况怎样,特别是共产党员。上层领导人是完全得救了还是部分牺牲了?

潘诺夫同志:在暴动前是否与广东省暴动的农民建立了联系?

维尔什宁同志:暴动时上层领导和群众之间的传送机制是什么?

马马耶夫同志:暴动时香港的罢工者有多少?向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提出的口号是什么?暴动前有没有同张发奎联系?中共党员总数是多少?

费林同志:在发动时有没有事先考虑到暴动失败的方案?有过哪些推测和现在的实际情况怎样?

鲍罗沃伊同志:有没有从银行里运走银子?

马马耶夫同志:有没有估计过敌人的部队到来的时限?是否占领了郊外的大军械厂及市内的小军械厂和造币厂?

布德凯维奇同志:如果在海南和东山交战的话,力量对比情况怎样,还能派多少力量到别的地方去?

安德烈同志:革命委员会工作的缺点之一是撤退进行得不够好。根据革委会的决定,我们撤退的部队应该到海丰农民暴动地区去。在我离开指挥部前,只组织了一支2500人的队伍,由教导团、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黄埔学生和并入这个团的最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组成。据报纸报道,这支队伍冲破了包围圈。这支队伍现在在哪里,我就不得而知了。

李福林部队中的工作没有进行。在占领城市时总共牺牲了20人,不超过此数。占领炮兵团和步兵团时没有交火。在攻打公安局时牺牲了几个人,在攻打第四军军部时有几十人牺牲。在暴动的前半段,总共牺牲了几十人。暴动后半段,在击退进攻时,牺牲的人数要多

^① A. J. 赫梅廖夫。

得多，例如，在银行那里大约牺牲了200人。根据广州委员会收到的统计材料，共产党员大约牺牲了150人。暴动前整个共产党组织共有1500名党员。敌人伤亡情况难以确定。大约打死了800名警察。我在巡视城市时，看到到处是警察的尸体。此外，大概有600到700名中国资产者被处死。当工人们碰到一位肥头硕耳的资产者时，就立即把他处死，还应该指出，工人们这样做是怀着很大激情的。在占领一些团时，就地处决了军官。

暴动被镇压后，我不得不路经整个城市，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到处堆满尸体。在银行门前，尸体堆积如山。我看到一些载货的汽车，上面堆着尸体。根据衣着判断，其中有些是工人。另一些则是白卫分子。报纸上的材料说，死亡的工人大约有3000到4000人。主要都是在镇压后牺牲的。革命工会，特别是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人们被残酷地处死。上层领导人全部得救了。只有中央委员、原鲍罗廷的秘书张太雷同志牺牲了。他是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当调教导团去举行暴动时，他第一个在这个团里发表演说。广州党组织的书记黄平同志表现特别出色。在非常艰难的形势下，他表现得惊人的坚强和勇敢，这是一位非常出色和宝贵的工作人员。他现在还活着，尽管我们坚决要他转移到香港去，但他还是留在广州。中央为了保留他为党做工作，决定暂时派他去莫斯科。

广州周围的农民组织大约有700名成员。暴动时，他们都到广州来了，占领了广三车站，在那里夺取了金库，得意洋洋地用推车把钱运到革命委员会来。与农民队伍的联系是有的，但应该指出，广州周围的农民组织为数不多。广州周围只有一些靠城市生财的富裕农户。

敌人的组织——广州周围李福林的民团要强大得多。与海丰县暴动队伍的联系是通过信使书面进行的。革命委员会清楚地知道那里发生的情况。在暴动的前三天，向那里发去一项指示，要农民武装组织向广州方面进发。

上层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在暴动期间是直接进行的。每个暴动队

每隔一小时就直接向指挥部汇报一次,每个战斗单位也都是这样做的。团长不止一次地到指挥部来报告。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机构。

香港的罢工者曾经达到4万人。李济深考虑到这么多革命的香港罢工者在广州很危险,就把他们驱散了。他宣布,11月20日每个罢工者可以得到75中国元。国家的整个救济停止。食堂和宿舍将关闭。张发奎在政变后也采取同样的方针,给每个罢工者发了75元,关闭了食堂和宿舍。显然,这以后大多数罢工者都自找出路了。大约有800人被派到广东省的各个县去领导农民运动。300人组成了专门的赤卫队,200人被补充到广州的卫戍部队里。总共约1000人留在广州。

暴动的主要口号是:“给工人饭吃,给农民地种。”“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打倒战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者”,“和苏联联合万岁”,还有其他许多口号: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大工业国有化,大住宅国有化,对生产实行监督,增加军饷,对士兵的军费进行监督,分配给士兵土地,等等。记得有17个主要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口号。

共产党员的总数是2到3万人(没有精确统计)。最近一个时期,人数有所增加。在中央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广州征收党员。

关于同张发奎的联系。我在谈失败的原因时还忘了一点。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本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在向汕头进军期间,当叶挺和贺龙占领汕头时,张发奎开始动摇了。他甚至开始和我们谈判。这里需要了解和理解中国军阀的心理状态。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时机。黄琪翔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他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容留共产党员比谁都久。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里担任许多负责的职位。我一直坚持必须同他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对谈判下了“禁令”。只有个别一些军事人员主张谈判。

在暴动前一星期,在与李济深交成正酣时,张发奎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省委拒绝与他对话。

军事组织有自己的情报网，几乎在各个军事中心都有。情报工作进行得很好。

在制定计划时，革命委员会认为，有很多取得胜利的机会，但也有可能失败。唯一可以撤退的地方是石龙和海丰，即向东面撤退。我坚持认为必须把武装部队调到石龙，以便同农民队伍结合，从而保障自己的后方。

没有来得及从银行里取走银子，因为中央银行大厦着火了。

在制定夺取广州的计划时，曾考虑到能够夺取 1.2 到 1.5 万枝步枪。如果有 3、4 天时间可以由我们支配的话，我们就能成立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这样就可以**依靠街垒网**，大量的机枪和 **30 门大炮**，不仅能反击，而且能向敌人**积极进攻**。还考虑到农民队伍会从海丰开来，约有 3000 武装人员。

小的军械厂夺取了。造币厂，不记得是否夺取了。大的军械厂，本来打算去夺取，但没有夺到手。

我认为，不用付出很大伤亡就可以夺取东山和海南。任何一支中国军队，只要向它进攻，它就会退却。如果我们出其不意地进攻，那就可以俘虏它，缴它的械。东山可以不交火就夺取。海南，如果要夺取的话，可能要付出一些伤亡，但伤亡不会很大。

关于夺取武器的问题。当然，这可能改变局势。武器很快被工人们抢光了。在汕头，没有人来领武器，而在广州则不够。工人代表团前来要求领取武器。

革命委员会常常不得不拒绝提供武器。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情景：工人排着队从指挥部出来，其中 10 个人有武器，10 个人没有武器。

关于工人参加暴动的问题。在广州，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李济深掌握政权时，革命工会会员人数有 **20 万到 25 万**。现在，在地下状态下，红色工会一位领导人对我说，据他估计，总共只有 **3 万**。我想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的，而不是中国式的虚数。主要的工会有：**海员工**

会、人力车夫工会、印刷工会和其他许多小的工会,如香蕉商贩、桔子商贩、服装工人、制鞋工人等工会。总共大约有 40 个革命工会。

赤卫队是按工会系统成立的,分成几支队伍:香港罢工工人队(300 人),人力车夫队(600 人),海员工会队。小工会里的小分队则联合组成一支大的队伍。

这是在我回国两年后^①在一次军事人员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的经修改后的速记记录。显然,这个报告对主要问题阐述得不够好。在我现在准备的报告中,我将更详细地阐述与广州暴动有关的所有问题。

安德烈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351, 第 105—125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两个月后。

64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第3号记录^①

1928年2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布哈林、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罗米纳兹、沙茨金同志。

议程：（1）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②

（2）关于罗米纳兹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的发言。

（3）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

（4）关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苏联经济形势的报告。

（5）关于东方书记处问题。

（6）沙茨金和罗米纳兹同志的声明。

（7）罗米纳兹同志关于解除其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请求。

（8）关于罗易同志的问题。

听取：1——由布哈林和斯大林同志制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定：1——同意决议草案以及会上通过的修改意见。

听取：2——关于罗米纳兹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

^① 文件上有批注：打印3份，送科兹洛夫同志1份，送斯大林同志两份。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见第65号文件。

的发言。

决定：2——允许罗米纳兹同志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他对联共（布）代表团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某些〔条款〕不同意见，但他不反对联共（布）代表团的决定^①。

听取：3——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

决定：3——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

听取：关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非正式会议上作苏联经济形势的报告。

决定：4——建议李可夫或布哈林同志在全会作报告。

·听取：5——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问题（彼得罗夫和赖特同志^②关于解除他们东方书记处工作的请求）。

决定：5——认为有必要将东方国家重新集中到东方地区书记处，以便为像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大国设立书记处下属的分部，并由单独的主任来领导。任命米夫同志为中国部主任。

与彼得罗夫商量，他是否同意在东方地区书记处主持近东国家工作。

认为可以解除赖特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

听取：6——沙茨金和罗米纳兹同志声明，有些同志指责他们从事派别活动，原因是他们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各党内存在右倾的发言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特别会议上的发言^③。

决定：6——只限于业已进行的意见交换。

① 见附录。

② 分别为：Ф.Ф.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 В.И. 索洛维约夫。

③ 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速记记录》第1卷，第725—742、747—749、757—759、804—808、823—829、834—842；又见第25号文件。

认为有必要使共产国际各支部所犯的右倾错误在《共产国际》杂志^①和共产党报刊上加以阐述。

认为联共（布）代表团成员最好不要在共产国际机构的会议上相互攻击。

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出现的所有原则性问题应尽可能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内审议。

听取：7——罗米纳兹同志关于解除其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请求。

决定：7——鉴于票数相等，将问题提交政治局解决。

听取：8——关于罗易同志的问题。

决定：8——建议他去印度。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1928年2月22日第3

号记录 决定：2〔附录〕

致全会中国委员会

请宣读我的以下声明：

我不同意俄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决议草案中的许多论点。在联共（布）领导就一些有争议的中国问题通过决议以前，我曾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全会代表们可以从发给他们的材料中了解我的观点。

我认为现在来反对对自己党的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②。由鉴于

^① 《共产国际》杂志于1919—1943年出版。

^② 以下一句话被斯大林用笔删去：“由鉴于此，我将不参加委员会内和全会会议上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大林亲笔书写的。

此，我放弃在委员会内和在全会上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权利。不言而喻，我将毫无保留地服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付诸实施。

1928年2月24日

罗米纳兹

全宗508，目录1，卷宗58，共1、3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亲笔签字，附录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会议第 11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听取：9——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布留汉诺夫、斯蓬德同志）。

决定：9——决议列入特别文件。

听取：10——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报告人：布哈林、斯大林同志）。

决定：10——同意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委员会审议（见附录 2）^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74，第 1、3、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签署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附录 2）没有发表。该草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于 1928 年 2 月 25 日通过并在作一些文字修改后发表（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 年 2 月 9 日—25 日）决议和决定》，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第 62—72 页；又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46—151 页。

66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
第 17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2 月 27 日于莫斯科

听取：5——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冲突调解委员会的报告^①。

（见中央书记处 1928 年 2 月 10 日决定，第 13 号记录，决定：4—（2）^②）（报告人：斯藤、舒米亚茨基、帕霍莫夫、向 [忠发]、季曼施泰因、切尔尼亚夫斯基、诺维科夫、波克罗夫斯基、塔季耶夫同志）。

决定：5——采纳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建议以及向组织局提交的修改意见）即：

1. 在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的冲突方面：

1. 认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的冲突，不仅是由于学员构成的原因引起的，而且是由于东大领导人在对中国同志进行党的工作和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引起的。

① 以 Я. Э. 斯藤为首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冲突调解委员会是在 1928 年 1 月 20 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的。

② 1928 年 2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业已进行的意见交换基础上修改由委员会提交的决议草案。

2. 认为军政训练班学生不满情绪的表达方式（殴打同志、上街游行^①等）是在党的教学机关内的严重捣乱和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3. 认为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党的领导未能及时地对学生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提出警告，未能充分利用党内教育方式来防止冲突和为此目的来依靠中国学生中的广大积极分子。

同时认为，在中国学生中进行的党的教育工作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主要在中国革命当前任务方面提出的问题，特别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指导材料加工不够上。

I. 在东大总的工作状况方面。

1. 认为在组织和教学方面（管委会机关和教学部工作的确定、特别班和基础班的合并、预算纪律的实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东大管委会和支部委员会无论在学校党的工作的总的提法上，还是在对学生进行党的教育工作方面都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其结果是对领导的不满，除了中国同志外，还波及到相当一部分东大基础班的学员。

党的工作方面的这些缺点主要归结如下：

（1）在培养党的积极分子方面没有进行令人满意的挑选，因此造成学生中担任校内党组织和社会组织来自学生中的一些领导人软弱无力；

（2）东大领导缺乏与学生群众的经常联系，在安排党的教育工作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群众根据校内缺点、日常生活问题、民族纠纷等提出的问题，以及没有向学生充分通报支部局和其他学生组织的工作。

（3）在解决校内发生的局部冲突时没有完全正确地将党的教育方式同组织感化主式结合起来。

^① 见第214页注①。

2. 同时认为，在东大基础班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一些捣乱分子，企图采取联合行动，并要利用在上述客观缺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冲突来破坏东大领导的威信和加强自己在学生党员群众中的影响。

3. 认为东大基础班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无论从特别班的教学领导机构方面说，还是从课程设置、教员水平和保证有关语种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方面说，都还没有在特别班的教学工作中充分反映出来。

4. 指出在行政管理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东大工作人员过分频繁调动，行政部门没有根据日常管理需要与学生保持足够联系，在教学时间外对学生过多的行政监护，住宿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等等）。

5. 根据以上所述，认为有必要：

（1）同意解除党委书记韦尔特纳同志在特别班党委会中的工作，同时确认有必要将安德烈耶夫、普列斯涅夫、奥布霍夫和伊格纳季耶夫同志^①开除出校。

（2）认为还有必要让东大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上积极参与捣乱活动的分子——柳林、罗蒙诺索夫、格里鲍耶多夫、佩图霍夫、奥辛^②以及王戈和东大三名研究生——梅利克谢托夫、金山达和乌多里亚金离开学校；

（3）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和组织分配处审查和加强普通班和特别班教学工作的领导班子；

（4）向东大校长舒米亚茨基同志指出，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及时揭露学生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并通过党的教育途径来防止冲突的发生；

① 分别为：武胡景、黄士嘉、竺廷璋、宗锡钧。

② 分别为：鲁易、李侠公、朱代杰、马员生、贺声洋。

(5) 责成莫斯科委员会在东大党支部和学生组织进行改选时采取措施来加强其领导班子；

(6) 责成莫斯科委员会，考虑到学校党的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在进行党的教育工作时通过系统的指导和帮助来加强对东大党支部的领导。

(7)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批准确定由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会提出的改进东大工作的具体措施。

6.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向东大学生和工作人员传达此决定。

Ⅲ. 关于马雷舍夫同志的工作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审议。

中央书记

[附录 1]

1928年2月2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副本送共产国际东方部^①**

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近来状况的许多材料后，我不得不向你们再次声明^②：

1. 安德烈耶夫、普列斯涅夫和中国部其他中国同志在调查不久前发生的冲突的委员会工作期间及其后，不顾宣传鼓动部绝对禁止学生进行任何发动的禁令，仍继续进行原先的分裂活动和闹事。他们利用墙报——党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在文章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并攻击批评他们的同志，指责他们搞“派别活动”和“反党活动”。这一情况又使我们（委员会委员们）所调查和禁止

^① 此处及以下各处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② 见第 51 号文件。

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并导致学生中原先的不健康情绪重新复萌。安德烈耶夫、普列斯涅夫、奥布霍夫和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应对此负责。请发布指令立即将这些同志开除出东大，并且不要把他们送往其他院校，如国际列宁学校，因为他们还会在那里继续闹事，而要把他们遣送回国。

2. 舒米亚茨基同志作为学校的领导人在冲突期间及其后，未能找到解决这一迫切问题的方式，甚至在委员会对这一冲突问题作出明确决议后也未能使学生平静下来。相反，我们看到，在他的领导下情况越来越糟，不满情绪、不健康情绪在增长，中国部在分崩离析。我请求中央追究他的责任。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同志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学习如何闹事，学习如何从事分裂活动，学习如何捣乱布尔什维克队伍，而是为了使他们受到革命觉悟和革命经验的锻炼。如果发生闹事的现象，那么领导人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消除的措施，找到解决的方法，说服并使之平息下来，而不是任其继续蔓延和助长它。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领导人对这种状况不给以认真的注意，那也是不能允许的。

3. 在对不久前发生的冲突进行调查后，委员会作出了明确的决议。为了尽快地解决这一问题，我请求中央发出指示，在最近几天内召开中国部的全体党员大会，并派代表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关于中国部的状况和委员会作出的决议的报告。

关于东大中国部最近几天的情况，如果委员会还将召开会议的话，我可以在会上作详细汇报。

向 [忠发]

[附录 2]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副本送共产国际东方部

关于东方大学中国部同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问题

据我所知，关于东方大学中国部同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的问题，原则上已由联共（布）中央解决，迄今只等着中共中央方面的同意。

中国革命的发展最终消除了使东方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的任务始终有所不同的特点。如果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有过交往，为它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小小核心的大学，以便为它培养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国民党已变成反革命力量，共产党正与它进行浴血战斗，我们也就没有这项特殊任务了。既然中国劳动者大学应该变成和正在变成共产主义的大学，目的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工作人员，那么同时存在东方大学中国部和劳动者大学就没有必要了。否则，两个学校同时并存，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人力分散，教材分散，以及由于这种并存会造成在教学工作和党的教育工作方面的不一致，使一个学校与另一个学校对立起来（更不用说节省经费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会造成以东方大学中国同志为一方和以中国劳动者大学学生为另一方之间的界限，并从而产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两种类型的共产党员。这种情况是中共绝对不愿看到的。

另一方面，最近在东大学生和领导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清楚地证明，东大中国部同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

因此，我完全同意这种合并，我相信，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也会完全同意的（虽然我征询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是在东大发生最近的冲突之后）。

现在的问题只是通过何种具体办法来进行合并。抱着这个目

的，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将中国部的普通班转到中国劳动者大学。鉴于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必须根据他们的程度进行分配，把他们编入相应的班级。一部分同志已到结业期限（确切情况不清楚，可能很快毕业）应当送回中国。但这是次要问题，可以经过个别审定来加以解决。

（2）军政训练班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同志：

1. 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合适，真正愿意学习军事的；
2. 身体条件差，或者由于本人兴趣不愿学习军事的，或者政治条件不合适的。

培养军事人员的问题对中共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要进行农会武装力量的更加统一和更加强大的发动，并准备为……^①而斗争。为了使这项工作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必须对其给予比过去更大的注意^②。应该在某个地方，在直接军事主管部门下^③，开设这样的训练班。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好在莫斯科某个军校下面设立单独的中国部（或者连，或者营），它可以更好地照料学生，使他们真正学到必要的军事课程。

因此我建议，把留下来准备接受军事训练的同志派到上述将要设立的军校去，而将另一些人或者转到中国劳动者大学，或者送回中国，这要根据每个同志的情况区别对待。

（3）以后招收军校学生应只从中国工人和农民中挑选。学习期限应从一年半延长到两年，但至少一年半。

（4）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的中文出版社设专门的军事部，以保证军校所需的中文资料。

① 此处原文空缺。根据意思是：总的武装暴动。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5) 通过指定一批政治上更成熟和更坚定的中国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办法，来加强这个军校。指定一位俄国同志来领导军事工作，这位同志最好从曾在中国呆过并熟悉中国军队里军事情况的人中挑选。

向〔忠发〕

全宗 17，目录 113，卷宗 600，第 1、2—5、7、154—157 页。
记录为铅印稿，附录为副本，中央书记签字字迹不清。

67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2月27日于莫斯科

秘密亲启

致布哈林同志

今天我同向〔忠发〕和李〔震瀛〕同志进行了例行谈话，同他们一起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

在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当中，需要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1. 向同志提请我们注意，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最近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安德烈耶夫、普列斯涅夫^①等人至今还留在东大，没有离开，尽管中央宣传鼓动部委员会已作出相应的决定。^②

2. 必须立即提出和积极解决东大中国部同孙逸仙大学合并的问题，否则，根据向同志的意见，就不能很好地安排中国学生中的工作，必然会出现两个学校之间的纠纷。

3.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学院）^③高等院校中国学生当中，好像成立了什么带有暂时不十分清楚的互助目的的同乡会或其他这类联合组织。这个同乡会的成员经常会面和相互通信。据向说，参加同乡会的有：（托尔马乔夫学院）、蒋介石的儿子、（国际列宁学校）纳利曼诺夫和丘贡诺夫^④。

① 分别为：武胡景、黄土嘉。

② 见第66号文件。

③ 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

④ 分别为：蒋经国、俞秀松和周达文。

向同志很想同您和斯大林同志谈谈这个问题和一些其他党内问题。

赖特^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3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B. И. 索洛维约夫。

68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摘录）

1928年2月27日于上海

绝密

敬爱的亚历山大^①：

最近一个时期，到处都在搜查和逮捕。上海、汉口和长沙党的机关和工会机关遭到完全破坏。广州在重新整顿，中央和印刷厂幸免于难。但毕竟应该考虑到，我们在组织上已经摇摇欲坠。显然，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代表外，这里还需要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一位较好的代表。目前，说实在的或者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说，这里既没有政治领导人，也没有组织领导人。日前接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②总的说来是同我在上一封信中^③说的观点一致的。

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对工会工作只字未提，而中国共产党对这项工作远远估计不足，还存在着一种糊涂观念，不知道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有什么差别和差别在哪里，等等。对工会工作的糊涂观念和估计不足不仅在省的党组织中存在，而且也在中央存在。例如：（1）中央决定，不要成立工厂委员会^④，而我

① C. A. 洛佐夫斯基。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见第61号文件。

④ 文件没有找到。

在自己的决议草案^①中曾提出这个建议，不久前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②也决定为成立工厂委员会开始进行宣传。(2) 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由七名同志组成的总理事会，其中五人应当住在上海，进行领导，并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但中央现在，在上海工会理事会遭到破坏后，竟把总理事会的同志（五人）移植到上海工会理事会里，从而取消了工会领导中心，因此一切都照旧：组织上没有设立独立的工会机构，而只有党的工会委员会。(3) 我们甚至要进行斗争才能派代表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③。例如：中央阻止4名代表前往，扣留并花掉了我们发给他们去莫斯科的旅费1200美元^④。因此，对你们的中国工会提纲或决议应该补充上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相应说明。

正如苏[兆征]同志将会向您报告的，在工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与我的决议草案的差别是，通过的工会决议把武装暴动立即提到首要地位，而我的决议草案只从笼统的意义上谈到这一点，重心放在组织工作和罢工战略上，因为我认为，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我们离暴动还很远。我们离暴动很远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争取到群众，在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暴动的提法不合时宜，其次，我认为工会的决议应该与党的决议有所区别。总而言之，我在1月20日决议草案中说的几点已为最近发生的事变证明是正确的。

尽管您来电话，要我抓中国工会工作，让奥莉加^⑤参加代表大会，但是我想让布劳德同志参与中国工会工作，就像参与日本工会工作一样。布劳德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认为我采取的方针是

① 指 K. 琼森起草的《全国总工会的直接任务》的决议草案（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6，第 1—13 页）。

②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全会。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第 201 页注③）。

④ 原文如此。

⑤ O. A. 米特凯维奇

正确的，中共现领导对工会工作估计不足……^①

致最美好的祝愿和共产主义的敬礼！

你的 查理·施泰因^②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6，第 82—83 页及背面。

打字稿，原件。

① 此外删去了信中关于日本和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当前工作的片断。

② K. 3. 琼森。

69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的信^①

1928年2月29日于莫斯科

我于2月20日抵达莫斯科。正是全会^②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关中共的所有政治问题都已弄清。看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后，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最近几个月来，这个问题一直摆在我们面前。在俄国同志当中，谁也没有坚定不移地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在莫里茨的提纲^③中，我们原以为他试图提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但经过解释后，他本人也说，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资产阶级被它自己发动的革命吓破了胆，因此它不仅向半封建地主和军阀反动派投降，而且无条件地向帝国主义者屈服，因此它已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领导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它不得不与农民和城市贫民结成联盟担负起完成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使命。

① 文件上有H. A.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交布哈林同志阅。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见第218页注①）。

③ B. B. 罗米纳兹。指1928年1月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会议的与会者中散发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

现在在中国，谈论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只有像彼得罗夫^①那样一些过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完全丧失了根基，与群众失去了一切联系，习惯于在闭关自守的小组习气中进行工作，为恢复自己的名誉而向左转。

2. 关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问题。我认为，要说“联合”只能打上引号。如果拿最近三个月来的经济和政治事态来看，那么很明显，国内正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不仅没有恢复，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景气。海关收入和厘金^②，即使根据官方的资料，也削减了40%。还必须记住，到处都实行2%的关税附加费，且不算货币贬值在内。国内贸易几乎完全遭到破坏。臭名昭彰的所谓满洲的“稳定”现在已被公认为神话。鼓噪一时的贷款^③没有兑现，或许永远也不会兑现。伪票（满州元）贬值到如此地步，几乎到处都不愿接受。山东银行倒闭了，因为不能用银两支付自己的债券。这些都是经济“稳定”的事实。现在来谈谈政治“稳定”。国民党，不用说它已完全不再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见商会代表会议的决议^④），它已彻底垮台。广西派和广东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大。国民党最近一次全会^⑤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在三个月内召开。现在所有将领实际上都企图为自己的饭碗在夺取城市和省份。参加国民党最近一次全会的实际上只是蒋介石的一些仆从。这是谁都知道也是人们公开谈论的事实。蒋介石竭尽全力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维持国民党表面的统一。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无论李济深，无

① 彭述之。

② 厘金是地方政权在省乃至县的边境征收的内部关税。

③ 可能是指192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签订的内部贷款。

④ 指1927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各省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保护中国市场抵制外国竞争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要求。

⑤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届四次全会，于1928年2月2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

论白崇禧，也无论杨森都没有参加会议。多数收益最丰的省份（上海、湖北、湖南、广东）的收入都没有纳入国民政府的中央金库。蒋介石甚至未能夺取上海。白崇禧成了上海独霸的主人。湖北和湖南也落在广西派手里。广东则公开声明，它倾向于某种独立。大家对冯〔玉祥〕都持怀疑态度。没有谁跟他完全结合在一起。英国报纸公开说存在着十个国民党，谁也不想来驳斥这一点。

在北方，“联合”看上去也不是更好。在山东，孙传芳赶走了张宗昌。张作霖那里，连他的儿子^①也不反对给他的老爸背后一击，阴谋接连不断。帝国主义者公开声称，北方人正面临灭亡。军阀之间的战争，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没有停止，相反，在不断加剧。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多。税负已不堪承受。在奢侈品税的借口下，几乎对所有日用品都征税。

对这些赋税到处都在进行抗议，这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稳定”的因素。

可以看作是“联合”的唯一一点，就是各种反动势力都毫不留情地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在这方面，各阶级和各集团表现出令人感动的一致和合作。

但是，如果说在这方面表现出一致，如果说革命运动不得不忍受各个反动集团的迫害，如果说革命运动由于自己的软弱和不成熟而不能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分歧，那么依我看来，这种联合不能看作是反动派的稳定。

如果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混乱更多地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么不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可以说，混乱更多地反映在各个反动集团上，而形势过去怎样，现在还是怎样，还是没有出路，在中国，离新的更加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已为期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策略上的错误是什么呢？

^① 张学良。

依我个人的看法，策略上的错误在于，我们过分迷恋于准备暴动，而不训练我们的队伍去领导革命。暴动成了医治一切祸害的唯一灵丹妙药，而当有人提出问题，暴动只能是一系列成功的终结，我们必须选择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的适当时机，那么这个人就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

早在1927年10月底，我在与一些同志的交谈中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把全部注意力只放在暴动上是很危险的。相反我认为，我们把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直接革命形势和准备群众举行暴动混淆起来，是要犯错误的。在中国，这两个概念现在恰恰比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更大的差别。

其次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下仍沿袭着旧的策略。在汕头以前的历次暴动^①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那时还没有最终弄清，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已退出革命阵线，而在这个时期以后仍继续实行暴动策略，那就意味着把暴动变成为盲动。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但它犯了许多重大错误。主要错误是只迷恋于军事因素。我难以启齿，它是否可以延缓一下。问题是在中国，在那以前谁也没有组织过暴动，它们都是自发进行的。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还很不够，不足以判断是谁确定的。然而，广州公社的意义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很大的。我们认为中央代表^②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在广州的活动是从揭露广州暴动的所有错误开始的。但这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揭露这些错误，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在本来就受到压制的工人面前提出这些问题是极其有害的。更何况李立三（中共中央代表）的讲话很不策略，他提

^① 指1927年8月1日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南昌的暴动，海陆丰（广东省）的农民暴动和湖南、湖北、江西的“秋收”暴动。南昌暴动的残部到达广东后于1927年9月底经过几天之后占领了汕头港。

^② 李立三。

出这个问题不是基层主动提出的，而是为了表现自己（来个下马威）。然而，我们当中谁也不否认他的讲话所带来的有益的东西。他的讲话像是进行一次淋浴，促使党去认真考虑迄今为止好像没有被人发现的种种现象。党内几个月来已经存在着一些很不健康的现象。其中主要的就是“英雄主义”精神。组织和教育群众方面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进行。主要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准备暴动”和秘密策划上。对罢工几乎没有给以注意。罢工要取得什么成果，确定的方针不切实际，而是提出了最大限度的要求。而且在罢工时，例如电车工人罢工^①时，常常强迫使用枪枝。每当有人提出有必要做组织工作的问题时，总是责备他是机会主义，等等。暴动到处都在准备：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甚至上海。而要进行这些暴动的条件几乎哪儿都不具备。然而，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工人们只想暴动，他们不相信其他斗争方式，他们说，让共产党员去发动暴动，而我们去帮助他们。党组织已经垮台，工会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批脱党的知识分子则叫嚷暴动。在上海，事情甚至闹到这个地步：省委发出了有名的第10号通告，号召各级组织采取措施，准备在白崇禧把上海交给蒋介石的时候立即举行暴动^②。

但是，这些几乎已经进行过暴动的组织却无力组织甚至一小时的罢工来声援广州。

现在革命阵线内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广州暴动无比鲜明地显示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内部所蕴藏的强大革命力量，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这一力所不及任务的工人阶级是多么软弱无力和毫无准备。我且不说上层领导，即党中央及其政治局的软弱无力，也不否认中央最近一个

① 指1927年12月上海英国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

② 文件没有找到。

时期在政治上有很大提高，克服了它过去所犯的许多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全党总的说来还不能胜任它所肩负的整个工作。因此常常从右的方针转向极左的方针。顺便说一下，这两种方针通常都是同一种颓废情绪的变种。这种摇摆何以解释呢？依我看来，主要是或几乎完全是由于缺乏正确安排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上层的组织。以加强基层支部这一基础来说，它没有做什么事，没有较好的各级委员会，没有与群众联系的传动带，没有工会，不会做农会的工作。总之，在革命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党不能利用有利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高潮是自发到来的。群众参加党又退出党，因为在那里找不到预期的帮助。例如，一些重要党组织里的党员人数，即使根据初略的调查，也是惊人地在流动着的。在高潮时期，上海党组织达1.2万人，现在就连正式的数字1500人，都是很令人怀疑的，因为谁也说不出有超过20人的支部。湖北的情况也是这样。正式的数字大约是3000人，但我认为不会超过800到1000人。湖南大约有7000人，但显然，这里的党员人数是大大夸大的了。据组织部人员说，没有一个支部书记能说得出，他那个支部究竟有多少党员。在广东，党员人数也是夸大的了。例如，人们认为，暴动前在广州有1800名党员，现在据最乐观的估计不超过100人。海南岛有1.4万名党员。但是，这个数字的意义可以这样来界定，广州暴动一个半月后，该组织竟向汉口政府发出致敬电，并要求为农民减租30%。工会的情况更糟糕。在上海，据权威的同志认为，大约有60名工会官员，约有100名半官员，而基层工厂委员会则根本不存在。几乎没有直接从群众当中涌现出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联系几乎完全丧失。人们对工人滥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去进行罢工。例如，纺织工人们公开声明，他们不愿罢工，但害怕共产党员强迫他们手执武器去进行罢工。原来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现在已脱离群众，继续按旧的宗法式传统

进行工作。工人们不愿参加会议，因为他们说，他们很不理解，老是谈暴动和罢工。人们不承认直接维护工人利益的日常工作，他们认为这是改良主义。例如，工人们现在很想参加一些兄弟姊妹式的互助会，由于这些互助会规模不大能够给予其成员某种物质帮助。党委会试图与这些组织进行斗争，而不是去影响它们，因而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在农民协会中，人们也犯了严重错误：不善于估计现实的条件和每个地区的特点，常常在小私有者的地区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因而遭到农民的反反对。相反，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反对没收土地，因而引起农民的愤恨。

据我个人的看法，通常人们超前提出成立苏维埃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因此苏维埃的思想威信扫地，而夺取政权的斗争没有考虑自己的力量和时机是否合适就进行。

建立红军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特点，军队有过分扩大的倾向。而由于这些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反对。这方面特别糟糕的是，这些军队常常撤走，留下农民为与军阀部队交战付出代价。

总之，在革命阵营内部情况很不顺利，更不用说在革命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灾难了。我还断然否认，似乎革命队伍之间的分歧已经消除（奥莉加的信）^①。相反，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发现这些分歧。使党清醒的时期刚开始，只是初步尝试从军事集团和军事组织的领导下解脱出来。

结 论

依我看来，目前，在大的浪潮刚刚退去，下一次革命高潮必

^① O. A. 米特凯维奇。见第 55 号文件。

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成立我们的工会，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机会的可能性。现在根本谈不上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政党。不应追求数量，而应追求质量。党不应成为人们不断进进出出的穿堂院。目前党应该尽百般努力来建立党的巩固的积极分子队伍，以便在革命高潮时将最先进的一部分工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必须开始进行成立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只要有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地方都要渗透到。党不能再容忍将工人留在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工会（广州机器工会）里，应宣布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和卑鄙分子。光有总工会的威望是不够的。靠威望是走不多远的。事实是英美烟草公司的8000名工人将跟着改良主义工会走。事实是工人们情愿诉诸于改良主义工会（纺织工人、铁路工人），最后，事实是在大工业企业、军械厂、采矿工业企业等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从事日常的枯燥的工作，使工人们从物质利益角度关心斗争。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加重所有党员的工作负担，并对他们进行教育。现有的机关报不能给党员提供任何东西，因为它们是为有学问的人创办的，工人看不懂。必须为基层党员创办党的报纸。创办这样的报纸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将意味着，重新建党的工作完成了一半。必须使普通党员经常地积极工作，使他们经常地进行自我教育，使积极分子开始从工人队伍中脱颖而出。

对于这批积极分子，现在的情况极其不妙。在上海，在工人最多的闸北，几周前选举了区委会，全是工人，但过了几周，这个区委会垮台了，因为得不到省委中的知识分子的应有支持。省委委员们对这个区委的失败简直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吸收工人参加党委会的方针的失败。如果说在中央所在的中心城市上海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在其他偏僻的省委会，情况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党应该暂时放弃英雄主义，放弃玩弄暴动的游戏，而应该重建自己的队伍，等待最有利的时机，以便共同努力给联合起来

反对它的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25—13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7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2月于莫斯科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促使我到莫斯科来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给中国共产党拨款的问题。

11月初，我曾写信给您，谈到这个问题的情况很不妙^①。

依我看来，主要毛病出在拨款不是从一个渠道进行的，因此给党内极不健康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2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要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这种现象自然不可能对党组织和对党中央产生良好的影响。

要求中央全面报告经费开支情况，但怎么也做不到。因为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监督。然而，我从与省里一些代表的谈话中得知，给省里的预算没有按月支付，上级组织将本来用于基层组织的款

^① 文件没有找到。

项截留了。

胡乱地挥霍拨给党的经费的一个矛盾的表现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光辉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该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

在同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①以前的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断绝关系以后，金库由一人掌握，而金库里的经费非常有限。因此根本谈不上追加拨款。党也不得不满足于共产国际拨给的那点经费，即仅约2万墨西哥元。在这个时期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无计划和无理由的拨款起了多大的腐蚀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这样一种做法上，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

然而，经费不足也带来了正面的效果。有些同志开始对党的经费采取较为节省的态度。在我离开以前不久，已有迹象表明，中央开始在研究党的经费分配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是从来不加重视的，并正在制定详细的预算方案。迄今为止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无计划拨款的不良影响。党的预算开支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

^① 1927年12月15日。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对党极其有害的一种倾向，即博爱主义倾向。在中国，工人的状况是极其艰苦的。所有比较激进一点的工人都被逐出企业，而在这种失业的情况下，这就等于饿死。因此，在党内和工会内有大量的失业人员。党没有任何生存来源，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有产阶级中同情者的支援，就只好走上对它来说十分有害的从自己的预算中进行救助的道路。这说明他们想要把自己的支出转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下，要弄到做所有工作，甚至很细小的工作的经费。据一些与群众有很密切联系的区委书记说，这项慈善活动几乎使全部工作无法进行。

我提请中央注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但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得到俄国同志（奥莉加、阿尔弗雷德）^①的支持，他们开始责备我没有良心，缺乏同志般的同情心，等等。总之，现在大部分预算都花在慈善活动上。当然，我也不想再说，工会、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经费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更加厉害。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您以及所有领导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条慈善活动的路可能是使党彻底垮台的路。

滥用经费的现象——截留钱款、挥霍浪费等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人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我应该惭愧地承认，一切深入中国同志当中并与他人打成一片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我们碰到的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我们是不参与内部事务的局外人。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党的预算的负面现象。

现在谈谈预算本身。

我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2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困难的工作条件，党所担负的诸多职能，如在农民中、工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工作，以及必须建立经常的联系，路途又很

^① 分别为：O. A. 米特凯维奇和 M. Э. 阿布戈夫。

遥远等等，那么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我建议拨给党总的预算为 3.5 万墨西哥元。应该责成它放弃任何慈善活动，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的办法帮助它来做这件事。责成它按时拨款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 3000 墨西哥元。责成它拨给其他省各 500 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 $\frac{2}{3}$ 用于报刊。责成党为工人和农民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

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 3.5 万元。

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35—137 页及背面。亲笔签字。

71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①

1928年2月于上海^②

致亚历山大同志^③

暴动^④后广州的形势

暴动遭到镇压（当时有2000人被杀）后，恐怖活动一直在继续，目前被杀和被处决的已超过4000人，其中党员200到300人。不仅以前属于代表大会^⑤的工会，而且加入广东工人联合会^⑥（李济深的）和汪精卫的新联合会^⑦的大部分工会都被查封。工会一批又一批被查封，特别受到迫害的是手工业工会和职员工会。查封的理由是怀疑它们搞共产主义，许多工会的财产被拍卖，资金被没收充当工会秘密存在时期的税款。商会向省政府提出了查封所有工会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紧张局势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多数革命工会，其中也包括广东联合会的领袖们，向政府进行威胁和表示抗议，提出查封商会的反要求问题。气氛已经有点白热化，早在12月份政府里就出现了某种恐慌情绪，而到阴历新

① 副本送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③ C. A. 洛佐夫斯基。

④ 指1927年12月11至13日的广州暴动。

⑤ 指中共领导的广东革命工会联合会。

⑥ 指国民党领导的广东改良主义的工会联合会。

⑦ 指甘乃光和汪精卫的其他信徒领导的革命工人协会。

年(1月中)则明显地出现新的“暴动”的征兆。大部分工人和职员的情绪确实非常激愤。英文报纸(《南华早报》^①)谈到有可能发生极大的麻烦,因为李济深以自己拙劣的政策使一些过去持消极态度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反对他自己。《字林西报》^②大致也是以这种口气报道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开始疯狂进攻,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日,等等。现在,广州工人的状况不比1922年时好,迄今为止取得的一切成果都被收回了。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中国旧历新年意味着新的大规模的解雇。关于工人情绪的最新消息提供了一幅斗志昂扬的惊人情景。多数同志指出,在暴动期间参加过战斗或帮助过战斗的人,个个都情绪激昂,都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进行新的战斗。没有参加暴动的人都很不满,为什么没有通知他们。这多半是些加入右派工会的工人,他们在暴动期间很少与我们有什么联系。他们要求,再举行暴动时,一定吸收他们参加。他们希望战斗。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的一部分机器工人(在铁路和市政企业中工作的人害怕共产党人)也有这样的情绪。他们这样议论:“政府宣布是工农的,而不是共产党的,那就是说我们也参与执政。”我想,这些材料稍稍粉饰了一下形势,但无论如何使人们确认:1. 没有对过去的暴动表示失望。2. 暴动后要比在暴动前拥有更多的群众;3. 机器工会这个大冰块终于解冻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停工四个月)。从广州逃出来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他们的情绪最坏,部分同志要求立即再举行暴动。经济斗争显然将在最近爆发。机器工会的失业人员通过一系列威胁手段争取到卫戍部队长官^③答应他们与企业主进行仲裁。企业主有几次没有去参加会议。工人们骂自己

① 自1881年起在香港出版的日报。

② 自1864年至1951年在上海出版的日报。

③ 何人不知。

的代表（右派），以致在企业主也没有出席的最近一次会议后，右派领袖们拒绝会见工人，他们怕遭到迫害。工人们提出要求：将企业合作化，并把企业交给工人。

关于那里的工会方针问题。显然，最近要使我们的组织合法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秘密工会在相当顺利地开始恢复。显然，工人阶级能保持这样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由于新的镇压手段和经济压迫在加强，另一方面是由于省里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李济深的地位很不稳固。陈祖铭^①（蒋介石的信徒）部队又集结在广州附近，可能又会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势力和广西派势力之间的决定性冲突现在可能会延缓一段时间，但据各种材料分析，只要其中一方积聚了新的力量冲突就会爆发。可能李济深也不会立即发动决战，但无论如何他的地位由于即将到来的冲突而大大削弱了，而他现在情绪非常急躁。新政府的地位不妙，因为与商会的关系开始紧张，政府不能得到它所要求的经费。关于农民运动的成就我就不谈了，因为所有英文报纸现在都在大肆宣扬这一点。总之，我们在广东大约有10个苏维埃根据地。等我们的小伙子^②从那里回来时，再详细报告。

上海。广州暴动的失败或许对上海产生了最严重的影响。情绪非常压抑。我在上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③中已经详细谈到这一点。这个时期里新的情况如下：“兄弟会”和“姊妹会”开始发展起来，主要是出于防止解雇的自卫角度。由于遭企业解雇，已经与当局发生一些小的冲突。这场运动开始有所扩大，可能这也是为大规模建立工厂委员会所最容易抓住的一个环节，正如你们知道的，工厂委员会遭到中央一部分人（多数）和上海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陈铭枢。

② 可能是J. 杜克鲁。

③ 见第55号文件。

总工会的反对。依我看来，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不仅仍是头等重要的，而且日益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在上次代表会议^①上，实际上发生了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论，在我看来这场争论特别明显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尽管在11月正式通过了关于工厂委员会的决议^②，当时又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意见，而我们实际上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除了不善于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外（当然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应该特别考虑到，对不纳入合法存在的反动工会轨道的自由组织作出任何暗示，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你是共产党员，你参加罢工，你公开大胆说话，你就会被砍头，所以最好一声不吭，最好不公开露面。这个情况不能不加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当我们谈论工厂委员会的时候，下面的工人群众，基层党组织就又提出恢复红色恐怖的要求。中央对迷恋恐怖活动（个人恐怖）的思想作出某种反击引起了许多异议。在地方和基层，公开要求恢复恐怖活动，作为工人阶级反对右派联盟新的发动，反对白色恐怖进行自卫的手段；尽管在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妥协性决议（在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条款中），但是我认为，问题有所松动，情况比过去有所好转。至于右派组织的作用，这样的组织在上海有两个：一个是白崇禧的“Labour Unification Committee”^③，一个是蒋介石的“Labour Confederation”^④，在这里我们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不能明确无误地说，它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有多大。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两者都还没有什么影响，虽然在工人的情绪中对在哪里能得到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有很大吸引力，因此

① 可能是指1928年2月初举行的全国总工会扩大全会。

②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见第196页注①）。

③ 英语，即工会联合委员会。

④ 英语，即工人联合会，见第280页注③。

他们议论说：“虽然总工会^①和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处在地下，不能给我们什么东西。虽然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不得求助于它的工会。”然而右派工会不可能帮助他们很好解决即使是极微小的冲突，因为没有他们能够真正赢得威望的基础。在这方面，查理^②认为“工人联合会”更具有意义，实际上我们俩在中央决议中的提法上完全取得了一致意见。此外应该考虑到，在蒋介石和白崇禧争夺上海的斗争中，卫戍部队掌握在广西派的手里，而蒋介石在现时政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这场斗争会相互削弱双方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为了互相谩骂和彼此暗中伤害会失去不少力量。在地方上，这些组织没有任何类似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工会联合委员会”，还是“工人联合会”，其会员人数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在递减。在蒋介石颁布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③后，可以认为，他会利用这个法令同“工人联合委员会”进行斗争，而把生存权只留给“工人联合会”。当然，眼下还很难说，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上海的势力（卫戍部队不掌握在他手里）不是很大。“工人联合会”左的假面具，诸如关于选举自由等等的议论颇为流传，但目前实际上还根本没有贯彻实施。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南京政府曾两次（第二次在广州暴动之后）重申关于禁止罢工的法令^④，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组织，两家工会的理事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支持罢工”（当然是“正义的”罢工）。这样做是迫于群众的压力，实际上禁止罢工的法令两次都告破产，因为法令颁布后，掀起了店员的罢工浪潮，部分罢工以罢工者的胜利

① 上海总工会，曾加入由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K. 3. 琼森。

③ 见第 280 页注③。

④ 详见《上海禁止罢工》，《东方与殖民地》，载《工会国际通报》莫斯科 1928 年第 44 期第 4 页；第 46—47 期第 6 页。

而告终^①。

除了“兄弟会”和“姊妹会”秘密社团外，现在开始出现一些与任何正式工会组织都没有联系的小社团。

昨天，与一些同志交谈后才弄清楚，现在人们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要求在总工会下建立一些大的组织，等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②认为情况是这样，工人群众在寻求出路，要求加以领导，但我们的力量，特别是新年解雇以后，现在很薄弱，我们不能迎合日益增长的关于建立和加强地下组织的要求。我认为，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现在，我们地下组织的力量怎么样呢？我认为，现在只留下了我们工会的一些会员，因为在新年解雇后，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干部被抛上街头，不可能留下什么了。我们在企业里的党支部实际上也已经垮台，因为新的逮捕和解雇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现在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恢复旧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寻找新的支柱。摆在前面的工作是琐碎而艰难的，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上海的情绪而消极悲观和改变整个方针。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谈到，工人们的政治情绪很好，是革命的，他们的愤恨情绪没有减弱，而在增长。我怀疑，是否能够对付得了工人，是否会把他们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工人们的状况可是糟糕透了，而且越来越糟。商会发起经济攻势，使工人们的状况越来越艰难。不久前，政府（还是卫戍部，不大清楚）发布了通告（地区的），要将年龄在16至30岁的所有工人都解雇^③。这些新的解雇自然会成为一系列闹事的缘由。

汉口。工人们的情绪很高昂。广州的陷落激起了反动派的狂

^① 指哪些罢工不详。1928年1月和2月，上海发生了八次各种店员的罢工。详见《中国年鉴》（1929—1930），天津英文版第564—569页。

^② 郑复他。

^③ 文件没有找到。

怒。现在每天都要处决几十人，报上说一找到共产党员，就把他们消灭。实际上情况远不是这样。在多数情况下逮捕的是一些“穷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处决。据各种消息说，恐怖没有减弱自11月份枪杀黄色工会会员^①后出现的高昂情绪。最近一个时期，虽然省工会联合会（书记被处决）^②已不存在，但企业中的组织在开始恢复。关于废除前汉口政府有关工人问题的一切法令的命令^③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恨。

我有意地缩小了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根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④，你们对它了解得很清楚。我只想回答一下你们在信^⑤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我认为，你们认为广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盲动，这是根本不对的。最近，你们会收到有关广州的一系列材料，这些材料将向你们证明，参加广州暴动的确实是一些群众，这些群众自发地投入战斗，他们在暴动后还想举行暴动，骂我们主要是撤退得过早，组织得不好，要举行暴动的事向群众通知不够。作为群众性的暴动，这次暴动当然能更具有群众性，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宣传，如果无产阶级和我们党的组织素养更强一些，如果在军事方面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并转入反攻，那么从我们这方面说参加暴动的人数就会日益增加。部分材料谈到广东省委的情绪，我上次已经寄去^⑥。同志们在一系列问题提法上的错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夸大了广州暴动的意义。如果广东省委指责暴动的群众性不够，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最起码的议论向你们表明，这反映了部分工人的不满情绪，他们不大了解情况也未能

① 看来是指对玉华纺织厂工人罢工的镇压，当时有17名女工都枪杀。

② 黄五一。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55号文件。

⑤ 见第47号文件。

⑥ 指中共广东省委的材料（见第287页注①、第291页注②、第295页注①）。

有组织地参加暴动。

现在，暴动是否可以推迟一些时间，哪怕推迟两周，以便更好地进行准备？我认为，绝对不行。你们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你们记得，未组织工人进行自卫意味着什么吗？你们记得4月的“改组”^①，你们应该完全明白，错过一天时间和让人解除武装意味着什么。你们会说，应该只要求去自卫，而不应去暴动。在总的革命形势下，这是件困难的事，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暴动的问题已从4月份就提出来了。请计算一下在广州失败后和4月镇压后我们取得的政治后果吧！那时党内一片失望情绪，怀疑自己的力量，而现在对党充满着信心和极大的同情，相信自己的力量。那时没有明确的前景，找不到明确的道路，而现在有了明确的目标，深深地铭印在广州大多数劳动者的心里。不，这里非常现实地感觉到，广州暴动会给广州工人，给广东、江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提供多少东西。广州暴动的现实结果无疑将对全体工人阶级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说现在工人们在令人窒息的迫害下还沉默不语的话，那么这还不是广州没有起重大作用的征兆。

现在农民运动已开始日益发展起来，无论在湖南，在湖北，还是在江苏，都已在谈论苏维埃了。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方针。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开展农民暴动。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稍稍恢复元气，它现在在政治上要比农民站得高得多。

虽然那里一直在骂我们搞盲动，但是真的，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最仔细和最认真的检查后，只会得出，是在骂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过于小心谨慎了。我有时自己检查，我们是否在与盲动主义和其他左的毛病进行斗争时过分妨碍了与党内机会

^① 指1927年4月李济深在广州对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的镇压。

主义的正常斗争，从而妨碍了在策略上对这一斗争的正确指导。

现在谈谈你们大加攻击的那个决议^①。我认为，决议中有许多地方可以修改和完善，但其基本内容丝毫不能改变。可以说，稍稍过分强调暴动问题是迎合了左的倾向。但这并不那么可怕，因为目前最可怕的是机会主义的危险，这已经在上海开始冒头了（涅姆采夫、克拉辛）^②。由于实际上您也不反对，所以我认为决议的个别表述现在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正需要加以发挥和深化，并从实际上来证明它的所有基本论点。

现在谈谈个人问题。您，老爷子^③，用不着说我要破坏优先权。我认为，我没有任何权利不首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因为命运吩咐我要对党的问题负责，这是第一。其次是，令人讨厌的联系造成了许多误会。显然，我的许多材料丢失了。要是您知道，第一从业务上说我不能离开，第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丢开全部工作那也不好，您的电报^④就不会用如此断然的措词了。我想，海因茨〔牛曼〕已经向您详细谈了这个问题，而阿^⑤又作了补充。因此，不是什么“恶意”使我在回去的问题上回避您的命令。至于移交工作，我在12月份就办了。希望这一点不致把我从工作人员名单中勾掉。等我回去后再详细地谈。我希望能在4月份成行，如果那时召开中共代表大会的话，无论如何，不晚于代表大会^⑥。我暂时写到这里。非常希望关于优先权的说法没有多大的根据。无

① 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见第196页注①）。

② 分别为：王若飞和陈乔年。

③ 可能是暗指C. A. 洛佐夫斯基的绰号：老爸。

④ 电报没有找到。

⑤ 可能是M. Я. 阿普列廷。

⑥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第201页注③）。

论如何，我是不愿意让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误会的口实。

亚 [历山大罗维奇]^①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29，第 8—10 页及背面。

亲笔签字。

① O. A. 米特凯维奇。

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3 月 1 日于莫斯科

听取：24——关于鲍罗廷同志的问题。

决定：24——成立由布哈林（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来审议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的问题。^①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75，第 1、5—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1928 年 3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委员会在一个月內结束对 M. M. 鲍罗廷在华活动的审议，1928 年 5 月 10 日又建议在三个月內结束，而 1928 年 12 月 6 日决定撤销这个问题（见第 78 号文件，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80 页；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15，第 7 页）。然而，1929 年 5 月 2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回过头来审议这个问题（见第 160 号文件）。

73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3月2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启

致布哈林同志

我是同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①的代表前香港罢工委员会主席、武汉政府劳工部部长、后来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苏兆征同志一起到莫斯科的。

据他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相应的委任状将通过英国同志带来^②。

苏兆征同志和向忠发同志曾在我这里，他们提出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例行的代表大会。

同时，苏兆征同志还希望向您和斯大林同志汇报中国目前的形势。

赖特^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3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第 201 页注③）

② 委任状没有找到。

③ B. H. 索洛维约夫。

7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8年3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①

1. 谨奉告如下：除工会系统外，中共中央还派我^②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共中央还任命在我以前到达这里的向〔忠发〕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此事的信件通过英国同志送来^③。

2. 我们完全同意联共（布）中央调解委员会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冲突问题的决议^④。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决议进行详细的解释，以便为中国部全体学生所理解，避免再发生纠纷。

3. 请确定会晤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亲笔签字：苏兆征和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9，第 3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东方书记处。

② 原文如此。

③ 信没有找到。

④ 见第 66 号文件。

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5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3 月 15 日于莫斯科

3——日本人的建议^①（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认为有必要用照会答复日本政府。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政治局意见交换的基础上起草一份照会，并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照会中声明，我们没有也不打算将武器运往中国^②。

4——关于中国人的照会^③（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同志）。

（1）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国内外报刊上驳斥中国报纸所宣扬的关于将一批中国人——罪犯窝主等强制赶出苏联的报道。

（2）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起草一份给中国政府的答复照会，并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3）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库比雅克、丘茨卡耶夫、亚戈达同志参与下，根据实际情况，从将中国臣民逐出苏联降到最低限

① 指 1928 年 3 月 1 日田中义一给 A. A. 托罗扬诺夫斯基的照会，照会中日本政府以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 12 国名义建议苏联加入由这些国家于 1919 年 4 月在北京签订的关于禁止将武器输入中国的协议书。

② 在已经发表的 1928 年 3 月 26 日 A. A. 特罗扬诺夫斯基给田中义一的答复照会中没有这个内容（见《苏联外交文件》第 11 卷，第 706 页）。

③ 照会没有找到。

度的必要性出发审议这个问题，并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作出报告。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77，第 1—2、8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5 号（特字第 14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3 月 15 日于莫斯科

听取：5——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见政治局 1928 年 3 月 3 日会议第 14 号记录，决定：16）（报告人：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1）认为可以拨给中方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全部预计利润，数额为 550 万元。

（2）关于在边境部署装甲车问题。推迟审议。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1）；

布留汉诺夫同志——（1）。

听取：36——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问题。

决定：36——为了协调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

（1）在哈尔滨除苏维埃机关外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分部。

国家政治保安局机关应在不通过正式边防站和没有办理签证

的人员通过边境进入苏联领土时给予大力协助。

（2）从哈尔滨领事馆工作人员中选出一名可靠的同志，由他发出密码电报给莫斯科，并由他接收这样的电报。这位同志应与国际联络局哈尔滨分部的一位同志保持秘密联系。

领事馆内不要留下任何东西。该同志也不应接待任何人，等等（总之，该同志应履行对在一些全权代表处从事类似工作的同志所采用的那些条件）。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契切林、缅任斯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39，第 41—42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6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3 月 22 日于莫斯科

听取：40——关于中国和蒙古问题。

决定：40——米夫同志参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国委员会和蒙古分委员会^①，以取代彼得罗夫同志^②。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78，第 1、7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蒙古分委员会是在 1928 年 1 月 19 日成立的。参加该分委员会的有：И. С. 温施利赫特（主席）、М. И. 阿马加耶夫、Л. М. 加拉罕、М. А. 特里利塞尔等人。

②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16号（特字第15号）记录
（摘录）

1928年3月22日于莫斯科

听取：3——关于中国人的问题（见1928年3月15日政治局会议第15号记录，决定：4）（报告人：契切林、加拉罕、缅任斯基、库比雅克同志）。

决定：3——同意委员会的建议（见附录1），作以下修改：

第7条在“我国边界防卫”后面加上“无论是同朝鲜的边界，还是同满洲的边界”字样。

抄送：契切林、缅任斯基、加马尔尼克——全部；

戈尔布诺夫——5、6、7；

鲁祖塔克——5；

布留汉诺夫——6。

听取：5——中国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5——1. 认为有必要确定一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便使该同志能够参加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此后到中国工作。责成布哈林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确定合适的人选。

2. 认为有必要在最近期间派一名具有一定经验和资历的军事顾问驻中共。

3. (1) 鉴于军事院校的中国学员中有大量异己分子，责成中国委员会立即进行清洗，开除所有国民党分子、无党派的冯分子和可疑分子，或者令人不满的共青团员。

将从军事学校开除的学生送回中国。

(2) 从军事院校今年的毕业生中，留下那些经过相应的政治培训今后能为中共用来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国指挥人员，在苏联继续学习。

(3) 认为有必要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招收不少于 200 名中共党员入军校，要特别注意增加特种军事院校（航空、炮兵、工程技术学院等）的学员名额。

(4) 鉴于学员成分发生的变化，提出进一步明确军校中国班向特种课程（武装暴动策略、游击斗争、破坏工作等）专业化方向发展的目标问题。

(5) 采取措施加强所有院校对中国学员的系统政治服务工作。

责成远东书记处和沃龙佐夫同志提出具体建议。

(6) 认为可以让毕业于军校并在中国担任过指挥职务的朝鲜人回到工农红军队伍里来。

(7) 满足下列中国学员提出的因病回国的要求：

- ① 扎鲁茨基……………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② 杰米雅诺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③ 伊夫涅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④ 波克罗夫斯基……………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⑤ 克罗波特金……………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⑥ 马洛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 ⑦ 雷科夫……………莫斯科炮兵学校

⑧胡基雅科夫……………骑兵学校①。

4. 鉴于有人谴责叶挺在领导广州暴动期间消极怠工^②，认为有必要调查这个问题，为此成立由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结果向中国委员会下次会议报告。

让叶挺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业务水平。

5. 责成布哈林同志的委员会在一个月內结束对鲍〔罗廷〕同志在华工作问题的审议。

6. 认为立即派吴玉章去中国是不合适的。让吴玉章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在苏联从事理论工作4至6个月。

7. (1) 责成孙逸仙大学管委会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起派20名学生立即去中国，派15名学生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工作，然后去中国工作，派遣工作要分小批进行。

(2) 责成远东书记处进行动员。

8. 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要求给内蒙古的工作拨款5万卢布，建议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经费中拨出这笔款项。

9. 认为可以让加伦同志^③就释放被捕的俄国同志一事^④对蒋介石进行私人访问。

10. 认为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是合适的。如果宋庆龄愿意让柳克斯同志^⑤陪同去美国的话，不反对他去。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

① 分别为：张碧光、周玳琏、徐印瑚、宋学濂、王觉源、彭寿高、许达文、胡学文。

② 见第63号文件。

③ B. K. 布留赫尔。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O. Ю. 普利切。

会见她。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2、3、(5)、4. 第一段7、8；

布哈林同志——1、5；

米夫同志——7、1；

舒米亚茨基同志——7、1；

科肖尔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绝 密

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

决定：3 附录1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中国人问题的建议

(1928年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1. 授权远东边疆区执委会或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海参崴代表^①释放被逮捕和被判刑的57名中国非法银行的老板，如果中国领事提出释放这57人的话，条件是立即将他们驱逐出苏联边境。

2. 对被捕的几百名刑事罪犯，无论是已经判刑的还是正在侦查中的，责成远东边疆区执委会采取紧急措施释放一部分关押在监狱里的中国人，例如可以将部分犯人送往中国境内，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3. 为了捣毁从事货币投机活动的中国非法银行组织，认为可

^① N. M. 盖茨曼。

以将该组织的头目进行逮捕，但不要超过 5 至 10 人。

4. 将来要避免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也要避免大规模的驱逐。

5. 为了消除中国货币投机商从事大规模非法货币投机交易的重要根源，建议交通人民委员部加速解决乌苏里铁路沿线边境运输的海关付费问题。

6. 建议财政人民委员部迅速制定和实行中国工人向境外汇款的办法，使得在远东工作的中国工人有可能将自己的部分工资汇给在中国的家属。

7. 鉴于今年将有大批中国人从闹饥荒的山东省逃荒到满洲（据中国报纸报道约 800 万人，其中有 100 万流浪汉），鉴于我国边界防卫，无论是同朝鲜的边界，还是同满洲的边界，都很薄弱，认为有必要加强我国的边防，以防止这些人非法偷渡。

核对无误：苏霍娃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46—48、51—53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附录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军事委员会会议第1号记录

1928年3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米夫、别尔 [津]、布留 [赫尔]、赫梅 [廖夫]、哈利 [斯]、瓦西 [里耶夫]、马 [马] 耶夫、苏 [兆征] 和向 [忠发] 同志。

听取：1——成立委员会和确定会议日期。

决定：1——选举别尔津同志为委员会主席。确定会议日期为每周四下午一点钟。

听取：2——由别尔津同志起草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决议草案^①。

决定：2——（1）草案原则上通过。

（2）选出由哈利斯（负责）、赫梅廖夫和苏兆征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草案进行最后校定^②。

（3）责成委员会在决议的基础上拟定给中央军事部的指示信。

（4）选出由哈利斯和日古尔组成的委员会制定武装暴动的策略问题。

委员会工作期限为10天。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321，第1—5页）。

② 见第82、92号文件。

主席 别尔津
书记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33，第 1 页。

打字稿，原件，主席亲笔签字，书记没有签字。

80

米夫给加拉罕的信

1928年3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加拉罕同志
副本送伏罗希洛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根据中国委员会的决定^①，兹将远东书记处关于宋庆龄问题的建议转去供你们讨论。

1. 认为有必要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②的态度。

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宋庆龄和她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方针。

2. 同时认为作为宋庆龄未来政治活动的前景制定以下方针是合适的：

（1）关于吸收她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工作。制定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

（2）关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

① 文件没有找到，亦见第78号文件。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50页。

行工作。

（3）关于国务活动方面。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例如，提出在中国成立“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张。

（4）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①）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造谣和诽谤。

3. 除宋庆龄同我们的负责同志谈话外，认为还有必要对她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并让她了解我们的建设和政策，如：

- （1）组织她到苏联各地参观；
- （2）吸收她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②；
- （3）指定1、2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等。

（4）在上述我所指出的几个方面对宋庆龄做工作取得成效时，认为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述目的。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9，第 49—5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即伍朝枢。孙科、胡汉民和伍朝枢在去欧洲的途中于 1928 年 3 月中至 4 月初曾在土耳其逗留。

②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第 201 页注③）。

81

诺林与向忠发和苏兆征 关于中国宣传鼓动 工作的谈话记录

1928年3月28日于莫斯科

中国的宣传鼓动工作 (与向[忠发]和苏[兆征]的谈话)

1. 中共中央是否有宣传鼓动部？

五大^①以后在中共中央下面成立了宣传鼓动部，有3、4位同志进行日常工作。

2. 省组织有宣传鼓动部吗，省组织下面有哪些分部？

在大的省组织里也成立了宣传鼓动部（叫宣传鼓动委员会）。下面设分部——出版部和发行部（报刊发行）。

3. 宣传鼓动部与中央和省的宣传鼓动部之间是怎样进行联系的？

省组织将自己的所有材料即他们印发的所有东西都寄给宣传鼓动部，并收到对这些材料内容的指示，以及总的指示和中央宣传鼓动部印发的材料。

4. 是否有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员的学校，如何对他们实行领导？

^① 见第33页注^③。

每个宣传鼓动部下面都设有宣传鼓动员。在每次政治运动前，宣传鼓动员都被召来接受指示和发给他们材料。

这样的会议一般是相当经常召开的，每周不少于一次。

5. 宣传鼓动员是从哪里招募来的？

最近一个时期，宣传鼓动员主要是从工人支部中招募来的。可以说，每个支部都有3、4位同志能够充当宣传鼓动员。

6. 日常的宣传工作采取哪些方式方法？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召开公开大会的机会越来越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工人家里、在夜校里和扫盲班上进行集体和个别宣传的机会很多，还有工作之余在住所里进行个别宣传。

7. 目前在中国宣传鼓动工作有什么缺点？

在农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中间，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

宣传鼓动员业务不熟练。现在很需要有70到80名优秀的宣传鼓动员分配给省委。现有的宣传鼓动员要更好地领导他们。

8. 宣传工作是怎样安排的，采取何种形式和内容？

这部分宣传鼓动工作最薄弱。现在很有必要把这项工作安排好。原来打算办训练班，但由于缺乏较好的领导人和经费而没有办成。然而，尽管存在白色恐怖，办这样的训练班的客观条件还是完全存在的。显然，这些训练班应该是短期的——两星期到1个月，人员不要超过15到20人。近期需要认真注意此事。

9. 通过什么途经和形式来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合法的机会？

这种机会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即存在于各种社团、学术团体和协会里（例如，基督教青年会，同乡会，经济学术研究会，文化运动协会，教育协会等）。

10. 在党的宣传工作中还存在哪些缺点？

应该注意在农民中进行宣传。在农民中举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是有客观条件的。

11. 报刊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党中央有两份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周刊^①和《党内通讯》半月刊^②。《布尔塞维克》的发行量是5000份。发行得很好，还发往国外，如日本。上面刊登中央的一些指导性文章和报道地方上的生活。《党内通讯》是为党内需要服务的。上面有许多地方党生活的篇幅和批评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内容。在《通讯》上刊登中央的一些指示。《通讯》的印数很有限（篇幅是30到40页），分发到各地，然后再翻印（经常用手抄，油印机复印），并在地方党组织的党员中传阅。由于交通不便，最大的困难是在国内联络和报刊发送。

出版小册子、书籍和其他群众性通俗政治读物的工作做得不好。迫切需要出版这样的图书，特别要注意为农村出版专门的小册子，或许还要提出为农民办一份报纸的任务。

记录 诺林

翻译 莫洛托夫^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9，第 41—4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68 页注①。

② 指《中央通讯》，1927—1930 年在上海出版。

③ 曾弘毅。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军事委员会会议第 2 号记录

1928 年 3 月 2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指示草案^①。

决定：1——责成委员会根据意见交换的精神进行修改^②。

主席 别尔津
书记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33，第 2 页。

打字稿，原件，主席亲笔签字，书记没有签字。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21，第 28—41 页）。

② 见第 92 号文件（最终方案）。

83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4月3日于莫斯科

阿尔诺^①同志：

1. 重复一下今年3月13日经柏林转发的我们电报^②中关于拨款的命令。因急于发出电报，拨款的美元数额为整数，现在我们提出确切的分配额，请按本信中的指示拨出。

2. 拨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第一季度应拨给他们25641美元。

3. 拨给日本共产党每月1025美元，此外可以拨给他们3076美元作为代表大会用。

4. 可以拨给朝鲜人每月256美元作为日常开支。

5. 拨给中国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额范围内拨给他们。

6. 拨给日本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额范围内拨给他们。

7. 拨给朝鲜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这个数额范围内拨给他们。

8. 拨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这是青年共产国际资助费中的拨款）。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电报没有找到。

9. 拨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驻你们那里的代表^①(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请求)50000美元。请转告他,这笔款项应作如下分配:

- | | |
|----------------------|----------|
| (1) 给中国至6月(含6月)经费 | 27300 美元 |
| (2) 给广州专款 | 8000 美元 |
| (3) 给汉口专款 | 1000 美元 |
| (4) 给广东专款 | 1000 美元 |
| (5) 给朝鲜至6月(含6月)经费 | 4000 美元 |
| (6) 给印度尼西亚至6月(含6月)经费 | 7500 美元 |
| (7) 给代表处至6月(含6月)经费 | 1200 美元 |

总计:50000 美元

10. 本信中所述的所有拨款包括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数额,请从1928年上半年汇给你们的数额中拨出。

11. 伊沃娜^②将转交给你们19000美元;请将这笔款项拨给中国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1927年最后几个月),这是上面所列50000美元以外的款项。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a,第146—147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T. 多尔森。

② 何人不详。

84

米夫给布哈林的信

1928年4月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布哈林同志 副本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鉴于最近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电报^①，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建议中共中央：

(1) 占领能够作为运动根据地的某个地区并在那里巩固下来。最好是东江地区，并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

(2)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革命部队集结在上述根据地。同时可将贺龙的新编部队调到该地区。

(3) 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 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 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 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 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 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

(4) 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特别是军事人员）集中在这一地区。派出尽量多的共产党员去进行工作。把从国民革命军里收罗来的左派指挥人员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集中在该地区。

(5) 提出军阀部队士兵大规模转到暴动农民方面来的口号。同时号召工人（特别是因迫害而不得不逃跑的工人）集中到革命部

^① 电报没有找到。

队活动的地区。

你方^①军事主管部门方面：

（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 20 到 30 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

（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

（3）拨给 100 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

（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

（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

注：上述各条已与别尔津同志商妥。别尔津同志认为军事主管部门方面的第（1）、（2）、（4）、（5）条是可以实现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50—5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我方。

85

布哈林给米特凯维奇的电报

1928年4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电 报

上海

致奥莉加，布哈林发。答复您的第9号电^①。已派去专家。行动计划应由你们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不要采取决定性行动。要积蓄力量，通过部队调动、帮助与地主作斗争、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农民力量来激励农民的斗志；在此基础上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武装力量，避免发生决定性的冲突。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夺取大的中心城市的大规模行动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第……号^②。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第 15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号码空缺。

86

瓦尔加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草案初稿^①

1928年4月7日于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正在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起，根据同样一些共同要求，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即推翻剥削者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为了顺利地结束斗争，她应该仔细地考虑到进行这种斗争的特殊条件。

现阶段的革命性质

中国正经历由建立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并含有强大封建主义因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过不完备的半殖民资本主义阶段，向工农民主革命专政革命转变的时期，工农民主革命专政在中国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初始阶段。革命转变时期的特点是，外国帝国主义向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渗透已是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这就有可能在业已推翻资本主义的各国人民的支持下在胜利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之后越过大资本主义阶段。

^① 这是文件的原有标题。1928年4月7日，E. 瓦尔加将文件送给斯大林、布哈林和 J. A. 米夫。瓦尔加在附信中请求审议这个初稿。他写道，“草案的优点在于有统一的内部结构，但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完全可能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0，第 52 页）。

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在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中国社会保留着自己的前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出身于贵族的官僚土地占有者、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彼此分享着被迫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民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担任国家公职期间通过商业或高利贷掠夺来的财产投入到土地占有行业：贵族、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作为土地占有者共同剥削着农民。中国资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方式向产业资本主义的过渡，因为建立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旧的社会结构，尽管进行着残酷的剥削，但是至少还要保证劳动者（自然灾害除外）最起码的需要。

帝国主义的渗入破坏着 前资本主义的结构

帝国主义的渗入破坏了传统的中国经济文化。商品经济排挤着自然经济。外国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作为农民微薄收入必要补充的农民手工工业，也破坏了古老的城市手工工业。农产品的输出造成了土地占有者对农民越来越重的剥削。与此同时，农户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帝国主义使统治阶级俯首屈从

掌握着经济命脉即矿山、工厂、铁路、海河航运、对外贸易和银行的外国资本把国家变成为半殖民地，使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俯首屈从，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买办。商业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推销国外商品，为外国资本采集用于出口的原料。高利贷资本则落到依附于强大的外国银行的地步。属于贵族的官僚——土地占有者以自己传统的威望支持着异国资本的欲望，为此从掠夺来的赃物中得到一定的份额。

相互角逐的帝国主义者 使统治阶级四分五裂

与屈从外国资本的同时，统治阶级分裂成相互角逐的集团，这取决于在中国争霸的是哪个帝国主义列强，是英国、日本、美国还是法国，它们都有直接的联系。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着，并使它们四分五裂。

帝国主义破坏着 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统一

帝国主义的入侵引起中央政府的衰落，它表明自己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能为力。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独立发展则造成了分裂成一些封建领地的国家的联合，但从国外入侵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却在瓦解中华帝国的前资本主义统一。国家被分割成一些军阀统治的地区，为了扩大剥削范围，这些军阀彼此争斗不断。他们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帝国主义者之间隐蔽的斗争；这反映了中国统治阶级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裂局面。

中国资本变成产业资本： “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斗争中的领袖

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相联系的一部分中国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变成产业资本，从而陷入与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之中，帝国主义通过自己的特权和不允许关税自主的做法来限制它的发展。这一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生长，诚然它本身还很贫乏无力，但是作为资本进步形式的代表则暂时成为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 的独立统治是不可能的

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只有吸收千百万中国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这就要求以极大的深度提出土地问题。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商人阶级和高利贷者阶级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它的财产首先是土地；它的收入是高利贷地租，因此它不可能领导土地革命，相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它必然会反对农民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会带来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革命（像在日本、土耳其那样）也是不可能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之间的矛盾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所有劳动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它对外国商品的竞争能力是建立在对中国工人的无限剥削之上的，它与外国资本一起都与镇压工人阶级有着利害关系。反帝的解放斗争要求中国全体无产阶级参加，因此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这种解放斗争不可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

民族资产阶级背叛 反帝的解放斗争

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随着它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土地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不得不使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的压力下背叛民族革命而献媚于帝国主义者，以便借助于它们的帮助推翻工农。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反帝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丧失。

它的政党——国民党失去任何意义。它的反帝词藻，它对帝国主义进行的虚伪斗争，这一切也就成了欺骗群众的幌子。

领导权转向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叛变后，反帝斗争的领导权转向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废除奴隶制和奴役关系、消灭封建剥削残余、恢复国家统一、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些任务应该在反对业已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完成。由此产生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和可能性；跳越大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立即（越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工农民主革命专政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阶段的可能性。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劳动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无产者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广大的被资本家逐出生产过程的所谓流氓无产者、雇佣士兵、失业者）反对中国统治阶级各阶层和帝国主义者的共同斗争。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两极分化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敌人阵营内不断发生的内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企图重新争得独立性——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这些矛盾的话。

经济基础的瓦解是 直接生产者革命化的基础

帝国统一的崩溃，相互争斗的军阀统治的不断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广泛发展和帝国主义者统治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决定着经济基础的深刻瓦解。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极端重要的水利经济即几千年来艰苦劳动的成果（如防洪堤坝、水路运河、人工灌溉系统），由于没有中央国家政权而开始衰落。由于农产品出口和整个施肥体制的紊乱，使耕种土地的营养平衡遭到破坏，造成了

只能靠精耕细作来养活过于稠密的人口。土地占有者、高利贷者，而首先是军事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掠夺使农民失去原先只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一点点生产资料。每年都有几百万劳动农民被逐出生产过程，这就扩大了劳动力的供应，使他们成为士兵、盗匪、逃荒者、饿死鬼。广大农民，除少数靠群众发财的上层富农外，都陷于破产、贫困化，或许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救。城市小资产阶级屈服于资本（销售制度、高利贷、通货膨胀），加入似乎独立的无产者行列，遭到普遍的破产。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消灭——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没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国内的发展得到补偿。这就为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打下经济基础。由于帝国的衰落而失去饭碗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在其中，他们传统的学校教育使他们原先有权得到国家的职务，现在则一钱不值。他们的职位现在被过去的一帮匪徒首领所占据。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是：数量相对来说微不足道；作为雇佣工人阶级的性质尚未成形（工业和农业之间变异很大）；妇女和儿童（轻工业）所占百分比比较大；工会组织不够强大，不够普及。

它的优点是：与农民联系密切；没有工人贵族；没有改良主义政党及其反革命意识形态；具有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最近几年来的丰富革命经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来相对要强大些，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是革命阵营中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

共产党（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它纳入新的轨道，即把所有因中国社会制度的解体而受苦受难或者被逐出生产过程的

劳动者聚集在自己的领导下，把他们组织起来，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既反对传统的反革命思想，又反对新生的改良主义思想，并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而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工农民主革命专政，直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尽可能广泛开展得到工人阶级总的运动支持的武装暴动。极其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工农苏维埃。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在自己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中共提出以下要求：

总的政治要求

(1) 废除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特权，特别是不平等条约，收复租界；收复被帝国主义者掠夺去的地区：台湾、印度支那、满洲等。

(2) 建立国家的统一。

(3) 与苏联结盟，以便共同防御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

(4) 废除官僚、豪绅等的一切封建特权。

(5) 废除一切奴隶制残余。

(6) 工农组织、俱乐部、政党和社团享有充分自由。

(7) 工农报刊享有充分自由。

(8) 工农集会自由。

(9) 街头示威游行自由。

(10) 罢工自由。

(11) 解散雇佣军队和地主武装组织（民团）并解除其武装；驱逐军事统治者；从应予没收的地主土地中分给无地的农民、士

兵一定数量的土地。

(12) 把工人和贫苦农民武装起来。

总的经济要求

(1) 剥夺无论是属于外国人还是属于本国人的—切经济命脉：铁路、航船、矿山等并将其国有化。

(2) 实行全国统一的硬通货；关闭由军事统治者和资本家掌握的私人造币厂。禁止军阀和私人银行印制纸币。

(3) 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

(4) 恢复关税自主权。

(5) 对劳动居民经常供应廉价稻米。

(6) 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对收入少于 500 元的人免税。

(7) 对奢侈品实行高额税。

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

(1) 阶级工会合法化，由资本家和政府承认它们是工人阶级的正式组织。解放黄色工会。

(2) 实际八小时工作日制。

(3) 实行社会保险（疾病、意外事故、失业等）。

(4) 保证足够的工资：因生活指数提高（通货膨胀）而调整工资。

(5) 由工厂委员会对生产进行监督。

(6) 废除合同制。

农民的经济要求

(1) 无偿地没收地主、寺院和资本家的一切土地并将其国有化。将剥夺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首先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小租赁者和复员士兵、农民无偿地使用（取消一切租赁的中

介形式)。

(2) 恢复和扩大灌溉和防洪设施。

(3) 废除水域的私有权：无偿地供给农民灌溉用水。

* * *

但是提出要求还远不是一切。要使这些要求具有政治分量，中国共产党人还应该参加一切群众运动，以口号的形式把相应的要求带到群众中去，从而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它纳入革命的轨道。他们应该不断地揭露和抑制资产阶级想要通过建立反革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真正的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来使群众运动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企图。无论中国共产党是合法的党还是非法的党，它都要考虑到地方性的具体特点，实行由中央制定的政策，弃绝同敌人营垒中的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任何无原则妥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纪律严明地遵循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能通过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合作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推翻有产者阶级的政权，大大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3，第 25—35 页。

打字稿，副本。

87

瓦西里耶夫^①给中共中央的信

1928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寄去贵党的示范章程草案^②。我们拟定这个草案是考虑到各国共产党建设的全部国际经验。我们并不建议你们作为不加任何修改就完整地通过的文件。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将这个草案在党内进行认真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条件有许多特点，只有当地中共的实际组织工作者才能考虑到这些特点。

在讨论该章程草案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应该极其谨慎地阐述像党章这样的文献，因为它是以强制遵行的规范来规定党内生活的。党成立还不久，对组织工作的许多方面我们觉得现在还不可能有完全明确的看法。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制定党章草案时略去了许多具体的内容，我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党现在不通过任何章程性的限制条款，而是遵循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③专门的具体决议和未来中央委员会的补充指示，那将更好些。

① 作者是根据中译稿确定的（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7，第 130—136 背面）。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于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日 11 日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

同时，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在第七次党代会^①上再来审议章程，根据在第六次党代会和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党的工作经验得出的结论来对它进行修改。

在确定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章程草案时，必须非常小心地注意，在实际运用章程时不能采取机械的方法。这对于〔贵党〕，对于实际上刚刚开始进行组织建设工作的党来说尤其是这样。我们的这个意见对于党的组织结构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国际组织经验，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应该这样来建立，即在每个行政单位相应地建立党的组织，在该行政单位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单位是统治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目的是对抗工农的革命斗争。因此，共产党也必须用自己相应的组织来对抗统治阶级的这种联合势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时中国的条件，那么在中国，党组织的形式应有以下几种：基层组织——支部，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城市的、农村的），乡镇组织，县组织，地区组织和省组织，最后是全国范围的组织。

显然，中国共产党根据现有的力量还根本不能按上述模式来建立党组织。根据现有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只能根据寄去的党章草案中提出的最简单的模式来建立党组织。例如，如果我们在一个省里只是在一部分县里设党组织，而在另一部分县里不设党组织，那么在这个省里自然不能这样来建立党组织，即在所有县都设县委会。对于一个包括许多居民点，而在这些居民点没有地方党组织的县组织来说同样也是这样。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县组织可以只依靠县里的有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村镇。同时，这样的县党组织应该进行与那些还没有党组织的村镇建立联系的工作，以便同这些地区的工农居民建立联系，采取各种措施把工农

^① 指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由他们来建立地方党组织。

如果你们问我们，我们对运用该章程草案方面具体任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们可以回答如下：

我们认为，党现在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首先放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组织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党来说首先必须使每个居民点范围内的党员感觉到自己是有组织的整体。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能，即生活在每个居民点内的党员联合成地方党组织，有自己的领导中心，即地方党委会，它给地方组织的所有党员分配工作，吸收每个党员参加具体的党的工作，使他们的精力围绕着最重要的任务，集中在革命斗争的最重要地段。地方党委会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在遵守以下条件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能：（1）如果它同地方党组织的所有党员建立经常的接触；（2）如果它同上级党组织有很好的联系。

为了实现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条件，在党员人数较少的组织内，应同每个党员保持直接联系，经常检查和指导他的工作，经常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在党员人数较多的组织内，地方党委会显然不可能同每个党员保持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委会应该依靠共产党的主要基层组织，即支部，而首先是工厂支部进行活动。地方党委会在动员地方党组织一切力量方面的最重要任务是，渗入和占据在该地方党委会工作地区的工业企业，并在这些企业内建立强大的和充满活力的工厂支部。各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全部国际经验表明，只有依靠各大工业企业中的强大的工厂支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共产党，因为只有这样的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斗争，才能在争取实现迫切要求的口号下和争取最终目的的口号下把他们动员起来。

为了遵守地方党委会顺利工作的第二个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现时条件下，即根本没有县和省的党委会，有时甚至没有省的党委会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同许多地方党组织建立直

接联系的问题。这是违反党章的，但我们再重复一遍，章程是无论如何不能机械地运用的，无论如何不能让地方党组织来服从并不存在的县或省的党委会。

另一方面，现有的省党委会应该竭力不仅为有县党委会的县党组织服务，而且为没有县党委会的县党组织服务，与地方党组织建立直接联系，竭尽一切可能在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地方党组织。

我们设想，在近期内中共还不可能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准确地实施我们建议的这一章程草案。日常革命斗争的利益必然要求对这一草案作多多少少的部分让步。但是党不应为这种情况而感到困惑，要估计到这种让步的不可避免性。这里主要的一点是，党应该首先注意到巩固的团结的地方组织与卓有成效的领导中心即地方党委会的关系，使这些地方党委会的工作有经常的领导。

这里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估计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了解到这个或那个省委会目前比较软弱，不能对属于该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地方组织实行应有的领导。特别是这个地方组织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么中央应该保持和加强对该省委会的领导作用，同该地方党组织建立直接联系。

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应该估计到，它不应在琐事上分散精力。对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可能使它难以履行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职能。因此，中央委员会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把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转交给相应的县党委会，以便不断加强县和省的党委会，使它们在日常斗争的实践中，在党章和党代会决议以及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范围内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

在这方面，我们提请中共特别注意章程草案中的以下条款，即说明中央委员会有权在地方上建立中央委员会的分局并派遣专门的代表。这一条指的正是党发展中的过渡时期，即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之间或者还没有有一

系列中间环节，或者中间环节发挥的作用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一条应该看作是日前过渡时期条件下必要的条款，而随着党的发展，随着地方领导中心的加强，派遣专门代表和设置中央委员会分局的必要性将会而且应该越来越少。

在章程草案中，我们特别强调从支部委员会、地方党委会到中央委员会的党的领导中心的集体工作。我们甚至认为有必要在章程中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经常召开会议的时间。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章程中作出这些规定，而为了使党有可能同老的传统进行特别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央委员会里，当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组织问题只是由一个同志，或最多两三个同志来决定，而作为组织整体的委员会实际上不存在的时候。^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应该结束，而且应该在各级党组织中尽快结束。

由选举产生的党委会应该成为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真正的领导机关。这就是说，党委会全体会议应该经常讨论和解决党章为该委员会所规定的范围内的一切重要的党的工作问题。这也说明，党委会全体会议应该经常听取党委会个别委员和由党委会的决定任命来执行党委会某项决议或在两次全会间隙中处理党委会日常工作的人员的详细报告。但这种报告制度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关的同志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出于建立党内真正集体领导的考虑，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章程草案中不仅专门规定党委会全体会议的集体工作，而且规定党委会常委会的集体工作。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在党委会不能经常和迅速地召开会议的情况下，可以从其成员中分出不少于三位同志（包括书记在内）的较小的常委会，在党委会两次全体会议的间隙来讨论和解决所有比较重大的问题，然后必须向每次党委会全体会议报告所做的工作。

^① 原文如此，句子不完整——译者。

领导党委会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也应该在每次党委常委会的会议上报告自己所做的工作，而党委常委会应该对书记的报告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最严厉的评论。

地下工作的艰苦条件自然会给党内民主原则的实施带来严重困难。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能进行党委会的正常选举，而只能从经受过较多考验的基层工作人员中增补的办法来加以充实，或者通过上级党委会任命的办法来建立新的党委会。我们在章程草案中没有规定这一条，但在这封信里我们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即使在由于警察监视而不能在建立党的领导机关时进行正常的选举，那也必须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通过增补来加以充实的党委会能够利用现有的合法和非法的条件让党员群众了解党委会所做的工作，使这项工作能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支部会议上、支部代表的代表会议上等等进行系统的讨论，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报告最好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那要视党的具体工作条件而定。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警察很严密的监视，在很少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根据选举原则成立党的领导机构。

关于接纳新党员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章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作出如下说明：

我们认为，在工人入党时应尽量对他们少提形式上的要求，例如我们坚决反对为来自车间的工人作什么专门的介绍。这并不等于说，每个愿意加入党的工人，只要他自己申请就可以接收他，而应该仔细地讨论每个新党员，包括工人在内，但不应讨论是谁介绍的，即使党的领导机关根本不了解这位介绍人。

我们认为，工人应该在工厂支部（还没有工厂支部的地方就在地方党组织）的全体会议上被接纳为党员。当然，接收每个新党员的问题首先必须交支部委员会（或者相应的地方党委会）审议。支部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该收集支部党员以及同情

党和了解这位新入党者的工人们对他的意见，应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清该工人在企业中的表现，他对共产党，对罢工运动，对国民党的态度等等。也完全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为了更好地考察新党员，支部委员会在最终表示意见前，让他去执行党的某些委托，并用这种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对他进行考察，同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这不等于说，我们建议实行新党员入党的某种成规。我们反对新党员入党的成规，我们认为，中国的整个形势是，没有任何必要为新党员入党实行某种专门的成规。

同志们指出要防止奸细，这自然是正确的。奸细应该加以防止，对于奸细行为应该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但是如果以为对新入党者的介绍人提出要求或者通过特殊的候补期才能接收愿意入党的人就可以防止奸细，那是十分天真的想法。应该估计到，在中共党内过去有奸细，将来还会有奸细。对于现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在中国进行活动的外国资本主义代理人来说，在中共党内有自己的侦探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侦探、间谍、奸细为了钻进党的队伍（这是事先可以预料到的）都会得到各种必要的文件、介绍信、证明信，等等，等等。这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解决。

接收工人新党员入党的工作，我们具体是这样设想的：在工厂里工作的支部要同工人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保持党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是支部的主要任务。工厂支部要保持这种联系，要参加企业工人同其阶级敌人进行的日常斗争。支部参加这种斗争，就能依靠无党派工人中的最先进和最革命分子，依靠所谓的同情分子。支部应该经常地吸收这些分子参加来完成党的一些任务，并同其中的优秀分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从而吸收他们加入党的队伍。

显然，在目前条件下，不能设想党可以进行大规模吸收党员的运动。这种情况必然会给党的吸收入党的工作打上烙印，也就

是说它只能通过仔细的个别的方式来进行，要考虑到中共目前开展工作所处的极端困难条件，而中共的党籍意味着（也必然意味着）每分钟都要经受最大的考验和带来最惨重的牺牲。

对于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规定介绍人的推荐。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建议不需要作特别解释。如果说一个工人在企业里总是在同志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而非无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或多或少是单独工作的。因此在这里要求更加仔细地专门地进行考察。

至于其他政党出身的人，首先是国民党出身的人，那么在现时中国的条件下，他们的入党问题就应采取最大的防范措施来解决。在中共党内与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实践表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敌人就是党内，特别是在党的上层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深刻残余。这些残余现在还有所表现。因此很自然，在接收其他政党出身的人，特别是国民党出身的人入党时，党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要防止加入党的队伍的人不是加强党而是实际上削弱党，防止让那些具有格格不入的敌对意识形态的人混入党内。

最后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谈一谈同反党行为进行斗争的组织形式问题。

我们反对中共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这是遵循共产国际组织局在审议类似问题时针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①。共产国际组织局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是这样一种考虑，即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国家里，各种反党行为问题可以在一般的党的机构内顺利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党的干部力量薄弱情况下，要建立有威望的监察委员会是很难的事，因为要么就得使一些优秀的同志脱离党的负责领导工作，要么就得把一些没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很大把握来正确解决复杂问题的同志列为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言而喻，为了解决一些细小的问题而成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与党委会平行地进行工作而又不对它负责，是完全不合适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4，第 82—93 页。

经亲笔修改过的打字稿，副本。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21号（特字第20号）记录 （摘录）

1928年4月19日于莫斯科

听取：5——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1. 认为在沈阳通过韩述曾领事转交给库兹涅佐夫同志的中国人的建议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2. 同意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作如下总的调整。

(1) 交换关于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同意承担不支持敌对集团的义务）的书信；

(2) 北京政府对袭击北京使馆^①表示歉意或遗憾；

(3) 释放在北京被捕的人员（15人）^②；

(4) 我们恢复使馆和派遣驻北京的外交代表；

(5) 从监狱中释放在我国境内无论按行政程序还是依据法律被逮捕的中国人，并将他们遣返回国。释放和遣返工作要根据北京政府或中国领事提交的名单在被捕人员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3. 如全面调整关系的谈判拖延下去的话，认为可以根据第(2)项第(3)、(5)条首先进行关于相互释放被捕人员的谈判；

① 指1927年4月6日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袭击。

② 指1927年4月6日对苏联驻北京使馆袭击时被逮捕的苏联公民。

4. 试探一下在谈判中扩大释放我国公民问题的范围，力争释放各个时期在哈尔滨和满洲其他城市被捕的人员。

5. 务必在我们提出的条件清单中列入由北京政府解散俄国武装自卫队伍并将其驱逐出满洲的要求。

6. 不反对冯 [玉祥] 的子女离开苏联。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6.。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61—62、6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89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 问题决议案的决定

1928年4—5月于上海^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 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案的决定^②

将以下五条交给赴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以便他们务必要要求共产国际作出解释：

1. 关于革命形势。如果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是在消退，也不是与间歇时期相适应的沉寂或停滞，那我们仍然应该认为革命浪潮的高涨是现有的事实。当然我们没有说，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浪潮。

2. 共产国际的决议对统治阶级没有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前景说得太少。

3. 关于革命性质。共产国际的决议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真正发展为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和前途指出得不够。

4. 共产国际的决议没有明确指出农民中的情绪的危险性^③。

5. 领导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协调工作只应在各种可能的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由参加六大的代表团带到莫斯科。

③ 原文如此。

范围内进行。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协调而阻碍业已成熟的农民暴动^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7，第 6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这里发表的五条没有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28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定的正式文本（见《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 1928 年第 15 期，第 3—5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第 174—177 页）。

9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5月1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朋友：

利用这个机会，就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您写几句。我是4月20日抵达这里的。已代表我们向政治局和当地的朋友们通报了在您那里所谈的一切。参加代表大会^①的人员已开始动身，我希望到5月中，一切都将就绪。奥莉加^②总是乱来，妨碍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现在大家都各奔东西。

全会的决议^③我已向政治局汇报。奥莉加总是按自己的习惯不让政治局委员们发表意见并建议在下一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她给我看了由她起草的决议，其中她建议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时再来解决，因为莫斯科讨论的性质对她来说，也就是对政治局委员来说，还不清楚。我对她的做法非常愤慨，并说我认为她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这件事。我已发电报^④告诉您这件事，并请求弄清这个问题。即将动身的同志们请我就适应这里目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见第409页注③）。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③ 指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19页注①和第65号文件）。

④ 电报没有找到。

前盛行的白色恐怖如何改组党的问题提出意见。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以下建议：

(1) 所有党员分成5至10人的小组。这些小组由组长领导，组长配一名副手。只有组长及其副手同领导这些小组的机关保持联系，同时5到6个小组联合成一个单位。我的这一建议的目的是，减少目前很可能发生的被破坏的危险，因为每个党员都知道另一个党员，大家都知道党委会、党委会代表和积极分子。

(2) 所有党委会暂时都应由三人组成，因为不可能很多人集合在一起开会。

(3) 每个党委会都应有哪怕一套接替的班子，以便在被破坏时由另一套班子来顺利接替这一套班子。

(4) 所有党委会，从区委会到中央，都应建立负责人制度，以便通过他们与支部、小组等进行联系。

(5) 党委会必须在委员中进行严格的分工，以便使经管财务的人不致陷入困境。

党委会与基层的联系应尽可能通过负责的代表进行。

(6) 必须使所有省委会以及中央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满不在乎地对待可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必要让所有党员或者所有机构的成员都知道党内的一切事务(即不是指政治方针和原则性问题，而是指党员构成和党的秘密事务等问题)。

因此，必须使党委会的规模尽可能变小(三人)，有一个好的接替班子，有经过考验的代理人，并尽可能分散地进行工作。

(7) 关于中央本身，我的意见如下：

1. 中央不可能永远呆在一个地方，应该从一个中心城市迁到另一个中心城市。必须设立一个国外中心，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工作。这个国外中心可以设在离中国较近的地方(新加坡、马尼拉等地)。那里有许多中国侨民区，而中央的工作可以进行得不露声色。这个中心可以出版一些书籍，制定一些原则性问题，领

导所有党组织。这个问题之所以十分迫切，是由于中央的著名工作人员，如瞿 [秋白]、[陈] 独秀，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广大人士中都很有名，而他们呆在中国，特别是呆在上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灾难。

关于瞿 [秋白]，必须特别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在个人生活上绝对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在个人自卫问题上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主动性。这就是我到这里后一个星期所能提出的组织方面的意见。

现在来谈谈经费问题。

我们这里现在开始按时收到经费了。但应该告诉您，据这里的同志们说，2月底和3月初，情况非常糟糕。如果说一方面，钱不够使工作难以进行，而另一方面，我要坚决抗议奥莉加的行为；她根本不承认预算委员会的任何决定。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她郑重地向弗里茨^① 采取恐吓手段。事情弄得糟透了。她不择手段地敲诈，现在还继续在敲诈钱财（例如，她从别尔津那边的人^② 那里得到钱，但对谁都不说）。由于她插手经费问题，我们同中国人怎么也算不清帐。我认为，她的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您的斥责。我断然拒绝对她所干的一切事情负任何责任。我要求她对她在这一切胡乱挥霍的钱财作出交代，也要求将来对所有派到这里来的工作人员说明，不能靠损害技术部门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威信。我知道，她会对您说，她是如何进行慈善工作的，她如何用自己的薪金供给中央的，等等。但我希望，无论是您，也无论是其他领导朋友都不要支持这种“人道主义”（何况用这种办法支付出去的钱以后又更多地赚回来）。

现在来谈谈她的工作的一些特点。绝对没有保密观念，带着中国人到处跑，我们的所有住所都遭破坏，同无论是别尔津那边

① Ф. К. 费尔格德。

②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代表。

的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人都进行联系，敲诈钱财，一味的盲动主义，最后还有支持最无政府主义式的恐怖活动。独秀^①动身前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特种工作怎样进行？当然，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对奸细进行暗杀，并同警察联系以防止遭到逮捕。我断然拒绝参与这些事，并建议他在代表大会上（即向别^②、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我援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波兰恐怖活动的决议^③，并认为，这个决议在中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正确。然而，〔陈〕独秀对我说，西方好的东西，在东方不一定合适，并引证赞同这种行为方式的奥莉加的威望作出说明。我不相信这一点，并直截了当地问奥莉加。她坚定不移地说，她认为必须把恐怖活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像格勃乌^④的工作一样。我认为，如果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不立即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我们就会走向灭亡，党内就会迅速充斥一些奸细。

这就是我要说的。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14—115 页。

打字稿，副本。

-
-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打字员打错了。这里多半不是陈独秀，而是周恩来。
 - ② 可能指 Я. К. 别尔津。
 - ③ 决议没有找到。
 - ④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91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联共（布）中央的信

1928年5月3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 副本送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

我们已经几次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出关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合并的问题。^① 从与莫洛托夫同志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几乎所有联共（布）中央委员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向你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 （1）关于合并的期限。
- （2）关于军政训练班。

1. 莫洛托夫同志在与我们的谈话中说，所有联共（布）中央委员都原则上同意把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中山大学，但是这项合并工作再过一个半月学期结束时来进行更合适些，也更少些误会。同时，莫洛托夫同志也请我们对改善东方大学的状况提出具体建议，但我们和莫洛托夫同志都没有合适的具体建议来真正改善东方大学的现状，因为第一，在领导同志和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完全缺乏相互信任，第二，党的纪律和教学纪律已完全化为乌有，第三，课程几乎没有进行（不是学生不去上课，或者没有翻译，就

^① 见第51、67号文件。

是教员不到课堂去),第四,由于安德烈耶夫^①集团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进行煽动,中国学生和其他民族学生之间的关系充满着敌意。第五,中国学生本身就分成两派:人数不多的安德烈耶夫派和大多数学生。这两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在东方大学不仅谁也没有能力消除这些分歧,而且甚至减少分歧也办不到。

最后,由于东方大学的这种病态现象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几乎所有中国同志都已陷于绝望和消极情绪(有些头脑发热的年轻同志谈到要自杀等)。

我们和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而现在有一百多名年轻共产党员处于这种状况之中。

目前,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环境,新的环境或许能使他们活跃起来,消除他们的忿懑情绪和普遍状态^②。我们认为,他们是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学习的。因此,关于合并的原则性决定应该在最短期限内贯彻实施,越快越好。因为对于一百名年轻共产党员来说,一个半月时间可以做许多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政训练班。

据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说,今年夏天军政训练班的学业将结束,学员们将被遣送回国。无论是出于正面的原因,还是出于负面的原因,我们都不能完全同意这样做:

(1) 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们,由于各种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在莫斯科呆的时间不同、形形色色的复杂成份、教学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整个东方大学特别是军政训练班的不正常状态而没有获得什么知识。因此,他们还不能成为军事干部,甚至不能成为下级指挥人员。为什么要把他们遣送回国呢?

(2) 由于东方大学的不正常状态,他们不仅对东方大学和军

① 武胡景。

② 原文如此。似乎应是:消极状态。

政训练班的领导机关不满，而且党组织在他们那里也没有威信。当然，这说明他们年轻，党的觉悟不高。但不管怎样，这种不满情绪和党组织缺乏威信的现象在他们那里是存在的，这一点决不能忽视。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对他们采取非常细心的态度，在他们当中进行长期的党的工作和教育，否则其中有一部分人（数量不少）今后会在工作中得不到应有的使用。军政训练班的优点是：

- （1）学员构成大部分是工人；
- （2）大多数学员是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对军政训练班的具体建议是：

- （1）将确实没有希望的部分学员遣送回去。
- （2）将确实有希望并能够在中共的军事工作中得到使用的一小部分学员遣送回去。
- （3）将学习最差的学员送到其他军校。
- （4）将身体状况不好的学员遣送回国，或者将那些因政治素质不能在军校学习的学员送到一般高等院校（中国劳动者大学等^①）学习。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培养中共干部方面已经付出和将要付出许多精力和财力。我们（代表团）谨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对此表示热情的感谢（这不是客气，而是党的尊敬），但是我们认为，提出好的意见胜过感谢千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代表中共代表团：苏兆征
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9，第 44—46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

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 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①

不晚于 1928 年 5 月 4 日于莫斯科^② 绝密

一、军事部的组织纲要

为的直接指导党的军事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下由中央委员三人组织军事部，按照中央委员会命令进行工作。

军事部工作的性质、范围与方向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之。军事部对中央委员会至少两月须作工作报告一次。

军事部及地方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须顾到这一点，就是当武装暴动的时候，他们能在最短时间内扩张成为指挥暴动的军事司令部。

军事部及地方军事委员会的机关应该是特别的机关，不与普通党的机关相联贯。

军事部下设三部：

1. 对敌人军队工作部

此部之任务是：

- (1) 在军阀军队中工作；
- (2) 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

① 本文按中文原件刊出——译者。

② 日期按文件上写的注注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米夫同志，转向忠发和苏兆征。马马耶夫，1928年5月4日。

(3) 征集和研究消息(传达工作)。

2. 工农工作部——准备和训练工人之工作及在农民组织中工作。

3. 组织技术部——司理统计、技术、供应、印刷等。

二、地方军事委员会的组织纲要

为在各地方进行军事工作起见，根据中央特别指令，在各地地方党委员会之下由三人组织地方军事委员会^①。

地方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地方党委员会建议名单提到中央军事部，经军事部批准之。

地方军事委员会按照中央军事部所批准之工作大纲及在地方党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为的保证在地方军事委员会中经常的党的领导，地方委员会的书记或委员之一，一定要加入地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的成份之内。

地方军事委员会的权利等于地方党委员会的一部。

地方军事委员会在军事技术方面直接服从中央军事部。

地方军事委员会也如中央军事部一样设下列三部，即：(1)工农工作部；(2)对敌人军队工作部；(3)组织技术部。

三、关于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

1. 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

此项工作的目的是破毁军阀的军队，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士兵群众倾向到革命方面来，为达到此目的党应当：

[1] 按照组织路线的：

(1) 尽力设法在各军阀军队中登记(抓取)同情我们的士兵。

^① 在次要一点的地方，可以不组织地方军事委员会，而由中央指定之军事特派员负责。

(2) 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记的士兵当中设法组织同情共产党的士兵小组或支部。

(3) 吸收受到相当训练的士兵加入共产党，并在这部分的兵士中组织共产党支部。

(4) 应当特别设法在军官与下级军官中工作，但在组织上不能因对军官的工作而束缚了我们对兵士的工作。某部分军队的军官，虽然比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则不应当使他知道在他的队伍当中那部分兵士已经有了组织。

(5) 至于对高级军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军阀间的冲突加剧的路线之下才可以进行。

(6) 为的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乡土观念(同省、同县、同乡)，有时或者氏族观念。

(7) 包括海陆军士兵的广大的群众的组织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军联合会”，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

(8) 按照党的纪律，派遣一部分党员到军队中充当士兵及军官(经过军阀的军事学校)，同时，党应保证对他们的领导。

(9) 特别要注意我们潜入兵工厂及武器库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影响应当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党能够抓住那里的工人。党的中央及地方委员会对这种工作应特别注意，应该特别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做这种工作。

(10) 必须在警察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警察中能有组织的影响，则警察恰好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

(11) 必须在商人武装(如商团等)中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商团亦似警察一样，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特别是在即将暴动的时候。

[2] 按照鼓动路线的：

(1) 必须在士兵中发展广大的群众的煽动工作，必须尽可能的使所有兵士群众都了解和接受共产党的口号。

(2) 中央军事部必须出版中央兵士周报。

(3) 报纸内容必须绝对的适合兵士生活条件，文字必须通俗，必须组织军事通信。

(4) 为的使报纸流通到各地，必须有特别的转运机关，因此，中央军事部应当有特别的运输机关。

(5) 除中央兵士周报外，中央军事部及地方军事委员会应散发兵士们正在闹的问题的传单。

(6) 在党的机关报上，必须设士兵生活栏（军事栏），除讨论军阀军队中的工作问题外，同时应该进行党员军事化及先进工人军事化的工作。

(7) 必须印刷各种士兵日用小册、日记、日历、记事簿等等，这些东西的外表应与通常的货物一样，但内部则有我们的材料。

(8) 每个地方军事委员会应有特别一组人，专负散发宣传品到军队去及在军营区域内张贴传单标语之责，这种工作人不应与党的一般工作有任何关系。

(9) 除去定期的或临时的传单以外，对于海军必须恢复《新海军》或《灯塔》半月刊，这两种过去都是很通行的刊物，指定海军中共产党党员进行海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10) 在最近革命阶段中，对兵士及海军应提出下列的口号：

1. 加饷；
2. 按时发饷；
3. 按时发给军装；
4. 改善伙食；
5. 监督连部、营部及团部的款项；
6. 取消对士兵的打骂和肉刑；
7. 不经过法庭和调查不能枪毙人；
8. 号召士兵回家去或者到农民游击队中去；
9. 号召被拉的农民停止服役的工作；

10. 向对兵士们解释将军们财富的来源是对于农民的抢夺；

11. 号召工农兵等联合起来。

[3] 按照传达工作的路线的：

(1) 责成士兵小组或个人通知关于本部分军队的战斗上的、思想上的及其他等等的情形的消息。

(2) 在敌人自团及团以上的参谋部中，中央军事部应该有自己的经常的消息报告人，以便知道敌人要干些什么。

(3) 地方军事委员会对于其区域内之驻军必须设法搜集最完全的消息，如：

1. 历史；
2. 军官成份，特别是上级军官与老军官的成份；
3. 军官间的相互关联；
4. 过去的战斗力；
5. 军官的财产状况及他们从什么地方致富的；
6. 人数与武装；
7. 营房的生活条件等等。

这些消息可以帮助地方工作人正确的进行煽动工作。

2. 在各县警备队中的工作

在各县县长领导之下的武装警备队是民团（有时并且是常备军）反对农民的直接后备军，地方军事委员会应当在警备队中工作，因为他们组织薄弱，军事知识不高明，和没有纪律化的原故，所以成为我们取得武器的好来源，由农民充数警备队在暴动时一定很快的瓦解。

3. 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

在帝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与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有同一之目

的，即是在军队中加强我们的影响，使其军队破裂而转向革命方面来。

为的顺利进行此项工作，中央军事部应按照下列之方法：

（1）中央军事部应当任命有军队驻华的国家的兄弟党的几个共产党党员担任工作。

（2）从军事部的委员当中找出一懂得相当外国语言文字者与外国同志共同组织“对帝国主义军队工作的副委员会”。

（3）如果在帝国主义军队屯驻之区域内，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共产党员同志，则在地方军事委员会之下也可组织上项所说的副委员会。

（4）副委员会之任务：即是用一切方法（文字宣传及与兵士发生私人联系等）瓦解武装干涉者的军队。

（5）用各种适当的外国文字有系统的印发各种宣言、传单、标语及告外军书等。

（6）如果有发行小报的可能，当然更好了。

（7）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应提出下列口号：

1. 加饷；
2. 改善生活条件；
3. 到中国一年半以上的毫无阻碍的束装返国；
4. 派你们到此地来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你们并非祖国的保护人，而是从本国跑出来压榨他国人民血汗的投机者的保护人；
5. 你们是工农的子弟——为什么你们跑来压迫为生活等等而斗争的工农；
6. 转到工农革命方面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8）中央军事部应当有特别的机关散发小品宣传文字及传单到帝国主义军队当中去。

（9）经过兄弟党的同志在已经受宣传的兵士当中，设法在

“不许侵犯中国”，“从中国回家去”等的口号之下组织这类的小组，这些小组或者可以作为我们散发宣传鼓动之材料之用。

(10) 必须注意到所谓“白种人”及“有色人种”的士兵中的工作的区别，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及煽动态度都应当有区别；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对“有色人种”兵士发生联系，必须尽量借这个种族的旅华侨民之助，最主要的是印度人与安南人，因为他们是英法驻华军队的主要成份。

(11) 在外国租界（如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地对警察应作上述的工作，因为那些警察的主要成份是印度人与安南人。

4. 征集和研究消息的工作（传达工作）

(1) 中央军事部应当很详细知道军队及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情形，他们的数量、武装、驻在地、政治的和思想的概况，指挥的计划等等。

(2) 中央军事部应组织特别技术机关，专管征集消息，整理和研究消息，抄写通告及传达消息给应得某项消息的人。

(3) 在传达消息时，第一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即某地的消息必须有证实这项消息的材料，因为军阀们对于自己的军事政治目的有时有意造出不正确的谣言来。

(4) 在警察机关中，较大政党的机关（如国民党）中、农民组织中及其他……中，必须有自己的传达消息人。

四、关于工农工作部的工作

工农工作部在教育和武装工人阶级及农民的口号之下进行工作，利用很小的秘密组织（如五人队、十人队），及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人方面，如工会、体育团体等等；农民组织，如农民协会，及各种会社等）来达到目的。

在目前准备新的革命浪潮高涨之时，工农的武装组织的作用，

应当是对反动力量进攻之自卫机关。

1. 在形成工人武装队的工作

为的保证在广大的群众所参加的暴动之时的领导，必须刻不容缓的创造工人武装队，其任务即是准备暴动的中坚人物。

在形成工人武装队和战斗武装队的工作中必须遵守下列规例：

(1) 武装队的组织必须顾及到这一点，就是当群众武装斗争之时他们能够成为领导的中坚。因此产业工人的武装队伍应按企业为单位来组织，而产业工人的武装队的组织尤须与相当的工会单位相适合。为的在武装作战时在组织军事上把群众卷入斗争，在有可能的地方，应该除武装队以外，更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自卫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武装队应该是这种自卫队的中坚。

(2) 武装队应该按地域划分单位，同时，须照一般规例，其基础应建筑在大规模的及在其中有坚强的党的组织的企业里面。

(3) 在每区必须指定一委员会或一军事特派员负责作此工作。

(4) 委员会（或特派员）应当与工厂支部或作坊支部发生联系，在每个支部中找出一个军事组织员。

(5) 委员会经过军事组织员指定五人队或十人队的队长，此些队长一定要是党员，如有特别情形方可指定可靠的非无党工人充任。

(6) 在秘密时代之中，所有队长统帅的五人队或十人队的队员，应当仅仅是工厂的或作坊的军事组织员知道，这一五人队或十人队的队长不应当知道那一五人队或十人队的成份。

(7) 已登记之武装队队员应当设法教他们军事知识，最初就须教他们使用枪械及巷战的策略。

(8) 除知道使用武器及巷战策略外，武装队队员应当知道在巷战时他们所住的城市的一切情形，对于他们自己居住的区域尤须最详细的知道。

(9) 除了掌握巷战战术和武器使用方面的知识外，工人战斗队队员还应该很熟悉自己的城市，以备进行巷战。他们应该特别熟悉自己的地区。

(10) 训练武装队队员绝对要分成小组，理论的课程在城内秘密住所举行，射击则在郊外。

(11) 对于特别机关的工人的工作应特别加倍的注意，例如：在铁路上有很好的有组织的铁路工人的战斗武装队，则对于革命能有极大的帮助，临时破坏铁路的交通，可使军阀没有迅速集中兵力的可能；对于这些武装队的队员应当教他们专门技术——如学习炸毁工作等等。

在电站、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及无线电站的工人有在必要之时断绝敌人的一切联系而把这些机关供给革命政权之用的作用。

在各种重要机关（工厂、银行、法庭等）的武装保卫队中应当有我们的人。在兵工厂、子弹厂、武库局中均应有我们的人。

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夫及私人汽车的汽车夫，据广州暴动的经验，他们对于革命能给帮助。

(12) 必须注意到，我们设法组织和武装的不仅是工人——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期——小资产阶级中如革命的学生、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等，党必须按时抓住他们的革命情绪，把他们组织和武装起来为暴动时我们的助力。党在组织小资产阶级的成份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中，必须保障对他们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和党的领导。

2. 在农民组织中的工作

(1) 在农民中的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使农民的武装组织受共产党的指导，帮助吸收无组织的群众到农民武装队伍里面来，变无组织的游击队为农民游击军，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地并变之为

红军。

(2) 中央军事部在农民中的一切工作应当与中央农民委员会发生联系和同意。中央农民委员会把经过自己的机关所得关于各区农民状况详细通知中央军事部，这些通知的材料应当成为军事工作的主要参考材料。

(3) 中央军事部对农民游击队的工作应该尽力注意把他们成为有纪律性，有军事训练，有最高限度的军需供给和粮食供给的战斗单位。农民游击队的基地是乡村（按游击队的参加人的住所为单位）。

(4) 在游击队运动已有广大范围的地方，有好些区域的政权已在农民游击队的掌握的地方，军事部必须设法使那些农民游击队采取正式军队组织原则的形式。

(5) 在各个游击队的小队和大队中，应当设法教它们军事，特别是他们的干部人材。

(6) 军事部应当尽力武装农民游击队。

(7) 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农民队伍中，应该派遣工人成份及党员去充当他们的干部，以便保证正确的阶级路线和帮助游击队的军事行动的奏效。

(8) 在有可能的地方，应该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出人来组织宣传员及下级军事干部人材的短期训练班。

(9) 党应当用一切方法钻进农民这种组织（如“红枪会”、“大刀会”等）中去，以便改造他们保证党对于他们的领导的影响，为达到这些目的，可用这些组织的县代表大会、省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等的方法，在这些代表会议中实行组织德谟克纳西化和使群众脱离首领的工作，用可靠的革命的成份去对抗他们的领袖。

(10) 当我们的影响在这些半宗教性的下层组织中还没有保证时，对于反对这些组织的首领的激烈的宣传和煽动不应轻易进行，首领的迷信在他们当中非常深固呵！

(11) 为的在这些组织中取得影响，实行改组他们的工作，可派遣一部分在政治上可靠的人钻入他们的队伍中去，并且选择比较最可靠的下级干部人材去作他们的干部。

(12) 党应当设法避免农民的单独的进攻，农民暴动如果不与城市中广大的革命高涨及工人阶级的武装进攻相联系，则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失败。

(13) 在农民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还负有对民团工作的责任，因为民团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所以有吸收其中较好的部分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至少，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武装。

(14) 强盗队伍（土匪、红胡子）有时有成千累万的武装，有时能够打败正式军队，所以在农民中的工作人应对他们加以注意。强盗是社会经济恐慌的产物，其中大部分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队伍第一就须改组，改组时首要的无须注意军官成份的选择，因为大半的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只是妨碍革命的事业。

五、组织技术工作部的工作

它的工作分成为下列的主要部门：

- (1) 工作人员的统计与训练；
- (2) 交通；
- (3) 武器与战斗用品的制备；
- (4) 特殊的印刷技术的设置；
- (5) 教导员组；
- (6) 财政。

1. 统计与训练

(1) 军事部对于自己的所有的军事工作人员必须有精确的统计，必须分别统计哪些同志在中国各地军事学校受过军事教育，哪些同志在外国受过军事教育。

(2) 军事部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必须有精确的调查，以便知

道何人可以做何种相当的工作。

（3）这些统计与调查最好尽可能的不留任何字据，党及军事部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之下，只容许有这样的字据，这些字据即落在敌人手里也与党无害。

（4）军事部指定军事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有必要时则这些指定分别与中央、省委、地委同意。

（5）为的使军事工作人员完全致力于军事工作，希望把过去因一般党的工作而经常的破坏军事工作人员的主要军事工作的现象扫除净尽。

（6）准备新的军事工作人材的中坚分子有下列方法：派遣青年知识分子到军阀的军事学校里去，在军事部之下组织特别训练班，派遣最有力的同志到外国学习军事。

（7）军事部应很正确的把所有的军事工作人材的中坚分子分配到各地。

2. 交通

（1）军事部与各地军事委员会及军事特派员间的交通应该绝对的正确而毫无间断。

（2）军事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各种秘密缮写的药剂，以便与各地通信，必须有很好的经过研究的暗记与密码，并且每个军事工作人员会使用这些东西。

（3）军事部与各地的交通应由军事部负责。

3. 武器与战斗用品的制备

（1）供给工人武装队及农民游击队的武器与战斗用品是军事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2）工作有两方面：在准备时期的条件之下的武器的供应与在直接战争之前及战争时的武器的供给。

（3）在准备时期条件之下对工人武装队的武器的供给，如为学习军事之用，这点武器不用特别的冒险与劳力在地方市场上购

买即可。

(4) 对游击队武器之供给，主要的是对于零星军队的袭击，最好是对于民团、商团、警察等的袭击。

(5) 军事部必须审慎选择一部分同志，学习利用旧弹壳制造子弹，在正当大战到来之时，应当尽量供给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武器与战斗用品。国外可以有武器到来，所以事前应研究将在什么地方可以起卸武器。

(6) 在准备暴动之时应该详细的研究所有的武器及战斗用品的贮藏所，研究袭击它们的道路，从那里得到必需用品的方法，很希望在这些贮藏所里事先有自己的人。

(7) 在大城市里组织制造所，最主要的在其中制造手榴弹。

(8) 注意取得炸毁剂并教会同志们使用。

4. 特殊的印刷技术的设置

为的准备印刷品，军事部应该有不与中央一起的印刷机。

应当找定一部分同志，专门考究转运文件及物品的问题，这些同志详细的研究各种运输品的转运途径。

为的散发和张贴秘密的党的宣传品，必须采用下述方法：组织三人队——希望由少共组成——由其中一人张贴或散发宣传品，其他二人注意查看周围情形，按时避免危险。

5. 教导员组

军事部应当指定一组流通的教导员，他们按时由一地到别地代表军事部教导和调查各地军事委员会和特派员的工作。

6. 财政

(1) 军事工作应该事前制定预算案，按照预算案进行工作。预算案须经中央的批准。

(2) 特别重要的，各地方能够按时得到的按照一定预算案所应得的款项。

(3) 因款项供给的中断可以引起意外的停滞工作等的结果。

六、破坏工作

军事部找定几个最可靠的同志教他们执行破坏工作，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一切破坏工作仅由中央特别命令决定方可执行。

七、关于组织红军的工作

在那些工农暴动的胜利得到巩固的地方，必须很快的尽可能的把农民游击队和红色先锋队改变成红军，红军的组织应按照下列的原则：

1. 经过工农组织征集最好的成份，并招募志愿军，对于志愿军事前最详细的审查，对于过去是军阀军队的兵士的成份尤其须经过严厉的审查。

2. 军官成份的工人化。

3. 实行党代表制及成立政治部。

叶挺贺龙暴动的经验证明，他们的革命军的破裂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这个原则，革命军的指挥处没有采取任何方法以实行党代表制，结果致有许多军官叛变之事发生。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71，第 83—89 页及背面。

打字稿，原件。

93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 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

1928年5月4日于莫斯科

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

亲爱的同志们：

就中国工会预算问题，我们同你们举行过一次会议^①，但还没有作出具体结论，所以我们决定再次让你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并再次表达我们的请求。

你们知道，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在正经历着最艰难最困苦时期。我们多次谈到恢复过去组织的问题，整顿和加强中央和地方工作问题，发展群众运动问题，把处在反动工会影响下的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问题，等等。

但是，仅一个决议^②远不能解决这些任务。解决这些任务的条件之一，是你们的积极物质援助。你们确实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援助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老实说，在目前条件下，你们的援助是不够的。

不能把目前的条件同我们还在同国民党合作时的条件作比

① 会议材料没有找到。

② 看来是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行动纲领》（见：《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8年3月17日至4月3日）速记记录（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28年版，第660—664页。）

较。那时几乎所有工会工作人员都靠国民党或国民政府机关的经费来养活。那时所有工会机关和其他开支项目都有相应的经费来源。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你们早就知道。因此我们请求增加预算，增加你们迄今给予中国工会的援助。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物质援助。中国工会现在所处的经费状况无法把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此外，屠杀和破坏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老组织在遭破坏，而新组织无法建立。我们面对这样的情景怎么能平静地坐在莫斯科呢？我们恳请执行局研究这个问题，即中国工会的预算问题。

期待你们尽快作出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向忠发

苏兆征

全宗 534，目录 7，卷宗 346，第 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中文真迹。

9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5月7日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已就中共财政困难问题向你们打过书面报告，并附上了新的预算^①。我们请求批准这个预算，因为至今还未得到答复。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很焦急，因为在中国，无论是恢复组织方面的工作还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刻不容缓。

不久前，我们在中国摆脱了艰难的处境，深信正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经费，近半年来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此外，近几个月期间，许多负责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枪杀，这种情况更加迫使我们考虑改善秘密工作技术的问题，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尽力营救现在被监禁的同志。过去的经验表明，是可以营救他们的。如在上海法租界，最近有几个同志被逮捕，法国人拒绝把他们移交中国当局。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资金的话，党组织就可以把他们解救出来。

共产党人当然不应只关心改善自己个人的物质状况，但是党怎么能同志们的最低生活费用都不予保证的情况下来迫使他们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呢（不妨提醒你们一下：连党中央委员每

① 见第105号文件。

月也只能得到 27 中国元)。这种艰苦的物质状况，可能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都了解。同国民党决裂后，党失去了一切特殊的经费来源，因此这种状况就更加重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在过去的书面报告中讲的够多的了。

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物质援助。党希望共产国际能像它过去在物质方面援助国民党那样来援助它。

期待你们尽快就此问题作出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苏兆征）

中共中央委员 （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9，第 48—49 页。

打字稿，副本。

95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工会 国际执行局的信

1928年5月7日于莫斯科

1. 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经济危机不仅没有缓解，相反在日益加剧。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用鲜血争得的工作条件：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相应增加工资，物价昂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近一年半来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重大变化和恶化。由此可以得知，为什么在这一年半期间，尽管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无产阶级实行了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但罢工运动仍在逐渐高涨。由此也可以得知，反动工会之所以未能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率领他们前进，是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未能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

2. 中国工人阶级在整个斗争期间，始终坚持着革命阶级的观点，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在反革命政变^①前时期，工会能够掌握中国各重要地区的各主要工业部门。在这个时期，革命工会能够使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阶级斗争，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阶级口号周围。

在国民党政变之后，尽管存在着极其残忍的反动派，中国工会仍能保持自己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而且还能够把他

^① 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的政变。

们动员起来，使之聚集在“苏维埃”口号周围，并率领他们举行（广州）武装暴动。广州无产阶级暴动不仅说明革命工会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保持着影响，而且这次暴动也预示着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开始。（上海和其他省）不间断的罢工浪潮则说明这个新的高潮已经开始。随着上述经济条件的恶化，这种罢工浪潮还会加剧。

3. 中国工会尽管有许多积极方面，但也有许多消极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不善于吸收基层工人参加工会领导工作，并且在工会内部缺乏足够的民主，因此造成了工会机关有脱离群众的某种危险。

（2）第二个错误也与此有密切联系，这就是部分工会领导人，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不是采取说服方式，而是采取强制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人群众的消极情绪和对革命工会的破坏。

（3）对所谓“小”问题，即广大工人群众关心的迫切的经济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4）在同反动工会的斗争中，热衷于搞个人恐怖，对于开展揭露反动工会出卖政策的群众性宣传鼓动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争取根除这些错误和与此类似的错误，是在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并把他们动员起来，使之聚集在他们的阶级组织周围的工作方面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苏兆征
向忠发

全宗 534，目录 7，卷宗 346，第 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中文真迹。

96

琼森和布劳德给红色工会 国际执行局书记处的信 (摘录)

1928年5月8日于上海

绝密

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二月全会^①指出，我们的影响有一定的扩大和加强。书记处从汉口迁到上海大大有助于改善联络和活跃整个工作。可以说，最近三个月，太平洋书记处变成了发挥作用的组织。

在中国，人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书记处的存在。由于我们的工作，现在至少工人积极分子知道了我们的存在。但是整个党的态度还是漠不关心的，这肯定与它对工会工作的普遍忽视有关系。我们对这里的工会工作方法提出的批评意见在逐渐起作用，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得到承认，虽然是缓慢的^②……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问题

必须指出，在纠正工会方针方面已有一定的进步。现在承认，需要重建工会机关，使其成为发挥作用的机器。有必要建立辅助

① 见第285页注③。

② 以下删去关于菲律宾、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部分。

性的组织形式，以争取合法或半合法存在的可能性。要根据每个场合的具体条件来建立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俱乐部、兄弟会、公共宿舍等等。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一些实际倡议。

在汉口、湖南和其他地方，职工运动完全被摧毁了。在大城市中，只有在上海和广州有合法工人运动。在这两个城市里，工人运动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地下工会多数已被摧毁。

黄色工会问题是最尖锐的问题。必须承认，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在日益增长，尽管存在着广为流传的工人群众对它们的怀疑、不信任和敌视态度。最近四个月，上海的任何一次较大规模的罢工，都是以工会联合会或所谓的工人联合会^①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而告结束的。看来，离开它们无法领导罢工。更糟糕的是，罢工都是自发的。有一些罢工规模很大，如35000人的丝厂工人罢工^②，而我们的同志却不知道，同他们没有联系，往往措手不及。如果我们说，在上海，我们的大部分同志同工人群众的活动是隔绝的，这并不夸张。

不仅仅群众在争取工会组织的“合法化”。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③也说：

“在我们的策略上，有两种消极倾向：一种是老机会主义余毒。我们的同志不敢领导工人的斗争，而准备同政府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妥协，以保持我们同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浙江工会负责人不想同反动工会组织彻底决裂。上海基层机构的负责同志对工会联合会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而安徽省委的同志决定加入芜湖市工人联合会，等等，等等。”

在黄色工会得到加强的同时，我们的同志把工会机构同党合

① 见第280页注③。

② 指1928年3月上海丝厂罢工。

③ 见全宗534，目录4，卷宗216，第152—159页。

并在一起了，实际上是取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在二月就此问题通过了几个很好的组织决定^①，但没有贯彻执行。几乎就在全会之后，工会中心的同志被党免去了职务，被派到地方工作去了，而中心从这时起实际上被撤消了。

现在建立了有一定工作效力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领导机构。主席团由三名同志组成，其中两名同志与中央代表一起组成党的工会委员会^②。在上海，恢复了市总工会，逐渐建立了联系。它由11个工厂的11名代表组成（是指派的，而不是选举的）。对工会工作逐渐给予了更大的注意力。但是几乎在所有政策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当作出一些好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常常，甚至总是停留在纸面上，连工人们自己也看不到。《上海工人》^③报，至少曾是群众工作的开端，现又以“资金不足”为借口停止出版。这是不可原谅的混乱和轻视工会工作的例子。

中央第39号通告（副本附上）^④基本上没有谈工会和工人阶级问题，然而却拿出很多篇幅谈论许多其他问题，如军事问题、农民起义、小资产阶级等等。我们今天同中央代表^⑤谈了话，要求下一期中央通告要指出工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答应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注意到有某些改善的同时，必须指出，工会工作还做得马马虎虎。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存在着巨大的工作困难、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存在着不利的政治形势的角度来看。我们迄今偶尔所进行的联系将会变成比较经常性的

① 详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51—252页；《中国工人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党史研究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版第2册第5—28页。

② 1928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和中共中央工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详。

③ 指《上海工人》报，1927年至1928年在上海出版。

④ 实际上没有。见中共中央通告《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1928年3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8—173页。

⑤ 可能是项英。

联系。我们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参与制定贯彻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①以及你们现在同他们的代表大会^②一起制定的决议的详细工作方法。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收到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你们最近通过斯特卢德同志寄来的信^③中说，决议已寄出，但在他带来的材料中没有这个决议。我们希望能很快得到这个决议，因为我们很需要它。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下面的总方针来制定对黄色工会的工作计划：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在各个拥有工人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建立自己的小组，主要口号应该是：“反对由主管指派领导人”、“工人自己为自己选举领导人”、“工会实行民主化”、“反对由企业主强制收取会费”、“建立工厂和车间委员会”、“应由罢工工人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所有罢工和签署一切协议”。此外，必须经常提出工人准备以某种方式为之进行斗争的各种经济要求。必须揭露黄色工会领导人出卖工人最起码的要求的行为^④……

附上关于中国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在4月底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和中共中央致工人积极分子的第39号通告。此致敬礼

查尔斯·塞基和拉塞尔^⑤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216，第 126，128—131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琼森亲笔签字。

①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行动纲领》（见第 93 号文件注 4）。

②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见第 409 页注③）。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以下删去关于太平洋书记处当前工作和日本的部分。

⑤ 分别为琼森和布劳德。

97

中国共产党代表给农民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5月16日于莫斯科

致农民国际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自中国农民协会正式加入农民国际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以来，我们和农民国际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或者说几乎没有联系。因为中国农民协会至今还没有向农民国际做过一次系统的书面报告，一次也没有派出代表出席农民国际的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去年恽鸟翔^①同志本应去莫斯科出席农民国际的代表大会，但因工作繁忙未能成行）。这种情况当然是很大的缺点。现在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农民协会和农民国际应该建立正常的、密切的联系。

以后我们一收到来自中国的材料，就向你们提出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详细书面报告。而现在我们在这封信里谨向你们作以下概括性的报告：

1. 存在苏维埃政权的地区。海丰和陆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展群众性革命农民运动和第一次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和军阀政权斗争的地区。关于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之前的这个地区农民运动的意义，这里就不必讲了。而现在，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之

^① 原文如此，音译，可能是阮啸仙——译者。

后，农民群众（主要是贫农和佃农）发动了夺取土地的斗争。在海丰和陆丰，农民第一次决定用“黎民百姓的办法”来对付反动政权，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农民第一次用“黎民百姓的办法”夺取了土地，消灭了农村所有封建关系残余。在这里，苏维埃政权在6、7个月内几次遭到了反动军队的进攻，它常常不得不撤离县城。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坚持着。然而，由于四面封锁，没有外界援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无疑还是很危险的。

在广东南部海南岛附近也存在农民苏维埃。但是在这个地区，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暂时还没有采取海陆丰地区那种激烈、残酷的方式。

2. 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地区。除海丰和陆丰外，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之前，群众性农民运动最发展的地方是在湖南省和河南省，以及在湖北省和江西省。在国民党政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及其军队，同地主和豪绅一起向革命的农民实行了空前的白色恐怖。江浙的蒋介石、广东的李济深、河南的冯玉祥、湖北的白崇禧、湖南的程潜、江西的朱培德，所有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刽子手，他们在大批枪杀和绞死革命的农民。现在除了湖南那里的农民协会保住了自己的基本核心，并且农民在进行夺取土地的残酷斗争外，在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和其他地方，农民协会处境相当困难，只是偶尔开展反对反动派的各种运动。

3. 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在同军阀反动势力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但是在北方，与南方的农民协会相比较，农民组织的革命阶级觉悟不够高，因此必须巩固和加强运动的领导核心。

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共产党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就是：

(1) 运动的老领导核心大部分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反动派通过逮捕和枪杀使他们离开了运动。现在我们缺少农民运动的领导

人员。

(2) 我们缺少做工作所需的经费。如果说在国民党政变之前，我们利用了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中的农民部，并得到了开展工作的相应经费的话，如果说这个时期同志们是靠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薪金生活的话，那么现在同国民党决裂之后这些条件都没有了。党现在一方面不能恢复老的组织和对农民的工作，另一方面不能建立新的更强大和更广泛的农民组织。

我们认为，目前时期的土地革命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巩固和扩大农民组织当然是解决土地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党在农村没有巩固的革命组织，没有巩固的农民群众协会，那就在农村扩大自己的影响，就不能顶住农村的反革命势力，从而保持革命的形势。此外，由于秋收的临近，必须在各地区着手准备抗税、抗租和夺取土地的斗争。解决所有这些任务，我们都需要农民国际给予尽可能多的物质援助。的确，过去中国农民协会从农民国际那里得到了不少援助，但是它们现在需要你们给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援助。因此，我们请求农民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其最近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认真加以研究。我们期待你们允许我们参加这样的会议。此致

敬礼

中共代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69，第 50—53 页。

打字稿，副本。

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5 号 （特字第 24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5 月 17 日于莫斯科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8 年 5 月 12 日

听取：26——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契切林同志）。

决定：26——答复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询问^①，发去斯大林同志建议的以下电报：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同南方人进行谈判。我们认为，南方人可能进攻我们机构的危险性，如果说没有被排除的话，那么也是被大大夸大了。关于张作霖和蒋介石在驱逐苏联机构问题上发生分裂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挑衅性的恶作剧。有人毫无道理地想让我们撤退，使我们处于令人可笑的境地。还毫无道理地要为将来苏联同未来的北京政府发生争吵制造前提。有人想造成我们拥护张作霖的印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贸易人民委员部要指示苏联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留在原地，并责成斯皮尔瓦涅克定期向莫斯科报告情况。”

抄送：契切林、米高扬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87—88、9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6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5 月 2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1——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和孙逸仙大学合并问题（见组织局 1928 年 5 月 21 日会议第 37 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克里尼茨基、舒米亚茨基、米夫同志）。

决定：11——批准组织局 1928 年 5 月 21 日关于在孙逸仙大学集中培训中国工作人员和取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的决定。

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88，第 1—2、8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100

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①

1928年5月25日于上海

同志们：

1. 关于反帝工作，我不能做详细报告。至于最近的政治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这里有3份中央最近的政治通告，其中1份现寄给你们^②。你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总的形势。此外，我还要向你们转达以下几点。

2. 第三党决定为自己选择“中华革命党”这个名字。其首领导是邓演达。叶夫根尼·陈^③、孙逸仙夫人^④、谭平山和唐生智。此外，这个党还吸收了黄琪翔（张发奎未被吸收，因为他接近汪精卫）。在中国，这个党的事务的领导权在转到谭平山手中。现在，这个党专门讨论了军事计划，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珠江和长江流域，特别是放在了唐生智和程潜所属部队身上。他们不做群众工作，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吸收退出共产党的分子的工作上。此外，他们还散布关于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的虚假消息，以此来吸引党

① 1928年6月26日，米夫把文件副本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别尔津、伏罗希洛夫、洛佐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

② 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431。

③ 陈友仁。

④ 宋庆龄。

的不坚定分子。现在谭平山给邓演达发去电报，表达了必须同第三国际建立关系的意见。在谭和邓之间已经爆发了争夺领袖权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策略在（给你们寄去的）中央通告^①中作了说明。

除革命党之外，还有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施存统集团，他们也想建立政党，《革命评论》是他们的出版物^②。

在目前开展反帝运动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不仅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军阀冲突，而且除此之外，在党员当中也发生了分裂，特别是在部分基层党部中表现出了对国民党首领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不满情绪。

3. 现在程潜被李宗仁扣留，李电请南京政府让程引退。内部原因当然是因抢占地盘同广西集团有矛盾。程潜现在同唐生智派旧部、樊钟秀部队等联手，打算在部队开上京汉铁路后不去进行北伐，而调过头来进军武汉，消灭广西集团。李宗仁及其一伙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打算，所以提前逮捕了程潜。但是，由此将引发湖南集团同广西集团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这种冲突会日益加剧，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湖南和湖北之间肯定也会发生军阀战争。

4. 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朱（德）和毛（泽东）到了赣西南，并且据报告说，他们占领了永新和宁冈，之后向赣南发展直至吉安。朱培德部的第九师被彻底击溃，一部分已转到朱毛方面。还在朱毛入赣之前，赣南的寻邬、雩都、南康、信丰等县就爆发了自发的农民暴动。虽然万安的农民遭到了非常惨重的失败，但是在朱毛入赣之后，这里的农民又揭竿而起。现在我们有希望顺利占领赣南地区。与此同时，在赣东北的弋阳等地，农民通过武装暴动占领了几个村庄。至于中央对江西的指示，请看关于江西问题的

① 指中共中央1928年5月11日发出的关于第三党的第46号通告。

② 《革命评论》周刊1928年5月至9月在上海出版。

决议^①和中央（就朱毛入赣）给江西写的信^②。希望这些文件对你们有指导作用。

在湘南的平江，肯定发生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广泛的农民暴动，已经坚持了整整3个月。他们有400多支枪和无数支老式火枪。在作战行动中，他们进攻敌人非常英勇。尽管有敌人清剿农村的行动，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进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决定把平江和修水作为第一个特区，并与来自平江的负责同志一起为这个地区制定了计划。

我们收到了来自湘西贺龙的报告。他已经有2000多支枪，而在桃源和其他县，农民有70多支枪。那里开展了消灭土豪劣绅的残酷斗争。现在中央正派人到那里去做工作并向中央作出报告，以便中央能够领导这项工作。

醴陵地区遭到了大屠杀，但是现在广西集团和湖南集团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所以清剿农村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呆在这里。此外，它们无力消灭这里的农民运动，因为军队撤离一个地方，农民就在那里再次发起暴动。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里的根据地是不会被消灭的。

据得到的可靠消息说，由于苏先俊出卖，郭亮和袁达时被捕。现在三个叛徒，即苏、蔡^③和任^④已全被释放。

最近没有收到来自广东的报告。湖南、湖北省委至今没有恢复。在山东，工作在日益收缩，期待重新从根本上抓起。现在向那里增派了工作人员。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给朱德、毛泽东和前委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9—357页）。

③ 何人不详。

④ 任卓宣。

至于以前的政治方针，你们将收到我们的有关材料^①，我们希望你们同共产国际一起讨论一下，并寄来答复。此外，还有以下几个问题，请你们给以解决，并给我们作出答复。

(1) 我们认为，需要派 10 人到莫斯科去学习从事特殊工作的手段，然后把他们派往各省。请你们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2) 在上海，侦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每月需要约 1000 元的专门开支。已就此事同^②…进行了交涉，但是这个问题连从原则上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给共产国际写了信，但还没有得到答复。请你们进行交涉并递交电报…以期每月支付 1000 元。

3) 政治局决定派十几名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到莫斯科去学习。请你们就此事进行交涉并解决这个问题。

在原件上签字：李维汉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3，第 297—30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指第 88 号文件。

② 可能指 A. E. 阿尔布列赫特。

101

向忠发和苏兆征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8年6月5日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共中央把我们派到莫斯科来已经几个月了。在这较短的时期里，我们提出一些关于中共今后工作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共产国际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决定，应在不久的将来贯彻执行。所有现实问题，不管其性质如何——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先向东方部^①提出，只是在取得后者同意后，我们才贯彻执行。

时间过得惊人的快。中国革命事态发展势不可挡。形势变化莫测，变化得很快。但是我们作出的决定依然是决定，问题依然是问题。我们不能及时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而许多问题正是要求及时进行解决，否则就会复杂化，还会对其他问题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平静地坐在这里等待。我们再次向你们说明这些需要尽快给予解决而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目的是使你们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1. “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问题

这个反党组织还是在今年1月份发现的。当时东方部建议我们指派几个忠实的同志就近了解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情况，以

^①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都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便尔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①。过了一段时间，根据米夫同志的建议，中国劳动者大学支部局成立了调查此案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之一^②恰恰是成立该委员会所要调查的组织的拥护者。因此，这个组织的活动暂时停止了，并且变得更加秘密了。这时米夫同志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试图通过教育工作使“同乡会”成员自觉地同该组织断绝关系，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后来决定对“同乡会”采取组织措施并立即实行。过了两天，米夫同志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5月初，又决定过几天后再实行这些措施，以期再收集一些材料，先在军校解决问题，然后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解决问题。这一拖竟一直拖到今天。问题因此变得复杂化了。

最近，“同乡会”成员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在军政大学学员当中和中国劳动者大学一年级里。他们说：“党组织之所以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秘密组织。”他们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反党活动，而群众被搞糊涂了，出现了互相猜疑现象。这种情况妨碍了党的日常工作。我们认为，“同乡会”问题已经不是比如说同反对派的理论斗争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放慢处理速度。处理的越快越坚决越好。要立即消灭这个组织。要公布说明它的活动情况的材料。对其成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也就是根据这个组织里这样或那样一些人的活动性质来采取组织措施或教育措施。但是对这个组织的首领必须采取组织措施，不仅要按党的系统采取措施，而且要根据政治保安总局掌握的材料按党外政治系统采取措施。

2. 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

还在1月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

① 见第51号文件。

② 何人不知。

就建议把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合在一起，而且我们提出把军政班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出来，加强布尔什维克教育工作，罢免（安德烈耶夫^①等）一些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回中国去，对在这次冲突中表现出错误行为的人^②提出严重警告。共产国际认为，这样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尽管冲突暂时解决了，但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负责人还在继续执行官僚主义方针，不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实际情况，欺骗学生群众。实际上，教学部的工作仍在按照拟订的计划进行，丝毫没有改进，党的工作也没有改进，没有吸收基层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工作，没有对党员群众加强教育。另一方面，在那里学习的同志表现出了相当消极的情绪、小市民习气、猜疑、互相敌视、对党组织不信任、不满情绪等，甚至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性质的情绪。是的，这些情绪是有害的，在党内是不允许存在的。但要消除这些情绪，只有通过做强有力的党的日常教育工作，而决不是实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领导人的官僚主义方针。

关于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的中国学生合在一起的问题，确实原则上已由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解决^③。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须由你们审定：

（1）通过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指派几名同志在短时期内对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包括军政班）中国学生进行强有力的党的教育工作：纠正学生中存在的错误情绪，提高政治觉悟和他们对党的工作的积极性。这项工作应通过全体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小组和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

① 吴胡景。

② 见第 51、66 号文件。

③ 见第 99 号文件。

(2) 这项工作应在制定工作计划的专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

在暑假前实行合并之后，我们想提出两点建议：

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的学生成份复杂，合并后必须进行认真的审查，以便把部分结业并有才干的同志派回中国工作，部分没有才干又不愿意学习的同志也要派回中国。

② 合并后必须制定确实符合中共要求的学习计划，为中共培养坚定的工作干部，这是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3. 关于军政班

还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提出了把军政班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出来的建议，以便使它直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从根本上改变教学工作和党的教育工作体系。在6个月期间，这项工作没有得到积极的改进。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军政班的领导人官僚主义地进行工作，欺骗学生。要知道，约300名青年革命者整整呆了一年，浪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而结果呢？

最近一个月，学业停止了，党小组活动停止了，教材和参考书被收回，一句话，整个教育工作都停止了。同志们都无所事事，打架，玩耍，而领导人对此未给予任何注意。我们从党的利益角度请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去年军政班所作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

关于解决军政班问题的措施，我们已经在给东方部和军事委员会^①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军政班的政治准备不够，在最近的短时期内，必须：（1）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政治水平；（2）对组成人员进行审查，以便把这些同志分成相应的组，或继续学习军事，学习一般科目，或派回中国。经军事委员会允许，我们于本月25日制定了各种表格，已通过政治委员发

^① 指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给同志们填写。

我们认为，应从军政班学生中为军校招收新生，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具有基本的军事知识，参加过中国的实际工作和战争。

至于总的军事学习计划，我们在过去的信^①中已具体谈过。仅请讨论一下。

4. 关于海参崴中国同志当中的斗争

海参崴是远东的中心。它与远东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它特别会对中国的革命事件产生影响。

早在去年11月份，我们就请求东方部和联共（布）中央给予海参崴的工作以极大的注意^②。

现在在海参崴中国同志当中进行的斗争，表面上带有反区委^③性质，而实际上是牺牲党的利益，试图扩大个人权力。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斗争的起因是“同乡会”^④成员试图将非“同乡会”成员排挤出海参崴，要把海参崴作为自己组织的基地。不幸的是，联共区委^⑤的俄国同志被“同乡会”成员欺骗了，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们认为，斗争双方几乎同样都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必须首先免去双方上层人员的工作。对（现在在海参崴政治保安总局工作的）王春美（音）和刘亦三（音），要采取党的和非党的政治惩罚措施。要派可靠的中国同志去取代他们（在上封信中我们推举了5人）。再者，必须详细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并对各个有严重过失者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最后，我们认为，必须得到详细的海参崴工作报告，以便向那里下达改进工作的指示。鉴

① 见第91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江浙同乡会”。

⑤ 原文如此。应为：市委（或州委）。

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请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海参崴（以及与海参崴相毗邻的地区，其中也包括满洲）的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海参崴可能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的影响。

5. 关于为中共培训工作人员的统一计划

中国运动的发展唤起千百万劳动群众投入了革命斗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工作人员^①不足的问题。这种状况由于在白色恐怖条件下成千上万的优秀同志被杀害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不仅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说，而且从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来说，培训新的工作人员骨干都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苏联领土上对中国同志进行的培训工作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是不够系统和不够有计划的。我们认为，必须主要靠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来为一般学校和军事学校补充新学员。这一点对军校来说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必须使教科书和学习期限等都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具体的计划，当然，先要详细进行讨论，而后再确定。我们现在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许多日常事务恰恰是与这个总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两所大学合并后的教学计划问题、一般军训计划问题、高级军训计划问题、海参崴工人党校问题，等等。这些大学和学校的学习计划没有纳入统一的体系（还有这种情况：中国同志在学校里学习，而东方部根本不知道）。今后互相必须建立联系，把所有学习计划纳入统一的体系。

6. 关于给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中国同志做鉴定的必要性

至今，中共中央对在国内外的同志、对他们的鉴定了解的很少。另一方面，在国内外的同志很难了解到中国革命事件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不知道在国外学习的同志政治水平如何，学习成绩怎样，有什么特殊才能，对党的工作态度如何，有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等

^① 原文如此。

等。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党不能在他们回国后给这个或那个同志分配相应的工作。此外，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当中，还有由冯玉祥或蒋介石派来的人。甚至还有隶属于张作霖的人，也有右翼国民党人。在我们的学校里，有部分学生始终是摇摆不定的。我们认为，在我们党的教育机关，决不允许有那些回到中国后会转到反革命方面去的动摇分子。因此我们建议对在国外的中国同志，特别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进行认真的审查。

必须有每个学生的鉴定。这种鉴定应根据党支部和相应学校教学部的材料，以及通过坚定的同志进行的个别谈话来作出。这种鉴定必须每（学）年作一次，以便每个学年结束时都有每个同志的清楚情况。鉴定要写两份，一份给东方部，一份给中共中央。这种审查工作先在学生中进行，然后在职员中、在生产部门工人中进行。先从莫斯科做起，然后在列宁格勒、海参崴和苏联其他地方，以及有中国同志的其他国家展开。当然，做这种工作有难度，不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我们先可以在有中国同志学习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做这件事。

为此我们设计了两种鉴定格式，由你们审定。

7. 关于对侨居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中国工人的工作

在苏联和其他国家有许多中国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政治觉悟比俄国工人低得多。但他们能够对中国革命起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居住在中苏边境上的那些工人。他们经常被军阀利用来摧毁无产阶级政权，粉碎无产阶级力量，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在这大量的中国工人当中，有很小一部分先进分子，即党员。但这部分人也很落后，其中许多人还是在内战时期入的党。他们是如此没有素养，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什么是工会。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出卖党票，用左轮手枪威胁他人。他们把党看作衙门，把工会看作只收会费的钱库。因此对这些人的教育工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这些中国工人的情况。可以通过有这些工人的地方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进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必须通过开办（学习中文和俄文的）扫盲学校，建立小组、俱乐部、合作社等组织对他们做工作。必须在思想比较成熟的人当中建立专门的即比较认真的小组，以便能够推举一些工人到高等院校进一步培养。必须通过教育工作消除这些人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项工作先要在苏联做起，然后在有中国工人的其他国家进行。请共产国际将此事转告联共和相应工会机构。此外，通过吸收中国同志参加，还可以使这项工作更容易进行。至于小商贩（中国人），则要把他们组织在党的影响之下，使他们能够有助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对莫斯科工人（中国人）和手工业者（中国人）工作的具体建议，我们将在日内作出书面报告。

8. 关于国际联系

在中国革命非常困难的时期，国际联系特别重要。尽管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在逐渐高涨。帝国主义报刊散布谣言，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它们试图把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同外界隔离开来，切断他们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在中共的活动和其他兄弟共产党的活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作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国际联络局。要在海参崴、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建立（如以小店铺等作幌子的）秘密机构，以便保持中共同国际组织的经常联系。这种联系在反动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在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情况下，是会给共产党带来很多好处的。我们已就此事向东方部提出了建议，并同布哈林同志进行了交谈。布哈林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请求你们批准，并采取措施立即实行。

9. 关于国际反中国白色恐怖运动

从去年4月至6月到现在，白色恐怖已消灭中国工人、农民

和党员达 25 万人之多。这个数字已超过近两年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无产阶级所蒙受的牺牲数字。这种白色恐怖现在还在继续，看来，要继续到中国工农取得彻底胜利为止。帝国主义报刊对此沉默不语，不让国际工人阶级看到实际情况。国际反中国白色恐怖运动，一方面应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揭示中国白色恐怖和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唤起他们反对白色恐怖的激情，给予中国革命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应该使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这场运动才会给中国刽子手和帮助中国实行白色恐怖的国际资产阶级以有力的打击。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反帝联盟、《国际通讯》^① 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组织进行。

10. 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我们在莫斯科这里已经几个月了。我们觉得很难推进工作。所有问题，不管其性质如何（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得先提交东方部，只有取得它的允许后，我们才贯彻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所有问题，不管大问题还是小问题，紧急问题还是不紧急问题，东方部解决得都很缓慢，甚至推迟几周，几个月。

由于我们不懂语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没有成立常设的中国问题委员会（要知道，存在英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等各种委员会），还因为我们没有常设的固定翻译，所以我们参加每次会议都完全没有准备，事先没有得到中文材料。关于召开会议，每次我们都只是在会前才知道，有时根本就不通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全面地定期地将所有中国问题提交讨论，然而，全面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为中共作出明确而及时的指导的主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充分了解西方国家革命运动的状况，特别是苏联的建设工作经验。

^① 指共产国际用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新闻通讯。

是的，这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技术性的，但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使我们不能迅速地推进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在红色工会国际里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同样不能推进工作的困难。是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技术性的，但我们还是请求共产国际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经费问题我们几乎是在半年前就提出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办法。红色工会国际已经有三、四个月不给中国职工运动寄最低限度的经费了。中共只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它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这个情况我们在以前的信中做了充分的说明。请共产国际给以认真注意，批准新的预算并及时给党拨出补助金。

上述所有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几次。为了事业，我们请求执行委员会研究这些问题，最好在最近一周内作出具体决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向忠发
苏兆征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40，第 1—12 页。

打字稿，副本。

102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6月6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

皮亚特尼茨基致阿尔诺^①，抄送中共中央。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9月1日前再寄去14000美元。请将这笔钱连同4月4日信^②中所说的和马林^③带去的一起交给中共中央，用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救济项目。通过别尔津寄去的35000美元应作为赎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救济方面的其他紧急需要的储备金，保存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④处。请派来中国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代表。

副本核对无误：米罗夫^⑤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60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见第83号文件。标明日期：1928年4月3日。

③ Я. М. 鲁德尼克。

④ 多尔森，詹姆斯。

⑤ A. JI. 阿布拉莫夫。

103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6月初^① 于上海

米哈伊尔^②同志，我尽量把我这次来到这里之后一个半月期间的工作情况向您作个汇报。

这个时期的最大事件当然是南方人北上，占领山东和由于他们顺利向北推进而发生的日本人的行动^③。南方人北上本身已经是很重大的事件，因为随着他们取得节节胜利，归附于南京政府的各军阀集团之间的对抗越来越尖锐。首先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争夺天津和北京的斗争，现在已完全公开。蒋介石在冯玉祥后方组织起义，收买他的将领，极力阻止他占领北京。后者当然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同样也对蒋介石施展奸计。广西人当然在这个时候没有打瞌睡。在湖南和湖北，独霸的统治者是广西人白崇禧。他在英国人帮助下认真地在做讨伐蒋介石的准备。两周前他逮捕了忠于蒋介石的广西军阀程潜。程就是那个指挥第6军并且当时鲍罗廷寄予希望的人。从各地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现在显然在准备再次放弃大元帅职务。日本人的干涉给所有人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日本人早就完全不把赌注押在张作霖身上了。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明的。

②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③ 指所谓的济南事件。1928年5月2日至4日，日军进攻国民革命军部队，袭击济南城，造成了中国军人和和平居民的大量牺牲。

他们现在的行为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要求张趁早从北京走开，并威胁他，一旦他的军队遭到失败不让他北上。我们的同志们认为，日本人已经同冯玉祥串通一气。他们认为，这种推测的重要证据是，日本人蛮横无礼地要把蒋介石排挤到南方去，而同时不阻止冯向天津推进。另一方面，冯几乎不进行任何反日宣传，并且建议所有这些问题在北伐结束后再讨论。日本人的干涉现在已经是活跃群众运动的强大推动力。早在收到您的电报^①之前，中央就向民众发表了宣言并向各省组织发出了通告^②。在这个通告中，中央采取了很正确的立场。它建议，第一，不要满足于搞反日宣传，而要使这场运动变成反帝运动；第二，指责国民党是造成日本干涉的罪人，因为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英，美等）的奴仆和走狗。第三，实际上中央建议把恢复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作为开展这场运动的目的，建议开展争取工农经济利益的日常斗争。这项工作已经有了成果。实际上群众已经确信，反动派已经不像一个月以前他们感觉的那样强大。5月30日成功举行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和罢工行动向工人们表明，积极工作的时期又来到了。但这项工作已经不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下进行，而相反，工人们主动跟着共产党走。在租界和中国城举行的示威游行，尽管遭到了欧洲巡捕和中国警察的抵抗，在各区还是集中了约5、6千人。反日抵制行动在群众中很受欢迎。日本的干涉为我们党做小商贩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创造了很有利的局面，而在一个月以前，我们遇到了他们消极的和甚至敌对的态度。现在感觉到，这些群众在寻找党，并意识到，只有党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1928年5月9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和同日发出的关于“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86—199）。

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

中央采取了在全国活跃反帝运动的措施。已派六名同志到各地去专门加强这场运动。在各地组建了开展反帝运动的工作委员会。虽然表面上这些委员会一开始是由改良工会组建的，但我们的同志不仅比较容易渗透进去，而且也比较容易掌握它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不仅不帮助反日运动，而且千方百计麻痹群众。这使大家感到很气愤，甚至不久前还敌视共产党人的团体在实践中也确信，国民党已出卖了反帝斗争，它受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摆布。如在上海中国城西部举行群众大会时，工人们自己喊出了“恢复群众运动自由！”、“打倒卖国政府！”口号。如果中央在这场运动中起很好的作用，那么此事就不会涉及到各个省委。有一些省委就行动计划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意见：（1）北方委员会（那里还没有国民党政府）认为，必须开展这种运动，以便利用南方军队的到来组织起义并夺取北京和天津的政权。（2）在反动派很嚣张的地区（安徽、湖南），建议根本不要搞这种运动，因为这样做对国民党有利。广东则是第三种态度：要对日本侨民和领事馆组织恐怖活动并挑起南方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中央在同所有这三种意见作坚决的斗争，并要求把这场运动变成唤起最广大群众的开端，使它一方面能够成为同农民和城市贫民建立统一战线的理由，另一方面又能为恢复我们党和工人运动奠定牢固的基础，最后能使整个运动既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又反对作为新军阀的国民党人等等。

如果说在革命战线的这一方面党做了比较多的工作，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则非常不顺利，这就是在农民方面。遗憾的是，奥莉加^①很喜欢培养的盲动主义情绪仍有表现。在湖南南部、在江西和在广东北部的各个地区，我们的军队还在作战。但是每天都

① O. A. 米特凯维奇。

从那里传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完全脱离了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土匪集团，农民越来越反对他们。例如在湖南，农民参加了专门为清剿农村而建立的豪绅和地主的队伍。现在从汕头、海陆丰等地区也传来了这种消息。我觉得，必须取消小规模暴动的策略，因为这种暴动只能以悲惨的失败和农民的失望而告终。这种策略在工人运动重新开始活跃的时候可能是极其有害的。中央自己已经建议把军队改编成赤卫队，并按村分成小分队，以便帮助农民同民团作斗争。这使我们有可能保存武装力量，并把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而轻率暴动的策略，不考虑实力和可能性，当然不会有别的结果，只能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军队不没收地主土地，不在农民中建立自治机构，而只是剥削农民，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如果在代表大会^①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很好的说明，那就好了。中央请求，尽量电告它大会的进展情况。我认为，这样做最好不过，因为所有最负责的同志都在你们那里。最好您就反日运动问题发来指示。

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3，第 294—29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104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 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

1928年6月9日于莫斯科

瞿秋白等人同斯大林的谈话^①

出席：斯大林、瞿秋白、米夫、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

瞿秋白提出要谈的问题：

1. 形势。
2. ^②

斯大林说：他已读了秋白的报告^③，关于五大矛盾的结论。五大报告中许多对的，但亦有不对的。因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诚然，有些地方城市工作已起来，有些地方农民暴动已高涨，而统治阶级不能稳定，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这不能说，革命已高涨了。广州暴动^④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

在俄国，1906年^⑤后是如此地争论了许多。

城市不能暴动。

① 在《党的文献》北京1988年第1期第3至6页上刊有此文件的缩写稿。
② 原文如此。根据内容判断，应为：中共的任务。
③ 指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俄译本（莫斯科1928年）。
④ 见第63号文件。
⑤ 原文如此。

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① 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

1. 以零星部队可集中甚至取得某些城市。

2. 农民武装暴动。

广州暴动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

俄国 1905 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

少年先锋主义是看轻了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斯大林说：我们以 1905 年同中国（作）比较（并）非全部。只是说失败后的新潮流未来时的短时期。

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尤其是忘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势力。

俄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改良主义。

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主要的，如忘记了是什么革命问题，讨论（就会）得出，革命高涨是革命进攻，而反革命退让。在现在的中国，是日本掌握着北方，英日美掌握着长江，南方法英在压迫着，而我们工作（范围）小了。

说中国现时较俄国危险少是不对的，主观上，中国的工人少，国内即不讲其他危险，帝国主义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华（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决不同于俄国革命。俄国一、二次革命不必说了，而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也无略加以大的压迫。

现时，帝国主义对华是一致的，日美是相当好的。在北方扬子江，帝国主义都是（帮）助反动势力在中国取得胜利的。

^① 原文如此。

第一次浪潮：自香港罢工^①、北伐^②，打到武汉^③。

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常常取吊膀子和让步政策，他们不敢向革命进攻。

南京事件^④起，革命渐渐低落，（不久）到叶贺^⑤，他们是一个反抗的尝试，广州也是一个尝试。

广州暴动引起了全国的同情。1871年^⑥、1905年和1917年7月都唤起了工农群众的同情。1905年11月也干了（采取了行动）^⑦，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

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

两个高潮中的时间，当然不像俄国那样长，因为战争的痛苦不能再使中国工农长期忍受下去了。

现在此中间时期，我们如何做呢？

1. 党要有坚固的、觉悟的、好的、马列主义的……是质量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中国同志多只做实际工作，但不够，要多注

① 指1925年6月19日至1926年10月10日举行的省港大罢工。

② 指1926年7月9日至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之前）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

③ 指所谓的中国革命武汉时期（1927年1月至6月中）。

④ 指1927年3月24日英美法日军舰炮击南京。

⑤ 见第9号文件。

⑥ 指巴黎公社，即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在巴黎存在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

⑦ 指12月武装起义。

意发展党员的觉悟，马列教育。尤其是马列主义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以及新奋斗的知识分子。此责任是传达马列新作，不是只“打倒”、“万岁”而已！

党员成份中工农都有，就觉悟程度说，如能有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者，才容易形成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假使真能有从50到100个（这样的人），力量（就）很大了。

2. 群众工作：工人和雇主发生任何小的冲突，都应该利用之发展，不是我们主观硬造的。

3. 农民工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虽少，但帝国主义常利用之，以保护其利益。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

党便在此处利用此机会以创造军队，因为没有武力是不行的。

4. 知识分子，中国同志看成太不行了。如学生对帝国主义的仇视，我们就不应（将他们）撵出去，（而要）使之做党的工作。

5. 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要加紧工作。

以上尚不是暴动。

1. 用术语（的混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结果。

革命高涨：反革命退步（却），革命进攻胜利。

在反革命中心，大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①，没有一个严重情形在主要城市中，仅仅在乡村中从彼处至此处，此处至彼处。而反革命则（掌）握住主要城市。

我们敌人帝国主义在华并未一点减弱。

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

① 原文如此。

(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

因为对于高涨的了(理)解不同，便对于环境的观察有异了。

不是每一(次)工人的暴动都能(发展)成为革命。

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

现在仅仅是农民暴动，说他(它)破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对的，但对全国却不能说高涨。

以为国民党能北伐，因有公开旗帜，政纲，好否?(这)是另一问题。而现今苏维埃革命尚未开展这一局面，故不能谓为高涨。

2. 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这个企图结果是失败了。

当暴动者去暴动时，一定要想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故他们可以说，这是新的革命高涨的开始。但在客观上只是工人阶级在过去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斗争——回光返照的企图，故遭到失败了。

假如我们如此说，是否减轻了广州暴动的意义?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05年的十二月暴动也是一个最后的企图?中国工人阶级最后的英勇企图，虽未展开新的革命高潮，但给了一个苏维埃形势的信号，指出了以后新的高潮来时的新阶段，这仅是信号，不是已经开展了这个高潮。

3. 关于大会决议案事，我未看见，无意见可说。(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①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

我关于党的任务，已说的不再重复了，宣传教育、工人运动、农村斗争，以及训练军事人材等等。我现在只说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其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

游击战争能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

工人阶级及党在能利用农民运动在党指导内为工人用，非是为相反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94，第 4—7 页。

中文手稿，影印件。

^① 指 1928 年 2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46—151 页，以及第 65 号文件。）

105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

早于 1928 年 6 月 11 日^① 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托我把关于中共财政状况的书面报告转交给俄国代表团。

我给您寄去一份^②。这个报告包含以下要求：

	共计
(1) 从 8 月起，每月党的工作经费 为 104000 中国元	520000 中国元
(2) 5 月份和 6 月份追加经费，每月 为 30000 中国元	60000 中国元
(3) 7 月份追加经费	57000 中国元

这样，到年底中国同志要求拨给党的
 工作经费为 637000 中国元

(1 中国元相当于 89 戈比)

(4) 军事工作经费，每月 30000 中国元，如果从 8 月份算起 5 个月为 150000 中国元，总计

① 日期是根据第 109 号文件标明的。

②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112B，第 3—21 页）。

	787000 中国元
(5) 此外，他们要求每月给职工运动 拨款 23000 中国元，到年底为	115000 中国元
(红色工会国际因为没有钱无法拨出这笔经费)	
(6)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要拨款 53800 中国元，到年底为	269000 中国元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因为没有钱， 看来也无法拨出这笔经费)	
(7) 青年共产国际每月要拨款 20000 中国元，到年底为	100000 中国元
(青年共产国际因为没有钱也无法拨出 这笔经费)	
(8) 农民共产国际每月要拨款 10000 中国元，到年底为	50000 中国元
(因为没有钱无法拨出这笔经费)	

合计.....	1321000 中国元
此外，他们要求提供基金	1000000 中国元

总共.....	2321000 中国元
1927 年到 12 月 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拨款 187674 卢布 (我们还没有全面的支出报告)	
1928 年拨款	200000 卢布
这一年 6 个月拨款	125000 卢布
代表大会 ^① 大概需要花费 100000 卢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8 年度预算中还没有分配的经费有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125000 卢布。当然不能全都拨给中共使用，以免一旦其他共产党需要时，无法给以援助。

谈谈中共预算本身的制定问题。

我很仔细地看了这个预算之后得出结论：这个预算制订的很奇特。

例如：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

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这些都没有注意到，有多少个县就意味着要给多少钱。

报告中的支出钱数，没有说明实际上是什么支出，而是分成 4 栏：省份、党的工作费用、工会工作费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作费用和特别支出。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月支出（第 14 页，第 5 部分）是这样制定的：

4600 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 3 元，共 13800 元。

10000 个家庭每家 4 元，共 40000 元。

总共 53800 中国元。

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这些都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 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

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我本人主张，在年底以前给他们增加每月拨款，但是拨多少，要由应成立的委员会来确定。

如果这个委员会由政治局建立，那就要责成它去查找以前中国工作经费肯定会有的结余部分。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11206，第 1—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委员 会会议第 102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6 月 12 日于莫斯科

机密

一、中国问题

1. 江浙同乡会

1. (1) 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收集有关同乡会的材料，并让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解这些材料。

(2) 不反对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了解这些材料之后，(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①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有中国学生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孙逸仙大学和军事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所有支部和党员发出公开信，说明同乡会的性质和活动问题。

(3) 不反对中国代表团在了解这些材料和作出一定决定之后，同那些可能与同乡会首领有联系的学生谈话。

(4) 再有，中国代表团在了解材料之后，对被军校开除的同乡会首领应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要提出建议。

(5) 责成东方部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协商后，向中国学生发学生成份调查表。

2. 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

^① 这里和下面应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不反对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
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后，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准确的审查，以便把结
束学业的那部分有才干的同志派到中国去做党的工作，并把那些
不愿意学习的人遣送回国。

责成米夫同志在同联共（布）中央协商后执行这项建议。

小委员会同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意
见，并认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同中国劳动者大学合并后，
这个学校的教学计划应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培养坚定的党的工作干
部的要求来实行。

为此，小委员会认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有必
要参加这个教学计划的制定工作。

3. 关于对旅苏华人的工作

认为有必要让中国代表团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提出说明
旅苏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报告，并且可以将关于在联共（布）少
数民族部下面设中国局，以便协调对旅苏华人的工作的建议，以
及关于做这项工作的方式方法的具体建议纳入这个报告。报告中
也可以涉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问题。

4. 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工作

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向共产国际的所有合法支
部提出按照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制定的计划给旅居
国外的中国共产党人作鉴定的建议。再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组织部应给共产国际各支部下达关于共产党有必要对旅居国外的
华人做工作的相应指示。

5. 联系问题

认为有必要让周恩来和阿布拉莫夫同志制定改善中国共产党
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间联系的具体措施。

责成国际联络部通过每六周至少派出一次信使同中国共产党
建立正常的联系。

6. 关于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工作

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一名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支的常务秘书。东方部应设懂中文的技术性工作人员。远东部应设立准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常设中国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335，第 4—5 页。

打字稿，副本。

107

皮亚特尼茨基给 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6月12日于莫斯科

密电

上海

皮亚特尼茨基致阿尔诺^①。立即拨给中共中央46000美元，记入他们下半年的预算。用于什么支出，这里的中国同志将作出说明。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61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108

米特凯维奇关于给中国工会拨款的证明

1928年6月12日于莫斯科

我从红色工会国际款项中给中国工会拨出到1928年2月1日的（预算）款8000墨西哥元。

奥莉加^①

从2月1日到4月15日的款额未给工会拨出。

奥莉加

（确认）周恩来

1928年6月12日

全宗534，目录4，卷宗229，第38页。

亲笔签字。

① O. A. 米特凯维奇。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29 号（特字第 28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6 月 14 日于莫斯科

听取：8——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8——（1）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驻华代表发出指示：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不死气白赖地要同北京或南京当局就建立正常关系等问题进行谈判。

（2）15 名被捕者问题^① 在收到斯皮尔瓦涅克的通报后提出。

抄送：契切林同志。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1928 年 6 月 11 日

听取：17——关于驻天津商务代表处问题（政治局 1928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25 号记录，决定：26），（报告人：欣丘克同志）。

决定 17——向驻天津商务代表处重申，以前给它下达的关于继续进行正常工作的指示仍然有效。

抄送：欣丘克、契切林同志。

^① 见第 418 页注^②。

听取：18——中国问题。

决定：18——（1）预算问题^①交由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议，责成该委员会审查以前拨款的结余部分。

（2）立即拨出 90000 卢布，作为预付款用于特别支出，计入预算。

抄送：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103—10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第 105 号文件。

1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
处委员飞行表决记录
（摘录）

1928年6月14日于莫斯科

特别文件
印一份
绝密

听取：1——对中共代表大会^①工作的指导问题。

决定：1——为指导中共代表大会工作，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②和米夫组成的委员会。

抄送：布哈林^③

皮亚特尼茨基
库西宁
安贝尔—德罗
列梅勒
什麦拉里
巴尔贝
艾尔科里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见第87号文件注3）。

② P. 陶里亚蒂。

③ 没有布哈林、巴尔贝和阿尔诺的签字。

曼努伊尔斯基

阿尔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71，第 57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11

米夫给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 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的信

1928年6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

敬爱的同志们：

现将东方书记处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分送给你们。这些草案都是草稿，应作为材料供中共政治局制定决议草案时使用。

东方书记处起草送去的草稿时，有以下同志参加：

1. 章程^①——瓦西里耶夫、诺林、沃尔克、贝尔曼、苏兆征、向忠发、米夫同志。
2. 土地纲领^②——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马季亚尔、休卡里、苏、向、米夫同志。
3. 农民运动^③——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苏、向、米夫同志。
4. 军事决议^④——贝尔津、盖利斯、布留赫尔、马马耶夫^⑤、阿片、安德烈、瓦西里耶夫、向、苏、米夫同志。

① 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84，第 7—21 页。

② 同上，卷宗 413，第 57—72 页。

③ 同上，卷宗 417，第 45—51 页。

④ 同上，卷宗 419，第 90—96 页。

⑤ 以下分别为：A. П. 赫梅廖夫、Г. И. 谢苗诺夫。

5. 军事工作训令^① —— 同上。

6. 职工运动——有两个草案：一个——苏兆征^②，另一个——斯卡洛夫^③。现在有洛佐夫斯基、格列尔、斯莫良斯基、奥尔加^④同志参加，在起草新的草案。

7. 组织决议^⑤ —— 库丘莫夫、瓦西里耶夫、米夫、彼得罗相同志。

8. 苏维埃建设^⑥ —— 纳索诺夫、瓦西里耶夫、阿片同志。

9. 宣传鼓动工作^⑦ —— 诺林、沃尔克、库丘莫夫、戈卢别夫^⑧、基泰戈罗茨基。多格马罗夫同志。

10. 妇女运动^⑨ —— 国际妇女书记处。

11. 中共纲领草案——由瓦尔加^⑩同志起草（看来，这个问题将从大会日程上取消）。

现在中共政治局在讨论所有这些草稿。

东方书记处请求告知对送去的草案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9，第 90 页。

打宁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92 号文件。

② 见全宗 4，目录 1，卷宗 3，第 38—47 页。

③ 见同上，第 56—74 页。

④ O. A. 米特凯维奇。

⑤ 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1，第 54—82 页。

⑥ 同上，卷宗 418，第 9—29 页。

⑦ 同上，卷宗 420，第 1—11 页。

⑧ 陈绍禹。

⑨ 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19，第 36—45 页。

⑩ 见第 86 号文件。

112

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①

1928年6月19日于莫斯科州

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 我们都认为，应给上海阿尔诺^② 发去以下内容的电报：

“要在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举行学生、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试验性街头反帝示威游行，打出反帝、反国民党政府和同日本士兵和工人联欢的口号。米夫”^③

这份电报上要加上对财政问题的说明（答复阿尔诺电报^④）。请您斟酌加上补充说明。我的意见是，可以同意阿尔诺的建议^⑤。

(2) 恳请您在最近一两天内组织兄弟党给我们这里发书面贺词，特别希望有英国、日本、美国共产党和一些东方党的书面贺

① 文件的(1)、(2)、(3)点有批注：已执行。第(6)点有批注：给科肖尔打电话。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下面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补充：抄送中共中央。

③ 电报于1928年6月20日发出（见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62页）。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作了以下补充：米哈伊尔致阿尔诺。这次运动的经费问题已由我关于9万卢布的电报解决。皮亚特尼茨基指的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8年6月11日的决定（见第109号文件）。在1928年6月20日发出的电报中说：米哈伊尔致阿尔诺。这次运动的经费问题已由我关于4万6千美元的第21号电解决（见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第162页）。见第107号文件。

词。

(3) 请和斯大林同志商量一下。如果他本人不能到这里来，最好能得到他的书面贺词。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① 今天回莫斯科，请督促他在星期三^②，不迟于星期四接待丹巴道尔吉并提出蒙古的决议。

(5) 寄给您大会^③ 第一天（还没有校对）的速记记录。其余记录我将每天寄给您。今天上午 10 时尼古拉开始作报告。

(6) 因大会开幕，周恩来不想在星期一^④ 去莫斯科。他应在何时去莫斯科？请在两天内通知我们。

(7) 您能否脱身到这里来？最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⑤。尼古拉和瞿秋白将致闭幕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帕维尔·米夫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8 页及背面。

亲笔签字。

① Н. И. 布哈林。

② 1928 年 6 月 20 日。

③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④ 1928 年 6 月 18 日。

⑤ 相应为：1928 年 6 月 23 日和 24 日。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0号
（特字第29号）记录
（摘录）

1928年6月21日于莫斯科

听取：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2——1.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目前只通知中国使馆收到了他们的照会并对搜查苏联驻华领事馆^①提出抗议。

2. 就孙逸仙夫人^②去中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她施加压力。

抄送：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6，第106、109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1928年6月20日搜查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详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1卷，第401、732页。

② 宋庆龄。

114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28年6月27日于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

1. 四大以后，在中央全会^①上讨论了军事工作问题，作出了决议，但这个决议只谈到了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没有涉及所有基本问题^②。在五大上曾责成一位同志^③起草决议，但这个决议也没有回答基本问题^④。米夫的草案只是小范围的工作计划。八月会议^⑤也没有涉及军事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要提出原则性的目标和军事工作的任务。

2. 八月会议以前，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共有20个，主要是：

(1) 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军队。我们到达武汉时，这个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我们以为，收买将领就足够了，而军队自己会跟着他走。我们对军队进行了训练，但忘了把它打乱。我们忘了阶级斗争。我们没有看到士兵的问题。只有推翻军阀，分给士兵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关于政治工作。我们在将领中间开展了政治工作，而没

① 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举行。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五大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没有找到。在《职工运动决议》第8点中，大体上提出了党关于建立真正革命军队的方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83页；《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7年第7期，第20页）

⑤ 见第83页注①。

有在士兵中间做这项工作。现在对士兵的工作，不仅要提出生活问题，而且要提出士兵的政治发展问题。以前我们较好地开展了政治工作的地方，现在我们都有较好的联系和影响。

（3）在武装工人和士兵方面，我们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方针，例如，1924年“纸老虎”^①叛乱时，我们就有可能武装工农。1927年3月在上海也是一样^②。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4）没有军事工作中心，也没有对这项工作的相应态度。我们把在其他工作中不好使用的较差同志派到军队中去。结果在军队中我们没有联系，没有受过训练的军人党员。

（5）对“红枪会”我们没有给以注意。在这里我们也搞上层计谋，结果领导权掌握在豪绅手里。

（6）对帝国主义军队我们没有做工作，虽然这个过错不仅仅在我们身上。

三、关于起义

上海起义。当时我们没有看出在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没有利用那些跟随着我们的士兵和农民的支持。这次起义表明，工人是会战斗的。

南昌起义。错误是：没有宣布进行土地革命，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对什么是雇佣军没有作出正确的评价。让农民参军，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彭湃曾被指派去招募农民，但他给我们招来的农民很少。当时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

1. 它是在工人被击溃后发生的。
2. 工人没有受过训练。

① 指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反对孙逸仙政府的叛乱。

② 指1927年3月21日至22日的上海工人起义。

3. 作战计划不好。没有进攻精神。根本没有撤退计划。
4. 没有做士兵工作。
5. 没有同农民建立联系。

四、关于最近半年的工作

八月会议和十一月全会^①后，没有完整的军事工作计划。最近拟定了计划，是很粗略的。我们没有搞懂什么是起义。这是盲动主义。我们不懂农民暴动的作用和意义。只是斯大林对我们说，要利用农民暴动来建立红军^②。但是，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人们就会说他是机会主义者。对海陆丰和其他地方的组织方面问题，我们很少给予注意。我们的武器很少。

广州起义后，有一部分工人为了得到武器参加了军队。

我们应该摧毁军阀军队，因为资产阶级利用它来镇压工农。广州的经验表明，可以摧毁军队，并把它吸引到工农方面。

在军队中，士兵的处境很艰难。我们想组织他们举行哗变，即便他们还不能完全搞清楚政治问题。

五、关于对帝国主义军队的工作

我们没有做工作，这是个大错误。特别要对日本军队做工作，组织日本士兵同工农联欢。

六、关于机构

我们没有军事机构，没有做系统的军事工作，这是个错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6，第 22—23a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83 页注^①、159 页注^③。

^② 见第 104 号文件。

1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1 号
（特字第 30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6 月 28 日于莫斯科

听取：1——斯大林同志的声明（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1——同意斯大林同志因负担过重不在中共代表大会^①上作报告。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110—11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116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1928年6月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们：

利用一位同志动身的机会，给你们捎去关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情况的信息。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向你们谈了山东事件^②后的事态发展情况。遗憾的是，现在关于反日运动以及反帝运动的发展情况，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东西可报告。党还很弱小，除了几次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外，再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些事件在暗地里对党重新同群众建立联系和把工会合法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有所帮助。但群众觉醒得很慢。例如，竟找不到谁敢于建议召开中华全国劳工代表大会。明显感觉到缺少头头，特别是现在，本来是可以做许多事情的时候。现在反动势力有些削弱，可以做很多工作。但遗憾的是，同地方上的联系太薄弱，而且地方上意见纷纭，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是在上海这个中央有些联系的中心城市，有些地区也不按中央指示行事。但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现在中央在做组织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内部得到了巩固。农民和城市贫民以及学生对我们的同情在日益加强。对此起

① 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批注：要寄给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同志和中共中央。文件副本已寄给布哈林、米夫和中共中央。

② 见第103号文件。

促进作用的是，国民党完全出卖了民族利益，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者，甚至禁止举行反日示威游行，禁止示威，千方百计破坏抵制日货行动，千方百计麻痹群众斗志。在国民党队伍中，越来越频繁地发出了对国民党的这种行为的愤怒声，在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口号中越来越频繁地见到了“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帮凶！”，“打倒日本走狗！”等口号。

在国民党内，现在也笼罩着一片灰心丧气的情绪。对占领北京的行动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现在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全线的胜利。在北京和天津，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冯玉祥，而是阎锡山取得了胜利。阎锡山同意为保卫北京的将领^①补偿武器，任命李宝璋（此人是去年2月或3月在上海第一个砍工人头的将领）为北京卫戍司令。帝国主义者当然在庆贺胜利。但是现在在他们的庄重声明中已开始含有担心的口气，怕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打内战。尤其意味深长的是，蒋介石准备去北京，在公布他决定去北京的同时，还公布说阎锡山和冯玉祥病了，他们对不能在北京会见蒋介石而感到遗憾。日本人对蒋介石作出了卑鄙的勾当。在最紧要关头，他们逼迫蒋介石后退，为其竞争对手冯玉祥和阎锡山敞开道路。阎锡山把原北方军的所有士兵都编进了自己的队伍，这当然是在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赞同和在他们的协助下进行的。现在到处都在称颂阎锡山，说他是中国最出色的督办，从来没有打过仗。在他的地区秩序良好，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在这种安宁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内讧。大家都公开说，一方面，广西派和广东派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李济深怕离开广州，他派出右翼中国人戴季陶代表他。另一方面，白崇禧现在实际上是北京和天津的主人。他现在同阎锡山很友好。好像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傻瓜，而广西人在他们鼻子底下从这两个大城市里捞取好处。

^① 即鲍毓麟。

国民党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新时代等的宣言，同时每天都在颁布关于越来越多的税赋的命令（在最近一周里，增加了新追加百分之五的面粉税、特别土地税和一系列其他税种）。

总的来说，中国联合起来了，同时也在准备新的战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如盐商暴动、军队哗变和冯玉祥部起义等。欧洲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些集团之间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现在所谓的第三党集团很活跃。他们出版了一个大型周刊^①。我担心，他们开始在原来跟随我们党的大量群众中拥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不能积极采取行动，那么这个集团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运动的首领。我们太弱了。在上海，三周内发生了丝厂罢工，有55000人参加，但我们在那里未能起任何作用。工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小伙子们太胆小怕事了。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很薄弱。瞿秋白走后，连《布尔塞维克》^②都停止出版了。还在早些时候，上海和广东的刊物也停止了出版。如果我们连这些刊物都不能出版，那当然是很糟糕的。现在从日本回来很多学生。他们思想很坚定。我们帮助他们在上海、北京和广州出版几个刊物。可能这对工作会有所推进。需要你们尽快派一些同志来，因为在这个严重关头，缺少领导人对工作是很有害的。

我在上一封信中向你们报告了我军推进的情况。需要你们对这些军队的工作紧急作出指示。趁为时不晚，要做这项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50a，第 104—10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不清楚指的是什么刊物。这个时期第三党出版了两个周刊：《突击》和《灯塔》。

② 《布尔塞维克》，见第 168 页注①。

117

米特凯维奇的书面报告 《中国苏维埃经验》

1928年7月10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中国苏维埃经验

迄今为止中国苏维埃的经验还不很多：除了存在两天半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外，约有30到40个县的农村有地方农民苏维埃。只有几个县成立了县苏维埃（约有10个，也可能更多些）。

地方农民苏维埃是地方农民政权机构，多半由农民代表大会选出，少数由农民协会代表机构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是农民协会政权）。所有有名的地方农民协会（海丰、陆丰、安阳）的缺点是，绝大多数都是党的机构，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都从属于党委，以至所有工作（除了军事工作外）都要通过党委领导来进行（如海丰），所有农民都认为党委就是政权机构。

这些苏维埃的第二个缺点是，它们不够具有群众性，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在有的地方造成了这种状况：地方苏维埃成了为农民办事的机构，而不是他们的真正产儿。因此在红军第一次撤离海陆丰时（1928年2月），农民没有为苏维埃而战，没有保卫它们，虽然他们对红军的撤退也很惋惜。反革命军队重新占领这些县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这次新的考验，农民不仅为苏维埃而战，而且促进了反革命军队的瓦解。在湘南和赣南地区，农民们非常积极地为了苏维埃进行战斗，在湖北也一样。

苏维埃工作

1. 消灭地主、土豪劣绅。
2. 夺取所有地主的土地（以及国家等的土地）。
3. 分田地。
4. 实行组织合作社（或更确切地说国家贸易）的最基本措施。
5. 有的地方向集体耕作方式过渡。

苏维埃在实行其所有基本措施时，都得到了几乎全体农民的支持，虽然这些措施有时并非完全合理（如在海陆丰下令所有房屋都涂上红色，修建列宁、马克思广场等）。在消灭军阀、地主等的各种残余基础时，农民表现出了过高的热情；消灭县城（地主、豪绅政权的中心）的倾向性很大。在湘南甚至有一个时候抛出了消灭城市（烧毁）的口号，并且对部分城市（一两个城市）已经这样做。无论如何可以说，在农民苏维埃政权存在一两个月的地区，地主、豪绅政权的基础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湘西南几个地区和陆丰分了田地。分田之前对现有土地和对它的需要量作了统计。在其中的一个地区，分田后中农得到的土地比他原有的要少，因为无地的农民也分得了土地，但所有人都还是满意的。原因是：第一，贫农和佃农的情绪是如此鲜明，以致中农自愿作出让步。第二，分田地是与消灭一切旧契约联系在一起，从而（与烧毁一切土地和债务契约一起）使人相信，旧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了。少量亩数（不是8亩而是6亩）还是不征收租金，因此更有利可图。佃户少的地方（如海南岛）是不能分田地的。

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还没有在任何一个苏区组织起来，但是通过由苏维埃建立的机构进行的分配和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并且不无成效。例如，在汕尾地区就相当成功地组织过食盐和某些其他产品的交易。在香港设有（海陆丰）苏区商务代表处，香港的一家

公司愿意同苏区进行贸易。价格比以前更低。海丰苏维埃甚至能为省党委的需要让出一小部分利润。建立这种贸易机构的尝试在其他地区进行得也很成功。我想，在中国农村建立合作社或苏维埃贸易机构的潜力是很大的，因为贸易活动常常集中在地方当局手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中进行的（当然是很有限的）。

（好像在安阳）有集体耕种土地的尝试，而且全村自愿参加组织这种活动。共同耕种，收成放在一起，待收获结束后再分配。按什么原则进行分配？是按劳力还是按人口？现在还说不好。

能否认为现在的农民苏维埃是苏维埃的萌芽形式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大多数苏维埃是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其措施是旨在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当然，在把目前的农民运动发展成更广泛得多的运动之前，在取得更多的（包括在县的范围）成立农民苏维埃的经验之前，很难提出最后的看法，但暂时还没有理由认为，有其他什么形式更可行。党越是能够更坚决地把方针转到苏区的群众工作上，越是能够使苏维埃的整个日常工作更具有群众性，这方面的经验也就越成功。

这些地方苏维埃（或者像广州对它们的称呼，地方苏维埃）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即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摆脱地主统治等等的国家，仅止而已。

为了自卫，农民建立了红军，但是这个（农民）军队不是始终都愿意走出自己的地区，并且进攻政策与它格格不入。它还不理解把捍卫地方苏维埃同反对整个政府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党的任务是在这方面做大量解释工作，从每个苏区吸取最优秀的农民力量（贫农和中农），来建立能够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的红军。

米特凯维奇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56，第 116—119 页。

打字稿，副本。

118

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1928年7月19日于莫斯科州

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

今天，全会的最主要任务是选举政治局和执行委员会^①。其他问题也很重要。会议^②经过讨论，一致赞同政治路线。会议取得了很正确的道路^③，但需要有做事一丝不苟、有责任心的同志来负责中央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部分同志，特别是像鲍罗廷、罗易等这样的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在会上表现出了右的倾向。会议指出了原中央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部分同志在会上反对原中央，应该让他们都参加政治局。需要把党的全部精力和力量都集中在政治局周围，并要把党统一起来，只有那时党才能够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推举两名有经验的同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工作就够了，但最好是瞿秋自和张国焘。是否推举他们，由你们自己决定。

① ①原文如此。

②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③ 原文如此。

今后的工作是巩固党的威信，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集中党的力量，要求每个同志都要维护党的利益，进行同志式的互相帮助。

翻译：卡爾斯基^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27，第 95—96 页。

打字稿，原件，译者亲笔签字。

^① 师哲，1939年9月16日译。

119

米夫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

1928年7月24日于莫斯科

上海

致阿尔诺^①

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

请紧急寄出第三党和汪精卫集团的所有出版物。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第 164 页。

亲笔签字。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120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①

（摘录）

1928年7月2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根据布哈林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②提纲草案。

第5部分。

米柳京同志对第25段的建议：

讲“中国可以取得彻底解放”等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讲工业。有必要加上这个内容。

奥辛斯基同志建议写成：

“中国的彻底解放只能在进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争取生产国有化和争取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取得”等等。

斯大林同志建议写成：

“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彻底解放，只能在进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争取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摆脱加在农民头上的闻所未闻的大量捐税的斗争中取得”，要加上：“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取得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务才有保证”。

① 文件上有批注：印2份，1份送斯大林同志。

②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

罗米纳兹同志建议写上：

“不…，这些任务就不能完成”。

斯大林同志建议写上：

“在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在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

斯大林同志建议写成：

“不取得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胜利，不没收土地，不对外国企业、银行、交通实行国有化，中国的彻底解放就不能实现”，等等，等等。

决定：采纳建议，删去“彻底”一词。

〔附录〕

布哈林 1928 年 7 月 25 日在俄国出席 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把中国党保留下来，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①上坚决扭转了方向。如果我们不在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扭转方向，我们就不会有中国党了。关于中国党的领导路线，那里并没有盲动主义，但要知道许多同志都说他们受到了无法完成的起义命令的折磨。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中国人的工作。他们列举了闻所未闻的例子：中央对来自湖南和湖北的农民、庄稼汉说：“举行起义吧！”他们对中央说：我们只有两支左轮手枪，怎么起义？不管怎么说中央还是要求他们举行起义。于是人们手里拿着火柴去举行起义。现在党内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不得不长时间做中国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想选举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任何人^②。只是因为我们强力要

① 见第 218 页注①。

② 指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和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局选举。

求他们，他们才选举，如果我们不在第九次全会上急剧扭转方向，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党了。

有右的危险吗？有。如果向中国同志说，你们白用火枪镇压了一些人，那么由此他们就会得出结论，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在发言中可以谈这一点，在报告中也可以着重谈这一点，但是否需要写进提纲，我不知道。这一点可以不完全这样来使用。重心在群众工作上，在群众组织上。否则不为群众起义做准备，就没有任何高潮可言。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65，第 1、3、10—11 页。

打字稿，原件。

12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不晚于1928年7月25日^①于莫斯科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再次把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的实际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途径。

目前，基本上不存在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反帝运动不断加强，罢工斗争有所活跃，农民持续发动的情况下，执行这个路线，要求党鼓足干劲，实现党的口号，做大量组织工作来巩固革命工会和农民协会，尽可能适应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做日常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向无产阶级做过去的革命时期的经验的强有力说明工作。党应该向群众说明，不推翻国民党和军阀政权，不建立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改善他们的地位，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

党应该利用工厂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村里农民和地主之间、军队里士兵和军官之间的每一个冲突，哪怕是最小的冲突，通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英文译稿标明的（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365，第104—108页）。

过这些冲突来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并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使用暴力的一切机会，利用凶狠的反动派的一切黑色的血腥恶作剧^①，来扩大民众对统治阶级的群众性抗议行动，以便从将来革命高潮一开始就成为群众运动的唯一公认的领导者。

争取群众工作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建立在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基础之上的策略执行的成功程度，以及对党内发生的错误和极左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等）及机会主义情绪（其表现是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和恢复针对国民党的群众运动^②的要求）克服的成功程度。

此外，党应该同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问题的错误提法作坚决的斗争，反对承认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反对在农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消灭城市的倾向，反对贬低无产阶级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同时党应该克服它脱离劳动群众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包含在用强迫命令方法来取代对群众的说服教育方法的做法之中。

党应使用以下口号来争取群众：

- （1）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
- （2）没收外国企业和银行。
- （3）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情况下统一国家。
- （4）推翻军阀和国民党政权。
- （5）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

（6）实行8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救济失业者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① 在更早的文件草案中下面是：不是为了在每一个场合都一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356，第168页）

^② 见第123号文件。

(7) 没收所有地主土地。耕地归农民。

(8) 给士兵土地和劳动机会，改善士兵群众的生活。

(9) 取消所有政府的、军阀的和地方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制。

(10) 同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联合。

党应该进行积极的斗争，争取领导反帝运动；把广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揭露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支持帝国主义的力量；把反帝斗争同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党应该说明，反帝斗争同夺取土地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

没收所有地主土地，并将其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

战略方针是：主要敌人是地主、土豪，劣绅；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盟友。在现阶段加剧反富农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抹杀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①。一旦农村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同富农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党应该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剥削者阶层。

支持、深化和联合农民游击运动。把它纳入到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而斗争的轨道。协调农民运动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

建立工农军队（在目前，由于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这是可能的）的工作，应是党在游击运动所波及到的农村和特别是在苏区的工作注意的中心。这项工作的成功可能是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加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更加重视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委员会），巩固无产阶级在其

^① 在更早的文件草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同“半地主的富农”的阶级斗争。

中的领导作用。把秘密农民社团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消灭反动上层的影响。

支持农民运动的部分口号，如抗税，反对在不交租金或要求减少租金方面闹纠纷，等等。

在军事工作方面，党应该组织广泛的运动来反对军阀战争，同时宣传把这种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党应该争取瓦解军阀军队并把士兵群众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对工农群众实行军事化。

在党内工作方面，党应该争取恢复被反动派摧毁的支部和地方党委；要特别重视在大型工厂中的最重要生产部门建立党组织（支部）的工作。

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地下工作条件的允许程度来保证党内民主，实行建立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的方式的方针；同时反对某些组织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导致破坏党的纪律，滋长不负责任行为和损害党的领导中心的威信。

随着党员群众政治水平的提高，要加强对他们的理论教育工作；要组织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以前阶段（武汉时期、广州起义等）经验教训的系统宣传工作。

（谭平山和汪精卫的）“第三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工具，对于这些党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这些党派在群众性反帝运动实践中充当发号施令阶级代理人的行径。

全宗 493，目录 1，卷宗 162，第 1—2 页。

打字稿，副本。

1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35 号 （特字第 34 号）记录

（摘录）

1928 年 7 月 26 日于莫斯科

听取：5——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8 年 6 月 11 日会议第 29 号记录，决定：18），（报告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5——采纳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给中国共产党拨 6 个月经费 34 万卢布，计入以前拨给的 9 万卢布，不足的 25 万卢布，靠以前拨给中国工作的款项的结余部分和已经拨去但还没有使用的款项解决。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6，第 116、11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 处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 代表大会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28年7月31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敬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你们第54号通告^②。请你们注意第54号通告17条要求中提出的3个口号。这3个口号，在我们看来是不对的。对其必须加以批判，并告知地方组织。这3个口号如下：

第一个口号是要求恢复“民众运动”。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从第三党武库中拿来的。关于恢复民众运动问题的提法本身说明，这个口号是针对国民党的。民众没有停止运动。迫于反动派的压力，改变了运动形式、运动规模，但没有停止。国民党确实不准搞民众运动。如果说在不准搞“民众运动”之初，在实行更加严重的恐怖情况下，我们需要号召民众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并提出抗议来再一次揭露国民党这个民众运动的敌人，那时向国民党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现在国民党在这方面

^① 文件稿是由米夫于1928年7月24日起草的，并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和皮亚特尼茨基。

^② 指1928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54号通告：关于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66—277页）。

已经充分暴露了自己，向它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的要求，只能在劳动群众队伍中造成只有在国民党保护下才能开展民众运动的错觉。因此，与开展民众运动和使其取得某种合法化有关的口号，不要向国民党提出，而要向民众自己提出。这样，这个口号应表述为号召民众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并在暗地里争取合法地位。

第二个口号名为实行民众政权。接着作出如下解释：“乡县市由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及小商人学生等穷苦民众代表会议选举之”。

显然，通告作者在以这种形式提出与组织政府有关的口号时，是想以自己对民主政权的理解来与南京政府头目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说法相对抗。但是他们取消了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停止宣传的苏维埃口号。用民主政府取代苏维埃口号的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更何况被宣传的政权的阶级基础在不断扩大。看来，通告作者仍有存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觉，没有考虑到早已发生的阶级力量的分化，他们打算组织能代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利益的政权。

忘却苏维埃口号的内在涵义就在于此。我们应该预先告诫党，由于不能容许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口号，必然会发生对于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偏离。

第三个口号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的要求。我们在前面一点中提出的批评完全适用于这个口号。对于军阀所拟定召开的把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国民会议的揭露和坚决反对，不仅不应导致取消苏维埃政权口号，而相反更加强有力地宣传这个口号。

现在需要特别注意反对“第三党”的斗争，因为它会给人造成错觉和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第三党虽然现在反对南京，但它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40，第 156 页。

打字稿，副本。

124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8月10日于莫斯科

密信

上海

致阿尔诺^①同志

1. 可以拨给中共下半年经费 128205 美元（除掉已寄给应急的 46000 美元）。
2. 请暂时按老的预算给日共拨款。日内预算委员会将讨论日本问题，届时再告知。
3. 请按老的预算给朝共拨款，如果基本上还存在这个党的话。
4. 给中国共青团拨第三季度经费 3653 美元。
5. 给中国共青团拨第四季度经费 3666 美元。
6. 给日本共青团拨第三、第四季度经费每季度 256 美元，共 512 美元。
7. 给朝鲜共青团拨第三、第四季度经费每季度 231 美元，共 462 美元。
8. 请拨给中国共青团支援款 5128 美元。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14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125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
代表大会代表团核心小组
会议第3号记录^①

（摘录）

1928年8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核心小组成员：布哈林、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核心小组候补成员：戈帕奈尔同志。

代表团成员：波波夫、希塔罗夫同志。

听取：12——中国代表团的请求。

决定：12——派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同中国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谈。

联共（布）代表团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1928年8月11日会议第3

号记录，决定：12附录

绝密

1928年8月6日

① 文件副本寄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致联共（布）代表团

请派贵代表团一名负责同志同中国代表团核心小组在本周内讨论以下问题：

（1）允许旅苏中国同志加入联共（布）问题（包括在华苏联同志问题）。

（2）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为中国同志开办的共产主义学校的相互关系。

（3）将旅居苏联的中国同志召回中国的程序。

（4）旅苏中国同志反对派集团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5）出版（特别是供中国利用的）关于苏联建设和俄国革命的宣传材料问题。

（6）苏联对远东和对华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东铁路等）。

（7）中东铁路上的职工运动。

（8）联共（布）驻哈尔滨省委^①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9）外蒙古问题。

中国代表团主席 斯特拉霍夫^②

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66，第 1—2、33 页。

记录为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录为英文手稿。

① 原文如此。

② 瞿秋白。

126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8年8月14日于上海

亲爱的朋友米哈伊尔^①：

我拿定主意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而情况要求您立即进行干预。

从我动身时起，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尽管不止一次地写信和发电报，都没有收到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的任何答复，因此我们不得不担惊受怕和冒险地进行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必要造成这种情况。

例如，我收到很多关于派遣孙逸仙大学^②学生的互相矛盾的电报（要么说根本不派，要么说什么时候将派遣，等等），把我们弄糊涂了。要知道，电报费是很贵的，一个字1个卢布65戈比。尽管不止一次地提意见，电报加密还是很马虎，所以往往根本无法解密。

曾派安里^③同志来给我帮忙，但突然又指示他返回，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他在上海有企业，在银行里有户头，并且有人给他寄来了价值10000马克的包裹。我在这个时候尽管被认为负有责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

③ Я. М. 鲁德尼克。

任（见书面契约^①），但既没有通知我在哈尔滨发生什么变故，也没有告诉我是撤回安里还是临时把他召回。再有，有人电告我，通过桑德（别尔津）^②给我寄来 35000 美元。我发电报询问这些钱的下落，但没有人答复我。我询问拨出了哪些经费用于派遣学生？没有人答复我。其实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做解释。这就是说，事情是在某个地方受阻了。我曾利用一切机会给您和阿布拉莫夫写信，但至今您一次也没有尝试同我们联系。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不得不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总的来说，是否值得把整个这个菜园围起来？在这里为建立这种联系支付的巨额开支是否会得到补偿？

为了使您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我想简要地谈谈我们这里采取的措施。

我们有一个相当像样的企业，我们利用这个企业来获取资金和某些材料^③。这个企业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价值很小。我们决定根据以下考虑来发展它：为了避免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我们应在这里设立 4 万到 5 万卢布的常设储备金。这从两个角度看是有必要的：

1. 如果在银行里没有相当规模的活期存款的话，绝对无法兑付约 100 万马克这样大额的款项。

2. 这种储备金同时也是我们企业的业务资本。我们的业务是进口和出口。我们根据欧洲公司给我们寄来的样品从当地中国公司那里得到订单。我们带着这些样品为我们的客户服务，因为我们能满足于不很大的收入，所以我们的订单会不断增加，我们的事业必定会兴旺起来。同时应该指出：我们实际上并不使用自己的资本，而是使用订户预付的订单保证金和银行的贷款。当你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02 号文件。

③ 大都会贸易公司。

好的合同时，银行总是愿意为你效劳的。

银行提供贷款的事实就表明，订货的商人是好人。另一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兴趣要把事情处理成这样，使得我们能够拿到尽可能多的贷款，因为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我曾在自己的信中和通过一些人口头上请求给我作出指示：怎么办？为了事业，我必须要有储备金，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动用，尽管您允许存 10000 卢布。但另一方面，如果我的企业不是很体面，我就无法实行我们的计划。我向银行作出声明，说我有个人资本达 15 万卢布，部分是现金，部分是这里的和在路上的货物。为了哪怕以一定的形式来证明我们每月达 10 万卢布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抵补的，这样做是必要的。一般说来，在这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组织我们的企业。要么我们全收现金，不通过银行，我们只维持小规模的商业企业，即用来为我们在这一居住作某种辩解的招牌；要么我们像样地进行贸易，那时就可以通过银行周转一切款项。第一种方法当然是很危险的，此外，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们能利用满洲的通道。第二种方法，如果从法律上对其作出很好安排的话，可能几乎一切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为此需要您给予我们一些帮助。

是什么帮助呢？首先，您要允许发展这项事业。其次，必须给这里派一位懂商务的很有威望的（不错的）欧洲人，在法律上他可以以企业主之一的身份在相应机关注册这个企业。

3. 要规定，每月可有多少钱花在我们的直接目的上。再有，要想办法在欧洲给我们物色几位有威望的商务顾问。我认为，不难在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瑞典和荷兰等随便哪个国家找到有很深商务阅历的友好人士来做我们的顾问。再者，为了不使用特别的资金就可以像样地经营我们的企业，我们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让我们一些公司（诸如纺织辛迪加、苏联商船队）的代表权。当然，如果向这里派遣一位有威望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这样做会彻底使我们的事业完全不受侵犯。我请求向熟悉中国而不是欧洲的

人打听一下，对于这种企业的工作来说这里的条件如何？宪法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利的。如果我们自己办事不拖拉，如果我们不晚办法律注册手续，那么几乎一切都会是百分之百有助于我们不受我们敌人的侵犯。不管怎样，我请求您立即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以便我知道怎么办。但不管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如何，我都请求进行以下工作：

(1) 采取措施，保证同我们的通信慎之又慎。

(2) 清除那些不知为什么认为自己有权领导我们的多余人员。所有这些干预、多余的电报等等都会给我们帮倒忙。

(3) 采取措施，不要把预算按需要用电汇方式寄给我们，而要用通常的银行转帐方式，并且要在不催要，而且不是一个人不催要，而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人都不催要（当然弗里茨^①，他的母亲或他的兄弟也不催要）情况下定期寄出。

(4) 要从柏林和其他国家给我们寄来足够数量的电报挂号。

(5) 每份电报都要有自己的解密法，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不便保存电报。

(6) 让在柏林运作的公司^② 不要同与我们相类似的其他机构合作。

(7) 要为这个公司设立较好的监督机构，使它不搞太大的开支项目，并按时把我们订货的公司给它的所有折扣转给我们。

下面是直接与我们的事业有关的一些准则：

1. 请只给我们这里派能当欧洲人用的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但无论如何不能派“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等。

① Ф. К. 费尔格德。

② 中国贸易公司。

2. 请给这些人作指示，告诉他们应与所有“邻居”^①保持较远的距离，并且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干预财务工作（找奥莉加^②和公司）。

3. 请按时给我们寄预算委员会会议记录摘录，以使我们明确的指示。

4. 请不要给我们下达立即支付各种“特殊”津贴的这种非常繁重的差事。看来弗里茨已把所有人的地址等都告诉您了。到这里来的任何人一开始都要在“宫殿”旅馆停留，也可能在“巴林顿”旅馆停留。然后在白天打188—24号电话，打听某种商品，但顺便说一下，只有哈贝尔^③接电话时才应该说，他是从巴黎米歇尔那里来的，或这类的话，无论如何不要让他直接到企业或住处来。

收到此信后请电告。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495，目录23，卷宗50a，第97—99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处和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

② O. A. 米特凯维奇。

③ A. E. 阿尔布列赫特。

127

阿尔布列赫特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不早于 1928 年 8 月 15 日^② 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朋友们：

利用机会谈谈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这里的最重大事件是：

- (1) 国民党全会^③ 刚刚闭幕。
- (2) 罢工运动高涨。
- (3) 反日运动。
- (4) 承认国民党政府现状。
- (5) 华南开始闹饥荒。

我按顺序说。这次全会召开时，会前的斗争就清楚表明，这次会议是雷声大，雨点小。会前发生了一系列丑闻。后来在会议开幕前夕，阎锡山突然“病了”。会前，所谓的“左派”集团提出了让汪精卫、叶夫根尼·陈^④、孙逸仙夫人^⑤、顾孟余和一系列其他左派人士回来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不管怎么说也未能被广西派和右翼西山会议派^⑥ 接受。因此全会不是在预先确定的 7 月 15 日而是到 8 月 5 日才召开。会议期间，湖北的主人李宗仁和另一些

① 文件中有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寄给布哈林、莫洛托夫、斯大林和米夫同志。

②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闭幕日期。

③ 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1928 年 8 月 8 日到 15 日在南京举行。详见《国民党第五次全会（资料）》，载《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 1928 年第 16 期，第 3—58 页；《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 册，北京 1986 年，第 115—146 页。

④ 陈友仁。

⑤ 宋庆龄。

⑥ 指参加 1925 年 11 月 3 日至 1926 年 1 月 4 日在（北京附近）西山举行的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些人主张把中共党员开除出国民党，罢免鲍罗廷的国民党中央顾问职务，组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

著名右派人士从南京跑掉了，由于不够有效人数，会议又不得不停止工作。蒋介石不得不专程来到上海，说服他们回去。当然，所有决议照例都很庄严，谈到同各国的平等条约、撤消省政治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政府、解散大部分军队、取消厘金^①等等，以及一大堆其他建议，一个比一个好。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无可辩驳和确凿无疑地说明，国民党在为帝国主义者效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者哪怕是对现状的承认，国民党竟什么都表示同意。后来又弄清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团结一致的局。在北京，取代阎锡山，奇迹般地出现了白崇禧。他现在甚至被任命为平津专区军队总司令。当然，这不无帝国主义者和整个桂系集团的帮助。广西人在全线凯歌高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北京和天津都在他们手里。蒋介石的处境极其危险。他已经得了“牙痛病”，在住院治疗。有各种理由认为，他很快就会去外国治病。冯玉祥的处境也不妙，现在他客居南京。首先他对未能实现他占领北京和天津的美好愿望感到很失望。但这还不够，他还被逐步从他所占领的北方省份排挤出去。他不得不到南京，并且这里给他提供了军事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每天都在发表演讲，说他在北伐期间，总共只积攒了几十美元，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他已无所事事，报纸上报道说，从国外邀请回来的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要来上海，也就是说右派要急于混入政权。现在白天的“中心人物”还是外交部长王正廷和财政部长宋子文。这两个人在拼命奔走呼号。王试图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来为中国造福，这些不平等条约显然反映在日前英中之间所签署的杜绝发生南京事件^②的备忘录之中。这个备忘录是国民党过去签署的协议中最可耻的一个。当然把发生事件的全部罪责都

① 见第 352 号页注②。

② 见《中国年鉴》（1929—1930），第 895—897 页。

推倒了共产党人身上，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但为此英国人许诺，他们同意开始就修订商务条约问题进行谈判。

现在在南京云集了大批外交官。继美国发表声明^①后，所有国家都争先恐后发表声明，表示它们同意开始就修订商务条约问题进行谈判。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丹麦人已经来到南京。外部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例如，取代国民政府关于停止执行同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条约的声明，提出了关于组织混合法庭的声明，说这些国家的代表无权在混合法庭中开会，中国法庭对这些国家的公民拥有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些国家的领事馆代表不仅不接受这个决定，而且当中国法官拒绝同他们一起开庭时，他们竟在没有法官出席的情况下自己审理案件，并当即结案。现在法庭屈从于他们的要求，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在法庭中开会。日前英国也表示，它打算修订条约，试图占领与香港毗邻的三个城市，借口是保护英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实际上是见日本人占领山东后要为自己找补偿。

宋子文的情况更糟糕。他大肆宣扬中国工业进入新时代，取消厘金，进行大规模财政改组，保护本国工业，建立统一币制，等等，等等，而实际上捐税在日益增加。在许诺降低捐税和取消厘金的同时，还在以前没有厘金的地方确立新的厘金并提前征收战争赔偿款和捐税。解散军队当然也是虚假的，是那些无力支付军费开支的将领的军队在解散。但与此同时，还在建立新的军队和招募大量新兵加入有地方主义思想的将领的军队。如李济深和李其金（音）^②仍在往自己的军队里招募新兵。一句话，一个许诺也没有兑现。一切照旧，并且所有所谓的“朋友”彼此开始争斗的时刻已为期不远。

① 指美国政府1928年7月24日关于准备修订同中国的条约的声明。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李宗仁。

反日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其原因绝不是政府的促进，也不是我们党的积极活动。政府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个运动，但遇到了两个方面的抵制，一方面，美国竭力支持资产阶级，实际上试图夺取大部分日本贸易份额。当然，抵制日货对此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开展了强有力的发展自己工业的运动，并且宣传购买本国商品。这两个运动无疑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可以看出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某种消极情绪。给我们的同志提出了积极开展运动、组织示威游行等建议，但无论如何都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现在的情况是，毫无疑问是可以做点事情的。不过，我们队伍中的消极情绪是很大的。应该承认，我们党几乎没有积极分子。工人不敢采取行动。我们有几个同志在工人反日宣传委员会里，但是他们的发言实际上与改良主义分子没有任何区别。现在可以看出罢工运动有某些加强。但所有这些罢工都只带有经济性质。不过利用目前的形势也可以使总的政治斗争取得很好的效果。可是我们做工作很少，或者说几乎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根本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我们只习惯于搞起义，任何争取群众的工作，从罗米纳兹^①、奥莉加、海因茨等人开始就认为是“下等工作”。我们的同志在一段时间以前又悄悄地尝试把“活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如在同中国同志的一次会晤中，有人问我：我是否认为革命又在走向高潮，应该把直接行动提上议事日程？我写了一封短信作答（当然是以个人名义），现附上^②。

最后，我想告之，我们收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中国代表团的电报很不清楚，很乱。这些电报说，不能提出关于群众运动合法化的问题，因为这会使国民党的幻想死灰复燃。

① 接下来相应的是 O. A. 米特凯维奇和 Г. 牛曼。

② 文件没有找到。

然后还说，不能提出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等等^①。我个人认为，电报中有点什么搞错了，因为我认为，作为向群众提出的口号（而不是向国民党提出的请愿书，而且是在宣布国民党是叛徒并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口号中提出的），提出关于群众运动合法化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国民会议问题，我认为，这个口号应该提出，因为现在在国民党试图组建由军阀集团选派代表参加的某种议会时，提出这个口号是完全适宜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完全理解这个口号，而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要求召开民族立宪会议。据我所知，列宁从来不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苏维埃的斗争对立起来，而相反，认为从一个斗争中可以产生出另一个斗争。我认为，你们有必要解释一下问题的提法。

根据你们的电报^②，我曾想同老头子^③谈他去你们那里的问题。我本人未谈成。但我们的一个朋友^④见到了他。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等瞿秋白和周^⑤回来后，他再决定这个问题。

最后，我请求尽快派一名同志来领导党的工作。但是我要求这名同志懂一种欧洲语言（不是斯拉夫语），以便他直接从柏林而不是从莫斯科来这里（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们不认为这个要求恰当的话，我认为需要提醒你们，不要把奥莉加派到这里来。我深信，她的工作只能给党带来损失。

致同志式的敬礼！

（签字）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a，第 88—90 页。

打字稿，副本。

-
- ① 见第 123 号文件。
 - ② 见第 119 号文件。
 - ③ 陈独秀。
 - ④ 何人不知。
 - ⑤ 可能是周恩来一译者。

128

苏兆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8年8月18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亲爱的朋友们：

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中国代表团协商后，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军政训练班毕业的中国学员当中，挑选出28名最坚定的党员同志，留在莫斯科，上为期2至3个月的破坏工作和地下活动技术的专门培训班。

我们无需来谈中共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多么需要这类工作人员。

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允许举办这种培训班，并为其拨出必要的30000到35000卢布的经费，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掌握。详细预算，一旦需要，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

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有了办培训班的场所。

请尽快将你们的答复告诉我们。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中共代表团 周^①

全宗514，目录1，卷宗369，第83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手稿上有中文署名：苏兆征（全宗514，目录1，卷宗369，第84页）。

129

瓦西里耶夫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28年8月27日于莫斯科

致东方书记处

(抄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我请求将中共六大决议案提交东方书记处最近一次（或专门）会议讨论。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审议关于职工运动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对于这三个决议案，我本人有以下意见。

职工运动问题决议案

(1) 整个决议写的很不经心。有许多不一致和不准确的地方，这在一些场合也具有政治意义。例如，在第一页上，第一句说，自1925年起，中国无产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引导力量”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如果它同领导权的意思相同，那说中国无产阶级自1925年起就起领导者作用就不对了。如果“引导力量”这个术语同领导权的意思不一样，那它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理解？第二节和第三节开头谈到工会组织的委派制度，是由于党的总的政策不正确，缺少足够的积极分子骨干等等所致，而第三节结尾（根据中国同志的建议，硬加到格列尔草案中去的）却说，在困难的秘密状态下，党不得不在工会组织中实行委派制。还可以举出几十个这种校订不经心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如果拿着

铅笔把决议从上到下校订一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掉的，我认为必须这样做。除了这些小的校订不经心的地方外，我认为，还应该指出在决议结构上的两个也应予排除的主要马虎之处：（1）决议叫职工运动决议案，而所谈的都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和斗争的问题；（2）决议部分写得像工会代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内部任务的决议案，部分写得像党关于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的决议案。

（2）整个决议是根据中国武汉革命时期的情况起草的，当时中共依靠拥有数百万会员的群众性革命工会组织，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黄色工会组织。在六大上，正式报告人报告说（包括格列尔同志在内，谁也没有驳斥他们），武汉时期后，工会组织数量从734个减少到81个，我们的地下工会组织未必真的还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报告人还报告说，到1928年，在中国有14个群众性的黄色工会组织，69个非群众性的黄色工会组织。

（3）决议不知为什么断定（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和整个国际实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工厂委员会在中国不能成为职工会的基层组织。根据这个奇怪的观点还提出了更奇怪的组织方面的观点：工厂委员会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最初形式，通过它来建立某种工会支部，作为革命工会的基层组织形式。我建议摒弃关于工会支部的这种臆想，并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总的框架来修改决议案中的相应地方。

（4）在第26节中，必须修改有关党和工会相互关系的地方，以使这些地方也同共产国际的相应决议一致起来。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

我不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十分周到的考虑，来对这些文件作出全面的评论，但就是对我这样一个对中国土地问题没有研究的人来说，也完全看得出，所说的两个决议案需要进行非常认真的校

订和完善。

(1)对土地问题决议案总的看法是，与其说它是政治决议，不如说它是一篇肤浅的文章。对准确性的评论使人提出很多的希望。例如，决议（第5节）反对“把整个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说成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制度”，同时（只有下面第6节第5段和第7节第2段的几页）谈到商业农业的强劲发展、急剧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等等。中共和国农民应该相信这些说法中的什么呢，再如，第5节第3段明显把中国和欧洲作了错误的区分，这证明决议作者起码是政治文盲。我还有一些类似的意见，但在这里我只讲这些，以证明有必要对决议案作仔细的修改。

我还要指出，有一些提法根本没有意义，例如第2节第4段说：“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2)我认为，说在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在客观上是争夺农场主经济的斗争，这是不对的。

(3)决议在分析农民的分化时，没有试图判断每一类农民的比重和政治作用，显然，完全有必要这样做。

(4)第7节第15段说，“已经获得政权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高度组织性和觉悟，必然会立即向他们提出，要准备条件抓紧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问题，就是说，要准备条件，去实行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和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调节去取代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与这个完全背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一切决议（而与托洛茨基的相应观点相一致）的说法相联系，同一节第19段作出结论说，“现在在中国土地制度中出现的劳资纠纷，就是现在，已经向中国农业工人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将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阶层一起在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去与农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作斗争(黑体字是我加的——瓦西里耶夫),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从援引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中农根本未提及,作为目前的任务,直接提出了贫农委员会问题,我认为,不用作任何解释,这是完全错误的。

(5)与上面援引的土地决议案中的几段话截然不同,农民问题决议案向中共提出了“争取将富农吸引到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的任务,并说明了“为什么中共不应加剧对富农的斗争”。这段话明显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现在要开始同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论断完全相悖,此外,不用作任何解释,它也是明显不对的和不可行的。

(6)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建议把平分土地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形式,但完全绕开了在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怎么办的问题。

(7)在农民问题决议中,建议提出平分土地问题,条件是大多数农民赞成这个口号,但在同一节(第3节)中提出,“同时对这个口号要加以批判,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

怎么能把这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呀:同时保护和批判同一个口号。决议未作说明。

(8)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在谈到农民协会的段落里,根本没有谈巩固无产阶级和贫农在农民协会中的基础问题,也根本没有谈党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这是很大的疏漏。

(9)关于农民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问题,没有谈什么具体的东西。

(10)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谈游击斗争问题时,没有同共产国际关于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总的论点联系起来,这会造成盲动主义的结论。

(11)结论如下:我只是粗略地列举了上述决议案中的一些不足。其中还有许多错误和不符合要求的地方。但我认为,上面谈到

的足以说明，这些决议案在寄往中国之前，必须认真加以讨论和作出大的修改。

瓦西里耶夫

全宗 4，目录 1，卷宗 349，第 95—9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页数=543

SS号=11039386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部分：向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策的转变(1927年7月-1928年8月)

1.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1927年7月16日)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1日)

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18日)

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1号(特字第99号)记录(摘录)(1927年8月25日)

5.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8月26日)

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2号(特字第100号)记录(摘录)(1927年9月1日)

7. 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1927年9月5日)

8.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

9.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

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摘录)(1927年9月15日)

11. 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27年9月20日)

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第103号)记录(摘录)(1927年9月22日)

13.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9月24日)

14.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27年9月27日)
15. 库诺夫给索洛维约夫的信(1927年9月27日)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6号(特字第104号)记录(摘录)(1927年9月27日)
17. 弗赖耶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面报告(1927年9月)
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日)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47号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日)
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文件(摘录)(1927年10月6日)
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特字第106号)记录(摘录)(1927年10月6日)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10月11日)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9号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3日)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51号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4日)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摘录)(1927年10月14日)
26. 希塔罗夫给沙茨金的信(1927年10月14日)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2号(特字第110号)会议记录(摘录)(1927年10月27日)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52号决议(摘录)(1927年10月28日)
29. 布哈林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摘录)(1927年10月31日)
30. 牛曼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11月)

29日)

31. 波赫瓦林斯基给加拉罕的电报(1927年11月29日)

32.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11月)

33. 普利切给加拉罕的电报(1927年12月3日)

34. 佩佩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12月5日)

3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927年12月5日)

36. 特里利塞尔对牛曼发自广州电报内容的报告(1927年12月9日)

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9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6—17日)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9号(特字第116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6—17日)

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2日)

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3日)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号(特字第2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3日)

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27年12月23日)

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9日)

4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3号)记录(摘录)(1927年12月29日)

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号(特字第4号)记录(摘录)(1928年1月5日)

46. 越飞给索洛维约夫的信(1928年1月6日)

47.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和琼森的信(1928年1月10日)

48. 洛佐夫斯基给米特凯维奇和琼森的信(1928年1月10日)
49.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8年1月10日)
50.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28年1月17日)
51.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信(1928年1月23日)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67号记录(摘录)(1928年1月28日)
53.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和结束语(1928年1月31日)
54. 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价》(1928年1月)
55.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
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记录(摘录)(1928年2月2日)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28年2月4日)
58. 索洛维耶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6日)
59.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6日)
60.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
61.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28年2月13日)
62.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2月15日)
63. 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1928年2月15日)
64.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会议第3号记录(1928年2月22日)
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摘录)(1928年2月23日)
66.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第17号记录(摘录)(

1928年2月27日)

67.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27日)

68. 琼森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1928年2月27日)

69.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8年2月29日)

7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

71. 米特凯维奇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28年2月)

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号记录(摘录)(1928年3月1日)

73.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3月2日)

7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8年3月7日)

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1928年3月15日)

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5号(特字第14号)记录(摘录)(1928年3月15日)

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记录(摘录)(1928年3月22日)

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号(特字第15号)记录(摘录)(1928年3月22日)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会议第1号记录(1928年3月22日)

80. 米夫给加拉罕的信(1928年3月23日)

81. 诺林与向忠发和苏兆征关于中国宣传鼓动工作的谈话记录(1928年3月28日)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1928年3月29日)

83.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

84. 米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4月6日)

85. 布哈林给米特凯维奇的电报(1928年4月7日)

86. 瓦尔加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初稿(1928年4月7日)
87.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4月10日)
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特字第20号)记录(摘录)(1928年4月19日)
89.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定(1928年4—5月)
90.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5月1日)
91.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28年5月3日)
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不晚于1928年5月4日)
93.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1928年5月4日)
94.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5月7日)
95.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1928年5月7日)
96. 琼森和布劳德给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书记处的信(摘录)(1928年5月8日)
97. 中国共产党代表给农民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5月16日)
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特字第24号)记录(摘录)(1928年5月17日)
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6号记录(摘录)(1928年5月24日)
100. 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8年5月25日)
101. 向忠发和苏兆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5日)

102.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1928年6月6日)
103.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初)
104.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
105.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早于1928年6月11日)
1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委员会会议第102号记录(摘录)(1928年6月12日)
107.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1928年6月12日)
108. 米特凯维奇关于给中国工会拨款的证明(1928年6月12日)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9号(特字第28号)记录(摘录)(1928年6月14日)
1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飞行表决记录(摘录)(1928年6月14日)
111. 米夫给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的信(1928年6月14日)
112. 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
1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0号(特字第29号)记录(摘录)(1928年6月21日)
114.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
1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1号(特字第30号)记录(摘录)(1928年6月28日)
116.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
117. 米特凯维奇的书面报告《中国苏维埃的经验》(1928年7月10日)

118. 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
119. 米夫给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1928年7月24日)
120.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摘录)(1928年7月25日)
12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不晚于1928年7月25日)
1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5号(特字第34号)记录(摘录)(1928年7月26日)
1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28年7月31日)
124.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8月10日)
125. 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1928年8月11日)
126.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8月14日)
127.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928年8月15日)
128. 苏兆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8月18日)
129. 瓦西里耶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8年8月27日)
- 附录页